

刘东方  
主编

# 冰心 论集

2016



下 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冰  
心  
论集



## 《冰心论集2016》编委会

主 任 张作兴

副主任 陈毅达

主 编 刘东方

选 编 邱伟坛 鲁普文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东方 刘冰冰 李 清 邱伟坛 张 颖

张作兴 陈明渊 陈毅达 林幼润 练建安

黄文明 黄水英 鲁普文 熊 婷

# 冰心论集

2016

下册

刘东方 主编

冰心

福建省图书馆  
藏书



3492508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心论集. 2016/刘东方主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550-1266-5

I. ①冰… II. ①刘… III. ①冰心(1900—1999)—作家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7728 号

## 冰心论集 2016

---

刘东方 主编

责任编辑 莫茜 刘徐霖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建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市金山浦上工业区冠浦路 144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650 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266-5

定 价 150.00 元(上、下册)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第三辑 非文本研究

## 金坚玉洁的友情

- 冰心与巴金往来书信读札 ..... 周立民 ( 3 )

## 名人日记与冰心行实论纲

- 从冰心在昆明的门牌号说起 ..... 凌孟华 ( 11 )

## 冰心日记中的时代生活

- 解读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冰心的日记 ..... 刘 嵘 ( 27 )

## 冰心和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成绩之研究 ..... 步起跃 ( 59 )

## “后卫思想”的先驱者

- 以谢冰心、巴金的知心朋友中岛健藏为例 ..... 虞 萍 ( 68 )

## 关于包贵思

- 以与冰心、杨刚的交流为中心 ..... 牧野格子 ( 92 )

## 冰心故乡考 ..... 施晓宇 ( 100 )

## 冰心女士二三事 ..... 秦贤次 ( 116 )

## 谢冰心家世略考 ..... 鲁普文 ( 120 )

## 第四辑 翻译与传播

## 冰心翻译的世纪回眸

- 译著的人文关怀及其他 ..... 陈 恕 ( 129 )

冰心与《吉檀迦利》中译本

——兼论《吉檀迦利》孟、英、中版本的文化关联及意义·····

····· 李 娟 (139)

泰华“小诗磨坊”对冰心《繁星》与《春水》诗艺之借鉴·····

····· 萧 成 (156)

冰心文学作品在泰国的传播····· 陈婷婷 (173)

## 第五辑 冰心研究之研究

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与精神风骨

——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 李 玲 (177)

关于《重庆时期冰心的创作与活动研究》的说明····· 熊飞宇 (187)

论冰心文学史形象的建构和嬗变····· 温奉桥 李萌羽 (191)

当“超人”成为问题

——冰心《超人》的百年研究历程回顾····· 洪丽霖 (202)

冰心和后冰心

——冰心文脉的当代传承与新变····· 盛 英 (221)

## 第六辑 社会学研究

内生的活力与共生的秩序

——燕京社会学派视角下的边疆土司、民族区域自治与一带一路外部效应····· 张海洋 (245)

“后魁阁”范式：中国乡村研究的当代取向····· 谷家荣 (250)

## 综述（代跋）


冰心研究的新收获

——冰心文学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东方 鲁普文 (266)



第三辑

非文本研究





## 金坚玉洁的友情

### ——冰心与巴金往来书信读札

周立民

#### 一、恕我不称他为“巴老”

“我把你给我的信都用一个盒子装起来存着，因为你一辈子只讲真话，我知道你对我的情谊，也句句是真话。”这是冰心写给“巴金与二十世纪研讨会”的贺词，那是1994年的春天，北京全城飘着柳絮的季节。

我当时还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那个名流云集的会上，很多在文学史上读到的名字都变成活生生的人站在面前，可以想象我的激动与兴奋。印象中，冰心的贺词是在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中宣读的，作为文学的老祖母和巴金先生的朋友，她的分量不用多说，然而冰心的表述方式与其他前辈似乎不一样。比如曹禺给这次大会的题词：“你是光，你是热，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很多人都是用这样的字句评价巴金，而冰心在这么隆重的大会上，居然这么轻松地从巴金给她的信谈起，如同拉家常，然而老太太马上点到了巴金晚年最看重的“真话”，又把它与他们非同寻常的友情联系起来，寥寥数语，举重若轻，又亲切自然，真是不简单！

我还记得冰心曾幽默地说：“我和巴金——恕我不称他为‘巴老’，因为他比我还小几岁，我一直拿他当弟弟看待……”（《贺叶巴两位》）有时候，老大姐还会给巴金下“命令”：

巴金：

北京166中的前身是我母校贝满女子中学，现在是男女合校，高考成绩是北京中学上等（我是名誉校长）。九四年是他们一百三十周年，要你题

词，托我转上，请你无论如何说一句话，寄我转就可以。我近来身体不太好。吴青明年七月才回来，寄爱！

冰心

十二、廿七、一九九三

“无论如何说一句话”，没有条件可讲，义不容辞啊！了解巴金情况的人都知道，巴金从1980年代初患上帕金森氏症之后，执笔无力，写字困难；更不愿意做名人去题词，所以题词、开会之类的事情早在禁绝之列，这些冰心当然很清楚，他们在信中还曾交流过做“名人”的烦恼，当时的文坛，恐怕只有冰心的资历和地位才可以这样让巴金写字，而且连句客套话也不用。而巴金不但乖乖地写了，而且还得回信检讨：“很想多写几个字，手指动不了，请原谅，写不下去了。”（巴金1994年1月1日致冰心）对冰心而言，这面是她的“母校”，那面是她的“老弟”，都是一家人，才有这样的“命令”，而且，从这样的短信中，我们不难看到两人关系之密切，才“无论如何”都得写！——只有老大姐才能说这样的话。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当我坐在上海巴金的“家”（巴金故居）中读着两位世纪老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通信时，常常为两位老人真挚的友情和忧国忧民的胸怀所打动。这些信件的一部分最近发表在巴金曾担任主编的《收获》杂志上（2012年第5期），有相当一批信是首次整理发表。他们的通信和友谊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现存的第一封信是1937年4月9日冰心写给巴金的，当时正是彼此风华正茂时，冰心在欧洲多国旅行，巴金在国内办刊物写文章，老大姐的信的开头就表扬他们这群朋友：“得来信和《文丛》，十分喜慰。知道你和靳以不断地在努力，尤为兴奋。萧乾的文章，越写越好了，应该传令嘉奖。”这批信的最后两封是98岁的冰心用颤抖的手写下的：

巴金老弟：

我想念你，  
多保重！

冰心

1997年2月22日

94岁的巴金三个多月后的回信：

冰心大姊：

我也很想念您！

巴金

九七年六月十一日

为香港回归欢呼！

这些没有任何修饰的字句常常会产生让你热泪盈眶的力量，不能不感慨虽岁月流逝但也埋没不了人间相知的真情。

## 二、你只管挑，你要的我都给你

印象中，冰心和巴金是性格和气质完全不同的人。冰心出生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中，童年充满了温馨的记忆；而巴金则父母早亡，记忆中总有挥不去大家庭各房间钩心斗角的阴影。冰心是大家闺秀，娴雅、清秀，而巴金则是热血青年，热情、激愤。冰心似乎一直在高校、学者名流的圈子里转，而巴金则是无知无业的自由文人。哪怕在晚年，冰心更为快乐、达观，巴金还是在紧张地战斗、不失时机地忧郁……很难想象，他们能够成为那么要好的朋友。

这次发表的信中，有两封是那么有趣地显示了两个人性格和气质的差异：

我总是怀念着你，老朋友不多了，知心人尤其少，我常梦见你，前几夜梦见你到北京来，我带你到我的一间“宝库”里，里面收藏着许多古玩、玉器，我说：“你只管挑，你要的我都给你。”我一边说一边指点给你看。你说：“我喜欢绿色的东西。”我送了你一只大绿色宝石花瓶，还有一只高脚绿玉盘，到此梦就醒了，我好笑，我哪里有一间“宝库”？你也好久没到北京来了。（冰心1989年7月21日致巴金）

她要送给巴金绿色宝石花瓶和高脚绿玉盘，这是老太太的情趣。可是

巴金根本不接老大姐的这个岔，“大煞风景”地谈起他心中的忧虑：

我天天做梦，而且多做怪梦。可是从未见到“宝库”，对宝石更无兴趣。只有几次同您出国访问，至今不忘，仿佛一场醒不了的好梦。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您还可以制造“宝库”，我也能等待您给我的高脚绿玉盘。我已在医院住了五个月，不会太久了。过了八月，总可以回家休息。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您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巴金 1989 年 7 月 27 日致冰心）

大姐知道这位老弟的性格，甚至说过“你在忧郁的时候，实在是你最舒适的时候”（冰心 1992 年 4 月 15 日致巴金），所以也不恼，反而来开导他：

我觉得你的悲观心理，和你从小长大的封建家庭有关，你已经闯出来了，为什么还总是忧郁？我想这也与萧珊早逝有关，人最怕的是孤独。我以为你应该多接近年轻人。我和你的身世不同，从小就在融乐的家庭空气之中，就学时也一帆风顺，老了仍有许多年轻朋友，他（她）也发牢骚，但是这牢骚是向前看的。就年纪而论，老的也熬不过小的。我对国家的将来一点都不悲观。就像北京连日下雪，又总是春阴，我总认为不久太阳出来，就是百花齐放了，这是酿花天气。我记得小时，十二三岁吧，曾做过一首七绝，是老师出的题目，大概是“春晴”吧，我写了“酿花天气雨新晴，蛱蝶翻飞鸟弄声，且喜春池高一尺，晓来荡桨觉船轻”，我劝你还是多往轻快处想。（冰心 1990 年 3 月 2 日致巴金）

巴金也坦诚地说：“我还在想悲观的问题。我感谢您的好意，但是我以为您对我的‘悲观’有误解。我悲观，因为我有病不能工作，写字动不了笔，写字不像字。我悲观，因为我计划做的事大半成为空话，想写的文章写不出来，……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言行不一致，我想向托尔斯泰学习，可是只能做到：通过受苦净化自己。”（巴金 1990 年 3 月 31 日致冰心）“我身体不好，生活杂乱，总是无法摆脱一些无聊事情，想做的事做不了，却有

不少人缠住你让你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人老了，来日无多，时间可贵，偏偏有人在这个时候麻烦你，干扰你，让你做买空卖空的“名人”，我实在痛苦。别人说我忧郁，我佩服您，您会讲，嬉笑怒骂，全讲出来，痛快之至，别人拿您也没有办法。我常常不愿伤人，结果只有委屈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矛盾，也充满烦恼。我说我一直在为消灭矛盾而奋斗，可是我不够坚强，我的奋斗没有用，这成了一句空话。”（巴金 1991 年 6 月 20 日致冰心）只有相知的人才会这样敞开心扉，写此信时，两个人已是文坛重镇，一言一行都被人传播和报道着，然而在这里他们这么坦诚地剖白内心，分析自己的性格，书信中的这些言辞恐怕是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所读不到的。

巴金不是一个话多的人，但在老大姐的面前却总是滔滔不绝。冰心印象深刻的是他们 1980 年春天共同出访日本：

在一个没有活动节目的晚上，小林、吴青和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东京街上游逛。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记得那晚在客厅里，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到午夜，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总之，到夜里 12 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我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觉。（《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冰心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巴金的印象：“我认识巴金是在 30 年代初期，记得是在一个初夏的早晨，他同靳以一起来看我。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作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靳以很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就比较沉默，腼腆而稍带些忧郁，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早期一些作品了，我深深地了解他。”（《他还不停地写作》）为何前后变化这么大？不是巴金的性格改变了，而是两个人随着交往友谊加深了，所以才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 三、您晚年这一段生活照亮了您全生

晚年的巴金和冰心，他们的存在对于中国文坛别有意义：他们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几乎每个重要的关口：从“五四”到“文革”乃至新时

期文坛复苏。不仅如此，在晚年都再次焕发了青春的光彩，巴金有《随想录》，冰心有一批烫手文章，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思想解放的最前沿，用自己衰老却又无比坚定地身躯为中国文学的探索和发展遮风挡雨。就像余华最近在谈话中讲的，《收获》要不是巴金担任主编，他的《活着》根本发表不出来。

他们的友情正是建立在认同彼此的追求和信念上，建立在相互欣赏和鼓励中。巴金曾说：“别人都喜欢往低处跑，您仍然站在高处，一下子就显得您高了！这是比出来的，大家亲眼所见。晚霞似火，您晚年这一段生活照亮了您全生。有了您的真实生活，我这小序才不是空头文章，我写，因为我要向您学。许多人战战兢兢抱头摇尾的时候，您挺胸直立，这种英雄气概，这种人格的力量，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真想您！”（巴金 1990 年 7 月 27 日致冰心）“我因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感到骄傲，因为您给中国知识分子争了光，我也觉得有了光彩。近九十岁的人了，您还写出叫人感到“烫手”的文章，使人尝到“辣味”的作品，您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还不是替受苦受难的人争取较公平的待遇……”（巴金 1988 年 11 月 30 日致冰心）

冰心也不断地诉说对她这位老弟的欣赏：“告诉你一件事，我已将你写在《关于男人》之中了（将载《中国作家》）！我从前写的都是已故的人，现在我想我已八十八岁，也是‘行将就火’，若不趁我还有一口气，不把几个我敬爱的男人写出来，等死了就来不及了。不过写了你以后，再写什么人就费斟酌了。（冰心 1989 年 2 月 11 日致巴金）冰心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人常说冰心很孤傲，特别是年轻的时候，然而从现在他与巴金早年的通信中就可以看出对巴金的看重，她说：“原本‘全集’，是为北新白作（内有北新字样），重印当然可以，移开明后，可否请你在原序之外，再作一序？几个字就得，我请人作序，还是第一次，请你同意吧！”（冰心 1940 年 12 月 20 日致巴金）到晚年，“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这是对巴金的极高评价，她文中说：“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我的孩子们都就他巴金舅舅。”在通信中，冰心也说过：“你真是著作等身，而且一辈子自食其力，这是我们这一辈人里，没有一个做到的！从这两件事来说，使我不但



爱你这个老弟，而且敬你这位老弟了”（冰心 1990 年 5 月 17 日致巴金）“昨天晚上清理一些信件，忽然感到如今没有什么人我能以衷心敬爱的！你不要以为敬字太重了，其实就是佩服的意思；你的为人做事，特别在感情方面，显得慎重。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冰心 1991 年 5 月 29 日致巴金）

这不是相互吹捧，这是心心相通，他们相互激励、相互安慰，有着超越私人友谊的情感，那就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忧心，对哺育他们的五四精神的捍卫和坚持，只有这样的精神相通才会有长久的友谊，才会有“金坚玉洁白的友情”（冰心的话）。巴金躺在病床上曾给冰心写下这样的话：

躺在病床上，每天总有四五个小时不能闭眼，我忘不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更忘不了我们那么多忠厚勤劳的人民。怎么办呢？我还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始终丢不开他们。时间不多了，我总得做些什么吧。翻来覆去，好像床上有无数根针，我总是安静不下来。每天都受到这样的折磨，我多么盼望看见远方的亮光。而屋子里却是一片灰暗。我们的光明在什么地方？我不断地问自己。朋友们都在摇头叹息。但是我不能失去信心，我没有失去信心。（巴金 1989 年 12 月 20 日致冰心）

冰心的回信说：

你说的“自寻烦恼”和不断想到的许多事，我和你一样，常常忧虑，但是我们虽然老了，我们国家还有百千万的年轻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地在思考，在忧虑。我们前途的亮光，就在这里，不是一片灰暗！你一定要乐观起来，我也要“你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而且你的力量比我大得多！我们大家努力吧。千万保重。（冰心 1989 年 12 月 29 日致巴金）

巴金说：

昨天我听早晨六点半中央台的广播《拜金主义要不得》，一天都不舒服。把文化和教育同经济对立起来，既可笑又可悲……把做生意和骗钱等

同起来，不知道要把炎黄子孙引到哪里去！但我是赞成改革的。（巴金 1993 年 4 月 9 日致冰心）

冰心坚定地表示：

说真话，我不怕，人家从我这里，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无“薪”可“罚”。我只是一个小小老太姑！（冰心 1991 年 11 月 20 日致巴金）

两个人的晚年，无论名声、地位，还是金钱都不缺，然而，他们却为国家忧虑，关切着社会的每一件变化，这完全超越了个人的利益和需求。多少年来，在我耳闻目睹的前辈言行中，常常让我自惭形秽，那就是我们为自己考虑得太多了，反而失去了自我；而前辈们超越了自我，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高大鲜明的自我。冰心和巴金的声音，是“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出弥为珍贵的知识分子之声。知识分子的声音并不是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而是具有更普遍的关注范围，关注的是整个社会、民众的利益和期待。他们在晚年的作品中表达出鲜明的“五四”气质和“五四”精神：强调不做奴隶，而做一个独立的个人；呼吁“科学”与“民主”；强调五四时期启蒙、开民智思想，从而强调对知识的尊重；对童心的爱护，对违背人性的教育方法的批评；呼唤“爱”与“美”，强调崇高的“理想”……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才把中国知识分子“良知”这样的尊称奉送给他们。

我有一个感觉：近年来的文学作品从文字技术上似乎不比前辈们差，自负的作家们甚至认为早就超过了前辈了，但却总也难以达到前辈作家的影响力和认可度，这当然与时间、机缘等因素有关，但当代作家的精神格局狭小，让他们在前辈面前不能不气短。或许《收获》发表这批信件也在提醒我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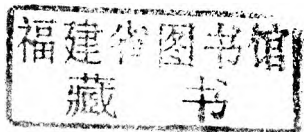
2012 年 9 月 20 日上午

（周立民 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3492508

第三辑 非文本研究



## 名人日记与冰心行实论纲

### ——从冰心在昆明的门牌号说起

凌孟华

作为记录自己每日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文字，日记的写作可谓源远流长。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版）等成果对中国古代日记进行过专门的梳理。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日记写作掀起新的高潮，众多政界、军界、文艺界、教育界人士都有数量可观的日记作品传世。这些日记有的民国时期就已公开发表，有的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在新世纪的出版热之中才得以整理面世，这从所谓“民国四大日记”<sup>①</sup>：《竺可桢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正编与续编）的出版时间就可见一斑。名人日记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已成为重要的史料宝库在相关研究中大显身手。

冰心研究也不例外。《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台湾作家出版社2014年7月版）不仅是“有别样的惊喜”的“内涵丰富的力作”，<sup>②</sup>是冰心研究会会长王炳根先生冰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且代表着冰心传记写作、生平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收获。此书就援引了不少名人日记，如王统照的《民国日记》《胡适日记》、许地山夫人周俟松的日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日记，以及浦薛凤“晚年根据日记所撰”的回忆录《万里家山一梦中》和《相见时难别亦难》等。论文方面，不少学

<sup>①</sup> 张荣明：《民国四大日记“海选”——〈竺可桢日记〉与民国日记（一）》，《东方早报》2015年4月26日。

<sup>②</sup> 李玲：《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与精神风骨——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2期。

者也将名人日记列入冰心行实考辩的参考文献，如刘涛《冰心 1937 年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 年第 3 期）对郑振铎《欧行日记》的引述，熊飞宇《冰心与成都燕京大学小考》（《安康学院学报》2015 年 2 期）对《叶圣陶日记》的征引等。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冰心研究界对名人日记史料的利用程度并不令人满意，还有不少直接记录冰心行实的重要日记很少甚至没有出现在冰心研究成果之中，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梳理。比如《吴宓日记》《顾颉刚日记》《梅贻琦日记》《朱自清日记》《胡适日记》《梁漱溟日记》《夏鼐日记》《潘光旦日记》《季羨林日记》《陈克文日记》《常任侠日记》《宋云彬日记》、罗常培《蜀道难》、赵景深《北上组稿日记》等等。由于相关的日记太多，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的日记如《顾颉刚日记》《潘光旦日记》等关于冰心的记载本身就值得进行专题研究，不是区区一篇论文能够完成的，所以拙文只能就名人日记与冰心行实的若干方面做一些尝试性的初步梳理。故名之曰“论纲”，以就正于方家。

## 一、居留处所

关于抗战时期冰心一家在昆明的居住情况，冰心在《追念罗莘田先生》中回忆说，“一九三八年，文藻在云大任教，莘田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们家住在云南昆明的螺峰街以后又搬到维新街，那时有几位昆明没有家的联大教授，常到我们家里来作客……”。<sup>①</sup> 诸多冰心研究资料均从此说。然而，螺峰街也好，维新街也罢，都只是街道的名称，如果要寻访冰心故居，要准确还原历史，还需要具体的门牌号。因此，值得追问的就是，冰心在昆明维新街的具体门牌号是多少呢？

从已披露的材料看，冰心没有记下来，吴文藻也没有记下来，但有人记下来了。此人就是吴宓。吴宓 1939 年 11 月 9 日日记云：

---

<sup>①</sup> 冰心：《追念罗莘田先生》，见《冰心全集》（第五册），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2 年 5 月版，第 535 页。引文中“螺峰街”后应有逗号，《冰心全集》此处失断。此文系应约为“罗常培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文集”所写，文集 1984 年 3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名《罗常培纪念论文集》。核查相关内容，“螺峰街”后果然有逗号。此外，《冰心全集》所录文字还有几处明显差异，不知是另有所本，还是抄录疏误。

……即偕珏良至护国街、维新街，74号吴文藻宅，访日昨到此之周叔昭。

6:00 宴叔昭及珏良于冠生园（\$12）。郑侨未到。8至10点再至叔昭寓中座谈。食柿。见吴文藻，瞿同祖。<sup>①</sup>

由此可知吴文藻宅在维新街的门牌号是74号，当日女主人冰心似乎不在家。周叔昭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女学生，1908年出生，安徽东至人，一度与冰心一家过从甚密，冰心《乱离中的音讯——论抗战、生活及其他》中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她的，已收2012年版《冰心全集》第二册。

虽然吴宓日记一贯严谨，很少疏误，但如有另外的证据自然更佳。查《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史略（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九）》，编者“在云南省档案资料中查到的有关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从1940~1949年每年的教师名录”多次提及吴文藻的“居住地点”是在“维新街74号”，在“根据掌握的档案资料”整理的“名师小传”第一则“吴文藻”中，也称其“住在维新街74号”。<sup>②</sup>两相对照，就可以确认冰心在昆明维新街的门牌号了。可惜的是，冰心住在螺峰街时的门牌号还缺乏查考的线索，而当年的“维新街74号”如今恐怕已难以辨认。

关于抗战中在陪都重庆歌乐山居住的“潜庐”，冰心先后在《力构小窗随笔》《从歌乐山到箱根》《我记忆中的沙坪坝》等文章中有过精彩的描写与回忆，相关研究成果自然也多援用冰心的说法。但是，冰心一人之说毕竟带有其作为女主人的主观色彩，客人眼中的“潜庐”是什么样子呢？往来出入“潜庐”的墨客骚人不少，诸如老舍、梁实秋、郭沫若、巴金、臧克家、赵清阁、冯乃超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却没有留下多少关于“潜庐”的文字。倒是语言学家罗常培在其日记式的《蜀道难》中，有对1941年8月的“潜庐”的精彩描绘：

<sup>①</sup> 吴宓：《吴宓日记》（第七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第88页。

<sup>②</sup> 刘兴育：《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史略（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九）》，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42页、第43页、第52页。

潜庐小而精雅，面对着嘉陵江，老远的望见星罗棋布的几堆房子，那便是沙坪坝和磁器口；兔儿山和云顶在它左右屏蔽着，一片浓绿的中间常常映衬着一块块的灰白色，那便是阔人们预备消夏或疏散的别墅；房后面还可以看得见高店子的市集，一条通磁器口的石板路，常常有坐滑竿或步行的人们像黑点般蠕动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除去松涛竹韵之外，往往还从隔壁的林家庙飘送过一两声发人深省的梵呗，越发显出山中清幽的趣味来。

与冰心的刻画对照阅读，可谓相得益彰，能够加深我们对“潜庐”的位置、景观与韵味的理解。特别是还记录了一些冰心文字没有提供的信息，比如与傅斯年住所的位置关系：

和孟真的住所只隔了一道山谷，有时两家站在廊子上就可以谈话，可是要彼此相访，假如不能飞渡的话，至少得走 20 分钟。<sup>①</sup>

这种描写很有山城特点，抓住了歌乐山民居的特征。更有意思的是，两家之间距离虽近相访难的位置关系，和他们之间存在不合与非议的情感联系，也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对照。还值得注意的是，罗常培文字称“吴、谢家的潜庐在林家庙 3 号”，有学者曾结合《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便览》之《国民参政会通讯录》亦作“谢冰心福建重庆歌乐山林家庙三号”，认为“林家庙 5 号之说，当系谬传”。<sup>②</sup>然而，林家庙 5 号曾经是浦薛凤接收亲人信件的地址，其回忆录《太空虚里一游尘》中明确地写着“而双亲及佩玉所发函件，则均写明四川重庆郊外歌乐山林家庙五号谢冰心女士收转浦瑞堂先生”。<sup>③</sup>使用多年的收信地址，一般不会出现记忆错误。同时，据郭秋

① 罗常培：《蜀道难》，见《罗常培文集》（第十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版，第 196—197 页。

② 熊飞宇：《重庆时期冰心的创作与活动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8 月版，第 5 页。

③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黄山书社 2009 年 6 月版，第 233 页。

北披露，重庆档案馆藏有1943年的“歌乐山居民公益社发起人鉴历册”，其中有“谢冰心，年龄四十二，经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教授，职务：参政员，住处：林家庙五号（盖章）”等内容。<sup>①</sup>可见，林家庙5号之说到底是不是谬传，还值得商榷。

## 二、经济境况

抗战时期，特别是寓居重庆歌乐山阶段，冰心一家的经济境况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不仅远不如战前宽裕，而且有的日子甚至非常艰难。对此，冰心在自己的文字中偶有提及，比如《我的老伴——吴文藻》中，就有“我这个以‘社会贤达’的名义被塞进‘参政会’的参政员，每月的‘工资’也只是一担白米。回家后还是亏了一位文藻的做买卖的亲戚，送来一只鸡和两只广柑，作为病后的补品，偏偏我在一杯广柑汁内，误加了白盐，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大女儿吴冰向我诉苦，说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只给她吃一个上面插着一支小蜡烛的馒头”<sup>②</sup>等内容，足见经济的窘迫。这一点在名人日记中，也有相关记载。兹举二例：

(1) “合起潜庐男女主人的参事和参政的薪俸来，已经超过一千元了——可是实际上还不够山上一处开支的，每月都得亏空……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罗常培《蜀道难》记录冰心一家1941年8月境况）<sup>③</sup>

(2) “到冰心处，持其函访陈维镛及谢蕴华、庐惠清两女士。取药。再到冰心处，与陈序经、杨石先谈。在冰心处吃饭……冰心一家，月入三千

<sup>①</sup> 郭秋北：《白敬宇的故事：向你打开一扇真实的大宅门》，南京出版社2014年2月版，第77页。

<sup>②</sup> 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见《冰心全集》（第六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311—312页。

<sup>③</sup> 罗常培：《蜀道难》，见《罗常培文集》（第十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97页。

元，而月用八千元，只得将物件出售。”（《顾颉刚日记》1943年7月6日）<sup>①</sup>

对读两则日记，就可以发现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冰心一家的收支情况一直处于亏空状态。也许是因为此前有些积蓄吧，1941年虽然已是“晚上往往吃稀饭”“没有肉吃”的状态，但还不至于售卖物件。到了1943年，生活更加困难，也就不得不出售物件以补贴家用。从1000元到3000元，收入看似增加了，而购买力如何呢？还是在名人日记中找依据吧！比如《吴虞日记》就记录抗战期间的四川物价情况甚详，可作参照。其1941年5月6日日记载“龙桥米今日五百元，永川米一千元，重庆米八百元”，<sup>②</sup>翻到1943年7月9日日记载，物价已飞涨至“米五千二百元”，<sup>③</sup>前后一段时间，均在4000元以上。从米价看，冰心一家收入金额的增长幅度（三倍）明显追不上米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五倍），购买力明显下降。

当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冰心一家仍然热情好客，用罗常培的话说就是“从丰招待朋友的老毛病却始终没改”。从其“残余的半罐 S. W. 咖啡，总等着朋友来的时候搬出那具特制的咖啡壶来，像作物理实验似的煮给你吃；快要生锈的烤箱，遇到客人来，也可借机会闻一闻鸡和猪肉的香味儿”<sup>④</sup>的生动描写之中，不由得对冰心又多了几分感佩。而记下冰心一家严重赤字状况的顾颉刚，当日就是在冰心处吃饭，同年8月4日，又“到冰心家吃饭”。<sup>⑤</sup>如果冰心稍有冷淡或怨言，耿介如顾颉刚者，肯定不会再去了。此外，1945年1月13日《陈克文日记》，也有“下午三时与铸秋同车回龙井湾，并同到歌乐山访徐道邻及谢冰心。谢煮咖啡客，

①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五卷），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5月版，第109—110页。

② 吴虞：《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54页。

③ 吴虞：《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908页。

④ 罗常培：《蜀道难》，见《罗常培文集》（第十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98页。

⑤ 顾颉刚著：《顾颉刚日记》（第五卷），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5月版，第125页。



意甚至殷勤”<sup>①</sup>的记录，也是冰心的咖啡与待客之道的见证。

### 三、身体状态

冰心虽然高寿，但其身体状态时有起伏，总体上并不是很好，经常看到生病的记载。青年留学美国，中年寓居重庆，以及晚年常住北京，都是如此。在名人日记中，有不少旧雨新知默默地记下了冰心在不同时点的身体状态。随手就可以举出几个例子：

(1) “晚振铎宴客，为季刊，晤李巴金，殊年轻，不似其特写。冰心亦在座，瘦极”。（《朱自清日记》1933年9月15日）<sup>②</sup>

(2) “到武川躲，略停，晤县长及党部人员。经大青山，颇颠簸，冰心感疲劳。六时，到公医院”。（《顾颉刚日记》1934年8月15日）<sup>③</sup>

(3) “士敦亦来观，告我以谢冰心曾来店访我，留字而去。余即至其所书地点中一路嘉庐，晤谢及其夫吴文藻君。冰心连日出席参政会，疲甚，小睡方起。观其姿态，已是中年妇人模样，余尚是初次见面也”。（《叶圣陶日记》1944年9月19日）<sup>④</sup>

(4) “午前十时搭朱车出至吴家，遇一樵、宗贺俊，在冰心房稍坐，伊因昨日劳顿又吐血少许，故卧床休息”。（《梅贻琦日记》1946年6月16日）<sup>⑤</sup>

《冰心全集》收录冰心照片颇丰，但未见1933年的玉照。朱自清日记中冰心“瘦极”的状态，或许可以视为冰心1933年9月体态之文字写真。

① 陈克文：《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897页。

② 朱自清：《朱自清日记》，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上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48页。

③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5月版，第224页。

④ 叶圣陶：《麈尾寄蓉城》（下），见《叶圣陶集》（第2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94页。

⑤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28页。

网络上可以搜索到一张 1933 年郑振铎与冰心夫妇在北平的合影，站立在吴文藻旁边的冰心着长款立领带袖有纹旗袍，的确和“瘦极”一语非常匹配。形体的变化自然和生活的状态直接相关，1933 年的冰心，已是而立之年，已为人妻为人母，已经历 1932 年夏天卧病的困扰，已蜚声文坛出版《冰心全集》，9 月 15 日前后正在酝酿创作《我们太太的客厅》，诸种因素叠加之下，体态变得“瘦极”，也是合情合理的。只是这种“瘦极”，不仅引起当年佩弦先生的侧目，也会引起如今读者后辈的唏嘘。

例二所引《顾颉刚日记》中“感疲劳”的冰心，也可谓旅行中的冰心之真实写照。关于这次旅行，冰心也以日记的形式留下了鲜活翔实的《平绥沿线旅行记》。冰心记录旅行团 1934 年 7 月 7 日至 8 月 26 日行程的《平绥沿线旅行记》与相应的《顾颉刚日记》值得好好对读，其中可以发现不少有意思的细节与问题，比如观察视角的差异，记录内容的选择，文字风格的差别等等。就 8 月 15 日日记而言，冰心的篇幅虽然超过顾颉刚，但多是对下午两时前所见的自然景观（动物群）与人文景观（蒙古包、普会寺）的描绘，此后在车上翻山越岭的感受，就被冰心过滤、省略掉了。而同车的顾颉刚所记录的“颠颠簸，冰心感疲劳”，虽然只有 8 个字，却既有“颠簸”的客观路况，又有“疲劳”的主观感受，可以作为冰心记录的重要补充，更充分地还原冰心穿越大青山时的身体状态，感知冰心为人为文的风格。只是这里的“感疲劳”，不知是顾颉刚记录了冰心的主动表达，还是自己的暗中观察。

例三所录《叶圣陶日记》，则不仅再度录下了冰心的“疲甚”，而且点明其“已是中年妇人模样”。1932 年 9 月天津人文书店发行的草野著《现代中国女作家》一开篇就以《始终没有走出象牙塔来的谢冰心》为题评论冰心，可谓代表了批评冰心的一个重要向度。然而，在 1934 年顾颉刚的笔下，与十年之后 1944 年叶圣陶眼中，却不约而同地发现和记录了冰心的疲惫。尽管前者是因为组织旅行团的劳顿与颠簸，而后者是因了出席参政会的费神与事务，但都可见走出象牙塔后人到中年的冰心生活状态之一斑。不惑之年的冰心自然应当“已是中年妇人模样”，而“初次见面”的叶圣陶记下此笔，或许是因为心中此前的冰心还是少女或青年的姿态，需专门交代吧。

例四摘录《梅贻琦日记》中“吐血少许”“卧床休息”的冰心，身体状况无疑是这几则日记里面最差的。5月初才从重庆飞抵南京的冰心，何事如此“劳顿”呢？在4天后写给赵清阁的书信中，冰心告知挚友自己“明后天上北平，带一个孩子去宗生，准备把他丢在北平上学，同时，回家、回校看看”以及“我们有去日本计划。也得在七八月之交，文藻去，我打算住北平，也许带两个女儿也去日本，还未定”<sup>①</sup>的情况。由此观之，冰心的“劳顿”可能与准备临近的北平之行，谋划计划中的日本之旅有关。吴文藻的工作突然面临重大变化，作为妻子，要不要同行赴日？作为母亲，如何安排好三位子女的生活？的确是很费思量的很难求解的情感方程式。这样看来，应该是繁琐的日常操劳与巨大的心理压力让冰心的身体吃不消了。梅贻琦能够进入病中卧床休息的冰心房间“稍坐”，已足见彼此间的熟稔与亲切。

#### 四、著述出版

被誉为“文坛老祖母”的冰心一生著述颇丰，从1919年8月25日第一次在北京《晨报》第七版“自由论坛”栏公开发表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到1997年8月9日于北京医院完成2012年版《冰心全集》收录的最后一篇作品《冰心文学馆落成贺词》，其创作生涯竟长达78年。78年间的著述出版活动情况，是冰心生平创作研究的重要方面。在现有的《冰心全集》《冰心年谱》与相关传记及研究成果之外，散落在名人日记之中的相关细节也值得重视。且举三例如次：

(1) 关于《平绥沿线旅行记》。《平绥沿线旅行记》是冰心较长的作品之一，《顾颉刚日记》有多处内容与它的创作发表有关。如1934年12月16日日记之“乘六时车归，到冰心处吃饭，商作西北考察文。十时半归”<sup>②</sup>“1935年1月27日日记之“文藻夫妇来访。到煨莲处吃饭，并商哈燕社印

<sup>①</sup> 冰心：《致赵清阁》，见《冰心全集》（第八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30、31页。

<sup>②</sup>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5月版，第272页。

刷事。看冰心所作游记毕。与子臧同步归”<sup>①</sup>等。前者的“西北考察文”，应当就是《平绥沿线旅行记》，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冰心在创作过程中曾与一起旅行的顾颉刚商量过，至迟在12月16日，冰心已经着手构思写作了；后者的“冰心所作游记”，无疑就是《平绥沿线旅行记》，据此我们能够知晓冰心发表之前的初稿先行给顾颉刚寓目过，而且初稿早在1月27日之前，就已经完成。至于冰心最后落款的“竟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sup>②</sup>乃是最后的定稿时间。

(2) 关于《关于女人》。《关于女人》是冰心抗战时期作品中最受关注的一部。《叶圣陶日记》几度记载其出版与再版的相关情况。如1944年9月19日日记之“谈其著作之版权应如何保持，并告余其《关于女人》一书在他家出版，颇多不满意处，拟交我店重出。坐四十分钟辞出”；<sup>③</sup>1944年10月13日日记之“再至外国人家，晤冰心，与谈其著作之版权问题，并约定其《关于女人》一书，决校正后交我店重出”；<sup>④</sup>1945年10月25日日记之“吴文藻来访，谈其妻冰心《关于女人》版权被天地出版社侵害事，嘱我店为之处理。因代冰心作书致天地社，如其不理，则登报警告，且将广告辞拟就”；<sup>⑤</sup>几天后的11月2日日记，复有“饭后到店，为冰心《关于女人》版权事，又为代写一信”；<sup>⑥</sup>一个半月后的12月18日，再有“十时出门，往戴家巷访冰心，途遇东润来访，请其暂候于茶肆。冰心谈《关于女人》版权事，渠无主见。以后渠夫妇两人将回燕京任教。谈半时而出”<sup>⑦</sup>等

①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5月版，第301页。

② 冰心：《平绥沿线旅行记》，见《冰心全集》（第二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432页。

③ 叶圣陶：《廛寄蓉城》（下），见《叶圣陶集》（第二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94页。

④ 叶圣陶：《廛寄蓉城》（下），见《叶圣陶集》（第二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305页。

⑤ 叶圣陶：《复员第一程》，见《叶圣陶集》（第二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467—468页。

⑥ 叶圣陶：《复员第一程》，见《叶圣陶集》（第二十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470页。

⑦ 叶圣陶：《江行纪程》，见《叶圣陶集》（第二十一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5—6页。

等。这几则日记在熊飞宇的《冰心与叶圣陶》<sup>①</sup>中也曾有过梳理。值得补充的是，从中不难看出冰心对天地出版社初版本《关于女人》的不满意和后来的版权纠纷，以及与开明书店由有重出意向，到约定，再到无主见的过程。叶圣陶为《关于女人》做出的代写书信交涉，拟写广告宣传等多种努力，既是其出版家工作热情与个性风采的展示，也是其与冰心友谊的见证，是“文坛二贤”<sup>②</sup>晚年仍能相约“海棠花下”<sup>③</sup>的先声。开明书店能够在1945年11月出版署名“冰心”的《关于女人》，叶圣陶功不可没。还值得指出的是，查开明版《关于女人》，版权页的确是署上了“著作者：冰心”，而在扉页，仍保留着“男士 著”。这也是一种编辑策略吧！

(3) 关于翻译活动。创作之外，翻译也是冰心文学活动的重要方面。新世纪以来，翻译家冰心已成为冰心研究的一个颇具活力的生长点，不少学者贡献了有影响的论文成果，如林佩璇的《冰心的翻译与翻译观》<sup>④</sup>，已是中国知网收录的标题含有“冰心”的2500多篇论文中被引频次之冠，相关的硕士学位论文已有20来篇。但是，一些名人日记中关于冰心翻译活动的记载，似乎还没有纳入冰心研究者的视野。比较典型的的就是《潘光旦日记》，可以略举数例如“婉莹来，商 mind 与 heart 二字译法”（1962年5月16日），“婉莹来，商译事中若干词句之具体译法”（1962年7月24日），“婉莹来商译事，渠近连译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诗集，备一纪念会之用，来相与商榷，此已第二次矣”（1965年4月7日）等等。<sup>⑤</sup>前两则日记虽不知是针对什么具体作品，但可以从中看出冰心找潘光旦商量译法的频繁，而第三则商榷的应该可以推断是已收入《冰心全集》第10卷的《马亨德拉诗抄》，“已第二次矣”足见其重视程度，而“备一纪念会之用”，则注明了翻译这批诗作的目的，值得冰心翻译研究者注意。20天之后，1965年4月28日，《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纪念中尼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日记

① 熊飞宇：《重庆时期冰心的创作与活动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198—200页。

② 陆潜：《“文坛二贤”：叶圣陶冰心》，《编辑学刊》2001年第1期。

③ 冰心：《海棠花下——和叶老的末一次相见》，见《冰心全集》（第七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129页。

④ 林佩璇：《冰心的翻译与翻译观》，《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⑤ 潘光旦：《潘光旦日记》，群言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291页、第303页、第484页。

中的“纪念会”很可能与此主题相关，惜乎尚未找到更多的证明材料。还有一则日记更有意思，那就是1963年9月7日的“近晚，婉莹来，亦提出移译 Eugene Du Bois 诗中所遇见之二三问题；见贻‘三5’牌香烟一盒，说是‘束脩’云”，<sup>①</sup> 不仅能体现冰心在翻译问题上的精益求精，而且展示了冰心谦逊、实诚而又不乏幽默的交往之道。这里的 Eugene Du Bois，应当就是美国诗人杜波依斯（Eugene 或系误记），而讨论的作品，则当是收入《冰心全集》第10卷的《加纳在召唤》。

## 五、交游活动

冰心一生交游广泛，活动丰富，各界朋友众多，诸色聚会频繁，有很多相关信息被不少名人在日记中记录在案，值得研究者翻阅参考。比如《胡适日记》关于冰心的记载，就被闻畦之加以利用，写入《“五四”文学百年情——胡适与冰心》。<sup>②</sup> 其中胡适1933年12月30日日记关于冰心参加的临湖轩聚会，就比《冰心年谱》翔实得多，相关内容也写入《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sup>③</sup> 此不赘述。而对照顾颀刚同日日记，就会发现二者也有一些明显差别，列出来的名字虽多有交叉，但仍有差异，连谁为客人谁的划分也不尽相同。再如关于与叶圣陶的初次见面时间，冰心1982年创作的《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称“我有幸见到叶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从日本回到北京”，<sup>④</sup> 就出现了误记，参照前面引述的叶圣陶1944年9月19日日记，就会真相大白。又如冰心与赵家璧第一次见面的时间，若不是赵家璧在《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中披露了自己的《北上组稿日记》，其中1935年6月11日日记有“晨十时，独去燕京大学，谒见谢冰心”<sup>⑤</sup> 的记载，恐怕是很难厘清的。

① 潘光旦：《潘光旦日记》，群言出版社2014年11月版，第377页。

② 闻畦之：《无聊无耻无行：胡适的人际世界揭秘》，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月版，第280页。

③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台湾独立作家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406页。

④ 冰心：《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见《冰心全集》（第六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106页。

⑤ 赵家璧：《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

名人日记中记录的冰心因公因私的各种活动情况，也是非常之多，其中有的内容有助于确认目前尚不够精确的冰心行实，有的是冰心相关活动的有力补充，有的能提供此前不知晓的重要活动信息。

关于战火之中携家带口辗转流亡抵达昆明的时间，冰心文字中只有一些“一九三八年秋天”“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sup>①</sup>等比较笼统的说法。卓如先生的《冰心年谱》、陈恕先生的《冰心全传》、王炳根先生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以及云南学者、冰心在呈贡简易师范任教时的学生段家政先生的相关著述等研究成果，均持“1938年9月”或“1938年秋”之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值得继续追问的是，“9月”也好，“秋”也好，都是一个时间范围，能够落实到具体的某一天吗？这是笔者四年前开始接触冰心研究时留心的问题。直至近半年为了这份“论纲”，重新梳理相关名人日记，读到朱自清1938年9月3日日记，才豁然开朗。日记云“去昆明。车上很挤。遇吴文藻夫妇与淑芳小姐，在开远用午餐。火车过彝良后出轨，约一小时修复，王清卫太太换车又耽误半个多小时，抵昆明已十时半”。<sup>②</sup>冰心一家是“经香港从安南（当时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车到了云南的昆明”的，所谓小火车是指在轨距1米的滇越铁路（又称米轨，轨距小于京沪的1435mm标准轨距）上运行的火车，是当时民众从越南到昆明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滇越铁路也是当年越南到昆明唯一的铁路。所以，朱自清处理完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事务之后坐火车回昆明，走的只能是滇越铁路，也只有小火车。凑巧的是，载着冰心一家的小火车经过蒙自的时候，朱自清上车了。拥挤之中，他们“遇”了。朱自清还在日记中记了下来。虽然没有记下旧友重逢的更多细节，但其情景是不难想象的。至于后面朱自清记录的“开远用午餐”“火车过彝良后出轨”“抵昆明已十时半”等经历，也就有理由挪用到冰心一家身上。9月3日是9月的第三天，冰心一家是9月抵达昆明的，冰心一家抵达昆明后两三天内没有坐火车出行蒙自的记录与可能，那么，就可以推断，朱自清遇到的冰心，只能是风

① 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见《冰心全集》（第六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版。

② 朱自清：《朱自清日记》，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上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549—550页。

尘仆仆的第一次踏上蒙自土地的冰心。也就是说，冰心一家抵达昆明的准确日期是1938年9月3日，时间是晚上十时半。再从火车站赶到旅店，自然是冰心回忆中的“那夜”了。而临近昆明还要火车出轨，费时修复，也是冰心所谓“旅途的困顿曲折”的最后一段插曲吧。

关于冰心的演讲活动，近年也颇受关注，不断有一些新发现，比如刘涛的《冰心1937年在巴黎的一次演讲》、赵慧芳的《论冰心关于文学与写作之演讲》、熊飞宇的《重庆时期冰心谈写作的五篇演讲》以及笔者的《1947年冰心日本观感演讲之钩沉与补正》等。<sup>①</sup>在2012年重庆举行的“冰心文学第四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也发言主张“抱着在故纸堆中发现另外几场演讲的速记或报道的希望”。<sup>②</sup>如今关于冰心1947年的另外几场演讲虽无突破，却发现名人日记中有冰心此前几乎不被人关注的演讲记录。比如1927年11月30日《吴宓日记》云“谢冰心女士在工字厅演讲，初拟往听，继因人多，座为之塞，乃止未往。”<sup>③</sup>吴宓寥寥数语，却透露了很多重要信息。一是当天冰心到清华大学工字厅演讲来了；二是吴宓对比自己小6岁的冰心比较关注，有兴趣有打算去听演讲；三是清华学子对留美归国已一年的女作家冰心更是非常关注，听演讲的热情很高，竟然听讲者多到“座为之塞”；四是吴宓最后放弃了，没有进去听，也就无法记下演讲的具体内容。张玲霞的《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曾介绍了“1927年经文学社团‘终南社’的数次邀请，冰心女士来学校演讲《文人与社会》”及学生的不同意见与反响，<sup>④</sup>不知是不是吴宓记录的这一次。此外，《朱自清年谱》1927年11月3日谱文有“下午四时，赴工字厅参加终南社举行的与冰心女士座谈的谈话会”，<sup>⑤</sup>不知与前述《文人与社会》演讲是否是同一次。但不管如何，冰心11月内两度到清华大学谈话或演讲，当是事实。1927年《朱自清日记》恐怕已佚，无法与相关内容进行对照，很

① 四文分别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3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5期，《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文艺争鸣》2013年第10期。

② 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2012），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471页。

③ 吴宓：《吴宓日记》（第三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3月版，第445页。

④ 张玲霞：《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86页。

⑤ 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63页。



是遗憾。笔者还有数期《清华周刊》等资料没能找到，如若其中有重要线索，那么冰心1927年到清华大学的几次活动，就可能进一步清晰化。兹录以备考。

关于冰心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社会活动，在时人日记中更是多有记载。其中《顾颉刚日记》最为突出，与冰心同会、同席、同参观、同闲谈等的记录多达百余次，是还原共和国时代冰心行实的重要史料，这里先不展开，留待以后专题梳理。这里略举前文还未引述过的三部日记为证。

《梁漱溟日记》1954年2月23日，“早点后出席外交、文教两组座谈会，听丁西林、夏衍、谢冰心、袁水拍等报告，又向达、常任侠、季羨林等发言（关于中印友好问题）”。<sup>①</sup> 这里的外交、文教组两组是指全国政协外交组与文教组，冰心的报告内容应该与其之后发表的《与小朋友谈访印之行》《印度之行》《回忆我在印度的日子》等文章不无关系。

《宋云彬日记》1961年5月21日，“下午四时，中央统战部邀请座谈，被邀出席者有胡愈之、杨东莼、潘光旦、费孝通、向达、谢冰心、吴文藻、顾颉刚……等十七八人，徐彬主持……谈毕吃夜饭，有茅台酒”。<sup>②</sup> 冰心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为统战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冰心与统战工作”这样很有价值的话题也一直缺乏系统的资料整理和深入思考研究，目力所及，仅见昔年同窗金华的《冰心抗战时期在渝统战事迹钩沉》尝试做过专门的阶段性的初步梳理。宋云彬日记记录的此次应中央统战部邀请出席座谈会，无疑是冰心与统战工作的历史细节之一，可惜非常简略，关于发言情况仅一句“黄子卿发言最多，我也发了言”。按常理推测，冰心发言虽然不是最多者，但想必是有的，只是不知道老人具体说了些什么。

《夏鼐日记》也多次记录冰心参加的重要涉外活动，如1979年8月26日“6时抵北京饭店，参加井上靖等的回请宴会。到会者有胡乔木、周扬夫妇、夏衍、谢冰心、曹禺……等，一共四桌。席间由井上靖和胡乔木院长先后致辞，至8时半始散”；如此前的8月8日“周扬同志以作协名义宴

① 梁漱溟：《梁漱溟日记》（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172页。

② 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564页。

请井上靖等 6 人，陪同者有谢冰心、曹禺、陈荒煤、冯牧、姚雪垠等人”；1979 年 10 月 11 日“晚参加英国柯立华大使为英国学术院举行答谢酒会……散会时已 9 时半，参加者有钱钟书、吴文藻、钱俊瑞、谢冰心等”。<sup>①</sup>这些记录，都是晚年冰心行实的有益补充。

总而言之，这份“论纲”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名人日记记录冰心行实的几个方面与若干细节，试图揭示“名人日记与冰心行实”话题的重要性与丰富性，凸显其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引起学界注意。没有提及的相关日记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与视野，恕不再一一列举。期待有更多冰心研究者关注这个话题，进行更加细致翔实的梳理与更加系统深入的论析。进而期待在充分把握名人日记与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增补出版新的《冰心年谱》或《冰心年谱长编》，修订完善冰心传记，将冰心研究引向深入。当然，对于名人日记的当事人“误记”，整理者“疏误”等问题，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比如关于朱自清日记，袁洪权的《朱自清 1934 年、1935 年日记误记举证二则》与徐强的《〈朱自清全集〉日记卷翻译疏误考校》<sup>②</sup>就进行过有启发性的讨论。

（凌孟华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① 夏鼐：《夏鼐日记》（第八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8 月版，第 337 页。

② 袁洪权：《朱自清 1934 年、1935 年日记误记举证二则》，《平顶山学院学报》2016 年 1 期；徐强：《〈朱自清全集〉日记卷翻译疏误考校》，《清华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

## 冰心日记中的时代生活

### ——解读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冰心的日记

刘 嵘

**摘 要：**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冰心的日记，是了解我国此阶段的外交状况，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省市、不同行业建设状况和人民精神状态的重要史料，也是完善冰心研究资料，丰富冰心形象，全面了解冰心的日常生活、文学世界、亲情世界的重要史料。本论文以冰心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的日记为研究对象，从出访生活的实录、时代场面的描绘、文学趣味的表达、真实心灵的律动和亲情关怀的呈现五个方面，解读时代大背景下冰心日记中所呈现的时代生活。在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社会历史背景与进入体制生活后冰心生活的互动关系中，以期对冰心和一代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有较为深刻的了解。

**关键词：**冰心日记；体制生活；时代气息；文学趣味；心态浮沉；亲情人情

2004 年，在冰心逝世五周年之际，冰心家人共同商定，将冰心生前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楼 34 单元中的遗物，全部捐赠给冰心文学馆，这其中就包括冰心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的笔记、日记。冰心文学馆按照年代整理后分装在 23 个信封袋中，并在每个袋的封皮注上了时间、内容。这 23 个信封中，第 22 本是散落的纸张，里面有住宿的安排、文艺节目的名单、民族学员统计表等，除此之外，剩下的 22 本是完整的笔记本。这些笔记本中，有的是政治学习的笔记，有的冰心则将日记与政治学习笔记记在一起。本

论文讨论的对象是其中的日记部分。

这些日记没有标点符号，用繁体楷体的连笔字写成，有的日记完整地记下地点、年月日、星期、天气状况，有的只简单记下了月日和星期。日记的日期不是连续的，其中包括：1955年6月29日至7月28日去瑞士洛桑出席世界母亲大会并对顺道的瑞士、捷克、法国和苏联的访问日记；1955年11月16日到12月20日，冰心作为人大代表到福建视察的日记；1957年4月17日至5月12日，冰心前往南京、扬州、无锡和上海的参观访问日记；1959年3月18日至4月2日，冰心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到河南参观的视察日记；1959年10月22日到10月27日，冰心到樊家村花队“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日记；1959年12月14日到12月19日，冰心到邯郸参观、访问的日记；1960年3月1日到3月20日，冰心参加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团，到湖北参观的视察日记；1960年9月9日至9月12日，冰心到河北涿鹿人民公社参观视察的日记；1961年12月15日至31日，应农垦部长王震部长之约，冰心到湛江参观访问的日记；1964年5月21日至6月4日，冰心到河北参观访问的日记；1965年11月1日至24日，冰心参加全国人大、政协组成的参观队，到江西、湖北参观访问的视察日记；1966年8月5日至8月31日“文革”时期的日记；1975年6月8日至7月18日，冰心赴西南四川、贵州、云南、湖南参观考察的日记；1977年11月23日至11月26日，冰心到河北任丘参观考察的日记。日记内容所包含的信息量很大，是了解20世纪50到70年代我国的外交状况，国内不同行业的发展情况，冰心的日常生活、文学世界、亲情观和心态的重要史料。

### 一、出访生活的实录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冰心日记，记录了冰心作为中外交流使者出国访问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到不同省市参观视察时的日常生活。1951年8月，冰心一家从日本辗转回到了祖国。一回到祖国，冰心就受到了文艺界与政治界的关注。1953年9月，冰心出席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1953年秋，在丁玲、老舍的介绍下，冰心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为国际知名作家，又曾经在外国留学、访问过，冰心被选派出国访问，成为中外交流的使者。在早年创作时，“自由”书写是冰心一直向往和追求的

写作状态。在她看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sup>①</sup>，创作“应当是个人方面绝对的自由挥写”<sup>②</sup>。为此，“常常顽强地拒绝了朋友的劝告，漠视了朋友的讥嘲”<sup>③</sup>，“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sup>④</sup>，用小说、小诗、散文传播“爱的哲学”，写家人、写童年，写旅美时的心迹，写身边的女性，满蕴着女性的温柔，表达内心深处深深的爱与淡淡的愁。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中外交流使者、人大代表、作协成员，冰心告别“自由”的创作身份，成为国家体制中的一员。参观、访问成为生活的常态，冰心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外出访问、视察的日常生活。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冰心日记中，1955年6月29日至7月28日冰心去瑞士洛桑出席世界母亲大会的日记，是目前发现的冰心日记中唯一记录国外出访的日记。1955年6月，以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前往洛桑出席世界母亲大会，并对顺道的瑞士、捷克、法国和苏联进行访问。在出行的第一天，冰心在日记里记下：

1955年6月29日星期三

晨九时半，自北京起飞，一路下望，尽是碧绿的层山叠谷，亦有小径和农田，不知是否古北口一带。

过内蒙古时，草原上处处有积水，如同一面的小镜。这时飞机不稳，晕吐。午，抵乌兰巴托，下机小憩，未用午点。乌站较为简陋，机战上服务多为苏联人。

晚，抵伊尔库茨克，已到苏联边境。下机累甚，到旅馆即睡，晚饭在屋里用。

① 冰心：《文艺丛谈》，卓如：《冰心全集第1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

② 冰心：《遗书》，卓如：《冰心全集第1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34页。

③ 冰心：《胰皂泡》，卓如：《冰心全集第2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46页。

④ 冰心：《我的文学生活》，卓如：《冰心全集第2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29页。

旅馆设备甚佳，欧洲式，街上亦毫无边境荒凉之状。

从北京起飞后，途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苏联边境伊尔库茨克后，冰心一行到达莫斯科，“沿途各种建筑俱佳，雄伟、清洁，一片新兴气象”<sup>①</sup>，在莫斯科参观农业展览馆、油画馆等短暂停留后，飞向捷克首都布拉格；在布拉格，参观了布拉格大钟、犹太教堂、犹太人坟场、有捷克思想家扬·胡斯塑像的广场等捷克著名景点，随后抵达了世界母亲大会的主场地瑞士洛桑。在洛桑，中国代表团与印度、德国、印尼、日本、罗马、苏联、亚细亚等国家代表们联欢，在印度联欢会上，印度代表跳“统一舞”，并朗读了泰戈尔小诗；在世界母亲大会上，各国代表纷纷讲话，李德全代表中国发表了讲话：

瑞士 1955年7月8日 星期五

晨七时早餐后，八时半至会场，今晨有李德全讲话，大得掌声，尚有美国代表演讲，亦甚动人。午餐，与印尼联欢。下午三时半，参加与四国会议书委员会。五时，回旅馆少息，七时半回至会场，有奥地利代表送礼给我代表。九时开会，有许多国家（代表）发言。回到旅馆已有十二时，即睡。

经过四天的会议，世界母亲大会“通过致四大国外长书、致联合国书及大会宣言，资格审查委员报告，鼓掌如雷，大家拉手歌唱，绕场数周，丝巾挥动，情形热烈”<sup>②</sup>。洛桑会议结束后，冰心一行对顺道的巴黎进行游览、访问，对完全异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行业有了了解。在巴黎，参观了上层的官府、住宅，如参观了市议会、参议院，参议院“建筑甚辉煌，为欧洲有名官厅之首”<sup>③</sup>；参观了罗浮宫、国王路易十四女儿的客厅，在凡尔赛宫里看到了路易十四的雕像；

---

① 冰心日记：1955年6月30日。

② 冰心日记：1955年7月10日。

③ 冰心日记：1955年7月19日。

既参观了田舍式的建筑大小维尔浓、巴黎人的娱乐之地真树旅馆和骑士旅馆；也参观了法国旧区，看到工人住宅，有的房子十年没有人住，有房东正在驱逐窗入室内要水电的工人；参观了教堂、住宅区、学校、医院、牛奶场、巾扇公司、衣装公司；在国际教育中心，看学校及学生成绩；在雷诺五金工厂诊疗所，医生介绍英国自然生育法与无痛分娩法的不同；参观共区、群众会；到坟地，吊唁在集中营和抗战中牺牲的战士……在巴黎访问十天离开时，朋友们纷纷相送，依依不舍。从巴黎回到布拉格，开完总结会后又回到了莫斯科，因接到8月6号要到日本参加由刘宁一率团的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代表们便飞回了北京。

冰心在日记中，记录了世界母亲大会的进程、参会期间的安排、参会代表们之间的友谊，为了解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外交状况、参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会议的开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由于与欧洲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同，代表们参会之前，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对出访人员进行了两个星期的外事教育：周总理关于出席世界母亲大会情况的介绍，陈毅副总理对国际形势的介绍，吴全衡讲国际妇女运动，张淑义讲中国妇女运动状况等<sup>①</sup>，避免由于国家性质不同而造成的冲突。在日记中，有如，“古登夫人的开幕词中有小诗，十分动人，大家下泪”<sup>②</sup>，会议报告通过后热烈的情形，临行时代表们依依不舍的描述，可以看出国家之间并没有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造成太多的隔膜。日记，对于冰心来说，是自己每天生活的记录，她在日记中记录了“同昌德夫人接触小谈”等日程，但对代表们交谈的内容、态度却没有记录，我们也就无法从日记中了解冰心本人的外交风采。在出访洛桑世界母亲大会之前，冰心在新中国的出访中已经圆满完成了两次出访印度的任务，一次是1953年11月，参加了中印友好协会访问团，另一次是1955年3月，参加了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夏衍在《赞扬我的“老大姐”》中，赞扬了冰心在印度访问时的外交风采，“她博古通今，英语讲得流利……有一次，我们访问泰戈

① 王炳根：《冰心与吴文藻：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2015年，第43页。

② 冰心日记：1955年7月7日。

尔故居，在欢迎的茶话会上，因为她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她用英语背诵了两首泰戈尔的诗，然后简洁地介绍了泰戈尔对中国的友谊和她；另一次是我们在尼赫鲁官邸吃午餐，席间冰心同志和尼赫鲁的女儿、现任甘地夫人的谈话，使我们这些干了多年外事工作的人感到佩服。她那种不卑不亢，既有幽默，又有节制的风度，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文艺队伍中，可以说很少有人可以和她比拟的<sup>①</sup>……从夏衍对冰心印度出访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冰心不卑不亢的外交风采和谈吐自如的外交能力。两次印度之行，冰心写出了《印度之行》《回忆我在印度的日子》《印度重游记》等时事散文。然而，1955年一个月的欧洲出访，冰心并没有写成文章，但是，冰心的日记，记录了中国妇女代表团从北京出发，经苏联—捷克—瑞士—法国—捷克—苏联，又返回北京的日程安排及所见所闻。1955年的欧洲出访日记，是目前所发现的冰心唯一一部记有国外出访的日记，为我们了解冰心的出访日程以及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冰心日记，还记录了冰心作为人大代表，在国内参观视察的日程安排。1954年，冰心被选为人大代表。1955年11月16日到12月20日，冰心作为人大代表到福建参观视察。此次福州视察的重点是合作社，以郑依姆合作社为参观重点。在福建视察的日记中，冰心记录了每天的视察任务，如：

1955年11月25日 星期五

晨起，至龙江乡石步村，与文教方面人员谈话，有小学生二人参加。十一时出，至对面地主王姓屋参观，后回至闽侯专区午饭。饭后，开车至橘柑厂，厂长郭英唐、党支部书记雷声远陪同参观。毕，自己回城小憩。二时许，有团市委吴荣营来，同往航管局职工子弟小学，参观少年造船厂开工典礼，有局长发言，总工程师林世舜发言，后有少年之家木工组长陈毓清献礼，见面，有儿童献花，以后工厂宣布开工，校长定华、副厂长宣布工作规则，即行开工。进内参观四组，至隔壁看另外机工组，上楼同辅导员谈话。六时回城，晚饭后看话剧《海滨激战》。十时半回来，睡不稳，有

<sup>①</sup> 夏衍：《赞扬我的“老大姐”》，《花城》1981年第4期。



蚊子。

福建视察的日记对一天不同时间的工作安排都有详细的记录，通过她的日记，可以梳理出冰心作为人大代表时的工作日程：从北京出发，在上海、嘉兴、上饶、建阳、古田县等短暂停车后到达福州。视察的重点是合作社，以郑依姆合作社为重点。参观了郑依姆合作社，郑依姆谈到了少年农场、对农场的期待，也谈到了自己的家庭，“极其动人”<sup>①</sup>；在闽侯城门还龙江乡，参观了该乡的抽水机站、灰窑、织布厂、粮仓、碾米仓、小学校；在龙江乡石步村，参观橘柑厂、航管局职工子弟小学，并参加了少年造船厂开工典礼；在城门区城门乡中城村，村支书在报告中对比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生活，“互助组合作化后，生活更好，因生产时劳动力有余，可搞副业”<sup>②</sup>；在城门区杜园村，参观工作组住处，了解了此村妇女解放的情况和青年的婚姻状况，访问了省劳模柑橘种植者杨兆栋；在后屿乡前屿村，听乡长报告、郑依姆报告，旁听粮食讨论，参加座谈会，“特别兴奋，农民正在热烈地社会主义，眉飞色舞，使人感动”<sup>③</sup>；在鳝樟乡，参观鳝樟实小校址，“陈敏秀携手不释，问毛主席健康，说毛主席关心他们，使人感动”<sup>④</sup>；在赤桥乡西庄村开会，“多数是讲镇反工作，这乡反革命分子太多、封建太深，这两块石头搬开，就大有发展余地”<sup>⑤</sup>，并参观了光明蔬菜合作社和水利……除了参观合作社，对农村合作社的发展状况、农民的精神状态有所了解外，冰心还参观了福建机器厂、造纸厂、食品公司、角梳公司、农具厂等工厂，师范学院、医学院、托儿所等学校，参观了省立医院等，在视察工厂时，发现角梳公司里“一切安排甚有次序，托儿所亦好”，而农具厂“厂址、设备简单，倒铁水时火星四射，操作程序较乱，安全大有问题”<sup>⑥</sup>。在每个场所的视察之前，人大代表都要先听相关工作人员对本单位基本情

① 冰心日记：1955年12月4日。

② 冰心日记：1955年11月26日。

③ 冰心日记：1955年12月2日。

④ 冰心日记：1955年12月3日。

⑤ 冰心日记：1955年12月4日。

⑥ 冰心日记：1955年12月8日。

况的报告，如 1955 年 11 月 23 日，闽侯专区李毅专员报告农业合作化运动及粮食统购统销工作；1955 年 11 月 24 日，龙江区石步村（城门乡）乡长谈乡内基本情况；1955 年 11 月 25 日，石步林校长陈文庄谈石步小学情况，冰心每次都认真听报告并记下笔记，随后进行参观。如今，我们参考冰心对村庄、工厂、学校的记录，甚至可以从中发现福建不同行业、城市与农村不同层面的发展进程。

作为文化名人，冰心的来访引起了不少部门的注意，他们邀请冰心座谈、演讲，分享她的写作经验和所见所闻。在新的时代下，作为人大代表、作协儿童文学组组长，冰心感到“我们自己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赶上了这伟大的时代。感谢之余，我们也要保证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青年人体力和智力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sup>①</sup>，乐于与青年、儿童分享自己的见解。福建视察中，冰心参加了一些文化活动，如接受新闻社女记者陈彬的访谈；与福建省文联陈虹主任、福建省美术协会谢投八谈《东山少年》及提线戏剧本问题；在龙江乡石步村，与文教人员谈话；在后屿乡，与少年农场指导员谈话；参观少年工厂机工组，同辅导员谈话；到体育场看福州市运动会，看儿童们表演徒手体操和组字体操，到三木坊少年之家参观“我们写诗”会朗诵及快板，看小学生演木偶戏《黄鹤的故事》；到省府礼堂看京剧，到南台中心剧场看《卓文君新剧》；到省一级团委处，论演讲问题；到教育厅，对中小学语文教师们讲外国观感及回答教师们问题；在金斗山劳动工人文化宫，为青年做报告，听众 1500 人左右，并有两名少年献花；参加福建军区授衔典礼仪式，并代表人民代表讲话等。

一个接一个的公务，一个接一个的报告，有时不免让人应接不暇：

1955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二

晨起，在会所八角亭，八时半起座谈，在闽侯县视察观感，午饭后半续开。后，三时许，齐出北门参观斗顶水库。在停车后，尚步行，来回六里许。回来续开会（4:40 分），由殷科长报告水利后，我定日程，散

<sup>①</sup> 冰心：《伟大的保证伟大的关怀》，卓如：《冰心全集第 3 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280—281 页。

会。晚饭后，到大众洗澡，回来十时睡。

今早发小妹一信，得杨慧音一信。

今日下午五时左右，红霞满天，四周深紫，极为美观。

早上开座谈会，午饭后续开，参观后续开……为了缓和较为紧张的工作安排，视察团也安排代表们游览福州的著名景点，参观涌泉寺，了解到了寺里和尚劳动的情形；参观龚家花园里，其环翠池，布置雅观，“正院有楼，雕刻、窗花，无一相同，全楼无一根钉子”<sup>①</sup>，冰心还记下了原龚家花园主人龚易图晚年在家撰写的对联，“百年无事但饮酒，五岳归来不看山”，“绿映照我又今日，红树笑人非少年”；游览了开元寺、雪峰寺、西湖公园、动物园、鸟山宫公祠、王天君祠等景点。“还乡日记的发现，对研究冰心的故乡的感情和冰心的创作有很重要的意义，对认识和研究福建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学界的情况，也有很高的价值”<sup>②</sup>。

20世纪50至70年代，冰心的日记以国内参观视察为主，除了福建视察的日记外，还有如1957年4月17日至5月12日，冰心参观江南工艺行业的日记；1960年3月1日到3月20日，冰心到湖北参观视察，记录了湖北炼钢、炼铁产业发展状况的日记；1975年6月，冰心赴西南参观考察新铺成的成昆、昆黔和湘黔铁路的日记等。冰心以视察的见闻和观感为素材，写出了反映时代面貌的时事散文，是后人了解时代的一面镜子，丰富了读者对冰心等一代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后的工作日程、生活状态的认识。

此外，冰心此阶段的日记，对完善冰心研究资料、冰心年表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原始资料。日记的记录，可以补充以往著作中的冰心生平资料，有些参观日程，由于冰心没有将其写成文章或在冰心写成的时事散文中没

① 冰心日记：1955年11月22日。

② 王炳根：《新发现的冰心还乡日记》，《厦门文学》，2004年第4期。

有明确标出时间，许多传记或冰心年表需要完善<sup>①</sup>。冰心日记，可以精确或修改冰心年表中不太准确的生平资料记录<sup>②</sup>。此外，冰心的日记还可以与冰心写作的时事散文互补，完善对冰心日常生活的认识。1959年3月18日，冰心日记里记录了到河南参观、视察的日记。在日记里，冰心记录了在郑州西太康路人民公社、登封县大冶镇、雷州水库、文村的幸福沟等的见闻，后写成时事散文《记幸福沟》。但是，也许由于笔记本的丢失，也许是冰心没再继续写日记，4月2日冰心一行到达洛阳市参观时，郑州参观的日记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她此期的时事散文《奇迹的三门峡市》中，了解在洛阳参观后，冰心等人代表又去三门峡市参观三门峡大坝工地的情景。

可见，冰心的日记对了解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冰心的生平、国内建设的发展以及我国外交事务的发展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 二、时代场面的描绘

冰心在20世纪50到70年代的日记，有的记录了此期间国内外发展的重要大事，有的描述了一幅幅具有时代特色的画面。冰心的日记，虽然在日期上不连续，但在这“时断时续”的日记记录中，我们却可以了解当时中国发展、建设的动态。

无论是外出访问，还是在家，冰心都有听收音机、读报纸的习惯。在当时的年代，听收音机、读报纸，是获得国内外大事的重要渠道。在日记中，冰心记下了她所看、所听到的国内外大事。有国际上或涉及国家安全

<sup>①</sup> 如1957年4月17日至5月12日的日程，2015年出版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中有较多提及（王炳根：《冰心与吴文藻：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2015年，第81—88页），《冰心研究资料》（范伯群）《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冰心》（卓如）《冰心诗文精选精装》（张秀枫）《冰心一片冰心》（段海宝）《一个真实的冰心》（段慕元）等著作中的冰心年表、《冰心全传》《冰心评传》中没有提及。1964年5月21日至6月4日，冰心到河北参观访问；1977年11月23日至11月26日，冰心到河北任丘参观考察的日程在有关冰心年表及冰心传记中都没有记录。

<sup>②</sup> 如：冰心在日记中记录了1960年3月1日到3月18日里记录参加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团到湖北参观的视察的时间，《冰心研究资料》上写的是“2月—3月，到湖北省暨武汉市参观访问”；《冰心年表简编》中1959年10月22日到10月27日，冰心日记里记录了到樊家村花队“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冰心研究资料》上写的是1960年“秋，访问京郊丰台区黄土岗人民公社，参加数天劳动”。（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27页）。

的大事，如“今天报载，西藏高级反动官员劫持，达赖叛变”<sup>①</sup>；“11时许，听收音机印尼赫鲁死了，南达继任尼赫鲁，1889年生，南达更右倾”<sup>②</sup>。有的记下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如“晨起听广播，知菲中已建交且把反对霸权写了进去，可喜也”<sup>③</sup>；7月2日又记录，“6:30听广播，知昨天中泰已建交，是个好消息，伊拉克副总统也要来了”<sup>④</sup>。有的日记里记下了国内的大事，在苏州游览戒幢律寺时，看到“大殿内正作释迦牟尼2500周年和平佛事”<sup>⑤</sup>；1966年8月6日的日记里只有一句话，“今天，《光明日报》上有郑季翘之《彻底清算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8月7日记下“今天有一篇巩卫东《周扬在东北放了些什么毒》”，8日记录“晚八时，广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8日记录“毛主席穿军装在天安门上见百万群众”等。在1966年“红色八月”里，冰心在日记里仅仅记录了当天的一篇文章或一个事件，却清晰地显露出冰心对政治界、文艺界批判周扬事件的震动之大，以及“文化大革命”来临之时心情的紧张和忐忑。

20世纪50至70年代，作为人大代表，冰心对国内不同省市参观、视察。在日记中，冰心将看到的建设场面、见闻一一记录，城市建设的苏联模式、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扫盲运动、镇压反革命、“人定胜天”自然改造、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理念下的中国社会面貌在冰心的日记中都有体现。

1958年冬天和1959年2月，中共中央连续在郑州召开了两次会议，河南省成为靠苦战来改变落后面貌的典范。1959年3月，全国政协组织到河南参观、视察。在大冶镇，冰心参观了康福乐园、幸福食堂；在文村，参观了幸福沟、跃进水库等，仅从这些参观地点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新建设的轰轰烈烈和人民生活的热情。冰心被新中国建设的面貌所感染，以这次参观的所见所闻为素材，写作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记幸福沟》《奇

① 冰心日记：1959年3月29日。

② 冰心日记：1964年5月27日。

③ 冰心日记：1975年6月10日。

④ 冰心日记：1975年7月2日。

⑤ 冰心日记：1957年5月2日。

迹的三门峡市》等时事散文。冰心参观河南医学院、郑州大学、国锦厂，感觉建筑“简直很像明斯克”<sup>①</sup>；到太康路人民公社，参观被服厂、铁编厂、食堂、幼儿园，还参观了仍在建设的展览馆，感到“到处与苏联所见相仿，社会主义道路总是差不多，所谓共同道路、普遍真理也”<sup>②</sup>。这些感慨显示出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模式对我国城市建设的影响之大。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此理念下，1958年到1960年，全国进入大跃进的高潮。大炼钢铁就是此次大跃进的典型形式之一。1959年12月14日到12月19日，冰心到邯郸参观、访问。在参观了邯郸工农业展览时，讲解员介绍道：“1.5米高炉胜利荣归，粮食八年渐变，两年突变，十年赛过五千年，纺织供全国五分之一人每人一件衣服（粮食从22斤到翻1.6倍及62倍）。全国棉花看河北，河北棉花看邯郸等”，冰心也被这种豪情壮志感染，感到“十分动人”<sup>③</sup>；在邯郸钢铁厂、炼铁厂、隆阳炼厂，多次看到铁水奔流。在邯郸隆阳炼厂里：

……到隆阳炼厂，看一风炉标兵炉13M，又看几个炉出铁，铁水奔流的情形。那时人民提出口号“一切为了钢”“为了钢忍受一切”“有了钢有了一切”，印象很深，马厂长报告极动人。<sup>④</sup>

1960年3月，冰心参加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团，到湖北参观、视察。冰心参观了湖北十年建设成就展，看到了炼铁工人的诗歌《威风抖擞比天大》，并在参观的笔记中记下了这首诗：“狂风暴雨我不怕，有铁才有机械化，国富民强谁敢欺，威风抖擞比天大”，听到了“7天7夜建成厂，年产3千吨”<sup>⑤</sup>的介绍。到了武汉钢铁厂：

① 冰心日记：1959年3月24日。明斯克市，白俄罗斯首都。

② 冰心日记：1959年3月21日。

③ 冰心日记：1959年12月15日。

④ 冰心日记：1959年12月16日。

⑤ 冰心日记：1960年3月3日。

……先听厂长报告，厂址真大，汽车走半天。先看一组焦炉，上面热度很高，夏天工人全中暑。厂内工地尚未修好，两年后会大改观了。只就烟囱而言，第一个烟囱56年用六个月，最近一个只用11天了。看后，看炼铁炉口，圆圆的像几个红太阳并列，又看调度室、主电室等。回到青山招待所，吃饭，休息。下午二时，出发看炼钢，钢水奔泻出来很热，流入大钢锅里，久视有红云，锅面平的时候，仿佛有绿白块块，每炉有270吨（有华东工学院女生在学习改进工作，要吊起四百吨钢）。吊车吊起后，倾入柱模内，由火车运走。<sup>①</sup>

冰心还参观了重型厂、锅炉厂、轴承厂等重工业工厂，感到“祖国各地都在大跃进，没有例外”<sup>②</sup>；参观食堂时，看到炊事员正在扫盲；在丹江口建筑工地，“工地之大，亦出意外，据说是亚洲第一大坝”<sup>③</sup>，登上大堤顶上看建设场面“一人一扁担，十分整齐”<sup>④</sup>。这一个个建设的场面正是“大跃进时期”中国社会的缩影。

除了大炼钢铁，此阶段的全国正秉持着“人定胜天”的理念，向大自然进军，通过改造自然来发展生产。1960年9月，冰心、喻宜萱、戴爱莲等人从永定门出发，来到河北涿鹿人民公社，参观长瞳村开劈山大渠典礼：

晨5时半起，6时吃早饭，7时出发到长瞳村开庆祝大会（劈山大渠放水典礼大会），一路出来，远望笔架山，甚为好看，一路渐见赴会的群众，穿起新衣，喜气洋洋，长瞳扫除一新。喝茶后到大渡槽，是横架两山之间的，渡槽高125.5公尺，没有钢筋、水泥，全是民工自己用砖石做的，参加放水典礼后，与英雄们一块照相。又坐车到山上，看渠道所劈，差不多都是硬石，工程真是不易。<sup>⑤</sup>……

① 冰心日记：1960年3月6日。

② 冰心日记：1960年3月3日。

③ 冰心日记：1960年3月13日。

④ 冰心日记：1960年3月14日。

⑤ 冰心日记：1960年9月10日。

1961年，雷州半岛开垦出了新农场，12月，应农垦部长王震部长之约，冰心、赵朴初、周立波等到湛江参观访问。冰心一行到种植园看花圃；在海滨散步，看到了防风林，“四望海上，法国人员经营了西营一角还是土路，新中国成立后到1954年盛栽木麻黄（南三联岛一带，长五十余华里，宽十九华里，成了防风林带）”<sup>①</sup>；“防风林如棋盘，中栽旱树事柳、蒲葵、木麻黄、相思树成林，蝴蝶成团，在阳光中锦绣一般，择些花草回来”；参加了雷州水库，“路经海滨，风景极好，水光橙蓝”；参观了堵海工程、湛江盐场，“计划甚大，东海堤岸上正在填土，将来下宽110米，上宽7米，一边是盐田，一边是稻地，又成为鱼米之乡了”<sup>②</sup>……

冰心在日记里，以旁观者的角度，记录了一个个反映当时时代面貌的画面，客观地记录了新中国建设的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民渴望翻身做主人，通过自力更生改变战争造成的一穷二白的局面，在中央的决策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新中国建设中的一员，冰心同样是饱含新中国建设的热情，渴望融入集体，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当看到新社会下人民在“在新的美丽的城市里，辛勤地劳动着，快乐地游赏着，热情地学习着”<sup>③</sup>时，态度是欣赏的、自豪的。这也就决定着，冰心无法抽离出时代，对建设中不合理的举措，如大跃进、四清工作等做出自己的判断。

### 三、文学趣味的表达

作为人大代表，冰心要在国内参观视察中发现社会建设的进展或存在的问题；作为作家，要在视察的所见多闻中积累素材，写出反映时代的时事散文。

① 冰心日记：1961年12月23日。

② 冰心日记：1961年12月26日。

③ 冰心：《归来以后》，卓如：《冰心全集第3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21页。



在创作上，冰心“喜欢描写快乐光明的事物，喜欢描写明朗清新的字句”<sup>①</sup>，对美好的事物有天然的敏感，有着细致的观察力、敏锐的审美能力和高雅的判断能力。在视察空闲期间，冰心总要翻书看报，在日记里记下了她看完文学作品后的感触。秦牧将自己的散文集《花城》送予冰心，冰心看了后感到“写得不坏，地方色彩亦很浓”<sup>②</sup>。1975年6月在昆明视察时，看昆明县志，“系光绪二十七年印的，戴筠帆辑；有序一篇，系闽人晋江吴鲁所作，从台湾说起，专论国防与其他，序文颇有眼光”<sup>③</sup>等。冰心也将文学欣赏的敏感运用到工艺美术作品的评价中。1957年4月17日至5月12日，冰心前往南京、镇江、扬州、无锡、宜兴、苏州和上海视察，参观访问的重点是工艺美术行业。在参观中，她发现了工艺行业中在产品、设计、艺人生活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在南京，冰心参观了云锦丝织合作社，“见各种土产品，颜色配合，大概嘈杂纷乱，不甚雅观”<sup>④</sup>；在馆长曾昭橘的带领下参观南京博物馆，看出土文物及各朝出品，“品质、颜色均好，有许多可为现代美工品所借鉴的”<sup>⑤</sup>，如认为铜镜可作漆盘，敦煌藻井图案可作桌布；参观艺美绒花生产合作社，看绒花制造过程，受益匪浅；到美术陈列馆，“选品甚精，似乎与市品脱节，不懂为什么生产与销售部门不通声气”<sup>⑥</sup>；为了进一步了解南京工艺情况，专门请手工业管理局工艺科同志来谈。在苏州，参观宋锦合作社、刺绣合作社、檀香扇社，在美术工艺指导委员会，看了通草堆花；到桃花坞木刻处，了解艺人生活状况，“因农民不买年画了，最近先制棋盘，又被江苏印刷局抢占生意，艺人生活很痛苦”<sup>⑦</sup>；到红木小件生产合作社，看了出品；到苏州市宫扇生产合作社，发现存在工艺水平与绩效的矛盾，“宫扇系两面的，一边好一边坏，但是计件出来，好的反而比坏的工资少，因画得慢细，细细问去，问题甚多。总之，出口公司

① 冰心：《归来以后》，卓如：《冰心全集第3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② 冰心日记：1961年12月16日。

③ 冰心日记：1975年6月27日。

④ 冰心日记：1957年4月19日。

⑤ 冰心日记：1957年4月20日。

⑥ 冰心日记：1957年4月21日。

⑦ 冰心日记：1957年5月4日。

掌握大权，对于遗产之存亡有举足轻重之势”<sup>①</sup>。在上海，到玉石象牙生产合作社看玉石雕刻；参观美术工艺研究室，看竹刻、篆刻等，“均甚精致，但玩具及绒花等颜色太糟”<sup>②</sup>；看羊毛服装及玩具商店，看百货公司，“出品为床单之类，花色、品种仍太庸俗”<sup>③</sup>……江南参观视察后，在中国文联召开文艺家整风座谈会上，冰心讲到了南方视察时看到的问题，“绣有湘绣、苏绣、锡绣之分，现在只有苏绣，因为土产公司只要苏绣，只许一花独放。绣花的稿子全是北京拿下去的。宫扇也如此，画师都难过得要哭，‘计件工资’画细画一天两件，画粗画一天八件，越画得好，工资越少。对工艺美术、民间美术，如不再挽救，国际声誉也会失去的”<sup>④</sup>等。

冰心将文学的敏感运用到工艺行业，也应用到电影或戏剧之中。1960年3月，冰心在湖北视察期间，看到了汉剧著名旦角陈伯华的《二度梅》，“陈扮相极好，表演有劲，手势很活，可惜后加大团圆，完全是春香戏，使上半段减色”<sup>⑤</sup>……在对文艺作品的评定中展现了冰心高雅的审美情趣，显示出冰心作为知识分子对事物的独立思考。

在上海玉石象牙生产合作社看玉石雕刻时，冰心联想到了写作：“材料纹理不同，因材雕刻，每件不同，这与设计人员胸中学问大有关系，于此可觉悟到写文章的道理”。冰心知道写作素材的重要性，“创作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中的真情实事，写出来的东西就不鲜明，不生动”<sup>⑥</sup>，在参观中，会细心地记下所看到的景象、所接触的人物、所谈到的事情，以此为基点，创作文学作品。有时，她在日记中记下关键字，为进一步的写作提供素材，比如：

1959年10月22日：

① 冰心日记：1957年5月4日。

② 冰心日记：1957年5月9日。

③ 冰心日记：1957年5月8日。

④ 《中国文联给外贸部、商业部、财政部的报告》，引自王炳根：《冰心与吴文藻：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2015年，第88页。

⑤ 冰心日记：1960年3月5日。

⑥ 冰心：《三寄小读者通讯四》，卓如：《冰心全集第5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69页。

……回张家，与张家兄弟谈话，张琳老人74岁，十五岁以前读书，以后就养花20多亩，兄弟二人与他二子。春天，月季、石榴、丁香，父亲曾给旗人俊家与庆王当花匠（曾祖起），丰台从明朝起，官院当花匠，有花匠地。这里有许多坟地，是贵族庄园，草花地是治贝子地，百姓受影响，收地只给几两银子，统治都王府的地。刚养花时才2亩地，30多年置20多亩（宣统后主，日本时）。……

10月24日：

本来以为今天很冷，出来并不冷，但日光不甚明朗。昨天张老汉说“丰台十八村，村村有井”，从来有走会如少林五虎等。此间有花神庙，道光年间建有十三个花神（闰月也有一神）。本队食堂桌上有仙鹤莲、大理花、变色黄月季、十姐妹、洋绣球等。在花洞内又煎了半天山虎子，有小孩子来抢红果。午饭后，朱树锦同到草桥花队，有会计陈宝林招待参观，看见有十姊妹、菊花等甚多，并到他的住处，阳光甚足，很像花洞，又看见他的父母等。回来时，他送我十姊妹树枝。……

10月26日：

晨，在张清廉处吃早饭，张清波折花及苹果来。9时左右，与朱树锦同至黄土岗，有刘镇海队长带看茉莉花量房、冷洞等，有三百多间，1700多棵，几十亩，队员30多人。花从广州前春节后上车，每年销花五次，室内两次，室外三次，注意水、火、风，冬天每斤4元，夏天2.6，刘本人每年3千多天，有5、6百元进款，十二三岁起作花匠印花，一层茶叶，一层花，早晨过鲜。

刘系雇农，53年结婚，固安县人，6岁时一挑来，每年6元，新中国成立后瓦房三间，地三十亩，买了自行车（从前一辆），现在有5、6平方，生活好不好？与殷维臣，八户成社（毛主席说全世界都吃上饭），地主赵家一花厂，没收归天堂归祖。本以菜为主，后因有人，为何不大搞？他本替赵泉做活，赵是保长后被枪毙……

在樊家村花队，与张琳老汉、刘镇海队长的谈话触动了冰心敏感的文思，她以三天的见闻为素材，写成了散文《像蜜蜂一样劳动的人们》和《“花洞”的生活方式》。《像蜜蜂一样劳动的人们》中，冰心以在樊家村花

队同张琳老汉聊天及学抹山虎子的经历、在黄土岗茉莉花队与刘镇海队长的谈话为材料，把花房里辛勤劳动的人们，比作“在那千千万万不知名的繁花中间隐现”的蜜蜂，在队长讲述的前后生活对比中展望了未来，“将来还用说么？人民公社是一轮初升的太阳呵！”<sup>①</sup>这篇散文把礼赞新中国的建设者具体到花队中的个体之中。在《“花洞”的生活方式》，看到花洞改建的办公室和食堂，最后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改得多么好，多么巧妙，多么适宜，这真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sup>②</sup>。两篇散文都以实际生活中的材料为主体，结尾处都进行了情感和政治的升华。早期创作中，冰心认为，“文学家要少和社会有纷繁的交际。文学家的生活，无妨稍偏平静，不必常常征逐于热闹场中，纷扰他的脑筋”<sup>③</sup>，如今冰心成为国家体制中的一员，履行政治责任时，作品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局限的烙印。就此阶段的日记而言，以1955年11月福建视察的观感为素材，写成《还乡杂记》；以1958年3月在河南参观的视察为素材，写成《我们把春天吵醒了》《记幸福沟》等散文。相比有应景之嫌的豪情式的抒情，如《我们这里没有冬天》里，“尤其是去年——一九五七年，就仿佛没有冬天。……也不是冬天没有来过，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干劲里，‘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前冬’，我们同心协力地在田野上，在河滩上，在工地尚，在把春天往前拉了三个月，人民心里光明温暖的春天，把严冬给吞没了。这是几千年来一个大变化”<sup>④</sup>，冰心以视察见闻为素材的时事散文，虽有政治的拔高，但不能抹灭建立在具体、生动的材料上而写成的散文本身的价值。

有的日记，冰心记录下见闻，为后续写作提供写作素材，而有的日记，特别是参观景点时的见闻感受，本身就是十分优美的写景散文。冰心有

① 冰心：《像蜜蜂一样劳动的人们》，卓如：《冰心全集第4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00页。

② 冰心：《“花洞”的生活方式》，卓如：《冰心全集第4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72页。

③ 冰心：《文学家的造就》，卓如：《冰心全集第1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55—156页。

④ 冰心：《我们这里没有冬天》，卓如：《冰心全集第4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页。

深厚的文学修养，五岁时就在母亲的帮助下认字、读书，读遍了《三国志》《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她习惯“在手边和枕边，常常放几本古典的散文或诗词”<sup>①</sup>，也乐于在文章中运用古典诗词，“古人供给我们丰富的可供利用的古诗、古文、古词作为蓝本、材料，倘若不能领略享受，真是太对不起！”<sup>②</sup>在游览名胜古迹时，冰心时时做个有心人，将看到的风景、对联，听到的历史故事一并写在当天的日记里，有的日记简直就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写景美文，有的则是知识量丰富的科普散文。

比如，在游览瘦西湖的见闻中，有美景介绍，有历史故事，也有闲聊趣事：

同出至瘦西湖，在大虹桥下车，桥系石制，据说唐朝本系木桥，至长堤春柳“胖亭”折入叶秀峰花园，有松树百余种及法国梧桐，与南京城及中山陵相似，并有桃花，有全红全白及红白相间者，此处均多。在劳动厅内，有几幅沈约画，可作缣丝画稿。从叶园绕出，至莲性寺，过五亭桥，建筑甚特别，可惜里面漆及瓦面漆均毁。观对面有乌庄，茅舍三五，古雅可爱。南岸有钓鱼台，乾隆曾在此钓鱼（乾隆曾四到扬州，盐商及宦官竞相巴结治瘦西湖，盖起24座园子）。再过去，有所小湖，上草堂蕙香满室，有花极美，可作标本，为仙客来（青莲色）荷包花，顾家青素，过去有王佛洞。登山遇见王秀山老人，保定人，据说随军南下，解放时有功德，他看守园林，他已72岁，只有老伴，他说了徐宝山盐桌许多故事。绕过月关亭处至徐园，有桥通过院中，太湖石甚多，据说仿《西游记》有72峰。出门处有一个鹤馆，内有海梅木器，此花梨纹理尤细，亭中有萧里镇海大铁锅两个，据老人说湖边也有，有的说农民作为羹缸，老人说锅面朝下可以吸水，底平可减轻浪势，亭中并有人面桃花，这种园林墙上截有青瓦隔子，通气且美观，竹子亦不少，老人言日本人砍去不少。<sup>③</sup>

① 冰心：《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卓如：《冰心全集第5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

②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二十三》，卓如：《冰心全集第2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③ 冰心日记：1957年4月23日。

又如，在无锡参观蠡园时：

……穿过长廊至蠡园，临水一小楼，绝胜，在大楼小憩，此园本属王姓，与招待所同主。出来后至鼋头渚，真是久闻大名了，岸有康有为写“横云”二字。上山至广福寺，有一联别致之至，曰：“唤起淡妆人，更何必十分梳洗，商略黄昏雨，只可惜一片江山”。下有花神庙，上至山顶，有一亭新建，极目四望，有三电山、鸟积山，有禹王鸟迹，是从前游击队大本营，蒋军来攻时，是海陆空并进的。山上有陶朱阁，有冈县陈永修一联，曰：“家国恩仇归一舸，湖山形胜占三吴”。从鼋头渚坐船至小箕山，是荣德生园子最好，满载桂花，到时楼前院子正百花齐放，有玫瑰、樱花、杜鹃、山茶等。从小箕山坐车至太湖饭店，门外一些岛屿历历在目，此处本是荣家所立江南大学，有纺织、面粉二系，院系调整后改成西湖饭店。饭后在车中小息。至梅园，系荣德生之兄（荣）宗敬的花园，进门也是藤萝架等，满山是梅，可惜不在花开时候。<sup>①</sup>

在“觉着横看、侧视，到处都是图画”<sup>②</sup>的苏州园林里：

……怡园（本顾家花园），小而曲折，假山、亭子等均好，雨中甚有幽致。再至玄妙观，大殿系石柱，坚固美观。又到狮子林，因园中假山甚多，状如狮子，亦有如蛙如蟹者，风景亦好，但水中放一石舫太挤了。又至拙政园，最好，大方朴素，我最爱。卅六鸳鸯馆，鸳鸯成双作对，相偎相傍，内中正陈列花、石、鱼等展览。各园均游人如织。在忠王楼上下巡视后，在嘉实亭吃茶。出至沧浪亭，园外是水园，内是山境，物连成一片，最有风致，雨中别有意思。总之，南方园林以曲折幽深胜，花多水多便觉艳丽。<sup>③</sup>

① 冰心日记：1957年4月28日。

② 冰心日记：1957年5月5日。

③ 冰心日记：1957年5月1日。

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追求文艺的政治高度和文艺风格的大众化。在文艺政策的宣传下，冰心此阶段的时事散文脱离不了时代的局限，存在着政治的刻意拔高、个体“我”的消融的问题，与早期作品清新俊逸的风格存在一定的脱节。然而，在纯粹个人情感抒发的小天地里，冰心不用顾忌发表后的效果，不用细思字词的政治性，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诗意的生活态度、随时随地情感和见解。美丽的自然景物触动了她心中美好的情感，细致观察的良好习惯和深厚的古典修养为她提供了表达文思的翅膀。这些写景日记延续了冰心早期的风格，在政治化的年代里弥足珍贵。

#### 四、真实心灵的律动

冰心的日记里，记录了冰心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命运的浮沉，以及时代影响下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波动。冰心日记，为我们思考一代知识分子复杂的命运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

1957年，冰心在江南参观工艺品时，发现了工艺生产中的许多问题，并在日记中对工艺设计中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然而，随着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向工农兵学习”的口号逐渐深入到冰心的心底时，冰心的批判锋芒开始减弱，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压抑的时代环境已经无法为冰心提供独立思考的条件，她和这个时代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紧张、恐慌，直到“文革”后，紧张的心态得到缓解，知识分子批判的锋芒才再次体现。冰心记录了自己的心理状态，透过冰心的日记，我们可以了解在政治化年代里，冰心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浮沉和真实的心灵律动。

1960年，冰心去湖北参观视察，在参观重型机械厂时，见到六好旗手马学礼，“高个子，和蔼朴素，是工人本色，比知识分子气味好得多！”<sup>①</sup>1964年，冰心在河北煎茶铺视察时，听到王汝卿县长的报告后感慨道，“这位县长简直和农民一样，社会主义的官和从前的官有多大的区别呵！”<sup>②</sup>

① 冰心日记：1960年3月5日。

② 冰心日记：1964年5月22日。

经过轰轰烈烈地反右斗争，在向工农兵学习的号召下，冰心的思想改造卓有成效，已经对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有所怀疑，对工农兵的学习，从外在的政治号召上升到自己内心的追求，“贫下中农立场坚定，可贵、可爱、可敬，我们应向他们学习”<sup>①</sup>，“贫下中农痛痛快快地谈自我革命、自觉革命，而我们本质不是如此，遮遮掩掩，没有他们那么快、那么彻底，那里头有阶级本质问题，农民提意见水平高，又概括又具体”<sup>②</sup>。为了改掉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习气，在时代的号召下，冰心与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到樊家村花队视察时，跟花匠学抹、屯山虎子<sup>③</sup>；到江西路口大队视察时，同社员一起抬谷子、晒豆子，和妇女们一同转风车<sup>④</sup>。1965年，冰心在汉口视察，旁听了武汉市学校四清工作报告，在日记里，冰心记道：

……听武汉市学校四清报告，有大、中、小三种学校的四清情况，对我最有震动的是武汉实验中学语文教师廖碧蜀，他深受了宣传母爱之毒、模糊阶级观点，在评改学生作文上亦持此态度。他的检讨使我知道文艺香花、毒草大有相反的影响，会后，我去和他握手说“你几乎成了我的替身，以后我们一同戴罪立功”。<sup>⑤</sup>

除了与农民一起劳动，冰心也和参观人员一同到沙窝镇地主家参观，感觉并不如宣传般凶恶，“果然与众不同，但他本人看去像个劳动人民，西高黑瘦”<sup>⑥</sup>。到洛市公社刘家大队看对敌斗争大会，有反革命分子“看来神情并不低头认罪”<sup>⑦</sup>，也旁听过批判会：

……参观 C. C. A. S. E. 展览会，有大台山韩家罪恶史“马走五里地，

① 冰心日记：1964年5月27日。

② 冰心日记：1964年6月2日。

③ 冰心日记：1959年10月23日。

④ 冰心日记：1965年11月30日、12月3日、12月1日。

⑤ 冰心日记：1965年12月14日。

⑥ 冰心日记：1964年5月26日。

⑦ 冰心日记：1965年12月4日。



不吃别人草，车走五里地，不轧别人地”，还有王俊（沙窝教员）富农分子，奸污女生宗谱，和沙窝四不清的报告（未记人名），并有实物，有“三江一海”的地契，是“于九江”一分一江。晚，坐汽车到前两间房参加干群团结大会，会上群众发言踊跃，高喊口号（带喊口号的人是受害者的儿子），铡刀时12岁。干部发言亦踊跃，武国信痛哭流涕，其父、兄弟亦发言。此外有富农子弟下决心与家庭决裂等，印象极深<sup>①</sup>。

在向工农学习中，冰心认识到了与工人农民的差距，否定了过去倡导的“爱的哲学”，她努力改造自己，积极读文件，“听孙局长报告，甚有概括性，恨我文件不熟。午饭后，补看三篇文章，地名、人名才弄清楚一些”<sup>②</sup>，也用新学到的政治批判标准，发现身边知识分子的落后习气和点滴进步：在小组座谈会上，听了吴世昌的报告，认为“吴世昌对于讨论问题总是纠缠于字句之间，又常有意气”<sup>③</sup>；听了徐楚波、朱光潜的报告，认为“徐是地主出身，但属阶级调和，朱是在概念上绕圈子，到此后看到活生生的事实，都有提高”<sup>④</sup>。然而，与资产阶级世界观决裂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红卫兵就搜查了冰心的家，“拿走了几包不合于毛泽东思想的书……随时有书，还可交去”<sup>⑤</sup>。搜查后第二天：

1966年8月28日

晨，宗生、小妹都回家，大家谈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尤其是我们这种家庭，必须彻底破旧立新，我们又买了红纸，重新写了林彪语录，我们把毛主席像挂在客室当中，两旁也贴上语录。午饭后，小妹夫妇回校。凌晨晚饭后走，宗生买不到回津车票，定明早行，我向预科一部红卫兵汇报宗生不走事（电话）。

① 冰心日记：1964年5月29日。

② 冰心日记：1965年11月21日。

③ 冰心日记：1965年12月7日。

④ 冰心日记：1964年6月1日。

⑤ 冰心日记：1966年8月27日。

随后，红卫兵通知冰心丈夫吴文藻去参加每晨四小时的劳动，冰心也提出了请求：

1966年8月30日

晨，发作协党总支一信，请求：停发工资，我的定期存款（全部）以及出国衣装并收的礼物以及自己衣饰，都还给国家。

在1966年8月的日记中，冰心紧张、压抑、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流淌开来。冷静下来，冰心认为“这是青少年在横扫我们思想上的牛鬼蛇神，一定好好接受，和他们一起对自己闹革命”<sup>①</sup>。在刚刚反右时的1957年，冰心从江南视察结束，回家几天后就接受《人民日报》林岗的采访，就肃反问题、整风问题谈一下意见。冰心说道，“肃反的时候……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这回整风以后，一定要订出个制度来，现在的制度不合理”<sup>②</sup>，冰心敢说敢言，显示了作为知识分子对事物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然而，“文革”时期已经无法给人们提供独立思考的条件，知识分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失去了理性的思考。

这种心态的改变，是政治宣传的结果，也是主动接受改造的结果。作为人大代表，在赴各地视察时，看到了轰轰烈烈的建设场面、各行各业人民饱满的工作热情，听到各地报告中的新旧生活对比，受到了革命之地的精神熏陶，在与贫下中农接触时，看到了他们对领导人的虔诚。反思、对比中，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正被孤立在社会主流之外，强烈的主流归属感让他们明白，只有放弃过去信仰的哲学，皈依主流集体，才能成为社会主义人民大众的一员。1965年11月，冰心赴江西视察，参观了余江县虫防治站、白塔集展览馆，“对自力更生及消灭血吸虫有最深印象”<sup>③</sup>。参观后，冰心记下了自己的学习心得：

---

① 冰心日记：1966年8月31日。

② 林岗：《与冰心的谈话》，《内部参观》，人民日报社1957年5月24日，引王炳根：《冰心与吴文藻：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2015年，第90—91页。

③ 冰心日记：1965年11月5日。

(1) 开门学习，初步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伟大、正确之威力——白塔集治水与根治血吸虫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解决，落实到发展生产、造福人民之上。

(2) 体会到党的方针政策是从群众中来，调查研究民生疾苦，然后到群众中去，倚靠群众，自力更生。

### 找到的差距：

(1) 为何贫下中农是依靠的对象，而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因为没有翻身感，没有受到像他们那样的压迫，就不革命，不是革命知识分子。

(2) 水、土、肥、种，互相促进，新陈代谢，我们在其他条件改进后，就没有改善，改造自己的干劲。

(3) 主席诗句句有根据，一人造天问题等。

参观八一南昌纪念馆、烈士纪念馆，“看了感慨万千，知道革命领导人之高瞻远瞩，并感到觉悟，革命之不易。在起义名单，看到许多现在领导人名字，真是久经锻炼了”<sup>①</sup>。到井冈山，看会师广场、第一次开党大会的地方、茅坪红军医院等，听红军打仗的故事、毛主席房东谢槐福讲毛主席爱群众的故事，“遥想当初毛主席领群上山时的苦处，我们真是踏着烈士的血迹上康庄大道了”<sup>②</sup>。在参观心得里，冰心写道：

我们平常所说的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又得许多铁一般的事实的证明。当我们从相木岭上山的时候，我自己就感到我们坐着的安稳、宽大的汽车，就是碾过烈士的血迹前进的，革命领袖和革命先烈用自己的血和汗给我们铺出一条康庄大道，这是我们所应该刻骨铭心的。到了之后，更想不到井冈山已经建设得和山下的许多城市差不多，

① 冰心日记：1965年11月11日。

② 冰心日记：1965年11月20日。

尤其是我们的住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几个五年计划中的建设成就，包括昨天那几位以及许多的老革命干部和青年的劳动在内。我们应当如何把我们自己的岗位工作和党的领导、全国人民的努力配合起来，紧紧跟上，这是我们在这次参观以后要时时刻刻记住的问题。

“文革”后期，思想改造仍影响着冰心。1975年去西南视察时，在贵州参观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陈列馆，想到领导人曾经为革命的胜利鞠躬尽瘁，“想到我们整整40年六个月之后来，此真是坐享其成，感慨无端”<sup>①</sup>；在湖南视察时参观毛主席故居及祠堂，“使我对火塘边的亲密、沉挚的手足交谈有无限敬仰之情”<sup>②</sup>。但是，我们也发现，经过时代磨砺的冰心，和过去一样心态乐观平静，在韶山看到“朝阳下空气清新，稻田碧绿，韶山叠翠，门前池塘荷花大放，真是有生中不曾有过的幸福感觉”<sup>③</sup>，没有控诉时代让她失去了什么，而是看到了时代对她的给予，在西南参观时住到招待所里时，“这招待所极其舒服，我昨晚睡觉还在出汗，那么一般在这里住家及乘车旅行的老百姓就会热得多，党和人民这等优待我们，我们必须努力尽自己所能为人民做些事”<sup>④</sup>，变得更加深沉宽厚了。三十多年前，“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愤然死去了”<sup>⑤</sup>的背景下，冰心全家来到了云南，如今再回云南视察，已是崭新面貌，冰心不禁感慨万千，“尽想给三个孩子写信，谈谈自己的万千感想，并勉励他们及第三代要奔向革命的最前线，比枯守北京好得多”<sup>⑥</sup>。既注重知识分子在书斋里遨游时诗意的情调，也认识到了干预生活的价值，这种认识在教育方式上得到运用，也在冰心晚年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特殊政治年代对她的影响虽未完全消退，但知识分子独立批

① 冰心日记：1975年7月6日。

② 冰心日记：1975年7月12日。

③ 冰心日记：1975年7月12日。

④ 冰心日记：1975年7月10日。

⑤ 冰心：《忆“七七”》，卓如：《冰心全集第7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⑥ 冰心日记：1975年6月24日。

判的立场也在复苏。在成都视察，参观蜀锦厂时，冰心评价道，“颜色太鲜艳，花样也不太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也”<sup>①</sup>，对文艺的敏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冰心的身上又出现了。1977年，冰心到河北任丘参观考察，11月23日至11月26日的日记，是现今发现的冰心唯一一部新时期以来的日记。在河北任丘，她参观潜山层图、积输站、雁翎油井，到海洋石油勘探指挥部，看渤海二号，看潜水作业，朴实的日记风格显示出冰心平和舒放的心态。新时期以来，冰心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重新举起“科学”与“民主”两盏明灯，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创作了《绿的歌》《我的故乡》《落价》《万般皆下品……》等作品，迎来了新时期的创作高峰。

### 五、亲情关怀的呈现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日记里，只有1966年“文革”时期的日记，冰心身在家中，其余的时间，冰心在异国他乡访问、视察，聚少离多的日子里，冰心对家人十分牵挂。冰心自幼对父母感情深厚，在早期作品，如《寄小读者》《往事》里，冰心书写了幼时与父母之间的趣事，表现了父母与孩子之间浓厚的亲情。1957年5月，冰心在上海视察时，也许是触景生情，想到1930年母亲在上海逝世，夜里做梦，“梦母亲镜箱，我收买了来，忽而痛哭”<sup>②</sup>。于是，在视察结束后，到三弟谢为楫家，与三弟、弟媳和孩子们到母亲墓上，剪草、献花，表达思念之情，之后冰心带着孩子们到俱乐部玩耍、买球。在云南视察时，也许是想到1940年将要离开云南默庐的时候，接到大弟的来信，被告知父亲谢葆璋去世，夜里梦见父亲，“哭醒过来”<sup>③</sup>。

外出视察，凡是在有亲戚的城市，冰心总会抽出空来与家人相聚。1955年，冰心在福建视察时，与三妹、五弟相见，有时是三妹、五弟来访，有时是冰心去他们家聊天，有时去他们家吃饭，“他们送我许多食物，

① 冰心日记：1975年6月17日。

② 冰心日记：1957年5月9日。

③ 冰心日记：1975年6月24日。

请他们代为打包”<sup>①</sup>。1957年，在江南视察时，虽然二弟谢为杰已经在北京工作了，但二弟媳李文玲仍在南京，冰心刚到南京，“小憩后，即赴李家与姥姥稍谈”<sup>②</sup>；上海视察结束后，临回北京前又专程到儿媳袁家“看见毓麟母亲和她太姑和哥哥弟弟”<sup>③</sup>。在西南视察时，冰心与云南领导们商量，希望得到云南民族的情况，即使在视察时也希望能帮助丈夫吴文藻获得一些研究民族的资料；在成都时，收到丈夫吴文藻和孩子们的家信，想到“今日是结婚纪念43年，文藻坐东北，我坐西南，亦可喜也”<sup>④</sup>。出门在外，冰心也想念在家的孩子们。在瑞士日内瓦访问时，为大女儿买表；在湖北视察时，为小女儿买底袜；在南昌视察时，关心着儿子的家庭，“得小妹信，极其详尽又好，心中甚喜，对于宗生事一分为二”<sup>⑤</sup>；在都江堰参观李冰父子庙，在河滩捡了小石头回去送给同名的小外孙李冰；在西南视察结束后回到家中，得知小外孙钢钢得了红领巾，十分高兴……

1957年，冰心一家三个右派，丈夫吴文藻、三弟谢为楫、儿子宗生都成为右派，“1958年3月20日，吴文藻已被告知去社会主义学院报名，参加学习。由于严重的精神压力，吴文藻患上了严重的荨麻疹，被送进北京天坛医院治疗，住院达一年之久”<sup>⑥</sup>。儿子宗生因在大字报中指出党要重用知识分子，要发扬民主，要整治腐败的观点，专案组对其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被划为右派，并于1958年3月28日被送往天津汉沽盐业化工厂劳动改造<sup>⑦</sup>。1959年，冰心正巧与二弟谢为杰同赴河南视察，去时又在一个包厢，在视察期间，冰心为三弟媳寄去一信予以安慰，为杰也寄去了粮票。冰心虽然人在河南，但心里仍十分牵挂家人的安危，与同行的许广平谈起，许广平劝他要帮助家中的右派，“谈到与文藻、宗生等一同改造，不进则退，真是金玉良言”<sup>⑧</sup>。1975年，在西南视察时，星期天时总会想起，“今

① 冰心日记：1955年12月14日。

② 冰心日记：1957年4月18日。

③ 冰心日记：1957年5月12日。

④ 冰心日记：1975年6月15日。

⑤ 冰心日记：1965年11月16日。

⑥ 陈恕：《冰心全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302页。

⑦ 陈恕：《冰心全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305页。

⑧ 冰心日记：1959年3月23日。

天又是星期，不知文藻回去否？”<sup>①</sup>“今天又是星期，孩子们又都回来了，不知文藻回来否？”<sup>②</sup>想念家人，但当确定了回家的归期，“回家在即，不知家中情况如何，真是近乡情心更怯也。”<sup>③</sup>回到家中，与亲人们相见，其乐融融。家人的互相关怀，让久出在外的冰心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家人的关心是冰心在政治化年代特别是应对“文革”时期的精神支柱。

冰心的日记中有大量的人物，这里面，有的是同行的人大代表，如同是作家的沈从文、张天翼、巴金、叶圣陶、周立波等，或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如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美学家朱光潜、漫画家华君武、雕塑家王朝闻、歌唱家喻宜萱、舞蹈家戴爱莲、历史学家顾颉刚、新闻工作者戈扬、妇女界代表彭镜秋等；有的是冰心访问或结识的工人、农民，如剪纸艺人张永寿、劳动模范郑依姆、刀具大王马学礼、花队的张琳老汉、毛主席房东谢槐福老人等；有的是见到的、听到的、游览时认识的或印象深刻的人物，如前清遗老萧退庵老人，“是前清遗老，从前三请不来，现在已参加政协了（省），人心振奋，此亦新气象”<sup>④</sup>；灵岩寺的妙真法师和小僧“圆澈”，在大雨中背着冰心过河的刘秀珍小妹，来访的年轻人，“晚会后，有总会两个女青年来看我，一个叫李平，一个叫姜亚琴，在台阶上谈了半天”<sup>⑤</sup>；滨海潜水作业相关人员丁耀民，“他和王铁人同时在玉门油矿工作的，很热情”<sup>⑥</sup>……冰心将接触到的人物的名字，即使是见过一面的普通人都写在日记里，小小的细节里显示着冰心这位大作家对每个个体生命的尊重，充满着人性的关怀。

冰心对朋友充满关心。1978年7月18日，西南视察刚回到家，冰心向家人打听朋友的近况，在日记里写道“蒋思铤病故，赵清阁贫病，是件伤心事”<sup>⑦</sup>。第二天，冰心就给赵清阁写信，“今明天等我女婿来时（现在有事都是让年轻人跑），我就让他给你寄点钱去，以后再有用钱时，立刻告诉

① 冰心日记：1975年7月6日。

② 冰心日记：1975年7月13日。

③ 冰心日记：1975年7月18日。

④ 冰心日记：1957年5月3日。

⑤ 冰心日记：1975年6月29日。

⑥ 冰心日记：1977年11月26日。

⑦ 冰心日记：1975年7月18日。

我，金钱身外物，应急之际，不能相助，要朋友何用！”<sup>①</sup> 冰心的关心让赵清阁十分感动。在赵清阁主编的《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里，搜集了冰心的书信 61 封，在与冰心的按语中，赵清阁写道，“建国前后两个时期，冰心经历了不少变化，有幸，有不幸，她都处之泰然。这是与她超逸的修养分不开的，我佩服她。我觉得她的一生，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sup>②</sup>，对冰心的人格高度肯定。即使参观视察时偶尔认识的工人，冰心也是充满关心。在视察江南工艺行业时，冰心发现了工艺品制作中的许多问题，也体会了艺人生活的辛苦，在上海美术工艺研究室，看到了玩具小组的许宝瑛：

晨九时，同陈施君同志，先至美术工艺研究室，副主任赵润明，谈及潘光旦、吴碧源不工作情形后，即参观有竹刻、篆刻等，均甚精致，但玩具及绒花等颜色太糟。毕，回来颇累。下午两时，又到服装社，系替苏联加工，颜色、样子都不好。又至玩具小组，系许宝瑛，看她大有创作才能，颜色配得最好，神气亦生动，但似有委屈，眼泪盈眸。回来后，与陈同志研究，看是否再深入识她，出来走走，给她以艺术地位，培养她。<sup>③</sup> ……

第二天，到其他玩具厂参观，对比后感到“花样不如宝瑛的好”，表现了冰心对普通工人才艺的尊重和欣赏。对普通朋友的关注，在冰心的日记中时常出现，1975 年，在西南视察时，天气炎热，招待所人员送了一盆冰来凉爽，冰心推辞了，“工人流千斤汗，我们怎能至少不在气候上受点热？”<sup>④</sup> 视察中认识了工作人员刘承钊，认为他待人热情，工作有魄力，还专门去他的家里聊天，看了他的妻子，给孩子们送糖。视察结束后，又去厨房感谢炊事员……亲情和人情为冰心提供了生活的温暖港湾，亲情和人

① 冰心：《致赵清阁》，1975 年 7 月 19 日，引陈恕、周明编：《冰心书信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55 页。

② 赵清阁：《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第 277 页。

③ 冰心日记：1957 年 5 月 10 日。

④ 冰心日记：1975 年 6 月 21 日。



情里，倾注着冰心“爱与同情”的人道主义关怀。

冰心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的日记，虽然在日期上并不连续，但联结起来却展示了一段时期的历史。在一个个充满时代气息的画面里，我们可以窥探出那个时代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侧影。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是特殊的政治年代，时代影响着冰心，冰心也用文字表现着那个时代。在两者的互动关系中，我们看到了大背景下冰心眼中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里有她的访问日程、观察到的时代画面，文学情调和文学追求，命运的浮沉和内心的思想状态，亲人的思念和人情的关怀等。冰心在日记里，把所看、所听、所感记录下来，为后代的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和全面了解冰心形象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史料。

#### 参考文献：

- [1] 陈恕：《冰心全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年。
- [2] 陈恕、周明编：《冰心书信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 [3] 范伯群、曾华鹏：《冰心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
- [4] 范伯群：《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年。
- [5] 段海宝：《冰心一片冰心》，北京：民主建设出版社，2012 年。
- [6] 段慕元：《一个真实的冰心》，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年。
- [7] 王炳根：《冰心与吴文藻：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2015 年。
- [8] 万平近、汪文顶：《冰心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年。
- [9] 肖凤：《冰心评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年。
- [10] 卓如：《冰心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年。
- [11] 卓如：《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冰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
- [12] 张秀枫：《冰心诗文精选精装》，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 年。
- [13] 赵清阁：《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 [14] 王炳根：《新发现的冰心还乡日记》，《厦门文学》2004 年第 4 期。

- [15] 王炳根：《新发现的冰心还乡日记》，《厦门文学》2004年第4期。  
[16] 夏衍：《赞扬我的“老大姐”》，《花城》1981年第4期。

（刘嵘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 冰心和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成绩之研究

### 步起跃

20 个世纪初，美国的女子学院培养了几位著名的中国女性。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是中国著名的“宋氏三姐妹”，是 20 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她们影响了那个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其中的宋霭龄和宋庆龄是乔治亚州梅肯镇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毕业，宋美龄则在威斯理安读了一年，因为二位姐姐毕业离开美国，1913 年转学到波士顿西郊风景如画的威尔斯理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直至毕业。二所学校读音接近，国人往往以讹传讹，以为宋氏三姐妹都是威尔斯理毕业的。何况威校校名的中文翻译版本有韦尔斯利女子大学，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卫斯理学院等，更是让不少人迷糊。2013 年威校第 13 任校长 KIM BOTTOMLY 率领代表团访华，笔者作为威校招生委员会主席随团来华，曾经与校长讨论过此事。校长说可以考虑官方发一个备忘录，统一学校的中文翻译。但是此事尚未办理，她即离任。看来此事还需要威校第 14 任校长 PAULA JOHNSON 过问了。

1923 至 1926 年就读于威尔斯理女子学院的冰心，是 20 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温家宝总理曾经这样怀念冰心：“记得那年冰心老人去世的时候，我在夜里赶到了北京医院，向老人作最后的告别，她的女儿拿出一个笔记本让我签个名。我非常尊敬老人的为人，喜爱她的作品。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爱心，有感情的人。”



留学美国的冰心

2006年5月，中国冰心研究会会长、当时的冰心文学馆馆长王炳根先生携冰心女儿吴青先生的授权书访问威尔斯理女子学院，得到冰心在威尔斯理的成绩单。80年前的成绩单尚未数字化，均由一张张卡片手写。

Full Name: Hsieh, Wan-Ying (Margaret)		School: Yenching College, Peking, China, B.S. 1923	
Date of Birth: August 12, 1902		Grade: Bachelor of Science	
Place of Birth or Birthplace: Peking, China		Race: Chinese	
Address: 44 Chang An Street, Peking, China		Religion: None	
Admission: Standard		Status: Regular	
Special Admittance: No		Class: 1923	
Height: 5 feet 10 inches		Weight: 120 lbs	
Complexion: Fair		Hair: Black	
Eyes: Blue		Build: Slender	
Mental: Excellent		Character: Good	
Physical: Excellent		Social: Good	
Moral: Excellent		Vocational: Good	
Intellectual: Excellent		Professional: Good	
Literary: Excellent		Artistic: Good	
Scientific: Excellent		Mechanical: Good	
Mathematical: Excellent		Business: Good	
History: Excellent		Languages: Good	
Geography: Excellent		Physical Education: Good	
Civics: Excellent		Other: Good	
English: Excellent		Total: Excellent	

冰心成绩单影印件（一）

第一张卡片记载的是：冰心于1923年7月17日被威校破格录取并授予奖学金，攻读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她的出生日期为1902年8月12日（这与现在的资料1900年10月5日不符），冰心的名字是：HSIEH, (MARGARET) WAN-YING。即是谢（英文拼音）HSIEH, (玛格丽特)

婉莹。玛格丽特的意思是“阳光的孩子”。冰心的学号是 015754，父亲姓名 (MR. P. C. HSIEH, 即谢葆璋先生)，地址 (中国北京中剪子巷 14 号)，监护人姓名 (MISS KENDRICK, 注明非亲戚)，她属于的教会是公理会 (CONGREGATIONS, 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她的本科学历是中国北京燕京大学 (YANCHING COLLEGE) 1923 年获得学士学位。

**WELLESLEY COLLEGE**

was admitted to Wellesley College, September \_\_\_\_\_

Name: <u>Ms. Hsieh (Margaret) Wen</u>				No. <u>015754</u>			
WELLESLEY COLLEGE				WELLESLEY COLLEGE			
Course	Grade	Section	Hours	Final	Final	Final	Final
Number	Section	Grade	Hours	Final	Final	Final	Final
Personal Hygiene	121		1/2				
Personal Hygiene	120		1				
Mathematics	101		3				
English Composition	102		3				
English Literature	302		1				
English Literature	307		3				
Reading	101		3				
Personal Hygiene	121		1/2				
Personal Hygiene	120		1				
Mathematics	101		3				
English Composition	102		3				
English Literature	302		1				
English Literature	307		3				
Reading	101		3				

Records not designated by the letters A, B, C, D, E, of which A denotes the highest grade and E (below 60) indicates failure.

Wen Hsieh received the degree of B.A. in June 1926  
Date MAY 6 4 2005 Registrar Gene B. Hamilton

冰心成绩单影印件 (二)

第二张卡片记载的是：1923 学年，个人卫生保健 121 (半个学分)，个人卫生保健 120 (1 个学分)，数学 101 (3 个学分)，这些课程注明休学，没有成绩。冰心到威校不久就生了一场大病，去了青山疗养院被隔离，所以请了病假。另外 4 门课，英文作文 102 (3 个学分)，英语文学 302 (1 个学分)，英语文学 307 (3 个学分)，阅读 101 (3 个学分)，没有显示成绩，笔者猜想是因病休学之故。

1924 学年：个人保健卫生 (半个学分)，圣经历史，阅读和朗诵这三门课，也是标注休学。英语文学 101 (3 个学分) 和英语文学 309 (3 个学分)，没有成绩记载。英语文学 307 (3 个学分)，成绩为 B。

**WELLESLEY COLLEGE**

was admitted to Wellesley College, September \_\_\_\_\_

Name: <u>Msgr. Ting Hsieh</u>		Major: <u>English Literature</u>		Degree: <u>M. A.</u>		Class: <u>1926</u>	
Thesis: <u>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Edition of the Poetry of the Lady to Ivan.</u>		Faculty:		Final Exam:		Grade: <u>B</u>	
Year: <u>1924</u>		Work Presented:		Credits:		Final Reading Period: <u>May 1926</u>	
1924-25		English 307		3		B	
1925-26		English 309		3		B	
1926-27		English 101		3		B	
1927-28		English 304		3		C	
1928-29		English 302		1		A	
1929-30		English 303		1		A	

Credits are designated by the letters A,B,C,D,E, of which A denotes the highest grade and E (below D) indicates failure.

Msgr. Ting Hsieh received the degree of B.A. in Nov. 1926  
 Date: MAY 8 4 2008 Registrar: Law H. Hamilton

冰心成绩单影印件（三）

## 第三张卡片的内容：

1924年11月入学（冰心从青山疗养院病愈出院）。1924至1925学年住校，奖学金情况是个问号（不详）。1925至1926学年住校，标明获得奖学金。

专业：英语文学，1926年6月授予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李易安女士诗词的英文翻译和编辑》（3学分）。笔者曾经把它拍摄成微型胶卷，赠送上海图书馆。毕业论文里面中文皆是冰心手写，笔迹清秀娟丽。英文则使用打字机。

1924~25学年：英语文学 307（3学分），第一学期成绩 B，第二学期成绩 B。英语文学 309（3学分），第一学期成绩 B，第二学期成绩 B。英语文学 101（3学分）比较特别：成绩单说这门课是毕业的必修课，但是标明免试。笔者猜想，威校教授们认为既然冰心已经通过英语文学 307 和 309，也就没有必要再上比较简单的英语文学 101 了。直接就免试给了 101 的学分。

1925~26学年：英语文学 304（3学分），第一学期 C，第二学期 B。英语作文 302 和 303（均为 1 学分，但无成绩，注明是旁听）。专业大考（1926年6月10日通过，成绩为 B）。

那个时候威校规定研究生毕业必须懂两门外语。成绩单记载冰心法语阅读 1926年5月通过，英语阅读 1925年10月通过（原来是德语，改为了

英语，并且注明是教授们经过特别表决，允许冰心用英语代替德语，因为她的母语是中文之故）。这个处理办法，和现在美国许多大学类似。笔者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攻读数学博士，学位规定要通过二门外语，和冰心情况差不多。唯一小小的区别是，除了笔者通过法语阅读外，学校直接允许中文作为第二门外语，连英文阅读考试也免了。

最后，成绩单标明冰心的专业总成绩为 B，于 1926 年 6 月被授予硕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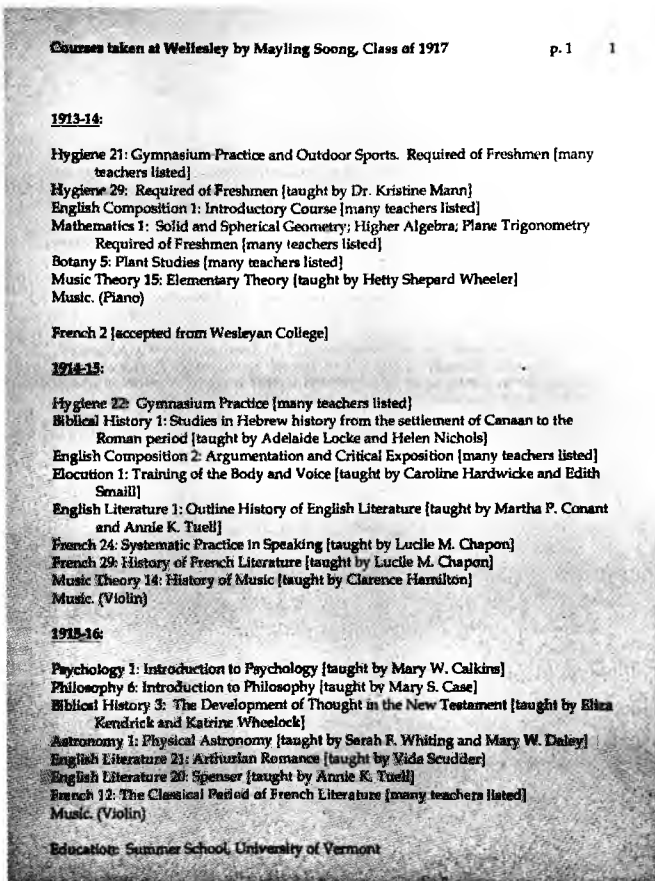
留学美国的宋美龄

宋美龄女士 1913 至 1917 年在威尔斯理的本科专业是英语文学，副业是哲学。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颇为神秘。在威校档案文献主管 MARY YEARL 女士的大力协助下，笔者调阅了宋美龄的档案，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尤其是她的学习情况。她的大学四年课程如下：

大一：卫生保健 21（体操训练和户外运动），卫生保健 2（一年级必修），英文写作 1（初级），数学 1（立体几何，代数，平面三角，一年级必修），园艺（植物学），音乐理论 15（音乐基本理论），音乐（钢琴），法语 2（威斯理安转学分）。

大二：卫生保健 22（体操训练），圣经历史（研究希伯来历史：迦南至罗马），英文写作 2（争议和批评），朗诵法 1（训练体型和发音），英语文学 1（英语文学简史），法语 24（口语系统训练），法语 29（法国文学史），音乐理论 14（音乐史），音乐（小提琴）。

大三：心理学 1（初级），哲学 6（初级），圣经历史 3（新约思想之发展），天文学 1（物理天文），英语文学 21（阿瑟王的传奇故事），英语文学 20（斯宾塞），法语 12（法国文学的古典阶段），音乐（小提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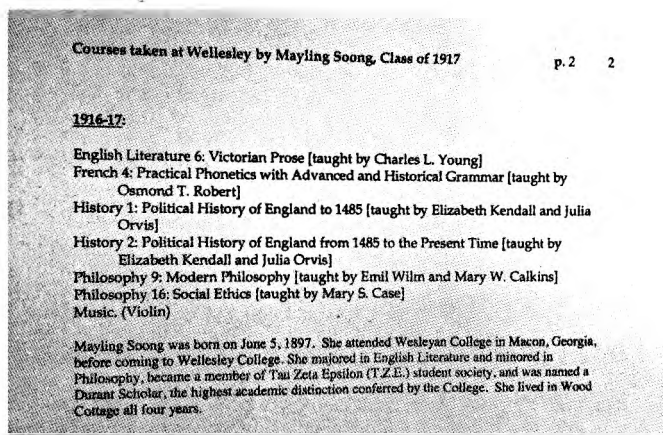
宋美龄在威尔斯理的档案（一）

大四：英语文学 6（维多利亚时代散文），法语 4（高级和古代语法的口语发音），历史 1（英格兰 1485 年前的政治史），历史 2（英格兰 1485 年



至今的政治史), 哲学 9 (现代哲学), 哲学 16 (社会道德学), 音乐 (小提琴)。

另外, 宋美龄加入了名为 Tau Zeta Epsilon 的学社。这是一个建立于 1889 年的学生社团, 由音乐和艺术爱好者组成, 也是 19 世纪美国大学最古老的六个学生社团之一。美国大学的学生社团 (又称兄弟会姐妹会) 大多以三个希腊字母为名。而这三个字母, 通常是一句希腊语格言的首字母。比如第一个兄弟会的名字 “Phi Beta Kappa” 来源于 “Φιλοσοφ α Β ουΚυβερν η (philosophiabioukybernetēs)” 即 “哲学是人生的向导”。在那个时候, 良好的教育都会包括拉丁语和希腊语。希腊语之于罗马时期的地位, 相当于拉丁语之于中世纪。选择希腊语字母为社团名字, 显得比较 “有文化”, 且有辨识度, 一下就把自己和其他社团区分开来了, 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 宋美龄在威尔斯理的档案 (二)

由于美国法律保护隐私, 宋美龄没有直系子女可以授权, 她在威尔斯理的具体成绩无法获得。然而, 有一个资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她的档案上标明: 宋美龄毕业时候获得 DURANT SCHOLAR 的荣誉称号。那么, 这个 DURANT SCHOLAR 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美国大学的传统是授予应届本科毕业生以拉丁荣誉 (LATIN HONORS)。拉丁荣誉最先是由哈佛大学于 1869 年从欧洲引进, 逐渐也被

别的高校所采用。该荣誉的评定标准基于学生的平均成绩（GPA），有三个等级的荣誉表彰：SUMMA CUM LAUDE（通常是最优 5%），MAGNA CUM LAUDE（次优 15%），CUM LAUDE（再次优 30%）。笔者的孩子凯文 2015 年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就获得最高拉丁荣誉 SUMMA CUM LAUDE，他的 GPA 是 3.91（4.00 为满分）。

拉丁荣誉通常只授予本科生和法学院毕业生，研究生几乎没有可能。授予标准各个学校不一。威尔斯理目前的做法不是按照比例，而是按照 GPA 授予拉丁荣誉：这三个等级的 GPA 标准是 3.9/3.75/3.6，满分是 4.0，差一点点也不行。高等和中等的拉丁荣誉毕业生则冠以名号 DURANT SCHOLAR。笔者查阅了 2016 年威校应届 620 名毕业生名单，获得拉丁荣誉高等的仅仅 27 名，中等的也不过 74 名，二者相加仅占毕业生总数的 16%。一百年前宋美龄毕业时，威校尚无拉丁荣誉，给优秀毕业生的表彰，就是 DURANT SCHOLAR。参照现在的标准，宋美龄的平均学习成绩必须是 3.75 以上即 A- 或者 A。

几点观察：

（1）冰心读的是硕士研究生（目前威校已经不再培养研究生，成为纯本科文理学院），宋美龄读的是本科，她们的课程设置完全不一样，所以成绩单没有可比性。

（2）冰心的课程基本是高层次的文学科目。除了一门英国文学 101 外，全部是号码 300 以上的硕士课程。宋美龄的课程是本科文理综合教育，号码是个位数，最高是 29。笔者猜想，当年威校本科生课程号码设置为两位数，而研究生课程号码为三位数。也可能是在 1917 年宋美龄至 1923 年冰心入学之间，威校重新设置了课程号码：本科为 101~299，研究生 301~399。威校目前的课程号码设置是：101~299 为低年级课程，301~399 为高年级课程。

（3）由此可以理解，冰心没有上过数学，物理，天文学，历史，心理学，哲学，更不会像宋美龄那样学四年的钢琴和小提琴。而宋美龄则不会去上高层次的英国文学课，更不需要写毕业论文。作为贵族女子学院本科教育的一部分，宋美龄所修的卫生保健（体操训练和户外运动）和朗诵法（训练体型和发音），对攻读硕士学位的冰心一概免了。

(4) 关于成绩等级，成绩单上注明为 A, B, C, D, E 五个等级。那时，对研究生成绩的评定严格，冰心的平均成绩为 B，实属好成绩，也就是 85 分以上吧，学校注册处的老师是这样解释的。至于宋美龄毕业时获得 DURANT SCHOLAR 荣誉称号，则属于本科生中的优异成绩了。这和她 10 岁就和宋庆龄，宋霭龄二位姐姐一起来到美国，就读美国中学和大学预科的经历有关。

(步起跃 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讲席教授)

## “后卫思想”的先驱者

——以谢冰心、巴金的知心朋友中岛健藏为例

虞 萍

### 引言

《冰心全集》第6卷（卓如著、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书前有4张照片。其中，第4张照片是1963年11月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时，和中岛健藏（1903~1979）<sup>①</sup>夫妇一起拍摄的。照片上有8个人，从右边起分别是马烽、严文井、中岛健藏的夫人中岛京子、谢冰心、中岛健藏、巴金、许觉民以及一位翻译。只见中岛健藏满面春风地直视着前方，两手交叉站立着，谢冰心和巴金则分别挽着他的左右手，站在他的两旁。京子夫人的左手搭着谢冰心，身子略微向谢冰心倾斜。从照片里能够感觉到中岛健藏夫

---

<sup>①</sup> 中岛健藏（1903年〈明治36年〉2月21日~1979年〈昭和54年〉6月11日）。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文艺评论家、日本友好社会活动家。笔名为水岛茂村。除了翻译和介绍保罗·瓦勒里、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等作品以外，研究当时尚未成名的宫泽贤治的作品，为战后的反战和平运动、日本文艺家协会的再建、著作权保护、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邮票的世界级收集家。1928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毕业，作为副手留在研究室。1929~1934年，同校助教。1933年，创办《作品》《文学界》杂志。1934年，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非常勤讲师。1935年，与出生于福岛市的大原京子（毕业于日本女子大学英文系）结婚。1936年，在法政大学法文系、帝国美术学院等学校兼职。1941年，法政大学法文系非常勤讲师辞职。1945年，重新建立日本文艺协会，担任理事。1948年，担任国立国语研究所创立委员。1949年12月20日，担任日本著作权协议会创立、专门委员会总会议长、代表理事、事务局长。从1953年起，应讲谈社的委托担任野间文艺选考委员。1954年，获得菊池宽赏。1955年1月，被选为新日本文学会干事会议长。1955年8月，被选为新日本文学会中央委员会会议长。1956年3月23日，担任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第一任理事长。1977年，《回想的文学》（《回想の文学》）（1-5）获野间文艺奖。1979年6月11日，因肺癌去世。

妇与谢冰心、巴金之间纯真的亲密感。

众所周知，中岛健藏是日本的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也是1956年3月23日成立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第一任理事长。这位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为何会和中国牵扯上关系？又怎么会成为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第一任理事长的呢？上文所提到的照片的拍摄日期为1963年11月，当时中国和日本尚未恢复邦交。即使如此，中岛健藏夫妇又为何会和谢冰心、巴金等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进行交流，并建立起亲密的友谊的呢？

为了解开这一连串的谜团，小论将对中岛健藏在日本中国文化交流事业上的奋斗历程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具体将从中岛健藏的新加坡经历着手，探讨他答应担当日本中国文化交流第一任理事长的来龙去脉。接着将整理和分析中岛健藏的访华以及他撰写的有关中日关系等方面的各类文章。最后将通过谢冰心和巴金发表的有关中岛健藏的作品，对战后中日邦交尚未实现的时候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状况进行诠释。从而探讨中岛健藏与谢冰心、巴金之间的交流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所产生的意义。

## 一、中岛健藏为中日文化交流事业奋斗的历程

### 1. 以中岛健藏的新加坡经历为中心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军队不断地征兵。征用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义务。军队的征用，即征兵，就更不能断然拒绝或找其他不着边的理由去怠慢了。除了体检不合格或是担当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职务以外，任何人都无法逃脱。<sup>①</sup>当时，中岛健藏39岁，既是一名评论家，又是一名无所属的新闻记者。他平时除了忙于投稿和传媒以外，还担任东京帝国大学<sup>②</sup>的非常勤讲师职位，教授法国文学和法语两门课程。

<sup>①</sup> 中岛健藏：《苦恼的开始——新加坡经历》（《苦恼のはじまり——シンガポールの経験》）《后为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後衛の思想——フランス文学者と中国》）朝日选书22、朝日新闻社、1974年、p.11。

<sup>②</sup> “东京大学”于1877年4月12日，由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1886年3月，因帝国大学令改名为“帝国大学”，1897年6月，因京都帝国大学的设立，“东京大学”被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1947年9月，改名为“东京大学”。小论根据中岛健藏的工作时期，在文中分别将大学名称为“东京帝国大学”和“东京大学”。

中岛清楚地知晓日本军方肯定不喜欢自己的撰稿，但是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一名在大学工作的大学教员，幻想着说不定自己可以幸免被征去当兵。<sup>①</sup>但好景不长，过了一段时间，中岛还是被命令去大阪城趾的师团司令部集结。接到命令后的中岛立即跑到东京帝国大学，和当时担任文学系主任代理的英文系的教授做了交涉。但最终还是以徒劳告终。中岛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个教授（平时和比自己职位高的人：虞萍注）卑躬屈膝的样子。我无法忘记他那张对我不屑一顾、压根就没瞧得起我的脸。我不清楚他是否认识到征用命令是在一种非常大的权利背景下形成的。然而，当时更让我感触到的是，他看上去对军方的威力尤为恐慌。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居然没说‘这是一种名誉……’，而是说，‘你的运气太差了，但没有办法啊。’话音刚落，就把我这个非常勤讲师给踢出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大门。”<sup>②</sup>

就这样，1942年1月14日，中岛被陆军征用后发配到了马来派遣军队。当时，中岛被要求在大阪的一个小宾馆里等待，拿中岛自己的话来说，就像被软禁了一样。此后被要求出海，已经是第二年（1942年）2月份新加坡沦陷以后了。中岛在宇品港坐上了简陋的运输船，向新加坡驶去。<sup>③</sup>他没有被安排在外部的报道班，而是作为正规部队的校正队员被分配到了司令部的“宣传班”。中岛对这个不切实际的分配这样批评道：“（日军：虞萍注）好像在模仿纳粹党的宣传中队一样，特意挑选无法完成任务的不适当的人选，将他们集结在一起。（这种分配：虞萍注）简直就是一种马虎透顶、不负责任的行为。”<sup>④</sup>被分到宣传班以后，中岛并没有接到特别的任务，于是他便打算快些习惯这个陌生的地方。中岛漫无目的地在新加坡徘徊，走着走着，不止一次地被女华侨叫住。对方拿出照片，底纸上简短地写着：“这是我的孩子，战争以后就下落不明了。你认识这个青年人吗？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此后，刚到新加坡不久的中岛

① 参照《苦恼的开始——新加坡经历》《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12。

② 《苦恼的开始——新加坡经历》《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13。

③ 《苦恼的开始——新加坡经历》《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14。

④ 参照《苦恼的开始——新加坡经历》《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15。

就知道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进行了大屠杀<sup>①</sup>这一事实。这个铁证如山的事实对中岛的打击是巨大的。

1942年年末，中岛退役后返回日本，并于1943年重回东京帝国大学续任法文系非常勤讲师。虽然中岛被征兵发配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只待了10个月，但在这期间他知道了日军对华人进行了大屠杀的事实，目睹了寻子心切的母亲们的痛苦与悲哀。这10个月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中岛的后半生。

在新加坡经历了风风雨雨，知晓了日本大屠杀的真相之后，坐落于淀桥12社的中岛的家因为1945年5月26日的空袭被烧毁一尽，多年积累的研究资料以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无从追回。战争使中岛承受了莫大的灾害，平日里收集的艺术方面的书籍和资料都被毁于一旦。然而，战争前无意间购买和收集的一些有关中国方面的书籍因为放在别处，所以完好无损。也许这也是中岛后半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事业的一个因缘吧。

## 2. 承担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一职的前前后后

中岛健藏谦虚地指出，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之前，自己在中日关系上一直充当着被前辈们召唤的角色。<sup>②</sup> 宪法拥护国民联合访华代表团的部分成员以及日中友好协会的干部等人从1955年10月15日以后召开了4次会议，具体商议成立新的文化交流联络机构一事。<sup>③</sup> 会议讨论了结成新组织的预备成员，最终从文化交流的性质出发，要求新组织的成员不属于任何一个党派，从而尽量能够保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新组织中来。<sup>④</sup> 除此以外，会议还决定由日本第46代内阁总理大臣片山哲和中岛健藏二人担当新组织的号召负责人。访华代表团的律师大野幸一作为片山哲的代理人向

① 同上。中岛健藏的著书《昭和时代》（岩波新书、1953年）《华侨的母亲——新加坡的悲剧》（《華僑の母——シンガポールの悲劇》）中对此经历有具体描写。

②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接受理事长一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役を引き受ける》）《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85。

③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接受理事长一职》《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83。

④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接受理事长一职》《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84。

中岛说明了这些事宜。有关这方面的筹备事宜，中岛用“完全出乎意料”<sup>①</sup>这个用语概括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

1955年11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宪法拥护国民联合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团长片山哲的会见中，双方在“为了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和亲善，就必须增进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并且提议，有关具体的问题，将由日本宪法拥护国民连合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商讨后决定。”<sup>②</sup>

战后的日本政权是非常敌视中国的。中岛对战后的日本政府如此辛辣地批判道：“吉田〔茂〕内阁签署了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条约（《日台条约》：虞萍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华和平条约》。<sup>③</sup>这些都是中日邦交最大的障碍。此外，吉田书简<sup>④</sup>的出现更加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变得困难重重。再加上日本组建了自卫队，这种让日本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行为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个绊脚石。（中略）接着是鸠山〔一郎〕内阁、石桥〔湛山〕内阁，他们虽然有意处理和解决中日邦交问题，但是由于当政时间都很短暂，所以对恶劣的条件都束手无策。（中略）岸〔信介〕内阁自不待言，池田〔勇人〕内阁夹在其中，佐藤〔荣作〕内阁昭

①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接受理事长一职》《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84。

② 《文化与政治——坚持无党无派》（《文化と政治——つらぬく無党無派》）《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79—80。日本宪法拥护国民联合和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商讨的结果如下：

一 为了实现目的（日中文化交流的目的：虞萍注），日本宪法拥护国民连合将和日中友好协会以及其它的民主团体、文化团体等共同协力，共同成立一个联络机构。这个机构成立后，将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密切联手，以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

二 以上的联络机构和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将协力举行介绍对方国家的绘画、彫刻、建筑、电影、演剧、音乐、文学以及其它的文化遗产的展览会、公演、出版等，展开文化交流活动。（1955年11月27日）。

③ 《日华和平条约》是指1952年日本和“中华民国”台湾之间签订的讲和条约，对前一年签订的旧金山条约进行了补充。宣布日本和“中华民国”之间的战争告终。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台湾自动放弃申请日本的赔偿。

④ “吉田书简”是指日本的吉田茂首相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政府是一个正统政权的两份书简。1951年，吉田茂首相和赴日的美国杜勒斯大使明确表示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1964年，吉田茂首相访台，在和蒋介石的会谈中表示，在向中国出口的生产设备中不提供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融资。此处指后者。



然若揭地采取了敌对的中国政策。”<sup>①</sup> 由于战后日本政权敌视中国，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设立前后，都未曾得到过日本政府的援助。并且，为了站在中立的位置更好地展开中日文化交流，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设立时就要求无党派人士担任要职，所以中岛也无法竞选议员。

当时，中岛不仅在精神上承受着痛苦的煎熬，在经济上也困苦不堪。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设立的第一次干事会议于1956年1月31日正午在东京新桥车站楼上的“日本食堂”举行。列车食堂“日本食堂”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饭馆，所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设立时完全不存在什么庄严的气氛。当时，协会以片山哲和中岛健藏的名义邀请了以下成员：

画家·梅原竜三郎（缺席·承诺担任干事）、宗教家·大谷莹润、原大藏大臣·小笠原三九郎（缺席）、学术会议会长·茅城司、日本演剧协会会长·久保田万太郎、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仓石武四郎、文学家·小官丰隆（缺席）、原厚生大臣·鹤见祐辅、大日本医师会理事·堂森芳夫、画家·中川一政（缺席）、大日本水产会会长·平冢常次郎、原司法大臣·星岛二郎、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音乐家·山田耕筰、朝日新闻社董事长·加藤祇文、每日新闻社总编辑（局长）·渡濑亮辅、读卖新闻社董事长·冈野敏成、每日新闻社副总编辑（局长）·橘善守。<sup>②</sup>

有关人选问题，中岛并没有被邀请商议，但以上大部分人都是中岛的朋友。中岛认为自己既不是中国通，也不是中国语言学家，但即使是一个对中国完全不通晓的日本人，如果对新中国没有新的认识，后果将不堪设想。虽然这是中岛本人的一种信念，但他认为在当时说出来的话还为时过早，所以除了自律以外别无他法。中岛认为，大家都必须认识到，这种状况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都是存在的，而自己作为一个认识短浅的日本

<sup>①</sup> 中岛健藏：《中日讲和的前提》（《日中講和への前提をなすもの》）《世界》1971年10月号、1971年10月。底本は参照张競、村田雄一郎编：《蜜月和摩擦：1972～》（《蜜月と軋み：1972～》）岩波书店、2016年7月、p.3、p.4、p.9。

<sup>②</sup>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接受理事长一职》《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88—89。

人，必须渐渐地进行自我改造，倘若不和大家一起前进的话，必定会陷入困境、走投无路的。<sup>①</sup>当时的中岛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决心投入中日文化交流事业的。

要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改革则是当务之急。因此，前卫人士是不可或缺的，而前卫人士总是少数。要将前卫人士的思想灌输给大众，后卫人士的支持和后盾是必不可少的。这一事实和中岛自身的想法非常一致，所以当心甘情愿担当后卫的中岛被宪法拥护国民联合会代表团的千田是也推举为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第一任理事长时，没有推辞。<sup>②</sup>这样，中岛在53岁的时候，在担任东京大学法文系讲师职位的同时，承担了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第一任理事长的职位。当时，中岛就已经做好了当一名后卫的思想准备。

1956年3月23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创立总会在日本东京丸之内的工业俱乐部召开。事务局起草了以下这份“宗旨书”：

#### 宗旨书

日本和中国除了最近数十年以外，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中，相互之间作为邻邦不仅共同和平友好相处，而且两国在文化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相似，互相之间都本着共同向上、友好的精神。鉴于这些历史事实，即使当前中日邦交尚未恢复，但至少我们应该增进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我们支持去年秋天日本各党国会议员访华团与中国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共同交流上所公布的“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的和平友好发展，今后为了更加增进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中国和日本都应该不断地努力”这一声明。为了具体地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也为了使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顺利展开、文化活动顺利举行，我们决定将成立一个超党派、超意识形态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以作为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

---

<sup>①</sup> 参照《众多成员——窘迫的财政》（《多彩な顔ふれ——財政困難でつづく苦しみ》）《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107。

<sup>②</sup>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接受理事长一职》《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90、p. 91。

会联络的机构。

昭和 31 年（1956 年）3 月 23 日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sup>①</sup>

就这样 1956 年 3 月 23 日在日本一个以民间力量为基础的超党派、超意识形态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了。它既没有日本政府的支持，也没有任何经济后援。万幸的是，在敌视中国的政权下，希望中日两国打开僵局的日本人并不在少数。<sup>②</sup> 中岛将打破中日僵局作为战争时代新加坡经历的一种延长，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非常乐意地接纳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呼唤，并且决定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1956 年，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后，中岛被要求成为一名可以激励大家的号召人。

1956 年 10 月 25 日时，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有 5 名事务员（男 4 名、女 1 名），和 53 岁的中岛相比，其余的都是平均年龄为 27 岁的年轻人。中岛除了向周日俱乐部的事务局请求过支援以外，在事务局的人选上没有做任何插手。虽然中岛承担着理事长职位，但完全没有财政上的能力。中岛对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初始的苦楚这样陈述道：“我在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是非常勤，没有任何报酬。即使是一条前所未有的路，至少第一年也只能这样摸索前进了。”<sup>③</sup>

1956 年 11 月 7 日，成立 7 个多月后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终于将临时办公室搬到了东京丸之内 2 丁目的三菱仲 12 号馆 6 号 110 室。这间房间是关东工业株式会社借的，之后挂起了有关中国贸易的其他公司的名字，以作为这个公司临时的“文化部”。1963 年夏天，这个楼改建时，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临时搬到了千代田大楼 602 区 A 室。1966 年 6 月 6 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搬到东京有乐町大楼 4 楼的一个房间，因为不是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名义正式契约的，所以也就无法在门的玻璃上用金

①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接受理事长一职》《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92—93。

②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接受理事长一职》《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84。

③ 《众多成员——窘迫的财政》《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110—111。

字刻上“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这几个大字。总之，就是一个见不到太阳光的办公室。（中略）当然也没有空调，只是一个类似于半地下室的陈旧狭小的房间，一到吃饭的时间，烹饪味儿就从窗口飘进来，使整个房间笼罩在一股油烟味儿里。<sup>①</sup>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初始，中岛的经济状况窘迫不堪。他这样回想起当前的生活状况：“东京大学的非常勤讲师等职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收入，说实话，中日关系方面的工作完全是在倒贴。（中日关系方面的工作：虞萍注）如果一直要花那么多时间的话，我就必须改变生活方式。然而，这只是一种痴心妄想。我不仅要对现实生活进行调整，就连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也开始混乱不堪了。我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开始变得心急如焚、焦躁不安。那时，我已经开始着手撰写岩波新书《昭和时代》了。我不断反省着自己焦头烂额的生活，在半信半疑、夜以继日忘我工作中度过了1956年。”<sup>②</sup>显然超负荷的工作量已经让当时的中岛有些喘不过气来了。中岛这样形容1956年狼狈不堪的自己：“（我）紧紧地抓住岸边的木头，单只手在水中拼命滑行。”<sup>③</sup>即使如此，中岛没有放弃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工作。

1958年的一天晚上，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工作人员去中岛那儿，和中岛在待遇上进行了交涉。当时，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由会费和捐款维持着，中岛自己没有报酬，所以对工作人员来找自己谈待遇问题这件事情感到十分惊讶。<sup>④</sup>从1958年到1959年，中岛依然觉得自己的生活需要调整，但却陷入了束手无策的窘境。当时，中岛定时的的工作只有周三下午东京大学的讲义和周五傍晚《周刊朝日》的书评《周刊图书馆》会议。中岛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作为自由撰稿人、记者的工作量比想象的要多。包括中日关系的工作，当时中岛承担的非挂名的文化团体等至少有十多个，有关传媒方面的工作也接二连三。从那时候开始，中岛的撰稿时间已经从后半夜延续到天亮，上午

① 《众多成员——窘迫的财政》《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110—111。

② 《众多成员——窘迫的财政》《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103。

③ 《众多成员——窘迫的财政》《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112。

④ 《长崎国旗事件——中日关系最紧张的局面》（《长崎国旗事件——日中關係は最悪の事態》）《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165。

成了他的睡觉时间。这种违背生物钟的生活规律被固定了下来。<sup>①</sup>

以上通过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设立前后的基本状况，概括分析了中岛健藏接受担当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一职的详细经纬。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这一头衔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悠闲。撇开当时来自敌视中国的日本政府的压力，中岛为了支撑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在精力和经济上都濒临奔溃。然而，中岛没有气馁，他坚信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也必须友好，因为这才是时代前行的正确道路。中岛甘当后卫，他凭借自己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反中的日本政府坚强地做着斗争。

下一章将整理中岛健藏的访华以及执笔撰写的有关中日关系等问题的文章。调查中岛健藏和谢冰心、巴金等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以及他对中日友好事业所做的贡献。

## 二、中岛健藏的访华以及论述中日关系等问题的撰稿状况

1956年3月23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成立，53岁的中岛健藏毅然决然地担当了第一任理事长。在此后的23年里，中岛15次访华。这期间，中岛多次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且回日本以后在众多新闻和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关访华纪录以及中日关系方面的文章。下表将梳理和归纳中岛健藏15次的访华经历以及归国后的执笔状况。

中岛健藏的访华以及论述中日关系等问题的撰稿

访华次数	年号 (中岛年龄)	行动	论述中日关系等问题的撰稿
1	1957年 (54岁)	11月6日晚上，从羽田出发去中国。日本文学代表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代表签署《共同声明》，中岛署名。 <sup>②</sup>	11月27日，《在北京的感想》（《北京で感じたこと》）《朝日新闻》。28日，《有发展的中国音乐界》（《伸びる中国の音楽界》）《读卖新闻晚报》（《読売新聞夕刊》）。12月8日，《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日中文化交流の意義》）《周刊朝日》（共同特信）。

① 参照《冲出“迷路”——陈毅副总理的回忆》（《“迷路”脱出——陳毅副総理の思い出》）《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188—189。

② 最初实现访华的日本代表团是文学代表团。1956年9月4日开始交涉以来，11月6日发出的第1个日本文学代表才唯有3名代表，没有团长，8名随行，构成的确有些离奇。参照《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接受理事长一职》《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107。

(续表)

访华 次数	年号 (中岛年龄)	行 动	论述中日关系 等问题的撰稿
	1958年 (55岁)	5月13日,在《面对中日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的危机,向全国人民征讨》(《日中両民族の伝統的友好関係の危機に直面し国民の皆さまに訴える》)的声明中署名。	1月,《新中国的摄影界现状记》(《新中国の摄影界現状記》)《朝日照相》(《アサヒカメラ》)。2月,《在中国的感想》(《中国で感じたこと》)《新日本文学》。8月,《令人担忧的中日关系》(《憂うべき日中関係》)《新日本文学》。《点描・新中国》六兴出版社。10月,《我所理解的时下的中日关系》(《当今日中関係について私はこう思う》)《世界》。《阻止中日文化交流的障碍》(《日中文化交流をはばむもの》)《外交时报》。11月,《潜伏在中日关系深处之物》(《日中関係の底にあるもの》)《中央公论》。
2	1959年 (56岁)	5月,作为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代表访华,和中日友好协会在北京发表《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共同声明》。	1月,《1959年最大的课题·中日关系的去向》(《1959年最大の課題・日中関係の進路》)《周刊朝日》。5月,《如何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敵視政策をどう変えるか》)《中央公论》。31日,《世界和平与日本的局势》《人民日报》。9月,《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世界文学》。
3	1960年 (57岁)	7月26日,外交部部长陈毅对访华的日本代表团发表了“两国应坚持子子孙孙友好,中日友好是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讲话。	10月,《中国访问杂感》《新日本文学》。中岛健藏、木村伊兵卫共编《文学家眼里的现代中国》(《文学者の見た現代の中国》)(相册)每日新闻社。11月,《新的条件里——中日恢复邦交的道路(特集 大选—安保斗争以后)》(《新しい条件のなかで——日中国交回復への道を(特集 総選挙—安保闘争の後に)》)《世界》。12月,《中日文化交流的新阶段》(《日中文化交流の新段階》)《人民中国》;4月,担任东京大学法文系研究生院讲师。
4	1961年 (58岁)	③3月,作为日本代表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东京紧急大会。	10月31日,辞去研究所评议员职务;12月,辞去新日本文学会干事会议长职务;辞去文部省审议会委员职务。
5	1962年 (59岁)	10月22日,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楚图南会长签署《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共同声明》。	4月1日,《中国照片展》(《中国写真展》)《朝日季刊》(《朝日ジャーナル》)。4月,《卢沟桥事变发生25年后》(《蘆溝橋事件から25年》)《周刊朝日》(共同特信);3月,辞去东京大学讲师职务。
6	1963年 (60岁)	12月27日,在北京签署《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共同声明》。	8月25日,《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教训》(《原水禁世界大会の教訓》)《红旗》(《アカハタ》)。

(续表)

访华次数	年号 (中岛年龄)	行 动	论述中日关系 等问题的撰稿
7	1964年 (61岁)	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祝大会。10月8日,在北京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签署《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共同声明》。	1月,中岛健藏、阳翰笙《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共同声明》《亚洲经济旬报》(《アジア経済旬報》)。
8	1965年 (62岁)	12月8日,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和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在北京签署《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共同声明》。	9月21日,《集锦文艺史·31·梅兰芳的来日》(《オムニバス芸能史·31·梅兰芳の来日》)《每日新闻晚报》。
9	1966年 (63岁)	5月,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会议(6月27日—7月9日)作家会议,与京子夫人一同访华。 7月5日,在京西宾馆起草并签署《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共同声明》。	1月,《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共同声明》(《日中两国人民間の文化交流にかんする共同声明》)《亚洲经济旬报》(《アジア経済旬報》)。《中国的青年艺术家们》(《中国の青年藝術家たち》)《人民中国》。4月,《中国的照相界》(《中国の写真界》)《照相艺术》(《フォトアート》)。9月,《在内外的危机之际,再次向国民呼吁促进中日友好(32位著名人士的呼吁)》(《内外の危機に際し、再び日中友好の促進を国民に訴える(著名人32氏の訴え)》)《亚洲经济旬报》。12月12日,《我的1966年》(《私の1966年》)《周刊读书人》。12月,《中日战争前夜和当今》(《日中戦争前夜と現在》)《群像》。《在紧急会议的氛围下》(《緊急会議を包む空気》)《北京紧急集会纪录》AA作家会议日本协议会。
	1967年 (64岁)	①	10月,《亚非作家日本委员会结成宣言》《亚洲经济旬报》。12月,《抗议对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官宪的不正当镇压》(《日中友好協会(正統)中央本部ならびに日本国際貿易促進協会に対しての官憲の不当弾圧に抗議する》)《亚洲经济旬报》。
	1969年 (66岁)	——	1月,《为了在中国展出日本工业展览界的所有东西,向佐藤内阁提出要求的声明》(《中国で開催する日本工業展覽界の全品展示のため佐藤内閣に要求する声明》)《亚洲经济旬报》。5月,《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本部副会长顾问声明》《亚洲经济旬报》。

① 尚未找到详细资料。以下同。

(续表)

访华 次数	年号 (中岛年龄)	行 动	论述中日关系 等问题的撰稿
10	1970年 (67岁)	作为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团长参加21周年国庆节庆祝大会。认识了中日间政治上的差距。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主席见面交谈,理解了“求大同,存小异”的重要性。	10月24日,《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印象记》(《プロ文革後の中国印象記》)《每日新闻晚报》。26、27日,《邂逅四年的中国》(《四年ぶりの中国》)《读卖新闻晚报》。12月,《在天安门城楼上》(《天安門上にて》)《中央公论》。《中国的旅途·袖珍日记》(《中国の旅・ふところ日記》)《文艺春秋》。12月,《恢复中日邦交就是反对安保的斗争》(《日中国交回復は反安保の闘い》)《月刊总评》。《中国之旅·手头日记》(《中国の旅・ふところ日記》)《文艺春秋》 *辞去日本笔会俱乐部理事一职。
11	1971年 (68岁)	10月,再次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22周年国庆节庆祝大会。与包括访华社会党国会议员的日中友好代表团一起,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0月19日,回国。	4月,《日本和中国》(《日本国と中華人民共和国と》)《周刊信箱》(《週刊ポスト》)。7月,《中国的第一印象》(《中国の第一印象》)《新评》。《满15岁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満15歳を迎えた日中文化交流協会》)《人民中国》。9月,《看中国的目光》(《中国を見る目》)《别册每周读卖》(《別冊週間読売》)。10月,《构成中日讲和前提的原因》(《日中講和への前提をなすもの》)《世界》;2月,担当恢复中日邦交国民会议的议长;12月,亚非作家会议日本委员会退会。
12	1972年 (69岁)	8月16日早上,日本访问公演结束以后,坐战后第一班从羽田——上海直飞的包机和上海舞剧团一起回国。 <sup>①</sup> 到北京后,8月19日晚上,在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杨骥副会长举办的招待宴会上发言。	1月,《围绕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运动》(《日中国交回復運動をめぐって〈アジアの中の「日中問題」特集〉》)《月刊社会党》。「中国の外交の原則(中国外交と日本)」「公明」。2月,《中国的音乐状况》(《中国の音楽事情》)《音乐之友》(《音楽の友》)。3月,《世界之旅·中国》(《世界の旅・中国》)《太阳》。《谈论现代中国戏剧——文化大革命以后》(《現代中国演劇を語る——文化大革命以後》)《演剧》(《テアトロ》)。28日,《中国的酒》(《中国の酒》)《东京新闻晚报》(《東京新聞夕刊》)。4月,《中国音乐的现状》(《中国音楽の現状》)《读卖新闻》。5月,《龟井胜一郎和中国》(《亀井勝一郎と中国》)《龟井胜一郎全集·13·月报》讲谈社。9月20日,《恢复中日邦交的紧急性》(《日中国交回復の緊急性》)《每日新闻晚报》;9月,中日邦交恢复。

① 《求大同,存小异》(《小異を残して大同につく》)《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243。



(续表)

访华 次数	年号 (中岛年龄)	行 动	论述中日关系 等问题的撰稿
	1973年 (70岁)	@4月15日—5月18日,接待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廖承志)访日。2月,获1972年度日本放送协会放送文化奖。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获朝日奖。	1月,《对现代中国音乐的期待》(《现代中国の音楽への期待》)《周边》。1月4日—2月12日(连载20次),《我的中国》(《わたしの中国》)《东京新闻晚报》(《東京新聞夕刊》)。2月和3月,《中国美术的现状》(《中国美術の現状》)(2次)《中美》。4月,《中国戏剧之现状》(《中国の芝居の現状》)《季刊・歌舞伎》 *同协会会刊《日中文化交流》出版200号。
13	1974年 (71岁)	9月,坐中国和日本开通的第一班飞机访中。 *辞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和日本笔会俱乐部一职。	1月,《高度的中日学术交流》(《高度の日中学术交流》)《自然》。7月,《木村伊兵卫的侧脸》(《木村伊兵衛の横顔》)《纸碑・木村伊兵卫》《木村伊兵卫相册・中国之旅》(《木村伊兵衛写真集・中国の旅》)朝日新闻社。10月1日,《新中国的音乐・对中国中央乐团的期待》(《新しい中国の音楽・中国中央楽団への期待》)《读卖新闻晚报》。11月,《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後衛の思想——フランス文学者と中国》)(朝日选书22、朝日新闻社)。
14	1975年 (72岁)	—	—
	1976年 (73岁)	—	3月,《周恩来总理和我》(《周恩来総理とわたくし》)《月刊经济学家》(《月刊エコノミスト》)。《回忆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呕心沥血的周总理》(《日中国交正常化につくされた周総理の思い出》)《月刊社会党》。
15	1977年 (74岁)	8月,和京子夫人和井上靖等人访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5月,辞去日本放送协会中央放送节目审议会委员职务。
	1978年 (75岁)	*3月前后开始,身体觉得不适。8月初,无法出门,同月下旬开始在病床上生活。 *6月3日,被推选为日本比较文学学会总会的名誉会员。	1月,《新疆纪行》《人民中国》。3月,《中国壁画随想》《世界美术的基点・六・中国的美术・二》(《グランド世界美術・六・中国の美術・二》)讲谈社。6月15日,《悼念郭沫若的逝去》(《郭沫若さんの逝去を悼む》)《东京新闻晚报》。30日,《郭先生的逝去》(《郭さんの逝去》)《社会新报》。7月18日,《悼念郭沫若》(《郭沫若を追悼する》)《经济学家》(《エコノミスト》)。

出处: 著者根据“中岛健藏年谱(含执笔目录)”中岛健藏《回想的战后文学——从战败到1960年安保》(《回想的戦後文学——敗戦から60年安保まで》)(平凡社、1979年、p. 392—411)、中岛健藏《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後衛の思想——フランス文学者と中国》)(朝日选书22、朝日新闻社、1974年)制成。

除了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以外，中岛在其他众多社团中也展开了积极活跃的活动。<sup>①</sup> 中岛作为日本文艺家协会的一员，在1957年11月10日公布的《联合声明》中这样写道：“我们日中两国的文学家在第二次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访华中相互畅谈，我们非常庆幸双方就两国文化的各种问题交换了意见。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不用回顾悠久的历史，就能明白我们彼此间亲密的关系促使了我们今天的相聚。在目前特殊的政治局势下，我们深切地认识到交流的重要性。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时，我们两国的文学家为了两国将来的文化，就双方有必要更加活跃文学家以及文学作品的交流这一观点上达成了共识。我们将不惜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sup>②</sup>

1957年11月6日晚上，中岛健藏从东京羽田出发坐飞机到北京。这是中岛第一次访华。此后，他多次起草并签署了《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共同声明》。最后一次起草和署名是1966年7月5日，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完成的。<sup>③</sup> 1972年8月19日晚上，中岛第12次访华，并在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杨骥副会长的招待宴上做了以下的发言：

① “中岛健藏年谱（含执笔目录）”“中岛健藏《回想的战后文学——从战败到1960年安保》（《回想の戦後文学——敗戦から60年安保まで》）（平凡社、1979年、p.411）中指出，去世时中岛健藏担当的各种团体职位如下：“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日本著作权协议会议长·代表理事、日本著作家组合总书记、日本音响协会会长、日本邮趣协会会长、工业技术文化中心会长、新兴美术学院理事长、日本近代文学馆理事、东京都交响乐团理事、善邻学生会馆理事、音乐鉴赏教育振兴会理事、日本放送协会、解说委员会委员、同、番組制作技术改善委员会委员、同、西洋音乐委员会委员、东京文化会馆运营审议委员会委员、东京都歌剧季节实行委员会委员、都民剧所音乐俱乐部规划委员、同、新剧俱乐部规划委员、同、新剧俱乐部规划委员、野间奉公介野间文艺赏选考委员、平凡社‘太阳章’选考委员、国际教育情报中心评议员、中国研究所评议员、远山音乐财团评议员、下中财团评议员、株式会社演员座剧场监查役、日本演奏连盟咨询担当、大原综合医院顾问、日本出版学会顾问、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图书馆顾问、瑞雲书法会顾问、日本比较文学会名誉会员。”

② 中岛健藏：《点描·新中国：北京、天津、广州》（《点描·新しい中国：北京、天津、广州》）六兴出版部、1958年8月。底本为志贺直哉、佐藤春夫、川端康夫监修：《世界纪行文学全集》第11卷 中国编Ⅱ、修道社、1960年、p.273。1957年11月10日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日本文艺家协会”“山本健吉 井上靖 多田裕計 十返肇 中野重治 堀田善卫 本多秋五 中岛健藏”、“中国作家协会”“周揚 邵荃麟 刘白羽 臧克家 吴组缃 陈白塵 严文井 萧三”签名。

③ 参照《文化交流の奮闘期——緊迫の内外局势》（《文化交流の奮闘期——緊迫した内外の情勢》）《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225、p.226。

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愿望。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以中日两国人民的意志为基础的，是两国政府间的协定所成立的。田中〔角荣〕内阁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本着积极的态度，田中首相表示，近期将亲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思想和政策与田中内阁的所有见解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我坚信我们应该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全力以赴地支持田中内阁的积极态度。我期待着田中内阁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将义无反顾地努力做好支援工作。

近几年，尤其是1970年，全世界可能会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几乎不会有一个国家完全保持中立吧。中国和日本之间断绝国交的话，不仅对中国来说是危险的，对日本来说，则潜藏着灭亡的危机。解除这一危机的最佳方法之一，便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sup>①</sup>

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以前，中岛在1971年10月号《世界》杂志的《中日讲和之前提》（《日中講和への前提をなすもの》）中这样号召道：“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都有着割舍不断的关联的日本和中国的国交，已经有26年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中断着。所以我们应该再次深刻地反省。（中略）这里所说的反省，并不是指徒劳地低头认罪。为了打开新的国交，建筑美好的未来，我们必须自发地进行反省。并且，这是昂首挺胸走向未来的必不可少的反省。”中岛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反省的真正意义。反省不是徒劳地低头认罪，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中岛健藏等日本知识分子多年来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个可喜的结果。1972年9月29日上午10点20分，日本时间11点20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市的人民大会堂，日本的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太平正芳外务大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姬鹏飞签署了两国政府的《共同声明》。中岛在东京中野自己家的电视上见证了这一在中

---

<sup>①</sup> 《求大同，存小异》（《小異を残して大同につく》）《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244、p. 245。

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深刻意义的画面。<sup>①</sup>中岛作为一名“后为思想”的先驱者足足花了23年时间，为日本政府铺好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

自从1955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宪法拥护国民连合中国访问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团长片山哲会见以来，在中国政府和以中岛为理事长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等众多日本名间协会的积极交流下，终于了断了26年的遗憾，恢复了中日邦交。

中岛对“文化交流”做了如此解释：“文化交流，分得粗一点儿的话就是文化各界人士的交流、舞台艺术公演、友谊第一的运动比赛、文物·美术的展览会、电影的公映、书籍等资料的交流。其顺序根据中日两国人民的直接往来的必要性而定。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尊重对方，并对对方负责。”<sup>②</sup>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1973年4至5月，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派出54人访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亲自接待。中岛希望人们都能理解类似这种大型的访问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当时，这个团里有中岛十多年前的老朋友廖承志、经普椿、楚图南、孙平化、王艺生、谢冰心、林丽韞、李季、张瑞芳、吴学文等人。看到这些老朋友，顿时让中岛回想起自己刚刚涉足从事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工作的那段往事。中岛不禁感慨万分。<sup>③</sup>

中岛健藏长期以来对中日友好以及文化交流事业呕心沥血，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得到了中方各界人士深厚的信赖。

下一章将通过分析谢冰心和巴金在各自的作品中对中岛的描述，从而探讨中岛和谢冰心、巴金的交流。

### 三、中岛健藏与谢冰心、巴金的交流

#### 1. 中岛健藏和谢冰心的交流

在中国被誉为“文学祖母”的谢冰心分别在《遥祝中岛健藏先生六十

---

<sup>①</sup> 《中日邦交正常化——“友好运动”的变意》（《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わる友好運動の意味》）《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248。

<sup>②</sup> 《中日邦交正常化——“友好运动”的变意》《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252。

<sup>③</sup> 同上。

大庆》<sup>①</sup>《访日观感》<sup>②</sup>《火树银花里的回忆》<sup>③</sup>这3篇文章中对中岛健藏做了描述。本节将通过谢冰心的这些作品，对中岛健藏和谢冰心的交友关系做一个论述。

谢冰心为了庆祝中岛60岁大寿（2月22日）于1963年2月23日，在北京作了一篇名为《遥祝中岛健藏先生六十大庆》的文章。谢冰心如此回忆到：“每当我们到日本去，<sup>④</sup>在羽田飞机场，远远地在人群中认出他（中岛健藏：虞萍注）的满头的白发和稳健的身形，我们就有到家了、看到了一位哥哥那样的喜悦和慰安。在日本我们和他一起开会，一起旅行，在饮食起居上都受到他的无微不至的照拂与关怀，旅途中听他谈话，看到他忙忙碌碌地举着摄影机，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东照一张、西拍一下，看到他眼角嘴边流露着的活泼幽默的微笑的时候，我们总感到他的身上，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如前文所述，当时，中岛的工作环境并不理想，他对当时日本现状忧虑重重。但是，中岛坚信将来日本一定会繁荣昌盛的。自从1956年3月23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以来，中岛风尘仆仆地往来于东京北京之间，每次谢冰心一行到机场迎接，总能看见他笑容满面地徐步下机，旅途的困倦盖不住他满心的喜乐。在谢冰心的心目中“中岛在不懈的工作和不断的斗争中，是永远年青的！”

从1963年11月5日到12月3日，巴金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谢冰心以副团长的身份访日。小论的“序”中提到的照片就是当时拍摄的。谢冰心在《访日观感》中，回忆了在日本相识的日本友人们。<sup>⑤</sup>其中，谢冰

① 冰心：《遥祝中岛健藏先生六十大庆》，初出为《光明日报》1963年2月27日。底本为《冰心全集》，p. 197—199。

② 冰心：《访日观感》（1964年作）。底本为《冰心全集》第6卷，p. 320—322。

③ 冰心：《火树银花里的回忆》（1984年2月1日作），初出为《人民日报》1984年5月2日。底本为《冰心全集》第7卷，p. 446—448。

④ 谢冰心8回来日，并在日本居住过5年（1946—1951），与日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谢冰心在日本的具体行动请参照拙著：《冰心研究——女性·死·结婚》（汲古书院，2010年）第2章。笔者判断谢冰心在第5次（1961年3月24日—4月22日）、第6次（1963年11月5日—12月3日）、第7次（1973年4月16日—5月18日）来访日本时，与中岛健藏夫妇见面了。

⑤ 冰心在《访日观感》（《冰心全集》第6卷，p. 320—322）中对日本友人中岛健藏、井上靖、末川博、伊田义雄、白石凡、川端康成、丹羽文雄、石川达、松本清张、庄津和郎、大原富枝、壺井荣、佐多稻子、由起繁子、芝木孝子做了描述。

心被邀请去中岛健藏家时这样描写道：“在中岛健藏先生的起坐间里，除了满墙的中国字画之外，还有一个玻璃柜子，里面摆满了他所最心爱的中国珍兽——熊猫形象的瓷制的、布制的玩具，还有熊猫邮票以及熊猫牌纸烟的匣子。这些都迅速地把我的心带回到离我家不远的北京动物园里去。”

中岛健藏家的起坐间里满是中国的物品。看到中国的字画、中国的国宝熊猫形象的陶器、玩具等，中岛也一定和谢冰心有同样的心情，他的心仿佛被带到了中国。看得出中岛之所以在家里放那么多中国的东西，是因为他心中有中国，他睹物思人，思念并回忆着和中国友人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中岛迫切地希望中日两国邦交能早日恢复，哪怕是早一天也好！中岛为了中日两国和平相处、早日恢复邦交，坚持不懈地奋斗着，并足足地奋斗了23年。

1979年6月11日，自称是谢冰心哥哥的中岛健藏因为得肺癌去世了。<sup>①</sup>之后，京子夫人和作家井上靖一同访华。井上靖和中岛健藏一样，也是一位为中日友好事业埋头奋斗的勇士。<sup>②</sup>即使中岛健藏已经去世，但京子夫人还是继续和谢冰心、巴金等中国知识分子交流。1981年，谢冰心病后家居，井上和夫人，还有中岛健藏夫人（京子夫人），一定要亲自去慰问。当时谢冰心家的客屋不太宽敞，照冰心自己的话说，“大家和翻译人员一同团团坐下，真是‘促膝谈心’了！”那次聚会，在谢冰心的记忆中，永不磨灭。<sup>③</sup>

谢冰心每次到东京中岛的府上，在四壁图书、茶香酒冽之中，总有中岛夫人慈柔的笑脸和亲切的谈话。1980年谢冰心生病以后，中岛夫人每次

① 中岛健藏1979年5月，被推选为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会会长。6月11日下午11点50分永眠（因得肺癌，全身衰弱）。6月13日，在自己家里秘密葬埋。7月3日，在青山殡仪馆办理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葬（殡仪委员长·井上靖）。9月18日，被埋葬在世田谷泰德寺中岛家的墓地。

② 著者在《什么是真正的“文化交流”：借鉴于井上靖和冰心》（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2012）》〈「冰心研究丛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p.385-395）中就井上靖和谢冰心的文化交流做过论述。井上靖一生中去过27次中国。

③ 冰心“《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序”（1982年9月24日作）、初出为《文艺报》1984年第11期。井上靖：《井上靖西域小说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初版。底本为《冰心全集》第7卷，p.316。

访华，必到医院或家中看望谢冰心。<sup>①</sup> 谢冰心和中岛健藏夫妇在你来我往的访日与访华中结下了如同亲姐弟、亲姐妹般的情谊，这种情谊是因为彼此都拥有一个中日友好的信念。作为邻邦的两国人民应该也必须加强亲善和友谊，互帮互助，共同努力。谢冰心和中岛夫妇的交流虽然要通过翻译才能理解，但是他们的友谊已经跨越了国境，因为他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中日两国人民“子子孙孙，世代友好”。

除了谢冰心以外，巴金也是中岛健藏的一位知心朋友。以下就将通过中岛健藏去世后巴金在《回忆录》中写的一篇名为《中岛健藏先生》的文章为线索，分析中岛和巴金跨国界的友谊。

## 2. 中岛健藏和巴金的交流——以巴金的《中岛健藏先生》为线索<sup>②</sup>

1966年5月，中岛健藏为了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1966年6月27日—7月9日）和京子夫人一同访华。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谢冰心和巴金等知识分子都遭到了迫害。

1966年6月，中岛到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机场欢迎的人不少，巴金也在其中。中岛夫妇见到巴金，非常高兴。到了旅馆，闲谈起来，京子夫人还说看见巴金，他们就很放心了。中岛夫妇见到巴金后说“很放心了”，说明他们在见到巴金本人之前是“非常担心”的。就是在当时巴金也明白这所谓的“放心”是什么意思，以后经过几次交谈，巴金更了解中岛夫妇对自己的关心了。那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郭沫若：虞萍）的著作全部烧毁，所以中岛夫妇以为巴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巴金还出来活动，中岛夫妇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巴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诚的。<sup>③</sup>

此后，巴金同中岛夫妇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来在武昌机场分别，巴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自己和中岛夫妇的最后一面，泪

<sup>①</sup> 参照《火树银花里的回忆》《冰心全集》第7卷、p.447、p.448。

<sup>②</sup> 巴金：初出为《大公报·大公园》（香港）1979年8月16、17日。底本为巴金：《中岛健藏先生》（1979年7月30日作）《随想录》《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p.114—119。

<sup>③</sup> 《中岛健藏先生》《随想录》、p.115。

水模糊了自己的眼睛。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受审查的岁月中，在“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长的日子里，巴金的心内才又渐渐产生了希望，并且想得很多。巴金常常想起东京的友人。巴金在报上看到中岛的照片和他到中国的消息。盼望着、等待着再次见到日本友人。

1966年7月，巴金在武汉机场同中岛健藏夫妇分别以后，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忆起同中岛先生一起喝酒谈心的日子。巴金相信和中岛夫妇还有重逢的机会，所以等待着。那以后整整等了11个年头，终于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上接到了中岛。当时中岛和巴金都含着热泪，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除了“你好！”以外，再也说不出什么了。<sup>①</sup>1966年8月，巴金受到上海市文联造反派批判，开始了靠边、检查、被批斗和强迫劳动的生活。被关在上海文联资料室的“牛棚”里。9月10日，又被炒家。妻子萧珊也受到迫害。1977年4月20日前后，巴金获得平反。所以巴金在文中说整整等了11个年头。1977年巴金平反从一些熟人的口中，还听到不少动人的故事。在巴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见都不敢相认的日子里，好些日本朋友四处打听巴金的消息，要求同巴金见面。

巴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访问日本的时候，也就是1961年时最初见到中岛健藏的。巴金在《中岛健藏先生》一文中这样描述1961年以后和中岛的交往：“我去他来，我们几乎年年见面，无话不谈，一直到1966年7月。他喜欢酒，又有海量；我几次请中岛喝酒，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我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当时他正在为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他接到恐吓信，他受到歧视，他的文章找不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给堵塞了，他卖掉了汽车，困苦地过着日子。他并不屈服，也不动摇。”<sup>②</sup>中岛接到恐吓信，受到歧视，文章找不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最后只能卖掉汽车维持生活。这些事实在中岛的作品里没有被详细地记载。巴金是中岛可以敞开心怀述说的知己，所以中岛将自己为了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所受到的苦楚毫无保留地向巴金倾诉。巴金1977年见到中岛时也想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

① 《中岛健藏先生》《随想录》、p.114、p.115。

② 《中岛健藏先生》《随想录》、p.117、p.118。



中受到的委屈向中岛原原本本地述说出来，但是终究堆积在心里的话还是没有讲出来。<sup>①</sup> 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中提出在中国建立一个国家规格的“文革”博物馆，但他的这个心愿始终未得到实现。<sup>②</sup>

正如巴金所理解的那样，“要是没有中岛先生这许多年的努力，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么？”<sup>③</sup> 中岛得肺癌住院时，生命的最后时刻呼唤几个人的姓名，巴金是其中一位。1984年5月9日，巴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会长前往日本，出席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第47届大会。抵达东京后在商谈日程时，巴金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到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看一看，二是为老朋友、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创始人中岛健藏扫墓。巴金的这两个要求，足以证明他对知己中岛健藏的尊敬和怀念。

如上所述，中岛健藏和巴金的友谊是真摯的，双方都诚心诚意地为对方着想，因此成了可以敞开心扉的知心朋友。中岛健藏和谢冰心、巴金等日中知识分子的友谊从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之前开始一直延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的友谊在中日友好交流史上意义重大。

## 结语

中岛健藏在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上兢兢业业，和中国的知识分子谢冰心和巴金结下了亲密的友情，从而推动了中日两国的友好事业。郭沫若曾经以中岛健藏姓名的4个汉字作了一首诗：“中流砥柱 岛国精英 健康日进 藏识深阔”，高度赞扬了中岛。

京子夫人也这样高度评价中岛：“我也没想到中岛居然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对周围的状况以及未来都时刻装在脑子里，因此成了一个值得依赖的人。我尤其钦佩的是，无论中岛醉成什么样子，他都不会指出对方致命的缺点。（中略）中国方面曾经称中岛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这种神经质、不拘小节、百孔千疮毫无防备的性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历

<sup>①</sup> 《中岛健藏先生》《随想录》，p. 115。

<sup>②</sup> 2005年元旦，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在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正式建成开放。

<sup>③</sup> 《中岛健藏先生》《随想录》，p. 118。

练和努力培养而成的。”中岛有着他坚定的信念，他后半生为着中日友好这个信念一直忘我地奋斗着。在中日邦交尚未实现的时候就开始担当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理事长，没有工资，有时甚至还会受到右翼的威胁。他面对困难，毫不示弱，长期甘当着后卫，为中日友好事业鞠躬尽瘁。

正如小论第2章中的表格所示，中岛撰著了很多有关中日关系方面的文章和报道。众多社会活动使得中岛的生活没有一点可以喘息的空闲。他挑灯夜战，挤时间参加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奋斗的各项社会活动。京子夫人回想说，中岛即使是一张纸也会作为资料保存起来。他的这种习惯使得家里的资料堆积如山，书架也被塞得满满的，所以在家吃饭时，根本看不到屋子里的墙壁。<sup>①</sup>中岛勤奋好学，做任何事情都会做到底，绝不半途而废。他的这种性格铸成了他努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23年的奋斗史。

京子夫人说，因为中岛是独生子，也可能是受到家里的影响，所以中岛比较孤僻，而且较为柔弱，也很单纯。但另一方面，中岛对任何事情都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京子夫人最初也觉得中岛知识面虽然广但不精，而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严谨、一丝不苟的人。邮票、地图、书籍的整理样样都有条不紊。（中略）中岛思考的始终不是什么远大的理想，而是为可能实现的目标全力以赴着。（中略）对于工作，他非常严格认真，丝毫没有差错，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中岛也会彻底调查，绝不罢休。为了找资料写一张原稿，他会花足足几天的时间。他希望活到老写到老，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因为他极度害怕自己会得老年痴呆。在工作上他不分男女，有时甚至对女编辑大发雷霆。<sup>②</sup>中岛做到了“活到老写到老”。正是因为中岛这种天生和后生不同寻常的努力相结合的结果，才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了自己独到的先见之明。他将战后非常棘手的中日关系以“文化交流”为切入点，主动将自己退位到后卫，承担起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的职位，与日本国内的反中势力坚决斗争，甚至不惜削减自己的寿命，为中日友好事业鞠躬尽瘁。

<sup>①</sup> 参照中岛京子“作为后记——有关我的丈夫健藏”《回想的战后文学——从战败到1960年安保》，p. 390。

<sup>②</sup> 同上，p. 389。

1958年，中岛健藏在中国纪行《点描·新中国：北京、天津、广州》（《点描·新しい中国：北京、天津、広州》）中对日中文化交流的目的这样总结道：“日中文化交流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日本方面也应该已经认识到了，那就是首先，中国和日本人民应该通过互相学习，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其更深层的目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要开拓一条真正的友好关系的道路，确保以平等的条件确立和平共存。这是用法律解释、考虑利益之前必不可少的条件。”<sup>①</sup> 相互理解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这种信念即使天荒地老也不能改变。<sup>②</sup>

中岛的乐观主义思想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亲身经历的新加坡经历使他认识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因此承担起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重担，后半生为中日友好的信念付出了不同寻常的努力。自从中岛1956年担任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以来，15次不厌其烦地奔赴中国，和中日友好协会一起确认中日关系地最新动向，核实中日人民的愿望，多次起草并签署了《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共同声明》。类似于中岛这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活动，即民间的活动促使日本政府的体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今年（2017年）迎来了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明年（2018年）即将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日中友好不仅仅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还关系到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国。中日两国必须继续立足于“战略互惠关系”的理念，共同努力，在不断促进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的同时，加强环境、医疗等新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应该继承像中岛健藏、谢冰心、巴金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忘我精神，谦虚好学，继续努力发展中日两国稳定、友好的双边关系。

（虞萍 日本南山大学外语教育中心讲师、学术博士）

① 《世界纪行文学全集》、p. 287。

② 中岛健藏在《长崎国旗事件——中日关系最紧张的局势》《后卫的思想——法国文学研究者和中国》（p. 158）中这样强调“日中文化交流”：“日中文化交流，首先是为了让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人民通过互相学习，加深相互间的理解。此为第一个目的。其二，更进一步说，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打开通向真正意义上的友好关系的道路，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

## 关于包贵思

——以与冰心、杨刚的交流为中心

牧野格子

包贵思是冰心的恩师，是她帮助冰心得以入学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她心中有两个得意的学生，就是冰心和杨刚。从包贵思对这两个学生所涉及的文章中，我想探索一下她对两个人的感情，以及对中国的感情。

### 一、包贵思的生涯<sup>①</sup>

包贵思于 1871 年出生在美国麻省波士顿郊外的布鲁克莱恩 (Brookline)。她父亲是属于公理会 (基督教新教的一派) 的牧师。她毕业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以后，在 Radcliffe College 和密西根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以后她去土耳其教英语，1919 年去中国，当了协和女子大学的英语老师。派遣她到中国的团体是“美国公理宗海外传道部” (American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以下简称为“美部会”)。

1919 年以后，包贵思在燕京大学担任了三十年以上英语和英文学的教育。她在中国的三十多年是起伏不平的。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包贵思留在北平，1941 年以后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锁的同时，教务长司徒雷登以及几个外籍教师也被逮捕了。以后她跟一批燕京大学教员和学生一起逃到四川成都。1945 年她再度回到北平。

1950 年 2 月，包贵思患了眼病，为了治疗，她暂时回到美国。同年 11

---

<sup>①</sup> 这个部分我参考了威尔斯利大学校友档案资料室收藏的资料，包贵思的个人档案，1971 年她的讣告记事以及魏斯特的著作。

月她虽想要回到中国，但因朝鲜战争爆发，她在香港不能入境，只好转到日本。在日本的神户女学院大学教了几个月，1951年因眼病再发，她回国了。回国以后，她辞去美部会工作之后，在晚年生活中，写了一些反映中国情况的文章。1970年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养老院去世。

## 二、包贵思与冰心

冰心是包贵思最早的学生之一。包贵思劝冰心到威尔斯利大学留学。包贵思可算在冰心的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人物。冰心20世纪80年代写过关于包贵思的文章。这个事实证明冰心珍惜对包贵思的记忆。包贵思喜欢冰心的理由不只是她的才能，还因为冰心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她在燕大期间发表过有基督教色彩的作品。包贵思也许希望冰心去美国以后，学习更多基督教，靠近基督教。两人之间的交流从美国回来以后也一直延续下去，包贵思还曾参加了冰心的婚礼。

在此，我看到两篇描述包贵思和冰心之间关系的文章。第一篇是1939年包贵思访问当时住在云南昆明的冰心一家时写的报告。这是给威尔斯利校友会的通讯。

婉莹在镇里的学校教着四十多个学生，都是男生。她在乡下的学校教书像让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在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一个传统的红色的小校舍当教师！但是，婉莹在那儿贡献于村里的教育，把她的教育活动当作为她的生活，还有创造新秩序。她自己是对这种活动感到极为骄傲的。一方面她仍然对在北方尽力的我们抱着很深的敬意和同情。<sup>①</sup>

文中涉及的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驰骋文坛的女诗人。包贵思把诗人冰心比拟这个美国女诗

---

<sup>①</sup> 包贵思给威尔斯利大学校友会的信（1941年）。

人，她赏识冰心的才华。实际上，包贵思把冰心的《春水》<sup>①</sup>翻成英文，她尽力把她得意的学生、深知基督教的冰心介绍给美国大众。

还有，包贵思除了写报告反映冰心在昆明的教师生活之外，她还十分体贴冰心辛劳的生活。从这篇报告我们可以感觉到包贵思对冰心的怀着深切的感情，这更像是一种亲情。

另一篇是在1944年春天，冰心来到成都做讲演，燕京大学的人员对她进行的一次采访。作者是当时身为燕京大学学生的杜荣。

大约在1944年的春天，冰心大姐来校演讲，那个小小的礼堂挤满了同学，包贵思老师也来了，坐在礼堂靠后的一个不显眼的座位上。冰心大姐谈了许多燕园初建成时的旧话，还特别提到，在燕大资格最老的自然是司徒雷登校务长，其次就要数Miss Boynton了，接着风趣地说：“在燕京，Miss Boynton可以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这时一些同学回过头去，以崇敬的眼光看着包贵思老师，只见她不住点头，脸上笑开了花，这是她最得意的弟子对她表示的敬意，也表达出了她教过的所有弟子对她的敬意，他怎么能不高兴，怎么能不感到自豪。<sup>②</sup>

从文中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可以知道包贵思受到了学生们的赞美。冰心说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词也表示冰心对包贵思的敬意。两人之间有很深的感情，她们互相体贴，互相尊敬。

### 三、包贵思与杨刚

本章涉及包贵思与杨刚之间的交流。关于两人之间的交流，作家的萧乾写过详细的情况。萧乾的文章《杨刚与包贵思——一场奇特的中美友

---

① “Spring Water” by Ping Hsi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G. M. Boynton privately printed in Peking, 1929

② 杜荣《包贵思》（《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谊》<sup>①</sup>就是基于两篇著作而写的，这两篇著作是包贵思的小说《河畔淳熙园》<sup>②</sup>与菲立普·魏斯特的研究著作《燕京与中西关系，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五二年》<sup>③</sup>。魏斯特的著作讲述的是关于燕京大学的一段历史。从萧乾的文章、包贵思的小说以及魏斯特的著作中，我也试图探索一下包贵思与杨刚的关系。

包贵思与杨刚之间的交流是从燕京大学时代开始。1928年杨刚上燕京大学至1931年毕业于燕大，期间她是包贵思的学生。

据萧乾的文章，包贵思1929年冬第一次遇到杨刚。那是在杨刚参加包贵思主持的英语诗朗读会的时候。朗读会在包贵思当时的居所举行。萧乾和其他学生大多不太凑近她，因为包贵思朗读时有时候突然严厉起来。但是有一个女学生不害怕包贵思，总坐在她身边。这个女生就是杨刚。

包贵思与杨刚的关系不限于一般的师徒关系。这是因为包贵思有两年的时间，帮助杨刚养育过她的女儿——郑光迪（1934年~）<sup>④</sup>。那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当时的郑光迪才三四岁。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杨刚要离开北平，身边不便拖着个娃娃，只好寄托给包贵思。包贵思悉心地养育郑光迪。据萧乾的文章，她专门找了一位保姆，规定严格的食谱，让郑光迪学习一些好的规矩，如见人问好，进屋之前要先叩门等等。

以上的事实显示两人之间有很强的联系。另外，跟这个事实类似的片段也出现在包贵思写的小说中。包贵思的小说，是在她回美后的1952年由McGraw Hill出版社出版。萧乾谈及对这篇小说的感想时说：“倘若不是为了想从中寻觅她与杨刚之间这场奇特的中美友谊，我也许很难把它读完。全书没什么情节，人物轮廓也很模糊。作者更着意描绘的似乎是作为故事背景的苑林中那些古老建筑。只有写杨刚的部分到还带些紧张气氛。”<sup>⑤</sup>

这篇故事从主人公Jane Breasted（以下略称“简”）因病滞留在四川一

① 萧乾《杨刚与包贵思——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原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二期 p121-127，转载：《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② Grace M. Boynton “The River Garden of Pure Repose” McGraw Hill, 1952

③ Phil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9~195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④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副部长，2003年因受贿罪被判刑。

⑤ 萧乾《杨刚与包贵思——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

个家庭的场景开始。简是教友派的传教士兼英语教师。她寄居的是她学生的老家。简以前的学生 Willow（以下称为“杨柳”）逃进简疗养的地方。我们可以预测杨刚是这个杨柳的原型。杨柳把自己的孩子托给简。

小说中还出现“简和杨柳之间在思想信仰上的截然分歧”。基督教徒和共产党员之间当然有不同的信仰。照萧乾的描述，跟小说中的简一样，包贵思通过这篇小说描写了杨刚向共产党的忠诚，并表示了敬意。举个如下的例子。

简想了想，说：“我是个宣传家，柳也是宣传家。她为了宣传必须付出重大牺牲，而我不必为我所宣传的牺牲什么。我同她一样希望中国人民可以过得更好。我十分敬重她的勇敢和忠诚。”

“那么她对你也有同样的敬重吗？”

这个问题把简窘住了。

“恐怕没有。在多次争论中，柳认为基督教徒已不再具有勇气和献身精神了。我曾向她指出，我们曾为信仰而死在义和团手里。我认为倘若再遇到考验，我们会发现自己不乏勇气。但是我们并没受到考验，所以也不敢在她面前说这种大话。”

“其实你可以向她指出，基督教同共产主义不是一码事。前者是宗教，而后者是个政治制度。”<sup>①</sup>

这是虚构的故事。我不能说这个情景真实发生在包贵思和杨刚之间。但是我想说包贵思特地把这样的场面插入是因为她对杨刚有着很深的感情。

这以后她们的交流还继续着。再看萧乾的文章，他从魏斯特教授的著作中介绍 1945 年 2 月至 10 月间两人写的信。萧乾说这时期的信具有特殊的意义。1945 年以后 9 月 3 日的信中，杨刚这样写道：

看来美国人正在把一个腐朽、自私的政权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以便让这个政权日后帮助它去打苏联，使从没遭遇过战争浩劫的美国，又可以

---

<sup>①</sup> Grace M. Boynton “The River Garden of Pure Repose” p191—193



安然无恙。他们一面这样做，一面又天真地以和平的捍卫者自居。美国知识分子及宗教人士则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自己的军队帮助国民党去毁灭中国人民心中好的希望。倘若耶稣在世的话，他目睹此种事态，一定会痛心疾首的。……当我开始写此信时，我本不想伤你的心。可是过去几个星期的局势是我难过得几乎发疯了。请原谅我。你要知道，当自己的祖国已遭受战争蹂躏之后，如今又要打起内战，这不是那么好受的事<sup>①</sup>。

杨刚批评美国政府和知识分子以及宗教人士，是因为她由衷担心祖国的未来。杨刚拿包贵思信仰的耶稣来打比方，表达了对自己信念的忠诚。据魏斯特的著作，国共内战结束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留在燕京大学。包贵思为了迎接新的时代，读起毛泽东、列宁以及斯大林的著作，同时也对共产党进行的“检讨”大会感到兴趣。关于她这样的变化，魏斯特指出“包贵思对新秩序在态度上的转变，都得益于她与杨刚之间二十年的友谊”。包贵思困惑于她心中的变化，同时对基督教的信仰有着一点的怀疑。这对于包贵思来说，是绝对不该有的事情。

魏斯特可能是根据包贵思的日记来描述的。接着他写道：“包贵思对杨刚生活的简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刚住在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吃的是干粮和素菜。她只有一件换洗的衬衣，身无长物，一文不名。包贵思要送杨刚一条皮褥子，给她冲一杯速成可可，她都谢绝了。包贵思十分生气。杨刚说：‘我是中国人，我只喝白开水。’包贵思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不至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得这么彻底呀！”

她们的这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51年。两人在别的朋友家吃饭后，谈到深夜。她们之间有很深厚的友情，但是她们突然争论起来。

她们本来说好不争论，然而争论是无法避免的。包贵思曾责备“共产党巨大压迫性的思想控制”<sup>②</sup>，杨刚则反唇相讥，说：“华尔街的思想控制可高明的很！”

<sup>①</sup> Phil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9~1952” p226, 萧乾《杨刚与包贵思——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

但是包贵思对杨刚单纯的生活方式感到激动。包贵思想要对没有家财的杨刚提出支援时，杨刚拒绝了。包贵思虽然生一点气，但是说：“今后美国传教士倒可以不再背着在中国享受特权，受特殊保护的包袱了。”杨刚说，她听了这句话很感动，因为这是由衷之言。不过她又说：“有多少传教士也这么想呢？”<sup>①</sup>

对基督教有着信仰的包贵思和共产党员的杨刚之间有永远不一致的差异。包贵思想超越隔阂，包容两人之间的差异。而杨刚则不谈与包贵思的交往。萧乾虽然向杨刚问过她为什么与包贵思交流，也没得到显明的回答。可是杨刚肯定相应地得到包贵思的友谊。所以杨刚没有断绝与包贵思的交流，她们可以互相坚固地信赖。

#### 四、总结

包贵思 1951 年回美后，辞去美部会工作，从基督教传教活动中隐退了。这是因为她认为她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后来，她写着关于中国的文章，把中国情势介绍给美国大众。

1952 年她出版了上述她唯一的小说。这篇小说对她来说意味着总结在中国的日子。以后的中国已离她遥远了。但是，她继续深情地凝望着这个国家，她对中国的感情可能永远不变。

包贵思通过基督教信仰跟冰心保持着感情。冰心在燕大时期写了受到基督教影响的作品。这也许跟与包贵思的交流有关。另外，包贵思和杨刚虽然有着超越宗教和政治思想的对立，但是她们仍互相深深地理解。

从她们的交流，我们可以看到包贵思的博大的胸怀。这可能有如上述的杜荣说的“所谓的基督教博爱精神（略）她从来没有向我直接宣传过基督教义，她是在用一种平常的爱心来关心别人，影响别人”，其中有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感情因素。

1840 年以来，美部会以及其他基督教团体的很多传教士来华，克服艰

---

<sup>①</sup> Phil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9—1952” p226, 萧乾《杨刚与包贵思——一场奇特的中美友谊》

难尽力进行传教活动。包贵思作为其中一名勇敢的女性传教士，她的勇气和觉悟是基于她想传播信仰的喜悦的信念。跟她交流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所以，正如杜荣说的“燕大英文系的老师和学生都非常的尊敬她”。包贵思的存在给冰心、杨刚以及所有接触过她的学生来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响。

（牧野格子 日本国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冰心故乡考

施晓宇

**摘要：**冰心先生的故乡有三个：福州市隆普营谢家大宅——今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脚下乌塔之侧是冰心的出生地；福建省长乐县甘墩乡横岭村——今福州市长乐市金峰镇横岭村是冰心的祖籍地；山东省烟台市东山海军学堂旧址——今烟台市芝罘区会英街是冰心的“灵魂的故乡”。冰心先生生前多次著文，遗憾未能回到祖籍地横岭村，这是记忆错误。其实她在1903年清明节随祖父谢銮恩与父亲谢葆璋回过祖籍地横岭村祭祖，不过是不满3岁的幼小年纪，让成年后的冰心没有留下一点印记而已。

**关键词：**冰心；故乡；出生地；祖籍地；祭祖

冰心先生的故乡有三个：福州市、长乐市、烟台市。

福州市隆普营谢家大宅——今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脚下乌塔之侧是冰心的出生地。

福建省长乐县甘墩乡横岭村——今福州市长乐市金峰镇横岭村是冰心的祖籍地。

山东省烟台市东山海军学堂旧址——今烟台市芝罘区会英街是冰心的“灵魂的故乡”。

### 一、隆普营——冰心出生地

1900年10月5日，冰心（原名谢婉莹）出生于福州市隆普营谢家大

宅，就在今天福州市鼓楼区遐迩闻名的乌山脚下乌塔之侧。因此冰心在4500字散文《我的故乡》中写道：

我生于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sup>①</sup>

今天福州隆普营的冰心先生出生地谢家大宅——由冰心祖父谢銮恩租来的房子仅存一面高高在上的女儿墙——压檐墙。不过，与隆普营咫尺之遥——公共汽车一站远的杨桥东路17号，则是冰心先生在福州生活过的另一处谢家宅院。而且，隆普营对出生只有七个月即离去的冰心而言，不可能留下丝毫印象，倒是福州杨桥东路17号给11岁才从山东烟台重返故乡的冰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sup>②</sup>

如今，每天川流不息的游客都会好奇地看见，由福州著名“三坊七巷”之杨桥巷扩建的杨桥东路17号，同时挂着“林觉民故居”和“冰心故居”两块牌子。因为这个谢家宅院原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林觉民家的老宅。

① 冰心：《我的故乡》，《福建文学》，1979年4—5期合刊。

② 冰心：《我的故乡》，《福建文学》，1979年4—5期合刊。

1911年春，林觉民提前从留学的日本经香港回国，与族亲林尹民、林文等一起参加推翻封建满清王朝的广州起义。4月24日深夜，林觉民在香港写下绝笔《与妻书》《禀父书》后，即随黄兴等革命党人攻打广州总督衙门，受伤被俘不降，于4月27日从容就义。林觉民烈士被害后，躲到乡下的林家人为避祸，忍痛卖去老宅。冰心的祖父谢銮恩遂从林觉民家人那里购得了这个宅院，供谢家老小居住。这是今天福州杨桥东路17号——同时挂着“林觉民故居”和“冰心故居”两块醒目牌子的缘由。

1865年1月3日，冰心的父亲谢学朗（字葆璋，号镜如）在福州出生。

1884年11月，19岁的谢葆璋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恩师是总教习严复）。谢葆璋先上“威远”练习舰实习，后随邱宝仁等一道赴德国伏耳铿厂接收北洋水师购进的“来远”舰，不久由驾驶二副升任枪炮官。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侥幸从击沉的“来远”舰上死里逃生的谢葆璋被清政府任命为从英国新购“海圻”巡洋舰帮带（副舰长），“海圻”舰的管带（舰长）则由谢葆璋的老师 and 福州同乡——北洋海军帮统（副司令）萨镇冰兼任。而4300吨重舰“海圻”与“海天”巡洋舰同为其时中国海军最大战舰。这段经历在冰心的散文《我的故乡》有明确记载：

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幼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秋分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

中国的国歌，你看！”<sup>①</sup>

1927年6月，62岁的谢葆璋升任第七任海军部次长——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海军部次长。

1930年，因爱妻杨福慈在上海病逝，退休后的谢葆璋由上海迁居北京。晚年的谢葆璋身边多数由冰心的大弟——回国后一直在交通部门工作的长子谢为涵负责照料生活。而谢为涵娶的妻子则是母亲杨福慈大哥杨子敬的长女杨建华，可谓亲上加亲。

1940年8月4日晨，谢葆璋在北京家中病逝，享年75岁。

冰心的母亲杨福慈是一个出身书香门第，能诗善文的开明女子。

1871年，杨福慈出生于福建省侯官县（今福州市），祖籍福建省连城县芷溪村。杨福慈的祖父杨际春（又名庆琛），乃清嘉庆年间进士，钦点刑部山东主事，与林则徐是密友。杨福慈的父亲杨维屏历任甘肃省隆德、中卫及河北束鹿等县知县，与冰心祖父谢銮恩是至交。早在杨福慈9岁那年，杨、谢两人就缔结为“儿女亲家”。杨福慈的家族是典型的“书香之家”，“进士门第”。在杨氏前六代，出了以两江总督杨夔为代表的12名进士，12名举人。从第六代开始又出了以海军部部长杨树庄上将——冰心表侄为代表的“海军世家”。14岁时，杨福慈的父母相继去世，她跟随曾任河北、山东道台的堂叔杨维宝一道生活。

1890年1月3日，19岁的杨福慈如约嫁给25岁的北洋水师军官谢葆璋为妻。婚后连生两个儿子都夭折了，10年后才在今天的福州市隆普营生下了长女谢婉莹并存活，接着生下了三个健康的儿子谢为涵（笔名冰仲）、谢为杰（笔名冰叔）、谢为楫（笔名冰季）。

1930年1月7日夜，相夫教子、辛劳一生的冰心母亲杨福慈在上海家中病逝，享年60岁。

特意从北京赶去的冰心日夜劳顿、精心侍候——陪伴母亲走完人生因病痛折磨的最后一程。巧合的是，这一年冰心的公公——吴文藻的父亲吴焕若先生也去世了。与母亲生死相依、母女情深的冰心，在1931年6月30

<sup>①</sup> 冰心：《我的故乡》，《福建文学》，1979年4—5期合刊。

日夜于北京燕南园完稿的祭奠母亲的 20000 多字长文《南归——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里写道：

关于母亲，我并没有写下半个字。虽然有人劝我写哀启，我以为不但是“语无伦次”之中，不能写出什么来，而且“先慈体素弱”一类的文字，又岂能表现母亲的人格于万一？母亲的聪明正直，慈爱温柔，从她做孙女儿起，至做祖母止，在她四周的人对她的疼怜、眷恋、爱戴，这些情感，在我知识内外的、在人人心中都是篇篇不同的文字了。受过母亲调理、栽培的兄弟姐妹，个个都能写出一篇最真挚、最沉痛的哀启。<sup>①</sup>

在晚年怀念母亲的 930 字散文《我的母亲》里，冰心先生于 1987 年 12 月 23 日早晨又写道：

母亲常常教导我们“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的道理。她自己更是十分勤俭，我们姐弟的布衣，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她是个最“无我”的人！我一直努力想以她为榜样，学些处世做人的道理，但我没有做到。<sup>②</sup>

1901 年 5 月，冰心出生七个月后就在襁褓中随母亲离开福州前往上海，住进虹口区昌寿里。谢葆璋任副舰长的“海圻”巡洋舰大多时候在沪驻泊，一家人可以在谢葆璋休假时得以团聚。

1902 年冬，37 岁的谢葆璋出任烟台海军练营管带（营长）。

1903 年冬，北洋政府创办一所新的海军学校，即烟台海军学堂。海军学堂将就在海军练营的简陋潮湿的营房里开课，38 岁的谢葆璋出任首任监督（校长）。冰心随父母来到了烟台。因此，3 岁的冰心打小就在烟台海军学堂的海滩上玩耍，成长。

1910 年，在烟台海军学堂春季运动会上，互相仇视的满汉学生爆发激

<sup>①</sup> 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二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296 页。

<sup>②</sup> 冰心：《我的母亲》，原载 1988 年 3 月 8 日《人民政协报》，收入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七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113 页，114 页。



烈冲突。事发后，上峰要求校方严惩汉族学生，谢葆璋却不肯偏袒满族贵胄学生，据理力争，进而愤然辞职。

1911年，谢葆璋辞去烟台海军学校首任校长的职务，举家返回故乡福州——冰心也依依不舍离开她生活了8年的烟台。一家人先乘轮船从烟台到上海，住在虹口区租界的旅馆里——恰逢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进步的上海市民纷纷捐款慰劳革命军。11岁的冰心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也把平日节省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报馆去捐献了。时隔68年后——1979年7月4日，79岁的冰心为此事在《我的童年》中追忆：

我们在回到福州的中途，在上海虹口住了一个多月。我们每天都在抢着等着看报。报上以黎元洪将军（他也是父亲的同班同学，不过父亲学的是驾驶，他学的是管轮）署名从湖北武昌拍出的起义的电报（据说是饶汉祥先生的手笔），写得慷慨激昂，篇末都是以“黎元洪泣血叩”收尾。这时大家都纷纷捐款劳军，我记得我也把攒下的十块压岁钱，送到申报馆去捐献，收条的上款还写有“幼女谢婉莹君”字样。我把这张小小的收条，珍藏了好多年，现在，它当然也和如水的年光一同消逝了！<sup>①</sup>

1911年秋，冰心从烟台重返久违的出生地福州，住在城中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面——就是今天的杨桥东路17号“冰心故居”。冰心对福州美好的印象从这里开始：“就在这一年，也许是第二年吧，福州有了电灯公司。我们这所大房子里也安上电灯，这在福州也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班孩子跟着安装的工人们满房子跑，非常地兴奋欢喜！”（见冰心：《祖父和灯火管制》）

1912年，冰心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福州女子师范预科读书。

据冰心自己多次讲过写到：一生中只回过两次福州，第一次在1911年冬天，第二次在1955年冬天。她在1955年11月第二次回福州后，于1956年春写下近18000字的散文《还乡杂记》（部分发表于1956年6月号《人民文学》，全文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57年4月初版，后收入《小橘

<sup>①</sup> 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五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10页。

灯》一书)。在《还乡杂记》的第一章《从北京到福州》中，冰心这样赞美她的出生地：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十一月中旬，北京已经是树叶黄落，朔风飏飏的了。我们坐着火车从北到南，穿过六个省份，就是：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一路上越走越暖。到了江西省的上饶，我们换坐汽车，在黎明的微雨中，上了紫鸡岭，直到分水关；这个山头，是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地方，从这时起，我就踏上故乡的土地了！

我的父母都是福建人，但是我的一生中，只到福建去了一次，那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且走的是水路。那时我从山东的渤海，走进福建的闽江，觉得江水实在比海水安静温柔得多！

……福州本是个有山有水有温泉的城市，而且是四季绿叶不落，繁花不断。外宾来到，都惊奇地夸赞福州是一座花园。<sup>①</sup>

1912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黄钟瑛为中华民国首任海军部总长兼海军总司令。

1913年8月，黄钟瑛任命同是福州长乐老乡加同是驾驶专业毕业的谢葆璋为海军部军学司少将司长，让时年48岁、办事认真的谢葆璋主管海军教育。冰心于是跟随全家从福州迁居北京，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14号院住了整整十年，这是冰心完成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关键十年。

1914年，冰心入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就读直至毕业。

1918年，冰心入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后转文学系）。

在中剪子巷14号，冰心开始了最早的文学创作。

1919年，借“五四”东风，19岁的冰心公开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两个家庭》（9月18日至22日北京《晨报》连载），还发表了小说《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等，都收入冰心的第一部小说集《去国》（北新书局1933年10月初版）。同时，冰心还写出了轰动一时的组诗《繁

---

<sup>①</sup> 冰心：《还乡杂记》，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三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33页，第435页。

星》。由此，谢婉莹出自于中剪子巷 14 号的笔名“冰心”在文坛一炮打响。因此，北京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 14 号可谓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冰心的诞生地。

## 二、横岭村——冰心祖籍地

冰心终其一生在出生地福州的生活总共只有两年多的时间，有 1979 年初冰心应《福建文学》编辑之约写出的散文《我的故乡》为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sup>①</sup>

1986 年初夏，适逢横岭村修订谢氏族谱，6 月初谢氏宗亲派专人去北京请冰心先生作序。本来，循旧例，族谱家谱只列男性，女性是不入谱的（仅记在夫家族谱家谱中）。但横岭村谢氏乡亲一反旧例，率先将冰心列入本姓族谱，还破例请冰心作序。冰心先生特别感动，于 6 月 7 日在横岭谢氏族谱的《族谱序言》认真写道（全文）：

“1986 年 6 月 4 日，有福建省长乐县横岭乡的三位乡亲谢振瑜、谢尊仙、谢捷先带着许多故乡的史迹相片和记录专程来京，要我为即将修订的族谱作序。这使我感到光荣而又惭愧！我自幼离乡，对于乡土乡人极少接触。但我认为族谱是承上启下的家族历史。对家史的注重和关怀，是爱祖国爱人民的起点！我祝愿谢氏男女子孙，继承我们农民祖先勤劳勇敢的劳作精神，加以发扬光大，精研各种科学技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我族的繁荣昌盛，为祖国的飞跃振兴，而尽上自己的最大的力量！”<sup>②</sup>

① 冰心：《我的故乡》，《福建文学》，1979 年 4—5 期合刊。

② 冰心：《族谱序言》，卓如编，《冰心全集》第六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470 页。

冰心先生固然对应邀为横岭村谢氏族谱作序“感到光荣”，但对一生“没有回去过”祖籍地——今长乐市金峰镇横岭村（冰心写作横岭乡），感觉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1990年8月22日冰心在北京家中为新修《长乐县志》作序时，继续写道：

福建长乐是我的父母之乡。我的曾祖父谢以达公就是从长乐县迁到福州去的。我虽然没有回去过，但我知道长乐地处东海之滨，和台湾隔海相望，和海外各地来往频繁，因而在文化、科技、经济各方面，历来都在突飞猛进。<sup>①</sup>

不唯如此，冰心更早在怀念福州的散文《我的故乡》里根据祖父谢奎恩的回忆写到：

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飘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sup>②</sup>

总之，冰心先生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回到过祖籍地长乐市金峰镇横岭村，冰心子女也一直信以为真。可这不是事实，有人亲眼看见冰心回到过横岭村。

2015年4月12日上午，阳光明媚，一扫前一天不停下雨的阴湿，冰心的小女儿吴青教授、女婿陈恕教授和外孙陈钢重返横岭村，由此纠正了冰心先生的一个重要记忆错误。就在冰心生前题词的“横岭敬老院”前，迎

---

① 冰心：《〈长乐县志〉序》，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七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90页。

② 冰心：《我的故乡》，《福建文学》，1979年4—5期合刊。

候多时的横岭村谢氏宗亲联谊会会长谢国平带领冰心的小女儿吴青一家三口等，前往已经倒塌无存的冰心祖屋探访路上，遇见了83岁的谢长宝老人——他是冰心先生的表侄，也是1975年出生的谢国平会长的父亲。同时遇见了冰心先生的侄孙谢如坚（1960年出生）和谢如强（1962年出生）兄弟俩；还有谢如坚的长子谢志敏（2008届福州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毕业生）和谢如强的长子谢文涛。

双方寒暄之际，站在母亲故乡土地上的吴青教授感慨地说，她在1993年2月和1997年从北京回横岭村省亲过。1997年5月回乡是因了参加福建省冰心文学馆——全国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文学馆，当年在长乐市区落成典礼的缘故，这次回乡是第三次。可惜母亲在世时一直遗憾这一生没有回到过横岭老家。就连冰心女婿陈恕教授在1997年由冰心先生题词的“横岭小学”举行落成典礼时，也应邀与妻子吴青一道代表冰心先生从北京到横岭村剪彩过。至于冰心先生十分疼爱的外孙陈钢则是第二次回到姥姥的故乡了，第一次在1993年2月。1966年出生、留学美国归来的陈钢至今不忘27岁为姥姥捐款资助横岭村办学之事，第一次返乡时的深刻印象：“那次回去，特别激动。姥姥的老家到处是绿的，水是滑滑的。”

陈钢还由笔者陪同、经冰心先生的侄孙谢如坚带路，专程祭扫、拜谒了距离横岭村咫尺之遥——位于横岭村西坡的冰心先生祖父谢銮恩的祖父谢顺云的祖父谢永泰之墓（笔者为陈钢拍摄多张照片留念）。就在冰心先生高祖谢永泰之墓左前方十几米处，还有冰心先生祖父谢銮恩的祖父谢顺云之墓，规模较谢永泰之墓要小。据横岭村谢氏族谱记载，当年就是谢顺云带着儿子——冰心先生的曾祖父谢以达从横岭村迁到福州城中做裁缝艰难谋生的。冰心先生祖父谢銮恩的祖父谢顺云去世后，叶落归根，迁葬回了横岭村——陪伴在谢顺云祖父谢永泰之墓的侧畔。

有意思的是，在听完吴青代母亲冰心再次遗憾一生没有回过横岭老家的感叹后，谢长宝老人却用浓重的长乐话（类似福州话）纠正道：“冰心回来过啊，只是她那时还小，应该不记得了。”

大家一听都来了精神，围拢过来听谢长宝老人“讲古”。

原来，谢长宝很早就听父亲和村里长辈说过，1903年清明节，谢銮恩带着儿子谢葆璋、孙女谢婉莹（冰心）回横岭村扫墓过。那时，冰心不满3

岁，还是个小不点的女孩子，走不了远路，乡亲们——包括谢长宝的父亲亲眼看见，都是祖父谢銮恩心甘情愿地像老黄牛似的一直背着孙女谢婉莹（冰心），走在通往横岭村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接着谢长宝老人继续用浓重的长乐话强调：“1911年清明节，谢銮恩也回乡扫墓过。”

说到冰心的祖父谢銮恩，由于冰心的曾祖父谢以达是个福州城里的穷裁缝，因为目不识丁被人赖账过，拿不到工钱过不了年，曾祖母气得上吊，差一点自杀身亡，幸亏被丈夫谢以达救下。因此，谢以达夫妇省吃俭用送儿子谢銮恩上学读书，为的是将来会记账不受人欺。谢銮恩也特别争气，读书成绩特别好，曾任福州尊孔兴文会会长，毕生讲学于福州市内光禄坊道南祠，所收皆为闽县、侯官、闽清等福州郊县及坊间邻里的儒生。在谢銮恩培养的得意门生中，有民国海军总长萨镇冰（曾代理国务总理）、清末民初著名东南亚侨领黄乃裳等。

1921年，最为疼爱冰心的祖父谢銮恩逝世了，享年87岁，在那一辈人里，算是相当高寿了，但仍然让已经长成21岁大姑娘的冰心无比伤心：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sup>①</sup>

根据谢长宝老人的说法，冰心生前确实是回过祖籍地横岭故乡的，只不过确实是因为冰心其时才两岁多，没有留下一星半点的印象罢了。如此说来，冰心先生一生没有回过横岭老家的记录应当改写，这可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史实变更——这也是笔者撰写这篇论文缘起的缘起。请看2015年4月15日福建省冰心文学馆网站发表岑帆以《冰心女儿吴青一家访问横岭村》为题做的报道：

2015年4月12日，冰心女儿吴青携丈夫陈恕、儿子陈钢赴母亲冰心祖籍地长乐横岭村，考察祖居、祖厅、坟墓并看望族亲。我馆书记、常务副

<sup>①</sup> 冰心：《我的故乡》，《福建文学》，1979年4—5期合刊。

馆长陈国勇，副馆长练建安，福州大学教授施晓宇，冰心文学馆办公室主任李清、学术部主任邱伟坛等陪同。

横岭村族亲谢国平、谢如强兄弟等热情带领吴青一家先后考察谢氏祖厅、祖屋和祖墓，介绍了横岭村的历史和目前的情况。乡亲们特别口述了村里上辈人相传在1903年清明节时，谢銮恩携儿子谢葆璋和女儿（施注：应为孙女）谢婉莹回来祭祖的事情。据横岭村老人口述，那年清明，谢銮恩一家人从福州回到横岭祭扫祖墓，由于山村小路不好走，那个小女孩总是爷爷背着她上山和下山。那时村里人只知道这个女孩是谢葆璋的女儿，许多年后才知道那年回来的小女孩就是后来的大作家谢冰心。据说，那次祭完祖谢葆璋就去烟台上任，任海军训练营营长。1911年，谢葆璋卸任海军校长后，又回到横岭祭拜祖上。根据父亲口述，冰心还创作了小说《还乡》。

关于小冰心曾随爷爷和父亲回横岭祭祖一事，如得到印证，将改写冰心从未回到长乐横岭的历史。<sup>①</sup>

这则官方报道，可以算作冰心先生童年时回返祖籍地横岭村的一个重要实证。其时二十上下的冰心最初创作的几篇小说之一《还乡》，连载于1920年5月20日至21日的北京《晨报》上。结尾是：

族长的影儿，去得远了。以超才慢慢的自己走到他曾祖墓前，坐在树下。这时那小村野地，在那月光之下，显得荒凉不堪。以超默默的抱膝坐着，回想回乡后的这一切事情……对着这一抔一抔的祖先埋骨的土丘，只觉得心绪潮涌，一直在墓树底下，坐到天明，和大家一同归去。<sup>②</sup>

在近5000字的短篇小说《还乡》中，冰心设计的以超和以棠兄妹对话，以超与母亲对话，包括家人与乡亲间的故事交待，不难看出冰心与三

<sup>①</sup> 岑帆：《冰心女儿吴青一家访问横岭村》，2015年4月15日冰心文学馆网站 <http://www.bxwxg.org/index1.asp>。

<sup>②</sup> 冰心：《还乡》，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一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第104页。

个弟弟日常说话的原型，以及冰心与母亲的对话交流情景。年纪轻轻的冰心，早早表现出她对故乡乡亲——社会最底层百姓艰难生活的同情、关心和体恤。冰心一生同情底层人，厌恶势利人，具体表现在冰心对生在祖上是横岭村一个贫苦农家深表认同，毫不避讳，并在《族谱·序言》中加以强调：“继承我们农民祖先勤劳勇敢的劳作精神，加以发扬光大。”这与一个爱慕虚荣的势利眼堂哥形成鲜明的对比：

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sup>①</sup>

### 三、烟台海军学堂——冰心“灵魂的故乡”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1903年冬，38岁的谢葆璋出任烟台海军学堂首任监督（校长），3岁的冰心随父母来到了烟台东山。于是冰心一家先后在会英街的海军采办厅、海军医院、海军练营、海军学堂等地居住过。而每一个住处都紧邻大海，这使得冰心从3岁到11岁，在烟台海边度过了美丽的童话般的童年，小丫头冰心则每每以小男孩的装束出现在军营里——冰心在《梦》一文中自述“她男装到了十岁”。自然而然的，冰心不止一次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将烟台称作故乡，而且是“我灵魂上的故乡”和“我真正的故乡”等——童年的记忆总是最美好的。请看冰心在1962年9月18日写于北京的2200字散文《海恋》的记述：

<sup>①</sup> 冰心：《我的故乡》，《福建文学》，1979年4—5期合刊。



在沙滩与我之间，有一簇依山上下高低不齐的农舍，亲热地偎倚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在广阔的沙滩前面，就是那片大海！这大海横亘南北，布满东方的天边，天边有几笔淡墨画成的海岛，那就是芝罘岛，岛上有一座灯塔。画上的构图，如此而已。但是这幅海的图画，是在我童年，脑子还是一张纯素的白纸的时候，清澈而敏强的记忆力，给我日日夜夜、一笔一笔用铜钩铁划画了上去的，深刻到永不磨灭。<sup>①</sup>

冰心还在1984年11月15日写下600字散文《忆烟台》，表达对烟台生活和童年趣事的向往：

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方八面涌来……村北的海军练营、村南的海军学校，都已不复存在了，但是中间的金钩（施注：应为沟）寨这个村落，一定还在山陬海隅安息着。这个我所熟悉的、一想起就感到亲切的、百十来幢偎倚着的村舍，里面生活着、劳动着我的淳朴勇敢的乡亲。他们如今一定和全国的农民一样，进步而富裕起来了。请你们接受我从千里外送去的祝福！<sup>②</sup>

1992年3月3日早晨，冰心先生因为读到杨健写的关于烟台的散文《走向大海》，再次引发冰心对烟台的思念，又写下一篇以烟台为题材的830字散文《牵动了我的心的一文一画》。开头写道：

《人民文学》1991年12期有一篇杨健（这位作者我不认识）写的《走向大海》，他主要讲的是烟台港务局局长朱毅的政绩。我却从这篇文章里知道了我童年奔走游戏的烟台港湾的许多历史事实，如烟台山上那座灯塔是建于1905年，就是我到烟台生活的同一年！还有我每天向南仰望的那座大山，原来叫做“岱王山”，人也称为“山岱王”。我常看见这座大山的左边山岩里有一道墙，不知道那是什么古建筑？文章里说那是“田横兵败之后，

① 冰心：《海恋》，《人民文学》，1962年10月号。

② 冰心：《忆烟台》，《旅行家》，1985年3期。

曾在此处屯驻”，那可真是一个古迹。

文章里还说“芝罘湾有岸线 14 公里，尚有 3.8 公里的自然岸线可供建筑”，原来本来是静寂的只供我一人奔走游戏的地方，竟是那么宽大，而且要兴起许多建筑了！……<sup>①</sup>

这篇十分罕见、不为更多人知的散文，字里行间掩饰不住晚年冰心先生对童年时期在烟台快乐成长的真挚情感和美好记忆。目前，冰心先生用三张《人民文学》240 格稿纸写成的《牵动了我童心的一文一画》手稿珍藏于福建省冰心文学馆。

难怪冰心的小女儿吴青教授于 2001 年 2 月的一天晚上，在北京中国民族大学宿舍区家中，对来自烟台、商议筹建冰心公园及冰心纪念馆的三位客人说：

妈妈太爱烟台了，甚至胜过爱她的故乡。妈妈说大海在她的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正是在烟台妈妈认识了大海，认识了大自然。我曾经问过妈妈，问她为什么喜欢海，妈妈说大海使人心胸开阔、包容一切，大海给予别人的都是爱。<sup>②</sup>

令人欣慰的是，位于烟台山海关税务司官邸旧址内的烟台冰心纪念馆已于 2008 年 8 月 3 日建成开馆。

以上所述，就是冰心先生的三个让她魂牵梦萦的故乡：福州市、长乐市、烟台市。

福州市隆普营谢家大宅——今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脚下乌塔之侧是冰心的出生地。

福建省长乐县甘墩乡横岭村——今福州市长乐市金峰镇横岭村是冰心的祖籍地。

---

<sup>①</sup> 冰心：《牵动了我童心的一文一画》，《散文天地》创刊号，1992 年第 1 期（福建省文联主办）。

<sup>②</sup> 郝凤利：《冰心与烟台及大海》，2004 年 5 月 18 日文化烟台 [http://www.shm.com.cn/yantai/2004-05/18/content\\_5081.htm](http://www.shm.com.cn/yantai/2004-05/18/content_5081.htm)。

山东省烟台市东山海军学堂旧址——今烟台市芝罘区会英街是冰心的“灵魂的故乡”。

(施晓宇 福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 冰心女士二三事

秦贤次

近十几年来，如要查考冰心女士生平纪事，我总是用卓如女士的《冰心年谱》<sup>①</sup>。最近则又增加了陈恕先生的《冰心全传》<sup>②</sup>，以及王炳根兄的压卷之作《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1900~1951）<sup>③</sup>。

其中，卓如女士的《冰心年谱》，出版最早，用力最深，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炳根兄大着，篇幅厚，集近十几年研究成果之大成，给研究者很大方便。

我是新文学史料搜辑及研究者，在此利用我之收藏史料，写下本文，无非供研究者作更进一步的勾沉导论。

### 一、冰心与北京贝满女中

根据《1930 贝满年刊》<sup>④</sup> 刊后〈贝满中学历年毕业生一览表〉记载，其中毕业于 1918 年的冰心系属第 17 届毕业生，毕业生除冰心外另有周启运及吴卓之姊吴缕梅（浙江）等 14 人。冰心之前的 1917 届，有孙淑贞、陶玲、黄世英等 18 人；1916 届有陈克俊等 11 人；1915 届有李德全（后为冯玉祥将军之夫人）、邓贵明等 9 人，冰心之后的 1919 届有陈克德、成春

① 卓如著《冰心年谱》，1999 年 9 月，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第 1 版。

② 陈恕著《冰心全传》，2011 年 8 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 1 版。

③ 王炳根著《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1900~1951）上下册，2015 年 8 月，台北独立作家第 1 版。

④ 《1930 贝满年刊》，约 1930 年 6 月出版，精装，全书计 117 页。

兰、管萃贞、严智安等 20 人；1920 届有黄玉蓉、于汝麒等 13 人。

## 二、冰心与华北协和女子大学

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系在贝满女中创办多年的基础上，始于 1905 年在北京成立，系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李德全即系 1915 年贝满女中毕业后，考入华北协和女大，于 1919 年毕业，成为末届毕业生。

冰心女士在 1917 年 7 月自贝满女中毕业后，考入华北协和女大三年制的医预科<sup>①</sup>。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设有全中国唯一的八年制医学系，三年预科，五年本科，毕业后，可授以医学博士学位。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于 1917 年 9 月，开办之初仅设有医预科；1919 年 10 月才再开办医本科。

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办之初，除自办医预科外，也与华北协和女大及南京金陵女大合作，请两校也招收并代训女医预科学生，三年修业完了后，再经考试，进入协和医学院本科就读。在华北协和女大于 1920 年 3 月 15 日并入燕京大学后，燕大仍持续与协和合并招收医预科学生，并在医预科三年毕业考入协和医学院本科一年后，授以燕大理科学士学位。

## 三、冰心与燕京大学

冰心就读的华北协和女大在合并到燕京大学后，1921 年 6 月冰心自燕大医预科毕业。这时，燕大还称为文理科大学。文、理科之预科为二年制，本科（即大学部）为三年制。但冰心系三年制的医预科毕业，在升入文科时（这时还未分系，那是 1923 年 9 月在冰心刚毕业后才开办的），因多读一年预科，因此插读文科二年级，迄 1923 年 6 月自文科毕业。毕业时，担任冰心毕业论文指导的助教许地山，系燕大 1920 年的文学士，1922 年的神学士。与许地山一同介绍冰心加入“文学研究会”的瞿世英（菊农）则是燕大 1921 年的文学士，1922 年的第一位文硕士。

<sup>①</sup> 冰心在《我的同班》一文，曾提到“医预科”一事。

#### 四、冰心的贝满女中同学与燕京大学

根据我持有的《私立燕京大学一览》(1930 学年)<sup>①</sup>，冰心在前述贝满女中同学中，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的，经查述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1922 年：陈克俊（文）

1923 年：黄世英（文）、孙淑贞（文）、邓贵明（文）

1924 年：黄玉蓉（文）、严智安（理）

1925 年：陈克德（文）、成春兰（文）、管萃真（文）、周启运（理）

1926 年：于汝麒（文）

#### 五、1926 年 8 月冰心留美回国日期，为何与报纸记载差一天？

冰心在其《寄小读者》一书中的第 28 封通讯上，记载她自美学成归国，于 1926 年 8 月 27 日，搭乘“约克逊号”（全名实际为“杰克逊总统号” President Jackson）回到上海云。然而，依据《申报》1926 年 7 月 28 日第 11 版《大批留美学生回国》一文记载：前日（26 日）美邮船“杰克逊总统号”抵沪，有大批留美学生回国。……昨日下午 5 时该会（指寰球留美学生会一笔者）总干事朱少屏君，并特备茶点，邀请回国诸君，到该会晤谈。

该文并录下这些回国学人的姓名，如乔万选、王箴、张锡钧、高崇熙、高君湘、程天放、王书林、安绍芸、潘光旦等等。我们确实发现潘光旦原来系与冰心女士同船回国的。

“杰克逊总统号”该航次系 1926 年 7 月 26 日抵沪；翌日《申报》之《轮船进口报告》栏也是如此记载。但冰心记的却是 27 日。合理的解释系，该船于 26 日夜已停泊在吴淞口；27 日晨，船在驶抵上海海关码头后才让乘客下船。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俞平伯于 1922 年 11 月 18 日自温哥华搭乘“俄罗斯皇后号”抵沪时一样，请读者参阅孙玉蓉著《俞平伯年谱》<sup>②</sup> 第 66 页。

<sup>①</sup> 《私立燕京大学一览》(1930 学年)，约 1931 年春出版，全书计 361 页，书后附有各年度毕业生名录。

<sup>②</sup> 孙玉蓉著《俞平伯年谱》，2001 年 1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 六、冰心与夫婿吴文藻在 1936 年 8 月何日搭何船前往美国参加哈佛大学创校 300 周年纪念庆典？

《申报》1936 年 8 月 14 日第 14 版中，有《女作家明日抵沪》一文，记载冰心偕其夫婿吴文藻将于 15 日搭车自北平抵达沪上，并定于 23 日搭轮渡美，除参加哈佛三百周年纪念会外，并在美考察教育云。

经查《申报》当月《进出口轮船报告》栏，23 日当天并无任何轮船开往美国。

再查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一书第 481 页，记有冰心与吴文藻于 8 月 25 日，乘坐“恩普列恩·欧卓·日本号”轮船道经日本前往美国云。

经笔者分析后，最后解读出这个怪船名实系“日本皇后号”（英文名 Empress of Japan，正确的译名应为“日本女皇号”），而日文中译者将船名之日文拼音直接音译成“恩普列恩（思之误排）·欧卓·日本号”。<sup>①</sup>

再查《申报》1935 年 8 月 24 日第 12 版《唐振绪今日放洋》一文，及当日《申报》之《进出口轮船报告》栏，确知“日本皇后号”实系 24 日，而非 25 日，自上海启程赴美。

该轮约于 9 月 10 日来到加拿大维多利亚港，再转渡轮抵达西雅图。由此搭乘美国大北铁路经芝加哥转往波士顿哈佛大学，需要 4 天时间。因此，冰心偕吴文藻有足够充分时间来来得及参加 16 日至 18 日的庆典重头戏及闭幕典礼。

16 日至 18 日系世界各著名大学及机构派代表按照成立时间先后排序，来庆贺哈佛大学的。在最后一天，始轮到胡适代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研究院；吴贻芳代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冰心及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来出席庆贺大典。

（秦贤次 台湾学者、著名民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

<sup>①</sup> 详见《日本关于冰心的介绍——清纯的力量》，日、荻野修二著，孙浩译，原载《日本研究》1994 年第 4 期，后收入林德冠、章武、王炳根合编《冰心论集》（上），2000 年 10 月，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第 1 版。

## 谢冰心家世略考

鲁普文

**提 要：**与冰心生平研究相比，目前对她的家世研究尚不够系统，且有不少语焉不详乃至错漏之处。拙文拟据族谱、地方史志等史料，结合冰心本人相关著述，尝试对冰心的家世渊源、迁移、回乡祭祖、祖父谢銓恩功名与卒年等作一简单梳理。

**关键词：**冰心；家世；族谱；祭祖；祖父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谢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建侯官县（今福州）。与冰心生平研究相比，目前对冰心家世的研究仍嫌不足，其成果散见于冰心传记、年谱等，专文论述很少，且疏漏及讹谬之处颇多。笔者不揣浅陋，拟依据族谱、地方史志等史料，结合冰心本人相关著述，尝试对其家世渊源、迁移、回乡祭祖、祖父功名与卒年等作一简单梳理。当然，以笔者有限的学力和视野、肤浅的理解，资料的收集无法完整；触及的层面，无法全面。故本文只是“略考”，有待有识者指教、补阙。

### 一、冰心家世渊源

冰心祖籍长乐横岭村。据《冰心志》的说法，“横岭谢氏源于河南唐河，‘永嘉之乱’时，申伯三十六世孙谢衡自河南阳夏迁越之始宁（今浙江上虞县）之东山。至申伯六十五世孙伯俭为贾迁长乐，生子录、铨”，“铨



居横岭”，冰心曾祖以达系申伯八十五世孙。<sup>①</sup>

在关于世系源流方面，家谱撰修者为了说明本家族世系源远流长，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自然地会攀宗附祖，常有夸大、编造本族的历史的行为尤其是由于年代久远，对本家族的来龙去脉已不可知情形下<sup>②</sup>，这几乎是一种惯例。但冰心很反感这种牵强附会地攀附名人的做法。这方面祖父谢銮恩的教育对冰心影响至深。冰心十一岁那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一本“薄薄的家谱”，“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sup>③</sup>然而，祖父对冰心讲述了谢家贫寒的家世，当年因为不识字被人赖账，等米下锅的冰心曾祖母被逼上吊自杀。祖父话对冰心带来不小的震撼，原来他们谢家并非如族谱上所载的什么出身世家望族、文风鼎盛之家：“我并不是‘乌衣门弟’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冰心堂弟谢为鉴为成立“谢氏源流研究会”之事找到她，她还告诫之“不要高攀什么‘名人’！”<sup>④</sup>目前横岭村《谢氏村志家史》为上世纪80年代新修。因为上代失传，《谢氏村志家史》只能追溯至冰心的上八世，冰心这一支则只能追溯到其曾祖顺云的祖父永泰公。《谢氏村志家史》编撰者强调“因谱丢失查不到来源”，所以根据族人的口耳相传，记述为据说“系从江西趁木排飘来长乐，也有说从南京飘来。”<sup>⑤</sup>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较为稳妥和切合实际的，我想也是会令冰心满意的。

也有人猜测冰心当年看到的族谱，就是横岭谢氏原有、之后散佚的那本，但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因为冰心的描述非常明确，这本“薄薄的家谱”的“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sup>⑥</sup>据笔者推测，这本家谱是谢銮恩编纂的自己这一支的“家史”。横岭村过去人口少，解放后土改时也只有三十几户，一百八十三人；经济落后，村民

① 张天禄主编：《冰心志》，福州：海风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② 邹华享：《使用家谱资料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上）》，《图书馆》，2006年第5期。

③ 冰心：《我的故乡》，卓如编：《冰心全集》（第5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第3版。

④ 冰心1991年4月27日给谢为鉴信，《冰心全集》（第8册）。

⑤ 《长乐谢姓迁徙情况》，《谢氏村志家史》。

⑥ 冰心：《我的故乡》，卓如编：《冰心全集》（第5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第3版。

文化水平低，1987年才有在校中专生一人、大学生两人。不排除横岭谢氏一直以来就没有族谱的可能，关于横岭谢氏远祖，其实已不可确考。

## 二、谢以达何时因何灾迁至福州

冰心曾祖父谢以达当年因天灾迁至福州城里以裁缝为业。但关于他家何时因何灾迁移，一般著述往往一笔带过。只有《冰心年谱》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冰心年谱》依据《长乐县志》的记载，认为是“咸丰五年（1855年）乙卯，春夏不雨，早晚稻绝收，遍地皆种红薯。秋，薯虫遍生，大如拇指，薯叶被食殆尽。先是天雨豆，次日豆皆变成虫卵，以至蔓延。是岁大饥，谷价每挑三千六百文。”<sup>①</sup>稍晚几年出版的《冰心志》笼统地称“清朝末年”，因为“春夏干旱，早晚稻收成无几，为饥馑所迫”<sup>②</sup>，谢家迁到福州府城。此说当源于《冰心年谱》。当年谢以达在侯官县因为不识字被人赖账，决心以后如果生男孩一定培养他读书。但他一直生了四个女儿，后才在1834年生了冰心祖父谢銮恩。他的四个姐姐也都是在闽侯出生的，咸丰五年（1855年）谢家早已迁至侯官，显然上述说法有误。查《长乐县志》，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长乐各种天灾十数次。除了风灾、水灾、火灾、疫病等，乾隆六十年（1795年）“大饥，谷贵，每挑价三千六百文”；嘉庆二十年（1815年）“春夏不雨，早稻绝收”；道光4年（1824年）“自夏至秋不雨”，道光6年（1826年）“大饥，谷价每三千六百文。”<sup>③</sup>从时间、灾情类别及严重程度推断，笔者认为，谢家不得已迁至侯官县应与这几次旱灾引起的饥荒有关。

## 三、关于回乡祭祖

《我的故乡》中，冰心曾将祖父比作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这形象地描述了他们家迁徙传播的“开枝散叶”

① 卓如编著：《冰心年谱》，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

② 张天禄主编：《冰心志》，福州：海风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③（民国）李驹主纂：《长乐县志》，长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过程。但叶落总要归根，“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sup>①</sup> 谢銮恩的祖父谢顺云以及谢顺云的祖父谢永泰的墓位于横岭村西坡，因为侯官县（1903年与闽县合并为侯官县）离长乐并不远，谢家也会按照中国传统在清明时回横岭扫墓。

冰心记忆中，家人回乡祭祖只有一次，那就是全家从烟台回到福州后，谢葆璋去横岭祭拜祖上。“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父亲“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〇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sup>②</sup> 在中国宗法社会里，对族人而言，修谱、祭祖、扫墓都是大事，其中宗祠中举行的祭祖是最隆重的仪式。祭祖多在清明、夏至、秋分、冬至进行。遇有子孙科举、晋升官爵、受朝廷的恩荣赏赐等，也可开祠堂特祭。对于横岭这样的小村，出了谢葆璋这样的人才自然是“配去替族人增辉吐气”的，结合上文冰心所言的“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之语，应该这次祭祖是族人安排的一次“特祭”。

这次回乡祭祖，谢葆璋也到自己曾祖顺云墓前坐了很久，感触很深。在这篇以谢葆璋返乡祭扫祖坟一事为依据而构思的小说《还乡》中，以超（以谢葆璋为原型）“慢慢的自己走到他曾祖墓前”，“对着这一堆堆祖先埋骨的土丘，只觉得心绪潮涌，一直在墓树底下，坐到天明，和大家一同归去。”通过接触，他知道自己族人还是比较守旧的，族人困顿的生活也使之生怜悯之心，“一时百感交集，忽然又想将他的族人，都搬到城里去，忽然又想自己也搬回这村里来，筹划了半天”。<sup>③</sup> 族人的生活，通过家人口述，建构了冰心的“族亲记忆”。“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

① 冰心：《我的故乡》，卓如编：《冰心全集》（第5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第3版。

② 冰心：《我的故乡》，卓如编：《冰心全集》（第5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第3版。

③ 冰心：《还乡》，卓如编：《冰心全集》（第1册）。

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的难过的滋味!”<sup>①</sup>正是那年，谢葆璋介绍了横岭村的谢时耀、谢时植、谢硅硅、谢允平（身高不合格，谢葆璋通融后得以通过）等几位乡亲参加福州马尾海军。<sup>②</sup>

冰心记忆中她没有去过横岭，但2015年4月12日，冰心小女儿吴青教授一家重返横岭村时，村里有老人告诉她，自己早前听其父亲和村里长辈说，1903年清明节，谢銮恩带着儿子谢葆璋、孙女冰心回横岭村扫墓。据该老人介绍，那年清明，谢銮恩一家人从福州回到横岭祭扫祖墓，由于山村小路不好走，谢銮恩背着年幼的冰心上、下山。那次祭祖后谢葆璋就去烟台上任。<sup>③</sup>但冰心到底是否曾经随家人返乡，或者是因为当年她年纪太小记不得了，因为仅有族人口述，笔者认为当存疑。

#### 四、祖父谢銮恩的功名与卒年

冰心祖父谢大德，字銮恩，号子修。谢銮恩是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他毕生讲学于福州光禄坊道南祠。关于谢銮恩的功名，一种普遍的说法是认为他是举人，如《冰心志》<sup>④</sup>《冰心全传》<sup>⑤</sup>均持此说。但查《长乐县志》（1917年修）、《侯官县乡土志》<sup>⑥</sup>（清光绪年间编纂）、《闽侯县志》<sup>⑦</sup>（1929年始修，1930年完稿）等均无记载。这几本方志从编纂时间上看都在谢銮恩去世前后，尤其是《闽侯县志》的编纂者陈衍居住于文儒坊，和谢銮恩所居杨桥巷都属于三坊七巷范围，他也和谢銮恩老友严复相交，应该说漏记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们结合冰心谢銮恩“进学”地点是闽侯的表述<sup>⑧</sup>，谢銮恩应该是“生员”，也就是秀才。

① 冰心：《我的故乡》，卓如编：《冰心全集》（第5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第3版。

② 谢时耀之孙谢国平2015年8月25日给笔者的信。

③ 施晓宇：《冰心故乡考》，《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④ 张天禄主编：《冰心志》，福州：海风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⑤ 陈恕著：《冰心全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⑥ 陈恕著：《冰心全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⑦ [清]朱景星修、郑祖庚纂：《侯官县乡土志》，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⑧ 冰心：《我的故乡》，卓如编：《冰心全集》（第5册），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第3版。

另外，关于冰心祖父谢銮恩的卒年，几乎所有传记、年谱，包括族谱等都称是1921年。如陈恕《冰心全传》称谢銮恩“1921年逝世。”<sup>①</sup>《谢氏村志家史》记谢銮恩“1921年病故。”这种说法是否也是来源于冰心晚年的回忆？查《冰心全集》，冰心但凡涉及到祖父谢銮恩年龄，包括其卒年的具体时间的记忆都是笼统的，如：当年谢葆璋回乡为谢銮恩庆八十大寿，冰心只是说“在我上中学的未一年(?)”。<sup>②</sup>谢銮恩去世那年，冰心的记忆也是模糊的：“大约是我在大学的时期，福州家里忽然来了一封电报说是祖父逝世了，”“我记得他的终年是八十六岁。”<sup>③</sup>再加上中国传统算岁数是按农历算虚岁，出生即为1岁，每过一次春节增1岁。虚岁只和过春节有关，和过生日无关。所以要想从冰心的相关表述中准确判断谢銮恩的卒年是很困难的。但笔者从谢銮恩老友严复1920年4月19日的日记中找到这样一条相关记述：“谢子修故，87岁。”<sup>④</sup>笔者认为，如没有更为可靠的资料被发现，谢銮恩的卒年应当依据严复的记述更为妥切。

### 小结：

无疑，冰心的宗族观念、家世认同感对她的人生与创作产生了某种潜在的影响，我们不难在她的《小家族制度下的牺牲》《骰子》《惆怅》《关于女人》等作品，尤其是晚年的散文创作中寻到这种影响的痕迹。但一直以来在对冰心的创作与其宗亲、家世关系的研究方面，前人虽然有所涉猎，但未进行过多的深入实质性剖析，这就使对冰心的研究少了一个重要视点。在冰心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今天，如何看待冰心与家世的关系，或许是拓展和深化冰心研究领域、推进其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新的有效途径。

（鲁普文 冰心文学馆学术研究部馆员）

① 陈恕著：《冰心全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② 冰心：《我的大学生涯》，卓如编：《冰心全集》（第6册）。


③ 冰心：《我的大学生涯》，卓如编：《冰心全集》（第6册）。

④ 王杖主编：《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四辑

翻译与传播







## 冰心翻译的世纪回眸

### ——译著的人文关怀及其他

陈 恕

**摘 要：**冰心最早开始翻译是她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1926年撰写硕士论文《李清照词的翻译和编辑》，她的第一本译著是纪伯伦的《先知》(The Prophet, 1923)，接着，她又翻译了纪伯伦的另一部诗集是《沙与沫》(Sand and Foam, 1926)；她还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献歌》(Jitanjali: Song of Offerings, 1912)和《园丁集》(The Gardener, 1913)；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马亨德拉诗抄》，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的诗集《燃灯者》(The Lamplighter, 1977)，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署名尼姆·威尔士(Nym Wales)的诗《古老的北京》(Old Peking)等欧美、亚非国家的作品。综观冰心的翻译作品，无论从题材和体裁，其涵盖面都是极其广泛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诗、散文、民间故事、童话、书信、论文、历史等。在翻译时，她首先要考虑的是要忠于原文，其次就是读者，她的译文准确、优美、传神。尤其在遣词造句上都是颇费匠心的，充分体现了她的人文关怀。在冰心一生的文学活动中，特别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她在翻译领域的贡献和巨大影响是决不应该忽视的。

**关键词：**时间跨度；题材和体裁；直译和意译；遣词用句；人文关怀

冰心是我国新文学的第一代开拓者，她既是一位诗人、作家，也是一

位翻译家。说她是一位作家那绝对是家喻户晓，要说她是一位翻译家，也许还鲜为人知，但从她的翻译作品看，她的成就绝不逊色。不论是从翻译时间的跨度和翻译题材的广度、数量之大都是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她和鲁迅、茅盾、巴金一些作家一样，在创作的同时，也对外国文学和历史的译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冰心最早开始翻译还是在她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念研究生的时候。一九二六年她要写硕士论文，她论文的选题是《李清照词的翻译和编辑》，“易安（清照）的词在中国享有盛名，但在欧洲翻译她的词的只有两人。朱迪恩·高迪尔夫人在她的《漱玉词》中用法语翻译了她的几首词，有七首易安的词由乔治·苏里，戴英杭译成法语。这些最终译成法语的词，在很多方面文字隽永和谐。但它们未取得中国人所理解的原著的精确程度。”“在这篇论文里所选用的二十五首词代表了李易安的最佳作品，”这二十五首词的翻译也就成了她最早的中译英习作。冰心说：

“对于外国语文，我只懂得一门英文，还不精通（我在大学时期，曾读过一年法文。在美国留学时期，因要取得硕士学位，要求在本国语文之外，必须会两种外语。我就在暑期补习了两个月的法文，应付过硕士的答辩之后，便又丢开了）。但是每逢我读到优美的、用英文写的诗文时，就口译或笔译出来，让不懂英文的人，如我的母亲，让她分享一些美的享受。这些零星的译稿都一直没有收集起来。一九三〇年母亲逝世后，我病中无聊，把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先知》译了出来……”

冰心从英文译成中文的第一本著作，是纪伯伦的《先知》（The Prophet, 1923），那是一九二七年冬在她的一位朋友那里读到的，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词，给了她深刻的印象。后来她又把它重读了一遍，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于是她就着手翻译了。这本译著从一九三〇年四月十八日起，陆续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上连载，后来因副刊半途停办而中断。该书于一九三一年九月由上海《新月社》出版。她翻译的纪伯伦的另一部诗集是《沙与沫》（Sand and Foam, 1926），部分译文先刊载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号《世界文学》上，一九八二年七月由湖南

人民出版社将她以前译的《先知》和《沙与沫》合集出版。一九五〇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她翻译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献歌》（Jitanjali: Song of Offerings, 1912）和《园丁集》（The Gardener, 1913）。她翻译的其他作品有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马亨德拉诗抄》，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的诗集《燃灯者》（The Lamplighter, 1977），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署名尼姆·威尔士（Nym Wales）的诗《古老的北京》（Old Peking）等欧美、亚非国家的作品。晚年，她和老伴吴文藻教授还参加了《世界史》（World History）与《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的翻译。

综观冰心的翻译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题材和体裁，其涵盖面都是极其广泛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诗、散文、民间故事、童话、书信、论文、历史等。从翻译选材上，她比较喜爱文学哲理性的作品。当她翻译《先知》时，她说，“那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词，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她觉得：“实在有翻译价值”。她最喜欢泰戈尔的散文诗集《吉檀迦利》，她觉得“这本诗和《先知》有异曲同工之妙，充满了诗情画意。不过泰戈尔的情调是更天真，更欢畅，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作品却更严肃，更富于哲理，还带些淡淡的悲凉。”她很早就读到泰戈尔的作品，泰戈尔的《飞鸟集》对她早期的诗歌创作就产生过影响。我们甚至可以从她的《繁星》《春水》诗集中找到泰戈尔的影子。如果说她的前期在翻译的选材上追求艺术审美的意识比较浓，那么她后期的译作就更看重诗作的现实思想意义。冰心在一九五七年翻译《泰戈尔诗选》的“译者附记”中说：

“这本诗集最突出的一点，是编入了许多泰戈尔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诗，这些诗显示了泰戈尔的最伟大最受人民喜爱的一面。……泰戈尔感激奋发，拿起他的“力透纸背”的神笔，写出了热情澎湃的歌颂祖国鼓舞人民的诗篇。……诗人的祖国曾长期地被践踏于英帝国殖民主义者的铁蹄之下，因此他对于被压迫剥削的亚非人民，有着最深厚的同情，对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有着最切齿的痛恨；在这类的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的目光如炬，须眉戟张的义怒，真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泰

戈尔人格中严霜烈日之一面，与《吉檀迦利》集中所表现的霁月光风，是有其不同的情调的。”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 50 岁那年（1911）从 1910 年前后所写几部宗教抒情诗集里面，和 1881 年以来一些脍炙人口的成名之作中选择出来，经过对孟加拉文原文诗删节合并，增添改写，译成英文，是一部诗人自己精选精译最具有代表性的诗歌选集，是他的一部再创作作品。1912 年诗集出版后，立刻得到西方读者的普遍认同和热情赞赏，并于 1913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吉檀迦利》是公认难译的一部作品，自然对译者的要求、条件更为苛刻，它要求译者在学识、才华，甚至在思想（当然不是绝对的一致）等方面几乎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才能胜任。

冰心是一位作家和诗人，泰戈尔是她“仰慕”已久的外国诗人，（特别是冰心自 50 年代初以后，去过印度三次，对于泰戈尔的作品的背景，比较有些认识）自然会在思想信仰、人生探索方面和作者有着一脉相通之处，这就有助于冰心对原作的思想内容、形式、风格进行更为深入理解。

冰心对原著的理解既深刻又全面。她深知无论诗人笔下虔诚呼唤的是我的父、主人、国王或是朋友、诗圣、情人……都是在他心中“燃起理智之火的真理”，都是他对人生理想的探索和追求的象征。诗人笔下歌颂的神不在超脱尘世的虚无缥缈的天庭，是活动在大自然中，在“锄着枯地的农夫”，“敲石的造路工人”，最贫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也就是说在人类活动的现实世界里，这种与人同在的地方，就是诗人所追求的最美好的境界。而且坚信，只要人人在“思想中摒除虚伪”，“驱走一切丑恶”，“在行为上”努力体现神的旨意，保持个人“永远纯洁”，达到“自我完善”，“在劳动里”，“再流汗里”，在服务与牺牲中奉献出爱，就能与神会合，一旦人神合一，人性就会得到升华，国家从而也会得到自由，就能进入他理想中的“人类和谐”的最高境界的自由天国——“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情割成片断；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冰心以她作家的智慧，诗人的灵感和对作者理解和同情，运用她的神笔，把这一百零三首诗歌精确传神地描绘成一幅长长的画卷，展现在读者眼前。

在冰心数量惊人的翻译作品中，印度作家和作品的译文占大量篇幅，在这部诗集中，其中除了大诗人泰戈尔还有诗人安利塔·波利坦等。收入波利坦的诗歌有三首《许愿的夜晚》《我写歌》和《一封信》。

关于翻译，冰心处处表现出对读者负责的严谨作风。在谈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纪伯伦的《先知》和《沙与沫》的翻译时，她说，“这两位诗人的作品，都是他们自己用英文写的，而不是经过别人从孟加拉文和阿拉伯文译成英文的，我译起来在‘信’，字上，就可以自己负责。我从来不敢重译！”（《冰心著译选集》上册“序”，1985年1月19日）在《吉檀迦利》的“译者前记”中，冰心还说，“这本诗集，是从英文的译本转译的，既不能模拟出孟加拉原文的富有音乐性的有韵律的民歌形式，也没有能够传达出英译文的热烈美妙的诗情，在此我要感谢在百忙中替我根据孟加拉原作校阅的石素真女士，没有她，我是没有胆量来翻译的。”

翻译本身包含两方面的因素：译者和读者，而作为译者，她（他）首先要考虑的是要忠于原文，其次就是读者，译出来的东西，是“为供给那些不认得外国文字的人，可以阅看诵读；所以既然翻译出来了，最好能使它通俗。”（《译书之我见》）她指出当时翻译有三种毛病：译不出来的“索性不译”，在译文里“参以己意”，“有时译笔太直”，这些都是她在杂志和报纸上所见到翻译的文字中的缺点，因此她在翻译中就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她认为“译书的宗旨，决不是为自己阅读，也决不是为已经懂得这书的人阅读”。如果译者“处处为阅者着想”，那么就可以免去这些缺点了。这自然对译者的要求是很高的，但冰心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她在《印度童话集》前言中说，“这本民间故事集的原文，是很美丽的，为便于中国儿童的阅读，我把较长的名字，略加删节；有关于印度的典故，也加上简短的注释；在文字方面，根据中国的口语的形式，也略为上下挪动。”她还认为直译和意译都是翻译的必要手段，但是应该有度，她不赞成“译笔太直截”，因为两种语言的语法不同，直译出来，“往往语气颠倒，意思也不明了。”她曾在她的小说《遗书》中借宛因的信谈到：“太直译了，就太生拗；太意

译了，又不能传出原文的神趣。”

冰心翻译散文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只要我们去读一下她译的纪伯伦的《先知》或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就不难看出她中文的功底，由于她学贯中西，特别是掌握了非常丰富的本国文学词汇，所以她的译文准确、优美、传神，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她在遣词造句上都是颇费匠心的。翻译也是创作，好的诗文译得不好，就无法传达出诗的神韵，而经过冰心的神笔，这些作品就会诗意盎然，熠熠生辉。黎巴嫩的布舍里纪伯伦博物馆馆长瓦希布·库鲁兹写道：“在您的手迹前，我看着它，感到岁月的流逝，生命的深邃和您眼中闪烁的中国文化的智慧。我热爱中国古老文化，读它，并尽可能的从中汲取营养。您对纪伯伦《先知》的重视，在他逝世不久的同一年里，将它译出，正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价值和您的深邃的智慧的证明。”

在冰心一生的文学活动中，特别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她在翻译领域的贡献和巨大影响是决不应该忽视的。这不仅使汉语读者可以读到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为汉语语言文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且对跨文化交流具有启示的意义，冰心是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作者，她具有跨文化的视野，她主动地突破文化本位主义的狭隘立场，都不同文化具有同情之理解，从而对真正的文化价值形成的信念。一九九五年黎巴嫩总统埃利亚斯·赫拉维授予她黎巴嫩最高奖赏“雪松骑士勋章”，就是对她在翻译领域成就的最好评价。在这里，我只想引黎巴嫩驻华大使在授勋仪式上的一段话：

“……我们今天颁发勋章，是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加冕。如此象征性地在谢冰心女士身上得到体现的这些品质是由兼收并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和诗一般的温馨融汇在一起的一种民族精神。从年轻时起，她便已敏锐地感受到另一位思想家、伟大的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深奥哲理和诗一般的呼唤。多亏了这位伟大的女士，纪伯伦的声音和他的人文思想才能得以不仅在黎巴嫩和美国而且在中国传播。……正是在她翻译的纪伯伦的《先知》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爱向你们召唤的时候，跟随着他，虽然他的路程艰险而陡峻……当他对你说话的时候，信从他，虽然他的声音也许会把你的梦魂击碎，如同北风吹荒了林园。’”

### 冰心翻译研究近况

自一九五〇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冰心翻译的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至今，深受一代代读者的喜爱，也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对冰心的译作做出了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我们对冰心翻译理念中的人文关怀和艺术观念会有更深入理解、进而更好欣赏这些世界文学的经典。

李勇在他《聊寄心声于异邦》中说：从冰心回国后 15 年的写作活动，所留下的文本进行审美分析，“审美价值最大、艺术性最高的是她的翻译作品，特别是她所翻译的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等诗作。”他认为，“这些译著构成了她的创作活动的一条隐秘的线索。”“冰心是一个直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的作家，她的创作特色就是把就是把自己的感受直接变成文学作品，把自己的全部身心融入作品中。”这种创作活动在 1950 年回国以后受到了影响。一方面，他真诚地改造自己的思想，认真地忏悔，认真地适应新环境；另一方面，他也开始写了应景式的报告一类文章……，在这些报告里，冰心仍然是认真的，投入的。但是这是一位国家干部的认真投入。国家干部的角色干扰着作家的角色，她的生活体验也处在两个角色的巨大张力中。这种矛盾的状态如何化解？翻译成了她平衡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她的文学感受在翻译活动中得以延续，得到滋养而不至于被社会活动摧毁。”“翻译对于冰心的重要意义早在她 30 年代最初从事翻译时就已被她自己意识到。《先知》是冰心去世之后的丧母之痛中译成的。翻译《先知》成为一种抚慰。李勇相信，“冰心翻译泰戈尔无疑成为他心灵的安慰，也使他内心的纯粹的文学感觉得以滋养，那种纯文学生活得以延续。”

从译文的语言而言，“尽管冰心强调这些译著的政治性，但是译文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已经超越了这些政治外衣。”“我们读到与当时的主流语言完全不同的语句。……文学的语汇没有受到任何污染，可以说是语言荆棘中的奇葩。在感情层面，冰心所传达的情感更成为感染读者的内在力量。使人看到人还有更美好更丰富、更优雅、更微妙、更高贵的内心情感。诚然这种情感，在阶级情感统治一切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是陌生的，但这种情感本应是文学所表达的，也是作家们应该追求的生命体念。在哲思的层面上，冰心对自己翻译中的哲理/信仰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她认为

泰戈尔的诗和纪伯伦一样，也有充满了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文词，但他们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泰戈尔的诗显得更天真，更欢畅，更有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冰心就是带着欣赏的态度来感受作品中的精神力量。”<sup>①</sup>

《古老的北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Nym Wales)的诗作，1935年发表于《亚洲》月刊(ASIA)12月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将其势力扩展到中华大地。1933年上半年，日军先后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以及河北省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作为身处北平的外国友人，海伦·斯诺亲历并感受着北平人民的痛苦，她为古老文明古都的命运哀悼、惋惜，她也为唤起中国民众捍卫国土大声疾呼。

冰心先生仅在海伦·斯诺诗作面世三月左右就着手翻译，而且仅用三个月就将它译毕，从冰心对此翻译任务的执着可见她热爱祖国的赤诚情怀与对北京即将沦陷的悲愤心情。

林佩璇在《〈古老的北京〉：意识形态规约下的诗歌创作与翻译改写》<sup>②</sup>中，指出这部冰心早期翻译作品值得关注，因为“原著是时代催生的产物，特殊的时代政治背景赋予作品凝重的主题，同时对翻译语境与技巧也产生一定规约，译文中展现了一派独特的翻译现象。”论文重点解析了冰心翻译改写的手段和技巧：1. 增译，相邻诗行对应性增补，释义性意义增补，2. 以本土化特色词语代替通俗化词语的翻译改写，四字格的使用，运用了归化方法进行翻译，译为“四肢五脏都冷了”，摹状词翻译的本土化倾向。论文对冰心的翻译技巧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和理解。

熊辉在他的论文《个人审美与时代诉求的强力结合：论冰心的文学翻译》<sup>③</sup>中，指出冰心对文学翻译的关注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9月在燕京季刊发表的《译书之我见》可被视为冰心翻译文学的开端。论文以时间为序，分三个阶段对她外国文学翻译进行了梳理。

① 《冰心论集》2012，王炳根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② 林佩璇：《〈古老的北京〉：意识形态规约下的诗歌创作与翻译改写》，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2012）》，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212—218页。

③ 熊辉：《个人审美与时代诉求的强力结合：论冰心的文学翻译》，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2012）》，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227—235页。



20世纪30年代是冰心文学翻译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她主要根据个人的审美偏好来选择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譬如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先知》，冰心之所以会选择《先知》，与她平素主张爱的哲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纪伯伦的作品契合了冰心个人的文学主张。

20世纪50—60年代是冰心文学翻译的高潮，该时期的翻译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情怀。冰心主要翻译了印度作家的诗歌、散文、小说与诗剧等作品。“冰心翻译这些作品与时代对文学主题规定性有关”。如印度安纳德的作品，主要描写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痛苦生活。冰心对泰戈尔的译介达到了她文学翻译成就的顶峰：1955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吉檀迦利》，1961年4月出版了《园丁集》。1962年4月，《世界文学》杂志刊发了冰心翻译泰戈尔的书信集《孟加拉风光》。以上这些译著加上1988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冰心所译泰戈尔回忆录，冰心一共翻译出版了7部泰戈尔的作品。除了以上泰戈尔等印度作家的作品外，冰心还翻译了4位加纳诗人的作品，欧洲作家的作品，亚洲朝鲜诗人的作品，尼泊尔诗人的作品以及阿尔巴尼亚和美国作家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是冰心翻译的最后阶段。该时期的翻译作品主要包括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沙与沫》，马耳他总统的诗集《燃灯者》以及泰戈尔的《回忆录》。

通过以上的梳理，作者指出冰心的译文能够在忠实原文内容的同时保持语言的明白晓畅，不仅彰显她文学审美趣味，而且也让她的译作较好地融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园地。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作者指出：“冰心的文学翻译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选材标准，她早期多根据自我的审美偏好来选择翻译原本，后来则主要受时代的影响。文学翻译也会受到‘赞助人’的影响和制约。”比如对泰戈尔的翻译冰心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冰心有时候为了完成“交给的任务”也会完成“上头”交给的任务翻译一些重要人物的诗集，如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的《马亨德拉诗抄》以及马耳他总统布蒂吉格的散文诗《燃灯者》，这些都是“有关方面”的安排。这就说明她的文学翻译活动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必然会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牵制。但不管是出于怎样的翻译动因，译者的责任感和求真务实的翻译作风才是决定译作质量的关键因素。

通过对冰心的译作选材的鲜明取向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作者指出“冰心的文学翻译在秉承文学性的同时，也给中国读者带来了期待中的精神食粮、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

在第三部分，作者指出：冰心主张翻译应该直接面对原文而不能通过其他译本进行转译。冰心常以国内读者的接受能力为潜在的翻译标准，认为文学翻译应该顾及读者的阅读能力和阅读期待。冰心认为诗歌因为具有很强的音乐性而难以用他国文字加以再现，这也成为她所谓“译诗难”的症结所在。“冰心的翻译见解是当代中国当代翻译思想的重要元素。”

凌孟华以《冰心译〈吉檀迦利〉初刊本与单行本之短长蠡测》<sup>①</sup>为题对冰心在《妇女文化》杂志1946年连载的《吉檀迦利》(1—30)的初刊本与通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单行本之间的500多处修改变化做了详细的对比，认为“虽然单行本总体上优于初刊本，但有些地方初刊本反而是略胜一筹，有的地方则是两个版本各有千秋。”

凌孟华对“一、初刊本较单行本稍瞬风骚”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十处：如1.“这脆弱的杯”与“脆薄的杯儿”(第一首)；2.“我用我歌曲的远伸的翅膀，触到你的脚”与“我用我的歌曲的元神的翅膀，触到了你的双脚”(第二首)等。凌孟华对例中的遣词用句进行分析，阐述了她的观点。她认为细致比较与有效体悟这样的冰心翻译史料，才有可能将冰心研究与冰心翻译思想研究引向深入。

#### 参考资料：

1. 《冰心译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2. 《冰心论集2012》，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版。
3. 《爱心》2014总第五十三期。
4. 《泰戈尔全集》，共24卷，含诗歌、剧本、散文、小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陈恕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冰心女婿，冰心研究会副会长)

<sup>①</sup> 凌孟华：《冰心译〈吉檀迦利〉初刊本与单行本之短长蠡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4期。

## 冰心与《吉檀迦利》中译本

——兼论《吉檀迦利》孟、英、中版本的文化关联及意义

李 娟

**摘要：**在印度诗人泰戈尔《吉檀迦利》的中译中，冰心的译本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冰心对于《吉檀迦利》的翻译带有明显的个人审美旨趣与文化理念，也存在时代背景影响的印记，这在她本人的译序、散文、译文细节中均有明显表现。同时，《吉檀迦利》中译本还存在一些微妙的文化裂隙，原因既来自于泰戈尔自译的英本版，也在于冰心对相关概念理解和翻译上的文化立场。《吉檀迦利》是一个跨越了孟加拉文、英文和中文的翻译文本，在格式韵律、语言特征和文化意义上都存在变化与关联，三重译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为了深入把握冰心《吉檀迦利》中译本的特点和价值，将其置于孟、英、中三环的译介过程中来对照和审视不失为一种可行之道。

**关键词：**冰心；吉檀迦利；译本；文化意义；泰戈尔

印度诗人、戏剧家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对中国现代文坛有着巨大影响，中国对其作品的译介已有百年历程。在泰戈尔《吉檀迦利》的各个中译版本中，冰心的全译本算得上是重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对中国读者了解泰戈尔甚至印度文学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作为中译者的冰心如何翻译和看待《吉檀迦利》，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冰心的文学与文化观念。为了更为深入地理解《吉檀迦利》在中文语境中的文化意义，也有必要在孟、英、中三种语言及文化背景下来审

视这部诗集在译介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及意义。因此，在论及本文重点关注的冰心《吉檀迦利》中译本之前，首先应该从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英译本<sup>①</sup>谈起。

### 一、“诗作在英语中重生”：泰戈尔与《吉檀迦利》

1913年12月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此奖项的东方作家。泰戈尔之所以极快地被西方文坛及广大读者接受，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无疑是《吉檀迦利》(Gitanjali: Song Offerings)的出版，其中收录的103首诗歌分别来自泰戈尔的《献歌集》《歌之花环》《祭品集》《渡口集》《儿童集》等孟加拉文诗集，由他本人从孟加拉文译为英文。

《吉檀迦利》英译本的重要特点在于，它是由泰戈尔自行翻译的作品。就对作品的熟悉程度、理解深度甚至改动的权力而言，作为原作者的泰戈尔无疑具有非常大的自主空间。这种作者与译者的同一关系和由此带来的翻译自主性，是我们理解《吉檀迦利》英译版的形式特征及文化意义不可或缺的基础。泰戈尔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改动之大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因而有学者认为这无异于重新创作，称之为“寓作于译”的翻译<sup>②</sup>或者“第二原著”<sup>③</sup>。对于这一翻译行为，泰戈尔自己也视为另一种原创，他表示：“在翻译中试图再造原文韵律诗所具有的抒情诗调的暗示，这种尝试我认为应该坦率地放弃，而代之以新的表达工具所固有的一些新的特征。英语散文中有一种魔力，它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使我的孟加拉语韵律诗变成了一种也是原创的事物。因此，尽管对于我的工作是否成功我远没有自信，但帮助我的诗作在英语中重生，这不仅使我满意更使我欢喜。”<sup>④</sup>对于西方读者而言，泰戈尔的工作无疑是成功的。1912年，《吉檀迦利》中的六首诗刊载于《诗歌》(Poetry)杂志，不久由叶芝推荐作序的《吉檀

① 下文称为《吉檀迦利》英译本，其中收录的103首诗歌来源不同，并非来自于同一部作品，但为简便起见，称为《吉檀迦利》孟加拉版。

② 陈历明《〈吉檀迦利〉：是翻译还是创作？》《外国语》，2011年4期。

③ 刘建《论〈吉檀迦利〉》，《南亚研究》，1987年3期。

④ Rabindranath Tagore, *My Life in My Words*, the Penguin Group, 2006, p. 169. 转引自曾琼《〈吉檀迦利〉翻译与接受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45页。

迦利》诗集由伦敦印度协会出版，引起强烈关注，一批评论文章纷纷对泰戈尔的诗歌进行评价和称赞。<sup>①</sup> 由此，泰戈尔以东方智者的形象进入到西方文化视野之中。

对于泰戈尔诗作的评价，以诗人叶芝的观点最具代表性。1912年叶芝在《吉檀迦利》的推荐序言中表示，西方人对于印度的民众与文明无疑是极为陌生的，但之所以深受其震撼并不是因为新奇，而是因为在其中能找到自我的形象，如同在梦境中聆听到自己的声音。同时他盛赞泰戈尔的“这部作品体现了极高程度的文化，却如同寻常泥地里长出的绿草和灯心草一样自然而然”。<sup>②</sup> 但很明显，叶芝所强调的自然、所感受到的契合其实杂糅了一种文化上的想象，他心有戚戚的神秘主义色彩也不过是泰戈尔文学的其中一面。其他评论家如庞德等人对于泰戈尔诗歌的理解实际上也难以脱离这种文化上的想象。西方评论者及读者的这种反应部分源于泰戈尔在翻译《吉檀迦利》时所采取的手段及所持的文化立场。

从孟加拉文版到英文版，泰戈尔对《吉檀迦利》收录的作品在语言形式、格律节奏及文化意象等方面都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由韵到散。诗集中的大部分诗歌在格律形式上由孟加拉“歌”味满溢的反复咏叹复沓变成了朴素晓畅的散文式诗作。泰戈尔甚至在部分诗行中取消了标点，造成了孟加拉语版与英文版诗歌在韵律节奏与表现效果的差异。<sup>③</sup> 当然，翻译之后的英文版诗歌也并不是一平到底，仍然具有一定的诗歌韵律和节奏感。其次，《吉檀迦利》英译本中出现了大量的意象置换，印度文化中特有的文化与宗教意象被西方称谓取代。如在第11、33、40、65、66、77、103首中将本应直译为“梵天”（Brahma）的“你”置换为上帝（the God或Lord），在第15、26、55、78、100首中将维纳琴替换为竖琴，在第22、45、84、103首中将极具印度文化特征的月份称谓（法尔袞月、

① 参见皮埃尔·法隆《泰戈尔在西方》，《印度比较文学论文选集》，尹锡南译，巴蜀书社，2012年。另参见曾琼《〈吉檀迦利〉翻译与接受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4—9页。

② Rabindranath Tagore,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 London: Macmillan, 1957.

③ 参见莎米拉《〈吉檀迦利〉孟加拉原版与英译比较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斯拉万月)直接替换为简单的四月、七月等。<sup>①</sup>但另一方面,诗歌中的东方文化与宗教的痕迹也没有完全抹去,仍然保留了“法螺”(the conch-shells, 51首)“毗湿奴”(Vishnu, 53首)、金辇(golden chariot, 50首)、圣河(holy stream, 88首)等词汇。这些细节的存在,对于西方读者理解和想象泰戈尔笔下的东方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塑造和强化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英译后的这批诗歌在文化意象上是杂糅的,同时混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特征。

同时翻译中的变化还表现在称谓语言上,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是泰戈尔使用了显得“古雅”而更有诗意的人称指代词汇。如第11首:

Leave this chanting and singing and telling of beads! Whom dost thou worship in this lonely dark corner of a temple with doors all shut? Open thine eyes and see thy God is not before thee!

把礼赞和数珠撇在一边吧!你在门窗紧闭、幽暗孤寂的殿角里,向谁礼拜呢?睁开眼你看,上帝不在你的面前!(冰心译)<sup>②</sup>

在英译中,泰戈尔没有使用现代英语中常见的 you、your 等形式,而是选择了 thou(你,主格)、thy(你的,所有格)、thee(你,宾格)、thine(你的,所有格,用于 h 或者元音前)等词汇。这些词汇的使用和上文中提及的文体变化、文化意象的置换杂糅都反映出泰戈尔在翻译过程中以西方诗歌之形来容纳和调和作品中的东方情调的倾向。此外,人称指代的翻译也对诗歌多重意义的表达产生了影响。《吉檀迦利》中相当一批诗歌是“我”与“你”的对话沉思,这个“你”在孟加拉文的表述中充满复义性,形成了一种宗教诗、爱情诗、哲理诗的混融现象,而这一点在英文版中被大量稀释了,“我”与“主”“上帝”之间的虔诚庄重冲淡了孟加拉版

<sup>①</sup> 关于《吉檀迦利》英译本中的文化意象置换,参见曾琼《〈吉檀迦利〉翻译与接受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7—38页,以及王坤宇《国内〈吉檀迦利〉的研究困境及新的研究范式的垦殖》,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40页。

<sup>②</sup> 泰戈尔《泰戈尔诗选:〈吉檀迦利〉〈园丁集〉》,冰心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5页。

原文中在人称指代上的多重效果。<sup>①</sup> 还有学者指出,《吉檀迦利》原文中极具格律性的孟加拉语言处处充满了复义性,但在泰戈尔的英译中,诗歌原文中的复义性/悖论性在翻译过程中往往被忽略掉了,或者难以表现出来。<sup>②</sup>

另外,泰戈尔对于某些指代比较直接和明显的地方还进行了泛化处理,淡化了其中的民族情绪。如《吉檀迦利》的第35首原本是孟加拉文《祭品集》第72首,在翻译中泰戈尔将原来直接称呼的“印度”换为了“我的国家”(my country),原本是祈求天神让印度觉醒,改动之后“这种模糊化的处理使诗跳出国家的阈界,具有了世界共性”。<sup>③</sup> 而对于其他那些充斥着更明显、更强烈的民族情绪的诗歌,泰戈尔干脆将其排除在英译本之外。

总体而言,经过泰戈尔的编译与大量删改,《吉檀迦利》英译本无论是在诗歌形式上、在宗教情感上、在文化意象上都变得更加接近西方的审美趣味,体现出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印西文化的理解与表现。诗歌原本极难翻译,即便是翻译自己的诗歌,对作者而言仍是极大的考验,而且泰戈尔的英文水平明显不如母语孟加拉语那么娴熟自如,在翻译中将孟加拉文中微妙隐晦的意思作单一化处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翻译中的选择与调整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其文化态度。<sup>④</sup>

对于《吉檀迦利》英译本,泰戈尔认为“我的诗作在英语中重生,这不仅使我满意更使我欢喜”。这个带来“重生”的翻译过程,实际上也是泰戈尔把握自己的本民族文化并将其并在西方文化面前展示出来的过程。从文化层面而言,《吉檀迦利》是一个杂糅的文化文本,它既保留了东方宗教文化中的神秘,又通过翻译使之向西方读者敞开和对话。泰戈尔对本民族文化呈现方式的调整和有意淡化孟加拉文原作中那种本土宗教的色彩表现

① 关于孟加拉文所谓的复义效果,可参见莎米拉《〈吉檀迦利〉孟加拉原版与英译比较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21—23页,以及曾琼《〈吉檀迦利〉翻译与接受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8—44页。

② Sukriti Ghosal, "The Language of Gitanjali: the Paradoxical Matrix." *The Criter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in English*, June 2012, Vol. 3 Issue 2.

③ 泰戈尔《吉檀迦利》,白开元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5页。

④ 对于《吉檀迦利》翻译中的改动,有部分学者认为诗集的英译本损害了原文即孟加拉版的艺术魅力,从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批评其中的文化立场,参见Mahasweta Sengupta等人的论文。本文更倾向于将这种翻译上的调整改动视为以文化交流为目的的自觉行为,不强调其中的“被殖民”心态。

出的“普世性”情怀，以及在文化上相互调和的立场，这正是《吉檀迦利》英文版得以“重生”的重要因素。季羨林先生指出：“既然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其间的关系，也就是宇宙万有的关系，就只能是和諧与协调。和諧与协调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sup>①</sup>应该说泰戈尔本人的思想与文化立场并非没有矛盾，并非全然的和谐，在他身上也汇聚着民族意识与普世观念、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间的冲突，但就《吉檀迦利》这部作品而言，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在文化上追求和谐与协调的尝试。《吉檀迦利》英文版在西方成功获得大量读者，这种调和效用起到了重要作用。<sup>②</sup>

## 二、冰心《吉檀迦利》中译本的文化意义

冰心是以女作家的身份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她的早期小说关注社会问题，曾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诗歌大多写人世宇宙之爱。茅盾在她的作品中看到了“‘五四’时期许多具有正义感然而孱弱的好好人儿他们的共通经验，而冰心女士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同时认为冰心“爱的哲学”虽然社会批判力度不够，却是“最最属于她自己”的。<sup>③</sup>冰心作品中显露出来的敦厚仁爱气质，在“闺秀派”作家中也堪称最为明显。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个人文化与价值取向，这些决定了冰心在创作上的整体风格，甚至对她的翻译活动也有明显影响。如果将某些“翻译任务”排除在外的话，如冰心所言：“至于我自喜爱，而又极愿意和读者共同享受的，而翻译出来的书，只有两本，那就是《先知》和《吉檀迦利》！”<sup>④</sup>《先知》《吉檀迦利》这样的作品，在审美倾向和文化情感上与她最为契合，翻译这些文本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或许也更能体现译者冰心在文化上的特性。

近现代以来，在中外文化交汇和重新反思文学与文化传统的背景下，

① 季羨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2期。

② 泰戈尔在《吉檀迦利》英译本中体现的这种“调和”尝试更多是在文化层面上的，而到他生命的后期，他在《文明的危机》等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更多是政治层面上的立场，本文暂不论及。

③ 茅盾《冰心论》，《茅盾全集》（第二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④ 冰心《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七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591页。



翻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话语体系是一种翻译体、翻译文学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话语体系。“由于它与其先辈的巨大差异和与西方文学的天然区别，它既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对话，同时也可以与西方的现代性进行对话，因而这实际上也消解了单一的现代性的神话，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选择的’现代的诞生铺平了道路。”<sup>①</sup>和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一样，冰心的创作与这种作为文化背景的话语体系有着密切关联。冰心的诗歌创作明显受到泰戈尔的影响，这在学界已是公论。早在1920年，冰心就发表了《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表达对这位大诗人的热爱与共鸣。她写道，自己为泰戈尔那种“大调和”的信仰、优美动人的诗篇字句打动，这些与她心中原来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sup>②</sup>在泰戈尔《飞鸟集》等作品影响下，冰心开始写作“小诗”，开始“学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sup>③</sup>，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从时间上来看，冰心不是泰戈尔在中国的最早译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后更名为《文学》《文学周报》）《诗》等刊物就刊载过陈独秀、刘半农、郑振铎、徐培德、周作人等人的泰戈尔诗歌选译，之前《吉檀迦利》也有不同译者的选译版本发表，但冰心是第一个译出《吉檀迦利》全译本的。<sup>④</sup>时至今日，她的这个全译本仍然是影响最大的中译版本。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冰心对《吉檀迦利》的翻译以及评价。

首先，冰心的《吉檀迦利》译本是一个语言优美、感情真挚的文学文本。冰心的语言向来以清新流丽著称，她的这部诗集译文也是如此。文学作品发挥艺术魅力的重要基础是语言，在语言表达能力上冰心得天独厚。对于文学语言，她的观点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主张“白话文文化”和

① 王宁《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中国翻译》，2005年6期。

② 冰心（阙名）：《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1920年9月《燕大季刊》第1卷第3期。

③ 卓如《访老诗人冰心》《诗刊》，1981年1期。

④ 1946年《妇女文化》杂志刊载了冰心翻译的《吉檀迦利》第1至30首译文，这批译文与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译文有比较大的修改痕迹。详见凌孟华《冰心译〈吉檀迦利〉的初刊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4期。及凌孟华《冰心译〈吉檀迦利〉（1—30）汇校》，《华中学术》，第十一辑。

“中文西文化”，其目的是“要使新诗语言吸收文言的典雅和西方语言的细致缜密，这种主张代表了现代诗人对新诗语言的主流取向。”<sup>①</sup>无论是在写作还是译文中，冰心对于这两种“化”的奥妙可谓得心应手，形成了她独有的语言风格，而表现在《吉檀迦利》的译文中，便是在句式上的灵动洒脱，节奏上的收放自如和词汇上的典雅清丽。冰心以一支妙笔，将她所感所思的泰戈尔诗歌转化为了中文。对于冰心《吉檀迦利》译文在语言上的特点，目前学界多有研究，此处不再赘述。总之，在语言层面上，冰心的译文体现了一种兼收并蓄的融合倾向。

需要强调的是，冰心在语言上的观念和实践也是一种文化态度的体现。她在语言上采取的是开放融合的态度，在古与今、中与外之间寻求“化用”，追求的是“能无形中融会古文和西文，拿来应用于新文学，必能为今日中国的文学界，放一异彩”。<sup>②</sup>在文化上冰心同样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实践者。除中国传统文化之外，基督教对她影响至深。冰心就读的学校，从贝满女中到协和女子大学、燕京大学以及美国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都与基督教有着深刻的渊源。这些经历影响着冰心，渗透到了她在文学表达的习惯与方式中。她有一系列发表在《生命》上的诗歌直接脱胎于《圣经》，其中一首写道：

上帝啊！你的爱随处接着我，  
你的手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的心思，小鸟般乘风高举，  
乘风高举，终离不了你无穷的慈爱，阿门。<sup>③</sup>

细读之下，诗行中表露出的虔诚真挚与从《圣经》中直接取材的内容无不显示出她在文化观念与文学写作中与基督教的深刻渊源。

① 熊辉《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人民出版社，2010年，242页。

② 冰心《遗书》，《冰心全集》（第一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431—432页。

③ 冰心《圣诗》，《冰心全集》（第一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163页。

这种对基督教的体悟表现在《吉檀迦利》的翻译中，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她对于 the God 的理解和翻译。在第 11、33、40、65、66、77、103 首中都出现了 God 一词，冰心译本分别译为“上帝”（11 首）、“你的上帝”（33 首）、“我的主”（40 首）、“我的上帝”（65 首、66 首、77 首、103 首），而根据精通孟加拉文的白开元的译本，可以看到在相对应的孟加拉文诗歌中这些地方实际上指的都是梵天，而不是西方文化中的上帝。因此白开元译本将其翻译为“天帝”，以突出印度宗教文化的特质并区别于西方人的认知指代。<sup>①</sup> 冰心译《吉檀迦利》根据的是英译，就翻译本身不能说是错误的，the God 在英文中一般原本就指基督教的上帝。泰戈尔将“梵天”改为 the God，西方读者自然会心，在浸淫在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环境中多年的冰心这里，the God 自然也与她在文化上的预期和本能相契合了。从更为宏观的层面而言，冰心对于 the God 这种几乎出于文化本能的翻译，背后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影响的历史文化背景。泰戈尔在“梵天”与“上帝”之间的选择调整代表了他对西方读者有意识的倾就，冰心对于“上帝”的翻译也很难与她自己的宗教体悟截然分开。所处的文化环境与个人经历对译者存在明显的影响，同时会无形中内化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文化心理模式，左右着译者在翻译时的语言选择。这一点，在冰心翻译 the God 一词时有明显体现。

泰戈尔的英译在文化意象上的改动还有一处是 harp。金琴/琴（golden harp）是《吉檀迦利》英译本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意象，在诗集中频频出现。<sup>②</sup> 而这一意象在中译本里是如何呈现的呢？第 15 首：“当金琴（the golden harp）在晨光中调好的时候，宠赐我吧，命令我来到你的面前”；第 26 首：“他在静夜中来到；手里拿着琴（his harp），我的梦魂和他的音乐起了共鸣”；第 55 首：“在你心的深处难道没有快乐吗？你的每一个足音，不

① 白开元的版本因为译者精通孟加拉语，熟悉印度文化，因此在不少细节上都更贴近孟加拉的语言和文化。例如，《吉檀迦利》第 53 首中的 Beautiful is thy wristlet 冰心译为“你的手镯真是美丽”，白开元译为“你美丽的臂钏，镶嵌着明星，镶嵌着色彩斑斓、五光十色的珠宝”结合文化习俗来看，“手镯”的译法显然没有“臂钏”确切。

② 本文关于英译本中“琴”意象的论述参考了曾琼《〈吉檀迦利〉翻译与接受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37—38 页，但有进一步阐发和补充。

会使道路的琴弦 (the harp of the road) 迸出痛苦的柔音吗?”第 78 首:“他们金琴的弦子 (the golden string of their harp) 猛然折断了, 他们的歌声停止了”; 第 100 首“我要拿起我的生命的弦琴 (the harp of my life), 进入无底深渊旁边, 那座涌出无调的乐音的广厅。/我要调拨我的琴弦, 和永恒的乐音合拍, 当它呜咽出最后的声音时, 就把我静默的琴儿 (my silent harp) 放在静默的脚边。”就字面意思而言, harp 一般指竖琴, 在西方古典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泰戈尔在翻译中将孟加拉版中的维纳琴替换为竖琴属于文化意象的置换。冰心的译文涉及 harp 时基本上都是译为“琴”而非“竖琴”, 这一方面可以视为冰心在译文语言上追求简洁流丽甚至略带古雅的风格。例如,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冰心译文对字词的“洁”化处理, 以简代繁, “落红”“柔音”“慈霖”等译法都是如此。但本文认为此处的翻译除了有“点繁”的效果, 更兼具一种文化上的弥合作用。“竖琴”与“维纳琴”在诗集中的并存, 势必造成文化上的不协调, 因此冰心以简单的译法替代了明确具体的指代, 在中译词汇上显得更简洁优美, 也避免了文化意象上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 对于泰戈尔译文中某些文化意象, 如 Vina, 冰心采取的是仍然直译, 如第 88 首“破庙里的神呵! 七弦琴 (Vina) 的断弦不再弹唱赞美你的诗歌。晚钟也不再宣告礼拜你的时间。你周围的空气是寂静的。”<sup>①</sup> 因此, 在《吉檀迦利》中译里,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与“破庙里的神”并存, 也可以看到“(竖)琴”与“维纳琴/七弦琴”共鸣, 这一现象是泰戈尔在英译过程中造成的。诗集由原作者自己在东西两种文化之间进行调整并翻译, 但又没有完全地“归化”入这一方或那一方文化语境之中去, 由此造成了文化上的裂隙。

冰心所依据的是《吉檀迦利》英译本。她在译序中已经指出“这本诗集, 是从英文的译本转译的, 既不能摹拟出孟加拉原文的富有音乐性的, 有韵律的民歌形式, 也没有能够传达出英译文的热烈美妙的诗情。”<sup>②</sup> 实际上, 孟、英两个版本除了诗歌形式与诗情特征的差异, 还存在泰戈尔在文化态度和文化立场上的不同, 由于冰心不会孟加拉文, 所以似乎也无从细

① 冰心译《泰戈尔诗选:〈吉檀迦利〉〈园丁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 45页。

② 冰心《冰心文集》(第五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年, 244页。

细对照比较。在翻译过程中，她得见的《吉檀迦利》是一个带有文化融合理念但同时也存在文化裂隙的文本，虽然可以发挥译者主体性，她却无法像泰戈尔那样对自己的作品大肆改动，自由腾挪。不过，这个在文化上具有混融性的英译本却也与冰心双向化用的语言观、既“是耶、是佛、是印”又“非耶、非佛、非印”<sup>①</sup>的宗教观念有着微妙的契合关系。冰心被批评家们认为“保守中庸”的文化观念、试图融合中西的语言尝试、在翻译之前就已形成的融合混杂的宗教理念，似乎都成为她翻译《吉檀迦利》最为合适的基础。

所以，在第二个层面上，如果说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英译是一个体现文化交流同时也存在文化裂隙的文化文本，那么冰心的译本也同样如此。在这个中译本中，清新流丽的语言中隐含着现代文学语言的嬗变痕迹，也蕴含着文化上的交融与杂糅，以及翻译也难以弥合的某种微妙的文化裂隙，并共同印证着翻译作为文化交流形式所具有的张力和复杂性。

在第三个层面上，我们还可以将《吉檀迦利》视为与冰心本人的思想动态、文化心态相互映照的历史文本。冰心对于《吉檀迦利》的评价和介绍，集中在她的译序和几篇散文中。

冰心写于1946年的《一篇祈祷》中曾提到过自己翻译《吉檀迦利》时的心情。她写道：

这是印度最伟大的诗人，最虔诚的爱国者，为他黑暗，愚昧，狭仄，分裂的国家，一篇最恳挚最哀切的祈祷，看那末句“我的父，让我的国家醒起来吧。”真是千言并在一句，声泪俱下！

好久没有动笔了，说是生活不安定也好，但最不安定的，还是这颗茫茫无着的心。八年抗战之中。生活是不安定的，但似乎还有一种希望，一种努力，一种忍受，一种为着不安定而生的自喜和自慰。胜利以后，相反的，这种希望是消灭了，努力是无用了，忍受也没有了力气，自喜和自慰的心情，也受了大大的打击。许久许久，拿不起笔来。有时在友人敦促之

<sup>①</sup> 梁锡华《冰心的宗教信仰》，林德冠、章武、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07—109页。

下，勉强翻译些富于哲学意味，宗教色彩的诗文，例如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想以哲学冷静的言语，来镇压自己不安定的心。忽然在重庆的一个雨夜，夜深人静，在雨声中读到这一节，——《吉檀迦利》第三十五首——，我的心和我的执笔的手都忽然颤动起来。抬头呆望隔江晶冷的繁灯，望了半天，忆起古人有“感怀不寐，慷慨抑郁。起诵楞严，求寂终乱！”之句，我的眼泪忍不住落下来了，“我的父，让我的国家醒起来吧！”<sup>①</sup>

《吉檀迦利》中大多是宗教哲理的沉思，如第35首这样发出民族主义呼喊的诗作并不多，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最让译者冰心触动的却偏偏是这首。前文已经提到过，这首诗中的“我的国家”原本是“印度”，在英译中泰戈尔作了淡化处理。或许也正因如此，更加能触动冰心对于“我的国家”（中国）的忧患与热爱。这篇佚文中提及的细节，可以视为在《吉檀迦利》翻译过程中冰心与泰戈尔与诗歌的心理互动的一个侧面。

《吉檀迦利》的译文先是在杂志上分几期连载，后来出版了单行本。冰心对这部诗集的中译写过两版译序，分别写于1955年和1981年。在1955年版的《〈吉檀迦利〉译者前记》中，冰心写道，“他排除了他周围的纷乱窒塞的，多少含有殖民地奴化的，从英国传来的西方文化，而深入研究印度自己的悠久的优秀的文化。他进到乡村，从农夫，村妇，瓦匠，石工那里，听取神话，歌谣和民间故事，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最素朴最美丽的散文和诗歌”。“从这一百零三首诗中，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出这位伟大的印度诗人是怎样的热爱自己的有着悠久优秀文化的国家，热爱这国家里爱和平爱民主的劳动人民，热爱这国家的雄伟美丽的山川。”<sup>②</sup>细读之下，我们会发现冰心在《一篇祈祷》中所说的《吉檀迦利》的“哲学意味”和“宗教色彩”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淡化了，那个在《吉檀迦利》诗行中反复出现的“上帝”和“主”，即英译本中最主要的倾诉与沉思对象被“人民”所取代：“我更深深的觉得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印度人民的生活时他创作的源泉。他如鱼得水地生活在热爱韵律和诗歌的人民中间，他用人民自

<sup>①</sup> 刘涛《冰心四十年代散文诗文辑说》，《新文学史料》，2012年4期。

<sup>②</sup> 冰心《冰心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243页。

己生动朴素的语言，精炼成最清新最流丽的诗歌，来唱出印度广大人民的悲哀与快乐，失意与希望，怀疑与信仰。”<sup>①</sup>与其说这是对《吉檀迦利》诗歌的介绍，不如说是对泰戈尔民族思想的素描，与其说这是对《吉檀迦利》英译本的译介，不如说是对诗歌孟加拉版独特性的回归与概括。如果说《吉檀迦利》的两版译文中都存在文化裂隙，那么在《吉檀迦利》的诗情哲理和译者冰心对于它的概括评价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裂隙。翻译从来就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文化行为，在对《吉檀迦利》的评价与认识中隐现着译入语文化对于翻译对象在审美立场甚至意识形态的“规范”。在诗歌译文中，作为译者她无法将诗歌中的宗教与哲思特征抹去，因此尽量准确而诗意地传达着英译本中泰戈尔所要表达的“那一个印度”，而在最能体现译者主观立场的译序中，她可以更为直接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显露出对翻译对象、对自己的文化观念甚至政治理念的反思。从时间上来看，泰戈尔生命后期对于英国殖民主义的态度越来越坚决，不复《吉檀迦利》那样如冰心所言“霁月光风”<sup>②</sup>，加之在四五十年代中国的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来评价泰戈尔译于1912年的这部诗集，自然会受到影响。冰心在译序中对于《吉檀迦利》及泰戈尔的描述，带有较为明显的“文化塑造”倾向，强调诗歌及诗人的人民性，体现出译者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于译本的理解和评价。

从早期借助于郑振铎等人的译作开始接触泰戈尔的诗歌，到在泰戈尔的影响下开始小诗的创作，再到后来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翻译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等作品，泰戈尔及其诗歌可谓与冰心的写作翻译生涯密切相伴。在这一过程中，泰戈尔形象在冰心的笔下也发生着变化，从早期与泰戈尔那种“无私的怜悯、温和的宽容、纯洁的爱——一个智、信、业互不分离的完美无缺的整体”<sup>③</sup>的共鸣与呼应，到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对于“宗教”色彩的剥离和对“人民性”的强调，再到后来20世纪80年代的译

① 泰戈尔《吉檀迦利》，谢冰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1—2页。另见《冰心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243—244页。

② 冰心《冰心译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282—283页。

③ 泰戈尔《三境》，《泰戈尔全集》（第二十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351页。

序中对于“诗情和哲理”<sup>①</sup>的重新归复，我们看到的是作为读者和译者的冰心在思想动态和文化心态上的变化过程。

当然，虽然冰心对泰戈尔及其作品在体认上存在一些变化，但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为译者，她与泰戈尔作品中最本质、最相契合的部分并没有改变，包含着对于普世性的真善美观念的传达。在论及冰心的审美理念及人格模式时，有学者指出：“这种德性人格和理性人格在冰心身上是完美统一而不可分离的，就其内涵构成而言，这种人格模式是以爱为基础石，而各种观念、情感和意识则保持其平衡与和谐的一种状态：情与理、美与善、个性与社会伦理要求、情感与社会道德原则、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等构成一个平衡和谐的人格世界；就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关联而言，这种人格模式的更为深层的呈现便是在时代精神的现代之表与文化心理的传统之根间的微妙关联、交错中寻求而保持一种均衡、和谐的状态。”<sup>②</sup>在冰心翻译和评价《吉檀迦利》的历史线索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内在的模式。

茅盾在《冰心论》中指出，冰心在创作上是“最属于她自己”的，而在她的译作中，《吉檀迦利》《先知》的译本也是“最属于她自己”的，与她在内心深处存在深刻的共鸣与契合。这本诗集隐隐呈现着一个时代在语言的古今中外调和，在文化上的调和，也见证了冰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心态。在很多研究《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的成果中，大部分将重点放在了冰心“如何译”的问题上，论证冰心的翻译水平与技巧之高妙，而本文试图进一步探索的则是冰心“这样译”与“这样评价”背后的文化心理与动因，从她的翻译行为与对于自己译介对象的评价介绍中去探究作为翻译行为主体的她。最终目的在于说明，冰心对于《吉檀迦利》的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意义转达，更是一种包含了复杂文化意义的行为。

### 三、《吉檀迦利》翻译中的三连环转化及文化意义

《吉檀迦利》既是一个在不同语言文字中呈现的文学文本，也是一个被翻译与复写的文化文本。从孟加拉版到英文版，再到冰心的中译本，三种

<sup>①</sup> 冰心《冰心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645—646页。

<sup>②</sup> 戚真赫《论冰心的良意识识与人格模式》《福建论坛》，2000年5期。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转译过程包含着创作者与译介者中对自我文化及相异文化的认知,对自我文化的呈现和对相异文化的把握,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关联,并由此折射出不同的文化意义。

在翻译行为中,源语文化、作者、作品、译者、译本、读者、译入语文化是与之关联密切的不同要素。目前的译介学研究越来越关注翻译行为在文化空间中所具有的能动性,关注译者的主体性,即关注“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同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混合体”<sup>①</sup>的译者。在译介《吉檀迦利》的过程中,两位译者泰戈尔与冰心在各自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之下通过翻译活动呈现出来的,除了在个人译者身上表现出来的才情诗意、理解运用母语及外语的能力,更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经验、社会历史背景和特定的文化立场。

《吉檀迦利》所收录作品的孟加拉文版原文是极具本土特质的,那是融合了孟加拉语言与音乐节奏的诗歌,是纯粹自然的民族文学。在这些诗歌中,泰戈尔以一种文化上的本能吸收着《奥义书》《梨俱吠陀》等印度宗教与文化经典的养分,将其融汇于母语写作之中。而英译本则不同,翻译过程更体现出东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泰戈尔从小就开始以母语写作诗歌和戏剧,又曾在伦敦游学,通晓英文,其文化视野不仅限于印度或者东方。《吉檀迦利》英译本的出版与成功,是一位有着国际视野的东方诗人自觉的文化交流行为,也是西方文化圈“发现”东方诗歌魅力的结果,虽然这些东方诗歌已经夹杂着西方的文化因子:其中既有充满异域情调的文化细节,同时也有文化上的调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诗人对梵天的倾诉在西方读者眼里自动投射为对上帝的祷告。这其中的变化反映出一种在文化观念上的趋近与融合,而非势不两立的东西对决,具有文化交流的特殊意义。显然,这部诗集并不能反映出泰戈尔文学创作的全貌以及他在思想观念上的混杂性,也就是说,《吉檀迦利》蕴含的宗教、哲理、思辨特质并不能完全替代他在其他诗作、小说、散文中表现出的浓重的民族情绪。从这一角度而言,西方读者接受更多的是那个作为“神秘主义诗人”的泰戈尔,而不是一个更为多元的泰戈尔形象——《吉檀迦利》英译本功亦在此,过

<sup>①</sup> 段峰《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76页。

亦在此，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西方呈现出东方文化与文学图景之一角，但以文化调和为目的的改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原作中最为纯粹的文化之魂。再看冰心。自汉译佛典开始，翻译文献与翻译文学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尤其是近代以来，翻译文学更是成为中国本土文学重要的营养来源。冰心自己的创作历程也是在近现代翻译文学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很难想象没有阅读大量的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译介作品，冰心的创作道路的走向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说《吉檀迦利》英译本是泰戈尔与西方文化对话的产物，那么中译本《吉檀迦利》也是冰心与她心目中的泰戈尔对话的结晶。早期冰心以她清丽的小诗来呼应着泰戈尔文字中“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后来她对泰戈尔的译介更是直接以译者的身份对《吉檀迦利》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直接作用。在译文中冰心以清丽优美的语言和在文化观念上的契合态度“塑造”了《吉檀迦利》和它的作者泰戈尔，同时，她翻译和评价泰戈尔的过程，还勾勒出了一条历史性的线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历史语境下的泰戈尔形象；另一方面，因为译文与作者本人极高的契合度，也可以说这部诗集的中译同样在塑造着冰心自己的文学形象，呈现出译者与源文本、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首先在印度出版，随后在英国出版，很快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注意随之陆续出现选译，再到冰心的第一个全译本，后来又不断有不同版本问世。《吉檀迦利》中的103首诗歌，在历经了不同语言文化与不同译者的斟酌摩挲之后，折射出一道道特殊的光晕。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历史与文化》导言中所言“翻译已成为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中重要的塑造力量”<sup>①</sup>，意在强调翻译活动在文化交流与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如果将翻译视为一个场域，这些翻译文本在呈现源语国文化特征的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受到译者主体性的操控而发生变形，语言意义转化背后存在着的文化的理解、塑造、冲突、交杂与融合并非无迹可寻。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能体现出的语言与语言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作为译者的作者与作为作者的译者之间复杂而多义性的关联。《吉檀迦利》

---

<sup>①</sup> Susan Bassnett,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Printer, 1990, p. 12.

在孟、英、中三种语言及文化语境中的翻译，正是这样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例子。

《吉檀迦利》第7首有云，“只让我的生命简单正直像一枝苇笛，让你来吹出音乐。”<sup>①</sup>在三种语言与文化背景下，不同版本的《吉檀迦利》在语言形式的转化间，在译者各自的审美趣味与文化立场间却奏出了谱曲相同、效果各有千秋的乐音。瓦尔特·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曾指出，“作品由于译文而得以存在。在译文中，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sup>②</sup>在《吉檀迦利》跨越孟、英、中三种语言的翻译轨迹中，我们也看到了这部诗集的生命是如何获得继续更新和完整的展开，在相互映衬间形成一个整体。这对于更深入地把握和理解冰心的《吉檀迦利》译本，理解她在翻译中表现出来的文化观念，或许会有一点助益。

(李娟 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① 泰戈尔，冰心译《泰戈尔诗选：〈吉檀迦利〉〈园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页。

② 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陈永国译，载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5页。

## 泰华“小诗磨坊”对冰心《繁星》 与《春水》诗艺之借鉴

萧 成

现代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曾指出：“五四运动发生的两年间，新文学的园地里，还是一片荒芜，但不久便有了很好的收获。第一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第二是冰心女士的小诗。……中国新诗界，最早有天分的诗人，冰心不能不算一个。”<sup>①</sup>所谓“小诗”，主要指“‘五四’以后，一九二一年——一九二四年前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少至一两行，多至四五行的这样一种短小的诗体等。”<sup>②</sup>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海内外影响最大的中国新文学作家，确实是鲁迅和冰心。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南洋诸国的华人族群中，上至耄耋老人，下至稚龄幼童，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冰心，以及她作品中以母爱、自然、童真为思想内核的“爱的哲学”。冰心曾回忆自己写“小诗”的缘起：“我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这集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来。在抄的时候，我挑选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名之为《繁星集》。”<sup>③</sup>冰心于1922年开始在《晨报副

---

① 苏雪林：《冰心女士的小诗》，林德冠、章武、王炳根主编的《冰心论集》（上），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② [泰]林太深：《湘子桥遐思》，《今夜韩江入梦无》，泰国留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③ 冰心：《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诗刊》1959年第4期。

镌》上陆续发表小诗，至1923年先后结集出版了《繁星》和《春水》两部“小诗”集。此后，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冰心创作的这些澄澈温婉、清新雅丽，且充满了哲理箴言的小诗，广泛深远地熏陶和影响了海内外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由于冰心创作的这类小诗，在同时代诗人中可谓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被人们公认为“小诗”的最高成就，故而被现代著名文学家茅盾赞誉为“繁星格”与“春水体”，而“繁星格”和“春水体”亦因之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为流行的一种诗歌体裁。换言之，“繁星格”和“春水体”乃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于中外文化融汇中所产生的诗歌宁馨儿。这类小诗无论是表现刹那间的人生感喟，还是阐发深邃的哲理体悟，抑或是记录吉光片羽的灵感思绪，都寄寓着一种“爱与美”的人生哲学，以及对自然、宇宙的新发现与新思索。尽管由于革命和抗战的影响，五四时期风靡一时的“小诗”创作渐渐式微了，但冰心等前辈开创的“小诗”传统仍以其独特的艺术风姿给世界诗歌领域镀上了一抹绚丽的霓彩，其流脉从未断绝过，而且还绵延至今，成为海内外华文诗歌园地里盛开不枯的奇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1980年代中叶始，冰心等五四前辈开创的“小诗”传统再次引起瞩目，“小诗”创作在台湾诗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受此流播的影响与催发，“小诗”创作的浪潮于2000年前后也波及了东南亚地区的华文诗歌界，扩展成了一个又一个同心圆诗歌圈，其中以泰国华文文学界出现的“小诗磨坊”的作品最为引人注目。

诗是生活的艺术结晶，诗中蕴涵的哲理，更是生活的馈赠。黑格尔曾说：“诗所特有的对象或题材不是太阳、森林、山水风景或是人的外表形状如血液、脉络、筋肉之类，而是精神方面的旨趣”。<sup>①</sup>在全球华语诗坛上，继承和发扬了冰心所开创的“小诗”传统的泰华“小诗磨坊”的诗作确实还没有的国际华文诗歌界占据中心的耀眼位置，而是低调伫立在边缘，默默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但这群诗人们却令人不容忽视。他们的诗歌始终把“为人生”的艺术作为自己创作的起点与归宿，恪守诗歌艺术中情感这一核心，以其独特思维方式在浪漫主义基调上融入了古典韵味与现代手

①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版，第19页。

法，形成了多元而鲜明的风格。具体来说，就是人们可以在其诗中嫌某一部分过于柔弱的同时，也很容易找到刚烈部分；可以指责某种低抑，却也不难看到激扬的因子。痛苦中有甜蜜，相聚中话别离，温馨中藏凄婉，阴郁中带明亮，所有抽象的理念、概念、意念一律在情感的浸淫下化做可感可解的意象，抽象物在感情之流里显出被藏匿的灵性。在他们那些难以言传的感悟之中，随处可以体验什么是心灵变成歌曲的大道，什么是明亮或暗淡的灵魂，甚至还可以听到在字里行间曲曲折折穿行的旷野呼喊，或者感到清澈寂寞中的颤栗，看到在赤道风雨中忧郁思绪的闪烁。泰华“小诗磨坊”诗歌形象的这种浓厚的感性氛围，使人们产生的阅读体验非常独特，如同抚摸着这群诗人情感的“熔点”和“缺口”，必须小心翼翼地不去碰疼他们。而中国古典诗学一向把情感作为审美灵魂：“情者，文之经”。（刘勰语）中国历史上虽有过“诗言志”与“诗言情”之争，但情感在诗歌中的地位则始终恒久不衰。西方浪漫派美学也认为情感乃诗歌生命之中枢，是诗学的出发点与归宿。中西美学所确立的情感方式正是泰华“小诗磨坊”诗歌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而对于冰心开创的“小诗”传统中各种独特诗艺的巧妙借鉴与生动生发，使其呈现出了独特的魅力。据此，我们可以通过这群泰华诗人的作品，从情感的多极调式、领悟式多极思维、情感生发的多极轨迹等诸方面入手，来具体领略和探究一下冰心的《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对于泰华“小诗磨坊”的诗歌创作是如何产生与时俱进影响的。

如果概括性地来考察的话，可以看出，泰华“小诗磨坊”诗歌的抒情对于冰心《繁星》与《春水》的艺术借鉴主要是以情感、情绪为主要因素，诱导并激发其他心理要素积极参与并形成显在与潜在交混的心理流程，具有相当强的感染性、互渗性与复合性，完全按照情感嬗变的自我逻辑对心灵世界中的爱、憎、喜、恶、悲、欢、哀、乐等情感进行“酿造”，并尽可能地将其表达出来。他们在创作中十分注意避免情感贫乏，很少采取简单的直线褒贬式抒情——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因为单一、单向的情感表达方式，将使无限丰富的情感世界归于单调、枯燥和沉闷，甚至变质为虚假，令抒情肌体日渐萎缩，因此他们的抒情一开始就自觉行走在情感的两极和多极之间。“极致化”情感时不是一味“极致化”，常伴有反向的弱化；“强

致化”情感时亦非一味“强致化”，而带有异向发展的强烈对比。即使是在表现情感的微量运行时，也不是一味直线推延而是做一些微妙的调剂，常常是正与反、高与低、轻与重、冷与暖、明与暗，以及强与弱的变换与复合。具体而言，其对冰心《繁星》、《春水》中抒情调式的借鉴方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

(1) 在情感两极之间的巨大震荡里体现多维性。例如冰心的冰心的《繁星二二》：“生离——/是朦胧的月日，/死别——/是憔悴的落花！”而杨玲的《泪水》则有异曲同工的艺术表现手法：“一滴泪水/浓缩人生的涩和咸/映射生命的伤和痛/稀释生活的苦与甜”。冰心的诗以哲理见长，其诗歌意象中闪烁的思想如一道冷冽的阳光直射海底，朗然映照出滚滚红尘波涛中的虹霓，使人浑如身临其境！而杨玲诗的感情落差中包含悲恨与惋惜，沉重与奋起，沉郁与沸腾，绝望与喜悦等多维负载量。这与艺术审美中“参差对照”的观点倒确实是不谋而合的。

(2) 在感情同一级向量推进中体现多变性。例如冰心的《春水八六》：“谈笑着走下层阶，/斜阳里，/偶然后顾红墙，/前瞻黄瓦，/霎时间我了解什么是“旧国”了，/我的心灵就此凄动了！”从中可以看出，“思念”和“惆怅”是该诗的主旋律；莫凡的《秋雨时分》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对冰心这首诗中意境表现艺术的借鉴：“梦里，我的眼角又被泪滴侵蚀/儿时的童谣已断绝在泛黄的日历/时空转换，秋雨切切/卷帘细望，翠竹犯愁/昔日月下尘土深埋的脚印/如今是故乡我 遥远的思念”。诗人自叙此诗的缘起乃是“在异国他乡，故乡一直是游子梦里的牵挂”，从中可以看出，莫凡对冰心意境营造艺术方式的借鉴是相当成功的，并非一味地宣泄或简单模仿，伴随着时有哀怨同情的弱音，也有充满希望和力度的和弦。

(3) 在情感某一单元的推延中，体现细腻的差异性。请看冰心的《春水一六三》：“暮色苍苍——/远村在前，/山门在后。/黄土的小道曲折着，/踉踉的我无心的走着。 宇宙昏昏——/表现在前，/消灭在后。/生命的小道曲折着/踉踉的我不自主的走着。 一般的遥远的前途呵！/抬头见新月，/深深地起了/不可言说的感触！”而莫凡的《日历》和《担子》这两首诗歌则很恰当地借鉴了冰心这首诗作对于“人生沧桑”主题的艺术呈现手法，前者这样感慨：“有许多时候，我徘徊在你身边/真的没有察觉/沿

途的经历，是你布设的风景/醒后方知/原来你一天天的削瘦 是一道道/上得去而下不来的 台阶”；后者这样抒情：“懂事那天，我便开始挑担/担子里的东西不是用的就是吃的/感觉很重，但其实很轻/如今，随着年轮的滚动/我的担子感觉很轻，但其实更重/因我挑的是流年岁月及 迷离未来”。这两首诗的主题都是对“时间之殇”的人生叹息，在诗人所构筑的这个充溢着“感伤”色泽的情感单元里，轻轻叹息里有着默默歌唱，但差别不太大的旋律中却又不乏惆怅、迷离和无奈的细腻变化。显然，泰华“小诗磨坊”诗歌的情感调式大抵遵循着真挚、强烈、深刻、中庸的原则，杜绝了单向叠加的走向，而尝试建立多层次的复合结构。虽然其富于变换的强度有可能被人指责为过于低沉，流露的情感色调亦涂满了感慨的原色，但却非清一色的单调，至少也有两种以上的混合补色，因为他们诗歌情感的密度正是在简约与丰繁，谨严与疏放，淡远与绚丽，浓缩与舒曼中尽可能做出优化的调节。

其次，虽然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是文学飞翔不可或缺的两只翅膀，泰华“小诗磨坊”诗歌的抒情调式对于冰心“繁星格”与“春水体”的艺术构思逻辑方面的借鉴则是有所侧重的。这表现在它具有领悟式的多极情感思维模式。现代心理学认为情感乃是主体对客体所持态度的反映和体验。在抒情诗人的思维结构中，情感占据着主宰或主导地位。它与其他感觉要素，譬如想象要素、智性、悟性要素等共同组成诗人思维的多条路线。它不分高低等级，不分前后阶段，它是浑然一体不断旋进的心理流程，乃各种潜意识、印象、感觉、知觉、记忆、表象、情绪、联想、幻想、思辨、感悟的交混协调。冰心以《繁星》、《春水》构筑起的这个“爱与美的王国”里，不仅有葱郁的树木、清莹的流泉、澄澈的湖水、峻峭的山峰、浩瀚的海洋等自然景观，而且还有美丽的鸣禽、温驯的动物和系列自画像，亦不乏歌咏、思考与发现的心灵与眼睛。而泰华“小诗磨坊”的诗人们则充分借鉴了冰心开创的“小诗”传统所赋予他们的这样的诗歌发现与透视的艺术能力。泰华“小诗磨坊”诗作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如泣如诉、曲致深婉的多极情调，恰恰表明了其心理状态——情感因素相当亢奋，即思维感性在心理能量中占据了较大优势，而其他心理要素，诸如感觉、联想、幻想、潜意识、错觉、理念则相对贫弱些。换句话说，正是情感优势的强大，才



使诗人心灵的各种急流波澜势不可挡地喷薄而出。泰华“小诗磨坊”诗歌对于冰心《繁星》、《春水》中构思艺术借鉴过程中的这种领悟式的思维模式，也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

(1) 情感单元的真与纯是泰华“小诗磨坊”诗歌抒情意象之美的来源，犹如每一部乐曲都是由众多单音节组成的一样。泰华诗人的抒情也是由一个个情感单元（类似电影的“蒙太奇”画面）构成的。在其诗歌创作中，当他们的感情单元与感觉印象交融，即他们的主观情思与外界某一具象猝然撞击遇合，就产生了意象。意象是现代诗歌的基本构件，是情感单元的载体，浓缩的真实情感是意象的主要内核。情感单元的内质，只要具备真与纯，其外化的意象不管是自然的流露，还是精致提纯过的，必然给人以醇厚、透明之感。譬如温晓云的《把幸福酿成酒》：“缘分，牵引了两个人/懂得，眷恋了两颗心/把幸福酿成酒/一路相伴一路芬芳/甜蜜超出了预算/我决定兜售给你”。这样的诗句就出自对普通心灵的真诚关切，有一种推己及人的感恩情怀。而这正是对于冰心关于爱情题材小诗表现艺术手法的某种艺术借鉴。

(2) 感情的精致优雅是泰华“小诗磨坊”诗歌抒情意象具有高雅风韵的根本。感情的精致优雅是指众多情感单元进入“复调结构”之前必须先经过滤除清理，祛除感情表层、浅层那些粗糙、原生的成分，且经过诗意化的浓缩与提炼，这样当它与感觉、错觉、幻觉、印象、想象、智性取得刹那间的交融而产生意象时，就自然而然带有精致高雅的风韵。譬如“人生”与“爱情”的母题在譬如冰心《繁星二〇》：“幸福的花枝，/在命运的神的手里/寻觅着要付与完全的人”。而在温晓云的《岁月》、《婉约》和《心的聆听》中冰心诗中所吟咏的主题则在继承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展现，诗意被精致激情所灌注，变丰满为蓬勃多姿的意象。“在真实的笑着哭/在梦境的哭中笑/打磨 沉淀/剧终的帷幕/亮相 完美”（《岁月》）；的确如诗人所言“幸福总是淹没在流年的急景中，追求和感悟就是幸福的过程”；“你婉约成一朵羞涩/诗意整个花季/不妨让思念轻盈如羽/妖娆终老”（《婉约》），这是一幅“自画像”，也是诗人秉承的生活理念之一；“一如烟花绽放最美烧得最疼/一路点燃希望盛开一地情花/最暖感应来自心的聆听/是咫尺？/是天涯？”这种真挚流露出来的对生命和爱情的时刻感恩之心，以及

“缠绵成花开，暖到落泪”的感情，确实让人感到亲切无比，又隽永难忘。

(3) 泰华“小诗磨坊”诗歌中抒情意象的蕴藉特点，则是因为充分借鉴了冰心“小诗”创作构思中那种情感单元的含蓄、暧昧与含混共同合成的情愫而形成的。它以“欲说还休”的魅力明确规定了意象的蕴藉，给人以意近旨远的感受。苦觉的《箏之想》就是如此：“心泊进了静港/尾随的风雨还在吹打/心飞上了蓝天/线断了风也没了/想，还是不想/佛说不如不想”。诗人将4个情感单元通过对应的4个含蓄意象：风筝、风雨、蓝天、断线，曲折而蕴藉地传达出痴迷、渴望、迷惘、欲罢不能的哀肠，这样的诗作让人不禁联想到冰心《繁星四一》中的语句——“夜已深了/我的心门要开着——/一个浮踪的旅客，/思想的神/在不意中要临到了。”当丰富多彩、高雅精致、含蓄蕴藉的情感通过主体心灵的“化合反应”形成一连串变化系列时，它就构成了情感流程，充满多重波动的情状和动力的性质，具有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不过情感的流程还是有大致规律可寻的。“一波三折”“起伏消涨”“抑扬顿挫”是人们评价情感流程时用的最多的术语，而真正把握其生长、流动、转折、回旋、递进、延宕的多层次变化，并非可望不可及的难事。冰心虽然在《繁星》和《春水》中尽情地歌颂母爱、亲情、童心及大自然，但她也用了一些的篇幅来含蓄地表述她本人和她那一代青年的时代性烦恼和普遍性苦闷。如《繁星三六》即如此表达了诗人的抗争意识：“阳光穿进石隙里，/和极小的刺果说：‘借我的力量伸出头来罢，/解放了你幽囚的自己！’/树干儿穿出来了，/坚固的磐石，/裂成两半了。”诗人用带着些微忧愁的温柔笔调“托物言志”，讲述着心中的感受，同时也在探索着生命的意义、并表达着要认知世界本相的愿望。而泰华“小诗磨坊”诗人的情感流程一般来说，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冰心小诗中“委婉抗争”的艺术表达方式。虽然不超过6行诗句，但却会竭力避免和杜绝一竿子插到底的直线冲刺，有时会采用层层并列递进的方式充分蓄势，以求最后达到顶点，譬如蛋蛋的《乌鸦说》：“我不喜红衣/也不穿黄衣/我有自己平民的原则/他们总骂我言论太多/对！我要用我的黑衣，祭奠/政客们的唯利是图”。面对“善良的泰国人民，被政客们利用，弄得社会、家庭都出现了派别分裂”作者发出了带有谴责色彩的感叹。面对泰国动乱的政治局势，诗人这种鲜明的平民态度，对于政客既不再期待，也不愿意逆来

顺受，更没有既往不咎的包容，而是以不讨喜的“乌鸦”意象来表明自己鲜明的姿态，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义无反顾地拒绝政客划出的框框道道，呼吁走出一条国家的和平新路。莫凡的《一棵理想的树》如此发问：“在一块自由的土地/长着一棵理想的树/七十几年了，还没有结果/为什么呀 为什么？/因为它开着许许多多/形形色式的花”。显然，诗中对“街头争斗与示威角力的背后”那“不成熟的自由反而是一种伤害”所隐隐透露出的疑惑和质问，不仅在泰国社会中存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度与地区都存在。这种“质疑”或“追问”式的抒情模式之所以引起了读者反响，也许较公允的说法是：他们的创作心态虽然处于封闭状，但其显现出的意义效果不少时候却呈开放状，故仍能得到某种共鸣。所谓的现代社会政治造成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隔膜、伤害、贫困、麻木、泯绝和异化，一旦触及到泰华诗人心灵世界中那些宽容善良、依恋温情，反对暴力的天性时，他们便本能地在诗歌中做出符合他们温柔敦厚性情的接收与反应了。

通过对泰华“小诗磨坊”诗歌抒情方式的粗略考察，很容易发现其对情感表现模式多极化的推崇与偏爱，如同冰心一般，他们几乎也达到梁任公在《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所认定的程度：“情感性质是本能的，但它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它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我们想进入到生命之奥，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进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至门，别无它路。”<sup>①</sup>冰心在《繁星二》：“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此作品中对于“圣洁的童心”的主题的表现，在杨玲的《踩落叶》以及今石的《榴莲》两诗中得到了具象性的表现。前者这样描述：“小哥哥踩着落叶/嘴里唱着欢乐的歌/妹妹说：哥哥轻点/树叶痛了/你听/它们在呻吟”，后者则如此吟咏：“走到树下/一阵阵狂风起/狼牙棒/抡得浑圆/天旋地转/铁蹄踏踏”。这两首诗都带有浓浓的童趣，令人心中油然而生一种默默的温情和喜悦，这是一种对天真、欢乐的美好期待和祝福。再如冰心的《繁星一五六》：“清晓的江头/白雾濛濛，/是江南天气。/雨儿来了——/我只知道有

<sup>①</sup>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收录于《国学大师讲文学》，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13页。

蔚蓝的海，/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这是我父母之乡！”其所呈现出的意境，在岭南人的《鸡尾酒》中也得到了另类形式的艺术借鉴：“勺半杯李白的月光/半杯东坡的大江东去/渗几朵湄南河的浪花/摇呀摇，调成磨坊小诗/那风味/只有舌尖知道”；曾心的《诗的味道》和《烹调冷盘诗》却是这样呈现的：“活蹦活跳的锦鱼/追食着小诗句/饱得连连打嗝/那嗝声里/闻到六行小诗/浓烈的味道”；“一缕白云/一袖清风/一瓢山泉/一声天籁/无米之炊的巧媳妇/烹调成醉煞人间的佳餮”。这三首小诗均涉及诗歌借鉴的审美品味，但却将抽象的文艺美学理念写得妙趣横生，生意盎然，这样的诗作让人不禁联想到冰心《繁星一三四》中的语句：“怎能忘却？/夏之夜，/明月下/幽栏独倚。/粉红的莲花，深绿的荷盖，缟白的衣裳！”这种诗歌灵感和诗思的产生，虽然显得比较平常，但诗人正是借助有形的情感意象这一“中介”去感性地拥抱世界与沟通人生，深信活生生的感性就是一切，以至宁愿听从感情引领而不太信任思想的加减乘除。这固然反映了诗人对把握思想理性的不太热衷，更多地却表露出其对感性的崇拜。不过，泰华“小诗磨坊”的诗人虽不太热衷于理性，但在其诗作里仍让人看到了情感与理性的统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骨子里并没有真正摆脱古典与浪漫诗学的审美规范。换言之，以情感推进为始，哲理升华为终，这一浪漫派模式在其诗歌中有着明显痕迹：当泰华“小诗磨坊”诗歌的情感思维、情感复调日趋成熟时，理性成分遂相对减弱，潜意识、直觉、错觉、联想、幻想、悟性等非理性因素才相对增长；当以情感为优势中心的思维方式被其他因素，如直觉、悟性所渗透，并在其诗中达成另一种更为自由协调的统合运动的思维方式时，就可以判定出他们的抒情是领悟式的而非理智式的。

众所周知，知觉是一种无须感觉综合与理性判断过程的特殊的“认知”，它既保留情感认知的感性特点——以直观方式“直击”对象，同时又具感性功能，即无须借助理性逻辑方式，而以直捷颖悟方式“穿透”把握对象。如冰心的《繁星八五》：“父亲啊，/我愿我的心，/像你的佩刀，/这般的寒生秋水！”就是这样以直截了当地方式“穿透”了意象的寓意，而杨玲的两首“悼亡诗”，虽然没有冰心诗作的简练，似乎也颇懂得借鉴冰心这种“穿透”艺术的。《悼老爹》——“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走了/从那天起/我成了失依的孤儿/等待走完人生的征途/到天堂和您重聚”，诗人即利

用知觉，借助失去父亲的孤儿那种“栖遑”无着的情感穿引，以“等待走完”——“征途”后的“重聚”，来表现生离死别；立刻就抓住自己在喧嚣的红尘紫陌中，无所依靠、渴望逃遁的孤寂心境，可见知觉为其情感复调的旋进、展开提供了最好的导引。至于悟性则是一种既非分析，又非综合，既非片断，又非系统的飞跃式的突发灵感，是某种具有经验性质的心灵体验，是机械理性无法企及的。特别是涉及“爱情”这一诗歌“母题”时，泰华“小诗磨坊”的诗人愈是禁绝机械理性，寻求对爱的直接体验、领悟及参悟，其诗歌对于冰心小诗情思、悟性表达的借鉴方式就愈坚定，杜绝了从概念或理念出发，而是强调从心灵敏感区域某一触点与客观世界某一契机猝然遇合时出发，从活生生的灵魂感动出发，始终听凭情感、情绪之流的领引，而且悟性的介入更使总体情感思维的运行轨道褪尽理性规范的明晰，加重体验的神秘，领悟的朦胧。蛋蛋的《梦的夜》和《初恋》即较好地诠释了这点。前者云：“梦很长故事很长/泪 洗刷忧伤/骤然夜雨/一声轻叹/梦很长夜更长”；后者道：“掠过万水千山/穿过春风秋雨/青丝华发一瞬间/初恋/是一枚如影随形的胎记”。不禁令人联想起冰心在《繁星一〇八》中的诗句“心是冷的，/泪是热的；/心——凝固了世界，/泪——温柔了世界。”确如作者诗外的自我诠释：“初恋是没有理由的理由”，与其“活在别人的夜里”，倒“不如活在自己的梦里”，由此可见这种介入“悟性”的抒情方式在更宽泛意义上说，也是现代诗的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这恰是泰华诗人对于冰心小诗艺术手法借鉴的独到与高明之处。

此外，泰华“小诗磨坊”诗歌抒情模式对于冰心开创的“小诗”传统的艺术借鉴，还闪现于诗人们情感轨迹的多极生发中。艺术家通常被分为开放型和封闭型。前者通常拥有广阔襟怀，开放视野，深入历史的跨度和接触社会人生的巨大切面，每一个触点都可能激发其创作灵感。封闭型艺术家刚好相反，他们以自我心灵历程作为创作中心，一切围绕着自我体验，无论外部的大千世界有多么动人的奇迹，若未触及其敏感区域则无法点燃其灵感，其敏感区域如含羞草紧紧关闭，好比死守一口井，只为那一线汨汨不息的泉眼，他们无意追求天空，或海洋的开阔，只是不断挖掘这泉眼的深幽。诚然，泰华诗人中既有封闭型诗人，又不乏开放型诗人，但其情感思维均能顺随天性生活本能，任它在生活之流中蓬勃也好，萎缩也罢，其抒

情都是客观世界某一“契机”撞击到其心灵敏感地带某一敏感点时才产生的。特别是古往今来的诗歌重要母题之一“乡愁”，在冰心的笔下也是一再被吟咏的，如“松枝上的蜡烛，/依旧照着罢！/反复的调儿，再弹一阙罢！/等候着，/远别的弟弟，/从夜色里要到门前了。”（《繁星四六》）“儿时的朋友：/海波呵，/灿烂的晚霞呵，/悲壮的喇叭呵；/我们如今是疏远了么？”（《繁星四七》）“芦荻，/只伴着这黄波浪么？/趁风儿吹到江南去罢！”（《春水四》）等。当然，与冰心一样，“乡愁”作为一种精致的文化理念，更是在泰华诗人笔下得到了不断的发扬与反复的吟诵。譬如曾心的《家乡的路》：“挂在村屋的月亮/静静地盼着我回家/从胖等到瘦/我的基因与它有约/从青发走到两鬓霜白/家乡的路在脉管中”。苦觉的《中秋节》也写“乡愁”：“影清的晚上/月亮走来/什么也不说/交给我纯银的孤独/鬓边的乡愁长了/酒杯是把轻巧的剪刀”，以及岭南人的《流浪的藤杖》所言及的“乡愁”：“笃、笃，穿过山间小径/回到生它的山林/山上的树不认识它/树上的鸟，噗噗飞走/落下几粒冷冷的鸟声”，等等。另有与“乡愁”相关的主题“文化传统”的承袭也如同在冰心笔下不断吟咏一般，也一再于泰华诗人的笔下屡屡闪现，曾心的《唐人街》可为代表作：“只有一条街/衣食住行/浓缩了龙族的精髓/琳琅满目的中国城/世代不失一个密码/——汉字”。诗句结尾的“密码——汉字”，确实达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尤其是泰华老一辈诗人岭南人的系列小诗借托送友、赠别、遥寄、怀乡、思念来张扬其所理解的“人生”，对此更做了最形象的阐释。寄赠老友的两片流泪的云——寄林太深》深情诉说：“两片流泪的云/因风 出岫/飞过山飞过河飞过海/天涯 相遇/含泪，叙说路上的风雨”，令人联想到冰心《繁星一四九》中的诗句“无月的中秋夜，/是怎样的内人寻味呢！/隔着层云，/隐着清光。”显然，“唐人街”与“中秋夜”都是中国文化独特的意象，意象中潜藏的寓意正可触类旁通；至于怀念母亲的《读母亲》默默陈情：“母亲，是一部无字的书/劫后渡海南来，与我相守/天天读她，却一知半解/走后，一读再读/不著一字的空白处/读到她斑斑的泪痕”。这样的镜像不正是冰心《繁星一五三》中“是怜爱/是温柔，/是忧愁——/这仰天的慈像，/融化了我冻结的心泉”之主题的形象阐释么？祭奠亡友的《寂寞的跫音——悼云鹤》娓娓道来：“没有猫的长巷/岁月苍苍的墙壁间/回荡着你寂寞

的跫音/你，踽踽独行的身影/夕阳里，愈走愈远……”显然，当诗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猝然遇合的一刹那，于是成就了其诗。毕竟在人的四大生存状态体系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泰华诗人大致只专注于人与自身、人与人关系的领域。这不禁让人想到冰心的《春水一〇四》中所闪现的那种“纯净如水晶似的悲哀”：“水面上一个小虫儿飘浮着——/在这小小的生死关头，/我微弱的心，/忽然颤动了！”泰华诗人的诗最初几乎总是如同冰心的小诗一样是针对某一具体对象发声的，但他们也有所突破和创新，在针对性地写给某个人时，却竭力表现由于一代人的共同遭际和特定历史所造成的血泪沧桑的社会心理的普遍性，致使为某个人而写的作品的最终效果却往往可能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一代海外华人的情感投影，这使诗人在抒情时，有时会于情感推进中不断进行转折突变，或者直逼绝境后，再另辟新路，如岭南人自己所言“人在，诗在；诗在，人在”。

虽然泰华“小诗磨坊”的诗人亦曾去过许多山水名胜之地，按理应歌遍山水，可单纯的风景诗却很少；他们也到过不少国家，面对异域风情却保持缄默，他们始终像冰心一样，歌咏的始终是自己的“心井”。譬如冰心的《春水六二》如此表现世事沧桑、人间无常的主题：“我要挽那‘过去’的年光，/但时间的经纬里/已织上了‘现在’的丝了！”泰华诗人蓝焰的两首小诗《渡》和《春》似乎也是这样表情达意的。前者这样道来：“来回于江畔河岸/木橹摇白了鬓发/涉足于山坳村野钵黑黄袍残/是岸非岸/非岸是岸”；后者如此感喟：“花开蝶舞/鸟唱谷鸣/天蓝地绿/水色山迷……醒后/我才发现/世事已枯 诗未老”。泰华诗人借鉴冰心式的高度凝练的语言，将景物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深广的哲理意味概括出来，紧紧抓住自己欣赏山水风光时所产生的一刹那间的微妙感受，把自己的独特领悟永远地“凝固”在诗句中，当然也是对于冰心诗作中那某种“纯净如水晶似的悲哀”补白与生动诠释。当然，忠实固守自我敏感区，所表现的情感并非就肤浅，但与之较少关联的事物，那大千世界种种奥秘的事物就容易被漠视。若我们进一步描画一下泰华“小诗磨坊”诗歌的抒情思维轨迹，就可以看出，其诗歌在诠释他们奋力坚守文学理想与诗歌信念的同时，也折射出了这群诗人孤军奋战在几乎是“华语沙漠”的文化异乡的孤独、寂寞和

无奈，孤傲中往往夹杂着对理想追求的痛苦、执着和忍耐，故而如同冰心《繁星》、《春水》中出现的大量表现孤独、寂寞、惆怅心境的小诗，冰心曾在其小诗中，创作了系列“自我心灵画像”之作：“郁倦的春风/只送些‘不宁’来了！/城墙——/微绿的杨柳——/都隐没在飞扬的尘土里。/这也是人生断片的烦闷呵！”（《春水七二》），“水向东流/月向西落——/诗人，/你的心情/能将她们牵住了么？”（《春水三九》）“人类呵！/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繁星一二》）“高峻的山巅/深阔的海上/是热烈的泪，/可怜微小的人呵！”（《繁星二六》）等；而泰华“小诗磨坊”诗作中亦出现了大量的这类模拟之作：“没有月光的夜/星星很寂寞/他们躲在没有色彩的云背后/我疾声呼喊/星星漠然不出声（杨玲的《夜》）；“树叶都回了娘家/雪花爱上了门口的石狮子/我和孤独/在习惯中抱成一团/相互取暖”（苦觉的《冬季的孤独》）；“孤独总是搭错车/寂寞也总坐过站/青梅枯萎竹马老去/季季痴候季季花凉/秋风和影子是最忠实的陪伴”（温晓云的《无奈》）。显然，围绕着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自身的种种欲求、信念、理想、挣扎、沉沦及追索过程，往往泛涌起一股忧伤、美丽又遗憾的情愫，常常包括信任、和解、尊重、友爱、怜悯、慈悲、忠诚、扶持等因子，它们共同组成了泰华“小诗磨坊”诗歌同声合唱的协奏曲。故就泰华“小诗磨坊”诗歌的情感倾向性而言，不论其诗的调子是低沉还是高昂，我们都已普遍认可了其情感的丰富性和其中的诚挚、纯正、高雅及优美。或者说，“诚挚”乃泰华诗人从冰心的《繁星》和春水中所借鉴和采撷到的基本人格精神和作品底色之一，也是他们最信守和坚持的一个诗歌原则。他们之所以一开始写诗就摒弃虚假和伪善，是因为并非所有的感情都可以成为诗的原动力，诗之情感不仅有真诚与虚伪之分，而且还有高尚与卑下之别。在这方面，泰华诗人所顽固恪守的冰心以“爱的哲学”所开创的这种小诗传统，坚持高尚与纯正，力求诚挚与高雅。正是这种情感品性的要求，使其诗作具有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风采。

当然，透过泰华“小诗磨坊”诗歌多极情感思维的表层，我们还发现他们在借鉴冰心“繁星”格与“春水”体“哲理”和“禅思”充满了其抒情内核。他们善于结合个人对某些意象的精微感受，创造出一种富含哲理的意蕴。众所周知，诗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具有高度集中、浓缩、凝炼的



特点，泰华“小诗磨坊”的诗歌对此十分重视，往往通过捕捉诗人自己对某一意象瞬间的精微感受，概括深广的生活内容，从而揭示出一种哲理意蕴。譬如冰心的《繁星三》：“万顷的颤动——/深黑的岛边，/月儿上来了。/生之源，/死之所！”此诗不仅带着透彻骨髓的寒战，而且还带着冰心遣词造句中所营造出来的那种无限意味，属于克莱夫·贝尔所说的那种“有意味的形式”。而蛋蛋的《距离》：“山与水的距离/用云来丈量/心与心的距离/让时间去丈量/走一步就远了/再走多一步便近了”，辩证地道出了“人与人的距离是一个微妙的空间”这一深具哲理意味的认知。冰心的《繁星二三》：“心灵的灯，/在寂静中光明，/在热闹中熄灭”；而晶莹的《形影对话》也借鉴了同样的表达艺术：“——你为何如此短？/——因你正如日中天/——你为何如此长？/——因你正日薄西山/——你为何要逃离？/——因你正步蹈黑暗”，以及另一首《水·冰》：“水对冰说/你真坚强/冰哭了/于是也化了”。这些诗作显然都借鉴了冰心在《春水四九》——“自然的微笑里/融化了/人类的怨嗔”中的表现手法，所着眼的亦是一切事物的相对性关系，自然蕴涵着无尽的意味，泰华诗人已充分表达了其直观意象，使拟作之诗也获得了它自在的艺术生命，而且唤起的经验也是繁复的，与冰心的小诗意境亦有着相辅相成之美。这些都在不期然间印证了罗丹所强调的“形式可以直呈内容”与黑格尔所说的“形式可以转化为内容”的意思。显然真正的艺术必可达到内容与形式融合无迹、完满自足的境界。这显然很符合中国古典诗学“诗无达诂”的老话和西方接受美学的新论。显然，正是由于生活阅历的丰富，泰华“小诗磨坊”的诗作一般而言，都能尽量把将感性与智性融合在一起。他们能较为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所长，通过对生活的整体把握和别具只眼的观察，从现实的土壤与历史的尘泥中咀嚼出别样的意蕴，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与景象里敏锐而细致地发现其独特的领悟、情趣与哲理。杨玲的《桥》：“桥/每天都在普度众生/度人到世俗/再度人回清静/年复一年/是佛祖的使命吗？”此诗与冰心的《繁星六》：“镜子——/对面照着，/反而觉得不自然，/不如翻转过去好。”杨玲此诗似乎也是在对冰心小诗意象的对立统一表达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借鉴，“桥”的连接往来同冰心笔下的“镜子”正反的意象所影射出的哲理似乎也是一脉相通的。“镜子”和“桥”在日常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但在诗人的笔下却成

了一种别具意味的“意象”，联结了对立统一的正反两极，确实达到了以有形意象寓无限意境的效果，还恰如其分地避免了一般哲理诗那种枯燥说教。再譬冰心的《春水六六》：“清绝——/是静寂还是清明？/只有凝立的城墙，/被雪的杨柳，/冷又何妨？/白茫茫里走入画图里罢！”而和冰心此诗相类似的景致与意境相仿的则有莫凡的《溪声山韵》：“所有的所有都远去了/月下山林空寂/心潮已静，飞鸟不惊/风是什么？雨是什么？/夜吃 震落流星/远处 谁在抚琴？”两诗均令唐代诗人王维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似乎在这里也无声地呈现出来了。而岭南人的《山林禅坐》：“一把油伞，撑起一方清凉/如亭/亭内，有人盘腿/禅坐，似睡似醒/亭外，叶落无声/花开无色”，则似乎与冰心的《春水一五〇》里“岩下/缓缓的河流，/深深的树影——/致电在和/细语着，/许多诗意/笼盖在月明中”所表现的意境殊途同归，而且魏晋“玄言诗”的天籁之思和明心见性的智慧，似乎在这首诗中也影影绰绰地能感觉到。

应该说，大部分泰华“小诗磨坊”的作者本质上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们一向服膺冰心所倡导的“爱的哲学”。他们生活在蕉风椰雨摇曳的热带“佛国”里，有着良好艺术感受和温文尔雅的性格，其经历与教养使他们浪漫而不狂热，从不刻意要成为什么；他们从未想成为专门的诗人，创作只是因为真正热爱掌管诗歌的缪斯，他们写诗出自本能，被称为诗人或许也只是一种机遇。因此无论外界怎样吵嚷，他们总是踏着自己优雅的步伐，带着古典韵味和时代清新，在蔚为大观的华语诗歌的园地里款款漫步。虽然泰华“小诗磨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倾向十分明显，且诸多诗人十分擅长将情感做直接的或夸张或扩展或浓缩或深化的抒发，并且把它推向极点的艺术探索。但值得注意的是，还是有一些诗人，如曾心和莫凡，也开始了借鉴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手法的尝试，进一步突破和发展了冰心在《繁星》和《春水》中的艺术表现模式，在不损害情感的前提下，融入了某些现代主义的成分，使泰华“小诗磨坊”诗歌的抒情模式表现出了某种现代派诗歌的雏形。且看曾心的《三个标点》：“从瑶池取圣水/打个‘?’/从山上瓢泉水/打个‘.’/从心灵舀净水/打个‘!’”的确如同作者所说的那样，“用标点说话，有时比语言更简洁、更明了”，这种夹杂着符号的诗歌手法，正是现代派诗歌常用的伎俩，意义的多重歧义、阅读与思考的留

白，以及不和谐与对称的穿插，都带给人们一种突破古典诗学美学原则的不和谐感受，似乎也有类似的向现代派诗歌过渡的审美迹象显示。对于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的这种借鉴与尝试，亦使泰华“小诗磨坊”诗歌创作中那种“复调”的情感心理模式变得更加开阔：诸如感觉的想象化，情感的错幻式变异，情感的直觉化，情感的智性化，悟化了的情感体验等都得到了呈现。不过，在他们的绝大部分诗作中，“中庸”的哲学观仍然深植于其“诗心”，他们如同冰心一样，在其诗歌创作中从不走极端，也看不到“金刚怒目”的呐喊或吼叫，始终沿着冰心所开创的“清丽、婉约与典雅”风格的道路，轻歌曼唱着人间的喜乐哀愁。虽然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人们难免前瞻后顾无所适从找不到位置，他们这时将传统融入现代，用了一种吻合人们心理的手法来进行创作，这种手法既是人们熟悉的，但又有些陌生、富于刺激的因子在里面，传统而不保守，新潮而不浮狂，就能比较适时、顺势地迎上当代社会的心理节拍。与此同时，泰华诗人对于冰心开创的“小诗”传统所进行的这种突破，在把西方现代派诗歌美学的尝试性引入，亦使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诗歌艺术中某些抒情直露、粗糙的毛病在他们身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克服。在泰华诗歌从古典、浪漫向现代演进的过程中，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美学的一定程度的借鉴与实践，确实适时合度地实现了泰华“小诗磨坊”诗歌的从冰心开创的五四“小诗”传统逐渐向现代“接轨”与“中转”。换言之，正是由于泰华“小诗磨坊”同仁们10余年来坚持不懈的多声部的咏唱，终于令泰华诗歌在当下的出场显得特别耀眼，虽无人为其策划包装，但它仍一出场就在彩丽竞繁的国际华文诗坛的百花园里从容自在地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或者说泰华“小诗磨坊”对冰心开创的“小诗”传统的创新与发展的贡献之一，亦恰恰表现在此吧。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风清且徐徐行。如今，在这个旋转的地球上，全球化的声浪呼啸而来，世界局势越来越复杂，就在这喧哗与骚动的名利场中一波波汹涌覆顶的现实大潮中，文学似乎正变得愈来愈曲高和寡，尤其是诗歌领域，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然而，泰国华文文学界的诗歌爱好者们却依然蹒跚蹀躞、坚韧地攀爬在一条冰心等五四新文化前辈先贤走过的崎岖山路上，或者默默地伫立在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角落，摇曳在众芳群艳之外，以幽幽芬芳飘荡四海，用明净、欢快的诗歌语言抒发着诗人对

文学的热爱之情和对生活的独到认识。他们宛如精神旷野里求索、呼唤、叩问上苍的孤独的文学游魂，我们需要去理解他们和阐释其作品。如同冰心等五四前辈诗人们曾以其诗作为一个时代留下自己的肖像一般，这是一个深藏于他们内心的隐秘渴望，尽管他们未必愿意这样表达，但事实上，无论用何种方式创作，诗人总处在与时代的关系之中——贴近或者疏远这个时代，视阈所及，仍然是混沌之中的光明与黑暗。贴近的景象是在眼前，疏远的光阴则在身后，而无论如何，都必须置身于这个时代与时俱进地对冰心等前辈开创的“小诗”传统进行继承、发展和创新。当这群泰华诗人给自己确立这样的位置时，或许早已意识到了这个时代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只意味着困境，而一个诗人的原动力则是他内心深处生生不息的困惑、叩问和思考。因此，不妨说，泰华“小诗磨坊”出品的诗歌是在当下文学的没落与诗歌的困境的不断打磨、琢磨、碾磨中生长的，这群深受冰心“繁星”格、“春水”体影响的泰华诗人期待能够用不断的思考与创作，在袒露自己的文学理想与继承冰心等前辈所开创的“小诗”传统与“诗歌不值一文”的现实阻碍中，勘探出一条继续前进的小道。的确，在这群追随冰心脚步继续前行的“小诗磨坊”诗人的笔下，无数的生活细节与心灵感悟闪烁出奇特的面目，这个庞大的生活区域交付给了诗人们纤细而又敏感的内心，诗人们又以幻化为诗句的形式，记录下了其所遭遇到的种种人生潜流、回旋、聚散，以及种种暧昧不明的思想波动和精神碎屑。日积月累之下，某些时候，这些大多只以6行形式问世的小诗，可能在历史之中汇成一个醒目的潮汐；另一些时候，诗人们复杂的心灵感悟也不再仅仅是历史边缘的涸流或漩涡，而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承袭的区域，而这个区域的意义只能由这个当下似乎正在式微的诗歌来映现。泰华“小诗磨坊”的这群诗人，宛如一列振翼翱翔的大雁阵，在喧嚣的滚滚红尘中，却努力将他们的剪影和啼鸣留在湛蓝的长空，今后究竟还能有多少令人欣喜的文学收获，我们完全可以对他们有更高的期许，而冰心开创的小诗传统也将持久、永续地存留创新下去，这也是冰心及其诗作研究的当下意义之一吧！

（萧成 福建省社科院研究员）

## 冰心文学作品在泰国的传播

陈婷婷

**摘要：**冰心作为中国现代文坛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不仅在中国国内广泛传播，对国际文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政治和社会的缘故，除了鲁迅作品以外，泰国很少翻译中国现代其他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的作品屈指可数，冰心的作品正属于这少数之列。文本将对冰心文学作品在泰国的传播做一点介绍。

**关键词：**冰心作品；诗琳通公主；泰国传播

泰国 1950 年代以来的政治活动对国内的文学有非常大的影响，这期间大部分的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包括介绍进来的中国文学。新时代和政治社会有关的文学如鲁迅作品在泰国共产党的支持下被翻译成泰语。由于泰国政府的政策干扰，后来鲁迅和一些泰国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就被列为禁书，被说成“是发表有动摇国内团结的趋向、指导读者欣赏共产主义的写作”，因此泰国国内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来就非常少。

目前，由于政治状况没有那么严苛，一些泰译版中国文学相继出版。这些作品具有普遍性、提高人类道德的意义，如余华、莫言、王安忆的作品。冰心的作品也具有同样的特性，在 2015 年 2 月泰国的诗琳通公主了翻译了冰心的两篇短篇小说的，就是《小橘灯》和《明子和咪子》，与两个当代作家的小说共同出版。这本书泰文取名为《รอยยิ้มและน้ำตาของหัวใจ》，中文意思是“心的笑容和眼泪”，书内收有四篇小说，除了冰心作品以外，

是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和殳俏的《双食记》。

诗琳通公主算是杰出的中泰友好使者，被授予过首枚“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奖章。她为促进中泰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推动中泰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诗琳通公主毕业于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向来对文学感兴趣，特别是中国文学。她创作过儿童小说，还选择一些对儿童有教育作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来翻译，比如王安忆的《小鲍庄》、池莉的《她的城》、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而她最新出版的翻译作品就是冰心的《小橘灯》和《明子和咪子》。

2013年诗琳通公主专程来到中国武汉。期间，接受了国际在线报道网记者关于中国文学梦的专访，她说她那时“尝试着翻译些以前的作品，比如老一辈作家冰心的小说。冰心生于1900年10月，跟我的王祖母是同年同月生。虽然素未谋面，但读了祖母同龄的冰心的传记，觉得值得一试。对那些读者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些距今百年的老一辈人的思想和语言。”她选择翻译冰心的《小橘灯》和《明子和咪子》，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让泰国读者从中感受中国人的思想和社会，通过前一辈优秀作家的作品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这两篇小说说到爱的纯洁，两个主人公都是儿童，而他们充满爱的心是每个人都能接触到的，这种表现普遍性的爱在全世界的人心中没有边界。

冰心的作品是超越时空的，虽然目前只有冰心的这两篇小说在泰国正式出版，可这情况也表明冰心的作品在泰国占据着一定地位。加之作品是泰国公主亲自翻译出来的，得以在泰国读者中广泛传播，使他们对冰心有多一点认识，促进将来更深学习冰心的作品，这也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 参考文献


[1] 张斯路. 泰国公主的中国文学梦—诗琳通踏访“她的城” [EB/OL]. [2013-04-12]. <http://gb.cri.cn/27824/2013/04/12/5951s4082409.htm>

[2] 诗琳通 สิรินร. 心的笑容和眼泪 รอยยิ้มและน้ำตาของหัวใจ [M]. 曼谷：泰京南美有限公司，2015

(陈婷婷 云南大学文学院泰国硕士研究生)

第五辑

冰心研究之研究







## 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与精神风骨

——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

李 玲

1992年8月，我还在福建师大读研究生，王炳根先生正在筹建冰心研究会，受他的委托，我和师妹姚向清一起，到北京检索冰心研究资料，并拜访92岁的冰心先生。那是一个夏末的上午，冰心穿着月白色的短袖上衣，坐在书桌后面。她纯净脱俗的气质点染了那间简朴的书房兼卧室，给我留下了一尘不染的印象。用圆珠笔给我们签名留言，她竟没有戴花镜。阳光从落地窗中照进来，洒在她低头写字的身影上，为她的素净镀上了一层光辉。圣洁的氛围让我觉得言语宛若尘埃，是一种惊扰。寒暄、合影后，我们很快就退到客厅，在梁启超手书的集龚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下又拍了几张照片，就恋恋不舍地告辞了。

从文学阅读和实际接触中所产生的感动，引领我长时间地眷注于冰心研究领域。冰心传记，前已有范伯群、曾华鹏合著的《冰心评传》，肖凤的《冰心传》，卓如的《冰心全传》，万平近、汪文顶合著的《冰心评传》和陈恕的《冰心全传》以及王炳根自己写作的多本传记等丰硕成果。<sup>①</sup>再写冰心

<sup>①</sup> 范伯群、曾华鹏：《冰心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版。萧凤：《冰心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版。卓如：《冰心全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万平近、汪文顶：《冰心评传》，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1版。陈恕：《冰心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1版。王炳根：《永远的爱心·冰心》，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初版，2001年再版；王炳根：《冰心新传》，台湾新潮社，1996年版；王炳根：《世纪情缘·冰心吴文藻》，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炳根：《冰心的世纪情缘》，香港花千树，2002年版；王炳根：《冰心：爱是一切》，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传记，如何创新是一大难题。与此相对照，吴文藻传记写作的难题则是可供参考的资料不多。吴文藻是留美博士，是中国社会学燕京学派的创始人，但他更多是作为冰心老伴进入读者的视野中。此前关于吴文藻研究的成果只有数量不算多的一些论文。

今读王炳根的这部 120 万字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则有别样的惊喜。作者既从日记、档案、佚文中发掘出许多前人未曾知晓的史料，丰富了我们对冰心、吴文藻这一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又能站在人的精神独立的角度评价他们不同时期的思想风采，阐发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同情他们遭受的种种磨难，也惋惜他们在某些时候的精神萎顿；还能及时吸收学术研究领域的新成果，拓展该书人物精神追问的深度与广度，并从特定的切入点回应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政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这是一部深入写出传主精神演变复杂历程的力作。

### 一、冰心：玫瑰的花与刺

冰心是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代表载入于文学史的。她早年那“冰心体”的文字展示了青春女性灵魂的优美高洁，让人读来顿感“心下光明澄澈，如登仙界”<sup>①</sup>。郁达夫曾借用雪莱赞美云雀的诗句赞美之：“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sup>②</sup>王炳根的这部《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则写出了这位才女在穿越整个二十世纪的漫漫人生路上多姿的精神风貌。它不仅详细考察了冰心“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及其社会反响，而且高度评价了冰心晚年的创作，尤其是那些“辣”味的小说散文。晚年感应现实，针砭时弊，冰心说：“……我明明知道‘写了也白写’，但我的‘老而不死’的心，却总在大声地斥责我说‘白写也要写’，至于有没有人看那是另一个问题！”<sup>③</sup>这种精神风骨，正如王炳根所言，“在

① 冰心：《笑》，原载 1921 年 1 月《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1 号，见冰心着、卓如编：《冰心全集》第 1 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年第 1 版，第 162 页。

②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原载《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 年初版；见《冰心研究资料》，范伯群编，北京出版社，1984 年第 1 版，第 403 页。

③ 冰心：《开卷有益》，《冰心全集》第 8 卷，1994 年第 1 版，409 页。

为士人请命，为教育呼吁的时候，冰心表现出了惊人的异样，完全不是人们印象中的温文尔雅。她视野开阔、反应敏锐、语言泼辣、文风犀利，简直有些长歌当哭，敢爱敢恨，这让中国的‘老读者’‘大读者’和‘小读者’，见识了一个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老太太的形象”。<sup>①</sup> 正因此，写《随想录》的巴金才会称“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sup>②</sup>

从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这两个相关联的维度重新评价冰心的文化贡献，是这本评传的基本视角。在四十年代冰心与宋美龄的关系方面，该书认为冰心既在抗战文化事业的大旗下对第一夫人尊重、合作又“对政界重要人物保持着警惕与距离”<sup>③</sup>。共和国时期，冰心在国际舞台上成了“新中国女性形象的代言人”，<sup>④</sup> 王炳根认为这是共和国的外交柔性需求与冰心个人成就、威望、素养的遇合。在共和国国内政治生活方面，这部书写出了冰心在特定政治高压形势下既在写作中随顺知识分子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话语，又在文学翻译中曲折舒展着那不能被压抑的博爱情怀，还在1957年那个“乍暖还寒”的早春中发出了批评肃反运动、批评时政的尖锐言论，从而还原出了特定历史时期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复杂性。“文革”后冰心并没有选择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控诉态度，尽管她一家也经历过种种磨难，但她“没有抱怨、没有仇恨、甚至没有愤怒。”该书则从冰心的宗教倾向方面来解释，认为“冰心的内心一直珍藏着贝满中学麦美德教士引导她的诵词。”那就是：“上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接受的。给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赐我智慧，分辨

①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555页。

② 巴金：1994年5月巴金给冰心的题字，见王炳根《永远的爱心·冰心》，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图片页。

③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〇〇～一九五一）》，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687页。

④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35页。

这两者的区别。”<sup>①</sup> 晚年冰心的士人风采，王炳根不仅从创作，还从冰心的民主实践活动方面展开叙述。这成为冰心晚年叙事中最为辉煌的一笔。八十年代末冰心为北京大学学生刊物题词：“希望《新五四》把我们‘一直追求而没有完全得到的民主和科学’的工作担负起来，勇敢向前走！”<sup>②</sup> 这显示了冰心自觉承传“五四”薪火的风姿。吴青在北京市人大与政协的“两会”上主张立法与执法分开，在审议草案时公开投反对票和弃权票。这些先觉的民主行为受到别人的非议，冰心便抄录林则徐的名言鼓励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给作为市人民代表的爱女吴青”。<sup>③</sup> 1988年当选为民进中央名誉主席，冰心对采访记者说：“民主党派要同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时，还要敢于民主监督。民主党派不要光是中共一号召，就举手同意，要认真、负责地对中共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进行批评、监督，真正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sup>④</sup> 该书在展示冰心现代士人风骨、民主意识的时候，也显现出了作者自觉追求民主、自由的价值取向。

《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并不仅仅从介入社会公共生活的维度审视冰心的精神特质，还从私人情感发展的角度多方位地探究了冰心的心灵世界。它不仅告诉我们冰心的童年有过男扮女装的生活经验，还告诉我们冰心的少女时期也经历过同性爱的激情。作者引用赵慧芳的观点，认为《关于女人》“是在以男士的身份重写当年经历过的同性爱情。试图把当年的同性爱在易性表达中写出，以达到既不逾越越矩、亦可告慰师友的效果。”<sup>⑤</sup> 这本传记不仅告诉我们冰心的童年“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sup>⑥</sup>，还首次披露冰心除了三个挚爱的同母弟弟外，另有一个异母弟弟和一个异母妹妹。他们是冰心父亲的姨娘生的，而“冰心由于对母亲的

①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396页。

②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577页。

③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第1版，第581页。

④ 袁建达：《在冰心家做客》，《民进》1988年第12期。

⑤ 赵慧芳：《冰心演讲同性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5期。

⑥ 冰心：《童年杂忆》，原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见冰心着、卓如编：《冰心全集》第7卷，第220页。

挚爱”，对他们仨“鲜有提及”。<sup>①</sup>这就为我们理解冰心的母爱颂歌增加了一个新的写作背景，启发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长篇散文《南归》披肝沥胆地抒发爱母之情和失母之痛，是否与苏雪林的《棘心》一样，也隐含着对母亲人生伤痛的深切领会？是否也暗含着一种同为弱者的女性之间的相互认取？个性气质研究方面，该书也在与吴文藻、凌叔华的比较中，凸显出冰心日常生活中善感、逡急且又通达、干脆的性格特点。这与冰心早期创作中所呈现出的“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sup>②</sup>的矜持气质形成对照、互补，丰富了冰心作为一个立体的人的形象。

## 二、吴文藻：学者的抱负与遭遇

《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是冰心与吴文藻这一对夫妇的合传。吴文藻1929年博士毕业时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回国后，他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不仅培养了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黄迪等优秀弟子，自己的理论著述亦多前沿创见。该书既从社会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角度评价吴文藻“开风气，育人才”<sup>③</sup>的贡献，也从知识分子命运变化和知识分子精神发展的角度探讨吴文藻的个人际遇与心灵世界。

吴文藻学识丰厚，执着于社会学的中国化，却命运多舛，无论在民国还是在共和国时期都难以施展抱负。这根本原因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多种政治意识形态都企图操控甚至消灭社会学这门学科。燕京大学时期，吴文藻托学术环境相对自由之福，已呈学术腾飞的趋向，此后几十年却难展宏图。该书指出主要有两种力量扼制了吴文藻的学术发展。第一种是民族国家话语对社会学的压制。抗战时期吴文藻由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在云南大学主持人类学讲座，指导学生展开边疆民族调查，其理论前提是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构成的。但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强

①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〇〇～一九五一）》，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312页。

② 冰心：《诗的女神》，原载《晨报副刊》1921年12月24日，见冰心著、卓如编：《冰心全集》第1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313页。

③ 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0页。

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与吴文藻的观点不一致。该书经考辨发现是另一个著名知识分子傅斯年直接出面阻挠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民族调查工作。傅斯年、顾颉刚不仅撰文批评吴文藻的多民族主张有分化中华民族的危险，傅斯年还直接给中英庚款董事长朱家骅、总干事杭立武写信，主张取缔吴文藻、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学术活动，说：“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sup>①</sup> 最终吴文藻不得不停止人类学讲座、黯然离开云南大学。该书由此展示了傅斯年这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学术问题上违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一面，也启发我们回到吴文藻、费孝通当时的学术立场来理解问题：增强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力与正视内部各民族差异性之间并不矛盾，并由此提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警惕意识形态话语的霸权性，哪怕它是堂皇的民族国家话语。这部书还强调吴文藻抗战时期难展学术才华，并不仅仅是傅斯年、顾颉刚等个别人作怪，而是当时整个民族国家话语的武断性在起作用。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期间，吴文藻曾到西北考察半年多。这时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已经发表，文中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吴文藻“不想附和，但也不想继续对立，以不提供报告、以沉默的方式，坚守了独立的品格与学术道德的底线。”<sup>②</sup> 这种仅能坚守底线、却不能自由发表中的无奈，又怎不令人叹惋！

该书指出扼制吴文藻学术发展的第二种力量是共和国时期的极“左”政治话语。五十年代，一方面，所有的院校一律取消了社会学，这让吴文藻“原本想通过社会学改良社会的愿望”<sup>③</sup> 完全落空；另一方面，宪法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主张多民族国家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民族关系之上的。这就保证了民族学研究的合法性，又让吴文藻感到欣慰。然而，取消社会学实际上是执政党在控制社会方面清除异己思想的

① 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6页。

②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557—558页。

③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23页。

一个措施，民族学研究又怎么可能存在学术自由的空间呢？冷战形成的政治壁垒很快就让吴文藻陷入资料 and 思想两方面的困境。吴文藻时常为无法看到西方社会学、民族学前沿资料感到焦虑，不禁在日记中感叹：“深觉孤立，缺乏学习业务机会之可怕”。<sup>①</sup> 更严重的干扰则来自于政治大一统话语的思想管控。该书作者沉痛地发现，五十年代阅读苏联的民族学著作，吴文藻还能对将民族学与政治意识混为一体的做法保持警惕；而重读马凌诺斯基等西方社会学家的著作，流行的反资话语则干扰着吴文藻的价值立场，他“一会儿从中找出反动言论，一会儿又是重新进行业务学习”，<sup>②</sup> 陷入思想迷惘中。1957年吴文藻因言获罪，被打成“极右”，而后二十年一直陷于写作“无休无止的政治学习笔记、思想改造感言”中，更不可能进行正常的学术创造。所以，尽管“吴文藻不仅在外交部，而且在中宣部，‘外文功力好’‘博学’是出了名的，遇上重大的理论问题，便来请吴文藻开书目，以便供领导参阅”，<sup>③</sup> 但是，到八十年代写作学术自传时，吴文藻发觉除翻译、编写辞典外，自己在共和国时期真正属于研究性的成果只有两篇论文，远远不及他的前半生。“吴文藻翻箱倒柜，将历年来的学习笔记也都翻出来了。这不翻也罢，当这些辛辛苦苦记下的笔记、剪下的报贴，放到自己的面前时，发现竟是一堆废纸，自己的青春、生命、智慧、才华、苦苦求得的学识，却耗费在这些毫无学术意义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自我批判的漫漫旅途之中，这一大堆的笔记便是残酷的证据。”<sup>④</sup> 吴文藻难过得几天都不开口说话。写到此处，作者的痛惜之情亦流淌在字里行间。

《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还从知识分子内在精神演变的角度深入探究吴文藻在共和国时期的思想变化，发掘知识分子“无罪认罪”的心理机制和制度机制。首先，通过查询历史档案等，该书还原了吴文藻

① 原载吴文藻日记，1956年3月13日，见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58页。

②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59页。

③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213页。

④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497页。

兼具爱国情怀、自由主义思想与民主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吴文藻早年曾参加大江会，提倡国家主义，也曾撰文提倡民主政治。1958年他的右派定罪书中所列的“反党言论”主要有：“钦佩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污蔑‘肃反是不道德的，是侵犯人权、人身自由没有保障’，‘政府存在着权能不平衡的矛盾，权力之大和能力之低都是古所未有的，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不足，没有法制。’‘官僚主义是制度造成的’”；“污蔑斯大林是通过‘杀头’上台的，赫鲁晓夫是通过‘政变’上台的。他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比，认为斯大林是独裁者。”<sup>①</sup> 吴文藻存于档案中的“反动言论”还有：“最反对汇报制度，认为这是一种‘思想警察制度’。认为共产党做事是‘目的神圣不择手段’。”<sup>②</sup> 1977年秋天，政治刚刚解禁，吴文藻就对老朋友韩素音说：“……个人崇拜必须带来对他人的怀疑，当个人崇拜达到顶峰时，有足够的力量摧毁被怀疑者时，内部清洗与内部革命必然发生，知识分子更要遭殃，因为他们有思想，看得清一些、远一些，都在清洗的范围。在中国则叫‘思想改造’。”<sup>③</sup> 该书正是从这些敏锐、犀利的自由言论中凸显出吴文藻的独立思想品格。其次，该书还详细揭示出吴文藻“反右”后是如何在痛苦的思想折磨中一步步被“洗脑”，最终完成思想改造的。“反右”之初吴文藻并不认罪，而是反复辩解、更正。“吴文藻还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为真诚、事实与权益，进行了悲壮的灵魂拼搏、痛苦的思想挣扎。”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实际上，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都是在劫难逃！”<sup>④</sup> 在领导批示、群众斗争、亲朋劝说、革命理论学习这四种合力的狂轰滥炸之下，吴文藻最终动摇了原先的价值立场，接受了极“左”的政治话语，在大庭广众下痛哭流涕、低头认罪，时时提醒自己要“破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抛弃资本主义的全部上层建筑，接受社会主义的

① 原存于吴文藻档案，见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126页。

② 原存于吴文藻档案，见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122页。

③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395页。

④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115页。



全部上层建筑”，并参与批判其他右派分子。1966年，“《舞台姐妹》被批判为一部坏电影，吴文藻被组织进城观看，但直到电影结束，仍然没有看出坏在何处，只得自我批判道：“看不出问题来，足见小资产阶级人情味很配胃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奋斗的道路，是相投的，值得大喝一声一要不得。””<sup>①</sup>再次，该书作者不仅深切同情笔下知识分子在政治严酷年代的遭际，还深入追问这种思想改造后面隐含的政治交易问题，从而显出深刻、敏锐的思辨特色。该书考察了冰心吴文藻夫妇在三年困难时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与全国政协委员所享受的特供、度假、视察、访问等待遇，并通过与其他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的比较，认为冰心吴文藻夫妇分别以时文写作和思想改造为成本分享了“‘紧箍咒’下的‘特权’”<sup>②</sup>。这样的剖析，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吴文藻“文革”结束后虽思想活跃，却因年老体衰，最终未能像他的学生费孝通那样再度焕发学术青春。王炳根深感惋惜之余，也欣慰地指出：“吴文藻的学术传承，不仅在学生中，也在子女中开花结果”。女儿吴青作为他的一名“编外的研究生”，“后来所从事的中国贫困地区的妇女教育、加入国际组织、参加妇女与教育的国际活动，包括创办昌平的‘农家女’培训学校，秉承的便是父亲社会学的理念与遗志。”<sup>③</sup>

## 小结

《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力作。归结起来，它有如下四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提供了丰富扎实的历史资料。

作者王炳根身为冰心研究会会长、冰心文学馆馆长，谙熟冰心、吴文藻研究领域的新旧成果，并注重发掘新史料。该书最令人瞩目的史料发现是吴文藻档案、日记、笔记的整理、研究。吴文藻有每天写日记、写学习

① 吴文藻笔记，1966年4月19日，见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244页。

②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184页。

③ 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一九五一～一九九九）》，台湾独立作家出版，2014年BOD版，第507、509页。

笔记的习惯，几十年不辍。抗战前的日记、笔记，因日本人入侵而遗失；共和国时期的日记、笔记，则有一大摞。这些珍贵的资料，除陈恕的《冰心全传》外未曾披露过。吴文藻的档案资料，则由该书首次披露。冰心史料方面的新发现亦不少。比如，抗战时期冰心写宋美龄的散文发表在日本报纸上，长时间没有被发现，冰心自己亦鲜有提及。王炳根从废品收购者那里得来蛛丝马迹，便委托日本学者去查找，使得这一组佚文通过回译而展示在国内读者的视野中。这既完善了冰心创作的面貌，也丰富了人们对冰心与宋美龄关系的认识。

第二，贡献了前沿性的学术见解。

这部书从文学创作角度评价冰心的作品，从社会学发展的角度评价吴文藻的学术贡献，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角度审视冰心、吴文藻的命运遭际与精神状况。各个视角相交织，形成了立体多维的丰富内涵。可贵的是，这三个角度的书写均能形成敏锐深入的见解、达到学术前沿。

第三，理性审察与激情写作的融合。

作者热爱他的传主，因而每能沉浸到冰心的创作境界中体会其精神风骨，深入到吴文藻的理论思考中发掘其思想精髓，但是热爱的情感并没有遮蔽住作者的理性之光，他对问题往往能多方面进行严谨的剖析，从而得出中正的结论；他还能时时站在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拷问的立场上审视他所尊敬的传主，并由此质问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不合理甚至诡异的现象。深厚的了解之同情与敏锐的思想辨析相交织构成了该书耐人寻味的魅力。

第四、学术评述与艺术想象的统一。

在叙述方式上，该书亦追求严谨的学术评述与生动的文学写作之间的融合。有些生活场景，如冰心创作《繁星》《春水》时期的家居生活场景，冰心赴美船上留学生们初次相见、相互寒暄的场面，吴文藻初进中央民族学院的感受，冰心、吴文藻夫妇在政协文化俱乐部一天活动的情景，作者均以“情景再现”为标识展开艺术想象。严谨的史料考证与理论思辨之间插入这些文学想象的内容，因为有明确的标记，因而只是增加了传记的生动性，并不影响作品历史考证部分和理论阐释部分的可信性。这是作者在人物传记写作方面所做的有益的形式探索。

（李玲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关于《重庆时期冰心的创作与活动研究》的说明

熊飞宇

抗战时期冰心的研究，相对于整个冰心研究来说，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2012年10月，第四届冰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正是以此为契机，我得以步入冰心研究的领域。会议期间，福建师范大学江震龙老师曾建议我从抗战时期的图书、期刊、报纸、档案、文物入手，对这一时期的冰心，展开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后来又得到冰心文学馆的鼎力支持，寄赠了大量资料，于是在两年后，便有了《重庆时期冰心的创作与活动研究》的完稿。2015年8月，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再后来，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的记者李普曼通过出版社对我进行了采访。采访内容主要见于2016年2月22日《藏书报》的阅读专刊。今天，我在这里所谈的，实际上就是这次采访的部分内容，目的在于通过介绍这本书，来谈谈对于冰心研究，尤其是重庆时期冰心研究的一己之得和一己之见。

### 一、关于《重庆时期冰心的创作与活动研究》的特色

本书应该说是冰心的一个断代研究。从时间范围来讲，所谓“重庆时期”，是指冰心寓居重庆的这一阶段，即从1940年11月22日左右，到1946年4月底。就内容来看，则是从冰心此一时期的创作与活动两方面所展开的梳理与研究。

先说创作方面。卓如先生所编的《冰心全集》现已出至三版，不论是一般读者还是专门的研究人员，都受益颇多。但由于编纂时的客观原因，相关部分的文章，或者是因为抄录人员的疏忽，文字与原文不一致的地方，

并不少见，包括一些文章的出处，也不是完全准确，所以有必要进行文本的汇校。本书对《冰心全集》所作的补正，江震龙老师在书评《开拓冰心研究的新天地》（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7期）里已有详细的梳理和罗列。另外，则是冰心有少量篇章，还遗落在《全集》之外，成为佚文，需要在考辨后加以补充。

再说活动方面，重庆时期，冰心曾担任新运妇指会文化事业组组长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此尚无详明的叙述，因此，有必要借助文献的爬梳，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并进而丰富冰心此一时期的行实。

## 二、目前学界对冰心的研究的新认识和新资料

单就这一时期前后而言，冰心与宋美龄的关系，近年来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冰心研究会会长、冰心文学馆原馆长王炳根先生的《谢冰心与宋美龄》和《尘封的美文——冰心的佚文与遗稿》，比较全面地梳理了两人之间的往来。大致而言，因沈兹九的离职，新运妇指会文化事业组组长出缺，宋美龄遂以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参加新运妇指会的工作。其后，便有冰心的三上黄山，并最终促成了她与吴文藻在抗战时期的第三次搬家。冰心夫妇与三个孩子，以及保姆富奶奶，乘坐飞机，直飞重庆。行李与家具，则由一辆大卡车拉走。再后，就是宋美龄作为最主要的提名人，举荐冰心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受到优待后的冰心，究竟有何思何想，长期以来，无从得知。但随着冰心佚文的发现，其心迹也逐渐袒露。

1941年7月1日，文化事业组曾编辑、发行《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扉页刊有冰心的《献辞》，对蒋宋二人首次出现赞誉性的表达。《冰心全集》在录入时，用省略号作了删节处理。全集所删去的，是第二节第5—8行，即“更赖有领袖的英明神勇，/指导长的智慧仁慈，/这伟大的感召，辛勤的领导，/团结了，鼓舞了我们。”“领袖”显然是指蒋介石，“指导长”则是宋美龄。冰心的赞颂，切合了她当时的政治身份（即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中国妇女文化事业委员会秘书，而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指导长、中国妇女文化事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均由宋美龄担

任)。另一方面，冰心的赞颂，想来也有出于人之常情的个人感激。

抗战胜利后，冰心旅日多年。在此期间，对宋美龄多有介绍，主要见诸三文：《我所见到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近况》（附宋美龄函）和《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其中不乏溢美之辞。

也正是因此之故，张耀杰先生在《民国红粉》（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中有一篇文章《冰心：左右逢源的女性智慧》，做过这样的分析：“种种迹象表明，既左右逢源又政治正确的冰心，是一个从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聪明女性。她在与宋美龄、蒋介石夫妇建立亲密关系的同时，还与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等人建立秘密联系。对于前者，冰心晚年采取的是遮蔽隐瞒的态度；对于后者，她所采取的却是引以为傲并且高调宣扬的态度。”（第316—317页）最后认为：“事实证明，在冰心老人的左右逢源与选择记忆的人生传奇中，确实存在着一种隐晦幽暗、深谋远虑的女性智慧和女权考量。”（第321页）

不过，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抗战时期，蒋宋二人曾一度广受赞誉，即便是左翼人士，也有部分作家曾发出高亢嘹亮的歌颂，这些文字，只要翻阅此一时期的报章杂志，并不难看到。冰心的用语，总体而言，还算平允公正，并不夸张与过分。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了政治运动的风雨洗礼，我们看到，冰心在她的文字中，对她与宋美龄的关系，下意识地有所切割和删除，这更多的恐怕还是出于明哲保身。

### 三、冰心重庆时期的创作和活动呈现的状态与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总体而言，冰心在重庆时期的创作与活动，都呈现出一种相对活跃的状态。就创作而言，此一时期，冰心在散文、诗歌、小说等方面，都有不菲的收获，虽然数量并不惊人，但却是冰心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即如叶圣陶所说，由“柔细清丽”转向“苍劲朴茂”，而《关于女人》就是冰心创作转向的表征。冰心在重庆时期，还有一项重要的成就，是她对泰戈尔《吉檀迦利》的翻译。这在以前，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我的同事凌孟华老师对此已有很好的分析与阐发。

就活动而言，冰心此前虽然也参加社会活动，如教学、讲演、考察等，但其名声，更多的还是从客厅与沙龙中扩散开来。重庆时期，冰心至少参

加了新运妇指会和国民参政会，标志着冰心开始从书斋中走出，通过这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平台，发挥其专长与才干，为抗战建国尽心尽力。冰心后来有“社会活动家”这一称号，我想其起点应该始自重庆。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参加诸多的社会活动，冰心对中国文坛的影响才更加直接：一方面，通过蒋夫人文学奖金的征文活动，冰心将自己的写作经验和创作观念，集中概括起来，通过演讲的方式，传达给战时中国的文学界。另一方面，因为加入新运妇指会，才引发了冰心对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战时妇女精神状态持续而广泛的关注，而《关于女人》便是其关注的文学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冰心在重庆时期的创作与活动，随着新的文献，如报刊、回忆录、日记等的发掘与披露，将会呈现出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完整的文学空间与生活世界。

（熊飞宇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 论冰心文学史形象的建构和嬗变<sup>①</sup>

温奉桥 李萌羽

**摘要：**冰心的文学史形象书写已逾 60 年。本文分别选取不同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文学史著作，从文学史体例到叙述语调，系统考察冰心文学史形象的建构和流变，进而阐释冰心文学史形象建构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深层原因。

**关键词：**冰心；文学史；形象；流变

冰心是 20 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冰心女士”是五四文学初期最耀眼的名字。冰心的文学创作始于 1919 年 9 月发表在《晨报》的小说《两个家庭》，初登文坛，即因其杰出的文学才华引起高度关注，并成为 20—30 年代文坛的一个持续热点，据范伯群《冰心研究资料》，仅 1922 年《小说月报》就发表了关于冰心的评论文章 7 篇，据严家炎“1917~1927 年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编目”，1922 年收录了佩衡等人的评论文章 4 篇。特别是阿英的《谢冰心》一文，提出了“冰心体”的概念，影响甚巨。如果从 1919 年 10 月下旬《国民公报》署名“晚霞”的短评算起，冰心研究已近百年。

文学史本质是一种权力话语，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性，恰如伽达默尔

<sup>①</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小说隐喻叙事研究”（项目编号：15BZW035）、“威廉·福克纳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3BWW007）阶段性成果。

所言是一种“合法的偏见”，其研究对象体现着历史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鉴于此，冰心之文学史形象的建构与嬗变就无法不带有时代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印痕，而并非文学的自主性选择。本文主要选取了1950年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文学史著作，从一个特定视角来探析不同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下冰心文学史形象的建构和嬗变。分别是：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唐本文学史虽然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末，但完成于6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及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新世纪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这三部文学史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其中，《中国现代文学史》入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入选“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三部外国学者撰写（主编）的文学史分别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简体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书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孙宜康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客观而言，冰心文学史形象的建构始自茅盾。茅盾发表于1934年8月《文学》第3卷第2期的《冰心论》，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但无疑已经初具文学史的视野和意义。《冰心论》是冰心前期研究最有分量、影响最大的文章，具有独特意义。在这篇文章中，茅盾以其超拔的史家眼光，结合冰心家庭生活、成长历程、思想发展等，第一次较为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冰心的创作及意义，特别是对冰心“爱的哲学”的成因和局限，更是做出了富有见地的评述和阐释。在《冰心论》中，茅盾独具慧眼地指出：“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冰心论》标志着冰心之文学形象合法化建构的开始。

当然，冰心之经典化更重要的标志是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新文学大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作品选集，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



次文学经典化实践，这一点从入选作品及每卷“导言”即可知。《中国新文学大系》对冰心文学形象的经典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茅盾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共收录 29 位作家的 58 篇小说，冰心不但置于首位，而且独占 5 篇，分别是《斯人独憔悴》《超人》《寂寞》《悟》《别后》，且在茅盾亲撰的“导言”中，对冰心的小说创作作了较大篇幅的集中介绍，由此可见茅盾对冰心文学创作的高度重视。茅盾从“关注现实，提出问题”的文学立场出发，第一次阐释了冰心“问题小说”的独特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次赋予“问题小说”某种历史合法性。而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冰心更是获得了郁达夫的空前褒扬，这种褒扬既体现在选录冰心散文的数量（22 篇，与鲁迅持平），更在于郁达夫给予冰心散文创作的高度评价。在这篇“导言”中，郁达夫以特有的充满激情的文字写到：“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初生的欢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是虹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师……，总而言之，把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郁达夫对冰心散文的高度赞誉，在一定意义上开启了后来文学史对冰心散文“偏爱”的先河。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冰心得到了同样的肯定。“诗集”共有 59 位诗人 400 首诗歌入选，其中冰心 18 首，仅次于闻一多地 29 首、徐志摩的 26 首、郭沫若的 25 首、李金发的 19 首，居于第五位。客观而言，无论是《冰心论》还是《中国新文学大系》，所呈现的都并非严格意义上文学史形象，但它们毫无疑问客观上塑造了冰心文学史形象的第一幅面影，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史形象，本质是一种时代形象，是时代精神和文学理念的集中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冰心文学史形象的建构始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 1951 年版），稍后则见于张毕来《新文学史纲》（作家出版社 1955 年版）。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初版于 1970 年代末，但完成于

60年代初，因而保留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时代印记。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张毕来《新文学史纲》始，文学史对冰心的叙述方向开始大幅调整，《新文学史纲》对于冰心的评价充斥着粗暴的政治判语，与文学所涉无多。唐本文学史基本承续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叙述基调，但对冰心的文学史定位，态度更为保留，这种“保留”甚至体现在文学史体例方面，例如，唐本文学史只是笼统地把冰心列为“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没有占据独立章、节，体例位置低于同时代的叶绍钧。唐本文学史一方面认为冰心是“文学研究会中较早开始创作活动的作家之一”，另一方面又从社会、政治的角度，重点评析了冰心“问题小说”特别是其中“软弱人物”的成因：

作者虽然受到“五四”浪潮的影响，有了一些与时代气氛相适应的民主主义思想，但优裕的生活地位、狭窄的生活圈子、跟下层人民隔离等种种条件限制着她，使她并没有真正产生反抗黑暗现实的强烈要求和变革旧制度的革命激情。到“五四”高潮过去以后，思想上的矛盾和苦闷有所发展，基督教教义和泰戈尔哲学便对她有了更深的影晌。

虽然唐本文学史对冰心散文创作从语言和文体层面给以认可：“冰心的散文笔调轻倩灵活，文字清新隽丽，感情细腻澄澈；既发挥了白话散文流利晓畅的特点，又吸收了文言文凝练简洁的长处；它们显露了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也表现了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独有的风格。”但整体而言，唐本文学史平抑的叙述语调难掩对冰心较为保留的文学史态度。唐本文学史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文学史冰心叙述的方向和基调，对后来冰心文学史形象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

美籍华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与唐本文学史同时代的另一部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史著作，也是迄今对中国学者影响最大的海外文学史著作之一，在很多方面具有范式意义。当然，其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夏本文学史同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甚至不乏对左翼作家如对鲁迅、赵树理等的偏见。但夏志清严格从作家创作文本实际和审美经验出发，严格遵循其“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原序）的初

衷，特别是严格着眼于“文学本身的美学质素及修辞精髓”（王德威语），鉴于此，其对冰心的评价，与唐本文学史相比则更为客观、公允。夏志清从中国文学传统的开阔视野，提出冰心的创作代表了中国文学悠久的“感伤传统”，并认为冰心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五四作家中“占一席重要地位”。夏志清从冰心的创作个性出发别具慧眼地指出，冰心是一个以“感性”见长的作家，特别是以儿童、母爱为主题的小说，具有一份“纯真的感性”，冰心小说最出色之处，在于对“寂寞”的书写，如《寂寞》《离家的一年》《别后》等，都极具深度；而对于一般文学史推崇的《超人》，夏志清则认为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滥用感情之作”。

## 二

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文学观念开始逐渐从意识形态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文学史开始了对冰心文学创作及价值的“再认识”过程，开始了对冰心文学史形象的新书写。这集中体现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社会、政治为中心的文学史视野不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则主要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的价值取向，表现在文学史写作中则表现为文学史从逐渐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挣脱出来。单纯从文学史体例而言，《三十年》在延续“鲁郭茅巴老曹”单独成章的文学史体例的同时（其中鲁迅独占两章），增加了赵树理和艾青，修订本又增加了沈从文。《三十年》与唐本文学史相比，体例处理上略有变化，虽然整体上仍把冰心置于“文学研究会”作家群中，但修订本中冰心开始出现于“节”的标题之中：“冰心、朱自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散文”。从体例安排即知，《三十年》更看重的是冰心的散文创作。《三十年》对冰心散文的定位，延续了唐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先例，对冰心散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冰心的散文实比她早年的问题小说和小诗成就更高”，特别是语言、文体“既保留了某些文言文的典雅、凝练。又适当地‘欧化’，使句子更能灵活、婉转、流动，有自然跳荡的韵律感。在开展白话文运动刚刚几年时间，冰心能将文言文、白话文与西文调和得如此完美，难怪能引起普遍的欢迎。冰心对建立与发展现代文学语

言是卓有贡献的，不过她的作品读多了也会感到格调偏旧，因为她究竟是属于以旧文学为根基的早期新文学作家。”《三十年》对冰心小说、诗歌，则持较为保留的态度。例如，《三十年》对冰心诗歌创作只是淡淡的一句：“1923年，同时出版了冰心的《繁星》与《春水》，以及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引起了人们对‘小诗体’的关注与兴趣。”冰心的诗歌位置不但远远低于徐志摩、闻一多，甚至低于同为“小诗”诗人的宗白华。在《三十年》最具特色的“本章年表”中，举列了朱自清的诗歌《毁灭》、陆志苇的诗集《渡河》、邓中夏的诗论《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但没有提及冰心的《繁星》（修订本中作了完善补充）。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冰心在《三十年》中，面影较为单一，乃至模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我感觉到一种叙述的暧昧，一种犹豫不决。我们态度的暧昧，我们立场的暧昧，造成了我们历史叙述的暧昧。”这种“暧昧”同样表现在冰心80年代文学史形象的建构中。《三十年》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对冰心文学史形象的一次“改写”，显然，这是一次有限度的“改写”。

而此时值得关注的是另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是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这部著作虽不是文学史，但其对冰心的评价眼界甚高，高于同时代许多文学史作者。《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出版于80年代中期，几乎与《三十年》同时，可以作为《三十年》的另一参照或补充。

在这部思想史著作中，李泽厚将冰心置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整体视野中，阐释了冰心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李泽厚从思想史角度把冰心看作是五四“开放心灵”的代表性作家：

带着少年时代生意盎然的空灵、美丽，带着那种对前途充满了新鲜话力的憧憬、期待的心情意绪，带着那种对宇宙、人生、生命的自我觉醒式的探索追求。刚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的二十年代的中国，一批批青年从封建母胎里解放或要求解放出来。面对着一个日益工业化的新世界，在一面承袭着古国文化，一面接受着西来思想的敏感的年轻心灵中，发出了对生活、对人生、对自然、对广大世界和无垠宇宙的新的感受、新的发现、新的错愕、感叹、赞美、依恋和悲伤。

李泽厚对冰心创作“母爱”“童心”主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冰心第一次把“母爱”这一人类最普通的情感带进了“本体世界”，其笔下的“母爱”，不再是传统伦理的母爱，“而是新时代新青年对整个宇宙人类多愁善感的母爱”；《繁星》《春水》等“第一次脱去传统框架的心态，用纯然娇弱的赤裸童心，敏感看世界和人生，憧憬着光明、生长、忠诚、和平”。李泽厚将冰心的“小诗”与郭沫若的《女神》相提并论，认为“冰心和沫若是在这‘无涯际的黑暗’尚未真正扑来，但已初初感到的时候，或用‘爱’或用‘力’来要求抵御它们的娇弱柔情和粗犷喊叫。”并认为他们在思想情感方式上，体现了现代人的追求个性解放合资无独立的意识。客观而言，李泽厚所关注的是思想史意义的冰心，但他对冰心创作的论述，无疑构建了一个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冰心形象。

### 三

新世纪以来，在文学史著述方面影响最大的当属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与唐本、钱本文学史相比，严本更侧重从审美本体看取和评价作家作品。虽然在体例方面，无论章、节标题，皆未出现冰心的名字，但很明显，在严本文学史中，冰心的分量有所增加，更符合作家创作实绩。如对于冰心诗歌创作，严本文学史对其论述较为充分，认为冰心的小诗“纯真清新，晶莹剔透……贯穿着‘爱’和‘美’的诗思。”对于冰心的散文创作，严本认为“在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在艺术上，冰心的散文重视结构布局，善于以小见大。其笔调轻倩灵活，文字清新隽丽，感情细腻澄澈，全没有某些作家笔下那种滞重的涩味。”并引用了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的文字来评价冰心散文。

如前所述，与唐本、钱本文学史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作家评价不同，严本文学史更注重对作家作品的审美把握。如对冰心“问题小说”的评价，众所周知，冰心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一般文学史都对此持低调立场，但严本文学史改变了这一文学史传统态度，认为基督教哲学对于冰心五四后期小说如《超人》《悟》等，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是冰心以母爱、童心为支点的“爱的哲学”的思想源之一。同时，严本文学史指出，《超人》《悟》等因“过于依靠推理，反使艺术感染力有所削弱。”

几乎与严本同时，另一部有影响的文学史，是德国学者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与绝大多数文学史不同，顾彬更倾向于从文体的视角看待和评价冰心的文学史意义。顾彬认为，冰心与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一同创立了“现代中国叙事艺术”，特别表现在“语言塑造”方面，她的“清楚晓畅”的语言，体现了真正“现代汉语”的特点；顾彬指出，作为“问题小说”的创立者，冰心赋予了“问题小说”以“理想模型”。与夏志清不同，就冰心的文学创作而言，顾彬更看重其小诗创作，认为冰心是五四时期能够与郭沫若“并肩”的诗人。顾彬提出，冰心是极具现代性的诗人，其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歌形式。冰心创造了五四诗歌一种新形式：“短小的、静谧的、克制的形式”，而其短小的形式也即冰心自己所说的“零碎的思想”，恰是诗歌“现代性”的标志——顾彬认为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残片”即“片断的思想”；同时顾彬认为，冰心从泰戈尔、日本俳句、中国古典绝句中领会到了诗歌创作的“并置”手法，与埃兹拉·庞德具有相似性；其二，是冰心诗歌意象背后的“现代精神”。顾彬分析了冰心诗歌的“繁星”意象，“作为现代精神的重要符号它往往有双重含义，它意味着实现与幻灭、永恒与短瞬、理想主义和哀诉，既是诗人和诗的光辉和恒久，同时又是一种异化了的实存和孤独。在星的形象中，传统的宇宙统一被解消了。它不再涉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事物，也就是不再关系到根本秩序和最终的和谐，而只表示个人的孤独，以及个人对孤独的社会处境的反抗。星变成了现代性的象征，取代了代表传统的月亮形象。星星是一种张力的表达，这种张力存在于尘寰与‘圣人’之间，存在于被社会排斥的现状和诗人的意识之间，顺应时势与特立独行之间，最后也存在于有生与不朽之间。”顾彬高度评价冰心在新诗语言和形式方面的成就。他认为冰心具有“令人惊讶的语言和形式意识”，在语言和新式的创造性方面，冰心“独一无二”、“堪称大师”，超越了她同时代的诗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孙宜康、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描述对象“从上古时代的钟鼎铭文到二十世纪的移民创作”，“横跨三千载”，因而，鉴于时间跨度与“完全针对西方读者”的初衷所决定的特殊体例，给予现代作家的篇幅相当有限，但即使如此，《剑桥中国文学史》仍对冰心的小说创作给予了相当关注、介绍和中肯评价：“冰心身兼

诗人、散文家、短篇小说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等多重角色。”其中最关键的评价是“冰心的作品大多以感性的基调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在英语语境中，“乌托邦”（Utopia）更多指向“理想”和“好的”的含义，而不是“空想”，也即是说，与国内某些文学史评价的方向相反，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看来，冰心五四时期创作的那些以“爱”和“童心”为主题的小说，指向人类的一种美好状态。有趣的是，《剑桥中国文学史》重点分析的是冰心广被忽视的小说《疯人笔记》，认为在《疯人笔记》之“流畅风格和混乱逻辑中”，体现了冰心“逃离了传统性别约束，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想象空间。”显示了作者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评价标准。

由上观之，1950年以来，冰心文学史形象的建构和嬗变，更多体现为意识形态的选择，而不是一种自主的文学建构。一方面，自唐本经钱本到严本文学史，冰心文学史形象的建构越来越趋于理性，越来越回归本体性和审美化。但同时更应看到，整体而言，冰心的文学史形象较为凌乱、单薄，这既与文学史的体例有关——由于在一般文学史中，冰心皆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形象出现，而冰心的创作又跨小说、诗歌、散文三界，不得不在各类文体中叙述，客观上造成了冰心文学史形象的零乱和漂浮。也就是说，冰心的文学史形象至今存在碎片化现象，更难以构成文学史的主流叙述话语，更多时候是作为主流之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而存在。但根本而言，这不是文学史体例或叙述技巧问题，而是对冰心之文学史意义的认知和评价问题。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可明白，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对冰心的热情洋溢、不吝赞词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对冰心的叙述语调大都较为飘忽、游移，在看似客观之中隐藏着一种源于意识形态的谨慎、冷漠乃至有意无意地贬抑。茅盾在《冰心论》中，对冰心创作虽有批评，甚至是很严苛的批评，但其整个语调是热的，与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对冰心的“保留”态度和叙述语调构成了鲜明对比。冰心的文学史形象，整体而言是被“遮蔽”或压抑的形象，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冰心的“爱”与“美”的文学理念与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的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这与冰心之“文学大师”形象不相符合，也与冰心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不相符合。可以预言，随着文学史话语的不断调整，一个更加真实、丰富的冰心将重新回归到文学史叙述之中。

注释:

1. 黄英(阿英):《谢冰心》,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第192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2. 茅盾:《冰心论》,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第222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3.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第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2003年版。

4.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第207、2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53—5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118、1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 旷新年:《犹豫不决的文学史》,《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0. 李泽厚:《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宗白华〈美学散步〉序》第45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1.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20、221、22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2.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第216、24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3.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第25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4.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63、6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75、7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6.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 77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17. 孙宜康、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版序言。《剑桥中国文学史》第 7 页，刘倩 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18. 孙宜康、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第 528、529 页，刘倩 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19.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序》，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 2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温奉桥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萌羽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 当“超人”成为问题

——冰心《超人》的百年研究历程回顾

洪丽霁

**摘要：**1920年代初期问世以来，冰心问题小说的代表作《超人》，一直存在不断的争议，难以被人轻易忽视和淡忘。回顾与审视近百年的相关阅读史和研究历程，不难发现，怎样深入、细致地研究《超人》以及同类题材的创作，如何理解冰心的创作理念与艺术个性，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多年来，众多评论者主要围绕“何为‘超人’？”“‘超人’因何而变？”“如何看待‘超人’之变？”等问题，作过不少思考和探讨，提出了各自褒贬不一、不乏新意的意见和看法。此项批评与研究工作，是富有意义和价值的。人们试图通过多个面向的体悟与解析，走近、理解冰心及其艺术世界，进而探寻和叩问百年中国文学之发展踪迹乃至内在规律，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和态度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关键词：**冰心；《超人》；“超人”问题；批评；研究历程

最初刊载于1921年4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上的短篇小说《超人》，在冰心先生的创作生涯里和新文学的发展史上，都是一篇颇有名气的作品。关于这篇小说，当年一度出现褒贬互见的意见和看法，成为现

代文坛引人关注的现象<sup>①</sup>。数十年之后，有关《超人》的批评和讨论，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差异与分歧。之所以如此，除了不同的人对同一作品的审美及评价会出现差异之外，也说明《超人》的确是一篇富有魅力的小说，引发人们不断地进行阅读和思考。如何深入细致地继续对它作出解读与阐释，至今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

冰心研究已走过近百年的历程<sup>②</sup>，本文将主要聚焦这一历程中有关《超人》的批评意见（尤其是其中关涉“超人”问题的部分），依据时间线索作出某种合乎史实的重温与回顾，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冰心的《超人》和其他同类题材作品及其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 一、何为“超人”？

“超人”不仅是冰心一篇问题小说的题目，该文中主人公何彬在话语里还曾两次提到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让人不禁产生关于“超人”的更多想法或推测。《超人》中的“超人”，究竟应该作何种理解呢？对此，似乎从不缺少进行思考或试图作出回答的人，他们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提出多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

1. 无须深究说。成仿吾系创造社的元老之一，他在写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评冰心女士的〈超人〉》一文中说：“发表的当时，我也觉得这标题新颖得很，便也怀着一肚子好奇心把它翻看了一下。我记得那时候的感想，第一，觉得有点被那个标题骗了似的。第二，我总觉得这里面穿了几个大孔，作者本人似乎始终没有把它看出。”<sup>③</sup>成仿吾作如此犀利尖锐的

<sup>①</sup> 对冰心研究做过仔细梳理的研究者曾经指出：“1921年冰心列名于‘文学研究会’后，更致力于反映从封建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又尚未找到出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的问题小说创作，自然引发出相当多的评论文字。最集中的莫过于对《超人》的批评。”参见徐瑞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上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1页。

<sup>②</sup> 笔者仔细查阅相关文献后发现，始于二十世纪初期延续了近百年的冰心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 1949年之前，评论者从多个角度表达了对冰心及其创作的喜爱、赞赏以及隔膜与误解；2. 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前，社会—政治视角在冰心研究占据绝对优势，肯定之声几乎被质疑、批判、否定的浪潮所淹没；3. 新时期以来，伴随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建设高潮而出现“冰心热”，高涨的解读热情、特别的苛刻评价与冷静的学理分析并存。一般认为，冰心研究与冰心的成就和影响之间存在不相称之憾。

<sup>③</sup> 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53页。

话语表达，与他一贯独树一帜、拒绝人云亦云的批评态度应该不无关系。在他所说的《超人》的阅读感受中，“超人”可谓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以“超人”为小说的题目，确实是个很不错的主意（不仅因自身创意吸引人们转睛，还极易令人生出猜测甚至联想，想要进入作品当中去寻找答案）。在同一篇文章里，成仿吾还说：“这小说为什么要叫做《超人》，虽然冬芬君<sup>①</sup>的附注上说：‘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我却至今还是不懂，但这是作者的自由。作者对于‘超人’这个词，或许有特别的见解，不过我们要知道作者在这篇作品里面，实在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超人，并且她也无须告诉；所以若有人说何彬就是作者意中的超人的表现，说这样才是超人，那样不是超人，那就不仅是武断，而且要被作者暗笑了（题目与本文，本来没有关系，不过许多的人，每每把它们误解了，我才顺便说及）。”<sup>②</sup>

在成仿吾看来，小说的题目“超人”是冰心有意为之的结果，她之所以这样做的主要意图，在于既想借此引起读者的普遍注意，又不愿意告诉大家确切的答案是什么。换言之，成仿吾主要视“超人”为冰心在作品中所卖的一个关子，他认为读者如果能够对冰心的这种意图心领神会的话，或许就再也不会会有刨根问底的必要了。

2. 假超人说。署名佩蘅的论者，在1922年发表的《评冰心女士的三篇小说》中则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超人》中的所包含的思想有三个不可忽略之点：第一，她的超人是假的。请看何彬的话：‘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女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随后又说：“尼采对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从不怀疑的，尼采底哲学是意志之哲学，力之哲学。现在何彬和他相反，不过是一个比虚无主义者更虚无的厌世者罢了；不能

<sup>①</sup> “冬芬”就是沈雁冰，他当时不仅为《超人》审稿，还撰写了最初置于小说末尾的《〈超人〉附注》，该文载于1921年4月《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

<sup>②</sup> 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54页。

实现人生的价值于刹那，徒然前后底虚空，中间底短促，因而怕爱与怜悯之能增加痛苦而至于屏绝两者；这是现在许多意志薄弱的青年的通例，而大多数，都逃入于他们底所谓超人生活。冰心虽然没有明提这个，但我看她在何彬对人生发表了厌弃的意思以后，忽然引到尼采，或者是存着一个深意，微微地讥讽那班自命的假超人吧？这是一个感想。”<sup>①</sup>

在这位评论者的眼中，小说《超人》里的所谓“超人”，实际并非是指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超人”（bermensch）<sup>②</sup>。他认为，“超人”二字只是作者冰心用来指称为感伤情绪所笼罩的悲观厌世者（主要为当时的青年人）的一个称谓、一种假托而已。无独有偶，沈雁冰（茅盾）也表达过类似的意见。这位对尼采做过研究的理论家<sup>③</sup>，在1930年代中期曾撰文指出，冰心“把小说题名为《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实在并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sup>④</sup>在沈雁冰看来，小说中的主人公何彬其实不大适合进行哲学层面的理解，因为他患的是“五四”时期因在现实中受挫而悲观厌世的时代病。

3. 外冷内热者说。作为文学研究会早期会员的潘垂统，极力称赞沈雁冰有关《超人》的主要观点。他在《对于〈超人〉的批评》一文中明确表示，沈雁冰的“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

① 佩衡：《评冰心女士底三篇小说》，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4—5页。

② 超人，是尼采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超人是尼采从‘强力意志’出发提出的概论，他要人不断提高，超越自己，成为超人，只有超人才是上等人，才能让历史增加色彩。他指出：一切生物都创造了高于自己的生物、种类。超人之于人正像人之于猿猴和超人之间的一根线索，一个过渡，超人才是整个人类的最终目的。尼采认为超人与现代人、善良人、基督徒不同，超人具有最旺盛的生命本能，最强大的强力意志，超人富有创造精神，他敢于冒险，勇于牺牲，敢于破坏旧价值，创造新价值，他不会受传统的、不合理的道德支配。尼采提倡超人精神旨在宣扬一种否定基督教旧价值，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参见程志民、江怡主编：《当代西方哲学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③ 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中的尼采研究专家之一，他曾经指出，“敢于说‘慈善’不是好东西，‘怜悯’不是好东西！他认人生是竞争的，是向上的……为欲达到这个‘超人’的目的，就牺牲了现在一切愚的弱的，都不要紧；毁了坏的，做成好的，有什么不上算？这正是尼采的意见。”参见雁冰：《尼采的学说》，郇元宝选编：《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8页。

④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361页。

人’，他是不懂得罢！”等一席话，是“全同我一样感受过人生悲悯而又觉悟了所发的，也是超人的确评。”潘垂统还说：“谈了何彬的信，回想这篇东西的第一句‘何彬是个冷心肠的青年’，就可以明白。这个‘冷’字是作者苦心用力写的，十分伤心，包含着许多眼泪。读完这篇东西，细想这个‘冷’字而不哭，那真是全没心肝的人。”他进而提出，文中关于何彬言行举止的描述，实际并不表明“何彬真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与此相反，“何彬的心肠，好像一个热水筒，外观虽冷，可是里面热不过；禄儿把这个热水筒的塞儿去掉，大家才知道这里面原来有这样高的热度！”<sup>①</sup>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潘垂统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一方面，从外表来看，“超人”是一个铁石心肠、对外界的人和事不会轻易动感情，因而显得有些坚硬冰冷或者说不同寻常的人；另一方面，由内里观之，“超人”则是一个不缺少温度和热度的人，并不等同于留在大家印象当中的那个只知一味“耍酷”的青年。

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很多学者在谈到冰心及其作品时，一般都会论及《超人》及其主人公，相关的分析与表达或详或略，数量较为可观，其中不乏一些颇有见地的想法。刘思谦在谈论《超人》这部作品的取名原因以及“超人”与何彬的关系等问题时，曾用清晰简洁的语言作过比较精炼的论述，对一般的超人与“真正的超人”作了区分，认为何彬虽不等于超人，但冰心对何彬最终成为“超越平凡”的“真正的超人”却充满了信心。<sup>②</sup>王炳根提出，“冰心不相信世间存在着超人，纵是有自命为超人的人，或将自己锁于一角想成为超人的人，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悖论”，她通过描写何彬这样“忧郁静寂”的青年所给出的思考，虽然“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但如果放在五四运动那一片‘打倒’与‘摧毁’的喊杀、血与火的场面中

① 潘垂统：《对于〈超人〉的批评》，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2页。

② “冰心用《超人》为题，也包含了否定前一个何彬的那种超人而肯定后一个何彬对真正的超人的期待。冰心也许并不认为后一个何彬就是超人，但是却相信他能够成为超人。她在行文中对后来的何彬用了‘至人无梦’四个字。‘至人’是中国古代词语，指思想道德的某方面达到最高境界，与天神相感应的人，词义与‘超人’相通。何彬终于认识到人和人是靠爱相维系的，在冰心看来便是开始感应到了宇宙的本源和万物相谐的人。这同泰戈尔的‘有意识的人’、‘伟人’相仿，都有超越平凡的人格，感应到宇宙的普遍规律和神奇力量的意思。”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页。

去，便是平淡的了”，但也“由此显示出她与社会激进作家不同的价值取向”。<sup>①</sup>

上述关于“超人”的多种意见，可以说都是据实分析、认真考虑之后得出的结论，它们虽然难免带着时代的烙印，但也有着诸多合乎情理的地方。我们认为，冰心是出于一定的目的和意图，才拟定了“超人”这一题目的（这两个字与1920年代初期广泛流行的某种理论、作者当时的思想情感，以及人们的普遍境遇与感受，整个中国社会的特有氛围等，有着某种紧密的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批判传统与反抗黑暗成了一种时尚与潮流，“尼采与‘五四’，因缘可谓深矣……胡适认为‘五四’‘新思潮的意义’主要就是‘评判的态度’，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反传统反偶像的狂歌醉语，无疑从多方面契合了这种‘评判的态度’，也就是用现代理性精神和价值标准全面批判传统文化与传统的生活方式”<sup>②</sup>，而“要以一己的力量与强大的传统惰性和黑暗的现实抗争就不能不把自我看高，尼采的‘超人’哲学正为处于时代变革当口的五四学人所亟需”<sup>③</sup>，因此不少文化人曾被尼采及其哲学思想深深地吸引，冰心便是其中之一<sup>④</sup>。至于小说中被喻为“超人”的主人公何彬，与1920年代的冰心一样，虽然并非流行一时的尼采哲学的忠实信仰者与深入研究者，但是他一定接触并且受到外来文化与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塑造得较为典型的、身处纷乱的时局当中，尝试用新的眼光对自己和周围世界重新作出仔细观察与严肃思考，曾经一度深感失望、迷惘、痛苦和无奈，又尚未彻底走向绝望而选择弃绝尘世的文学形象。

## 二、“超人”因何而变？

如果同意《超人》里的“超人”其实“是假的”这种观点，就相当于

① 王炳根：《为人生与为未来的艺术——冰心的小说（前言）》，王炳根选编：《冰心文选·小说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② 卞元宝：《尼采在中国》，卞元宝：《现在的工作》，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2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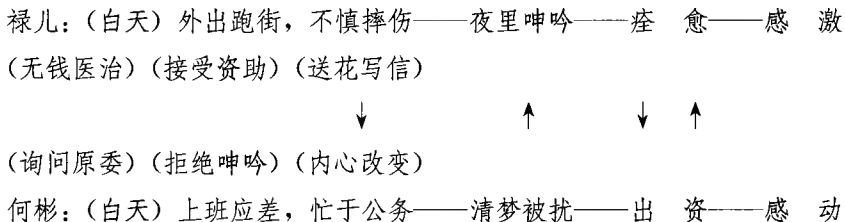
③ 张国义：《五四学人的超人意识初探》，《兰州学刊》2009年第5期。

④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与批评家之中，除李石岑之外，对尼采学说最有兴趣的当推茅盾和冰心。”参见黄怀军：《中国现代作家与尼采》，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承认这个“超人”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复杂性，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超人存在距离和差异，不能随意地将两者划上等号、混为一谈。正因为如此，“超人”才能与现代中国的现实生活以及其中的人们发生愈加紧密的关联。与“超人”有关的何彬，实际就是生活在中国社会之中的一个生命个体。他的身上尽可以沾染、散发出一种生活气息乃至世俗味道，这使他较之其他完全凭空虚构而成的形象更加丰富和立体。可以说，生活本身及其中的点点滴滴，为身处人间、向“超人”迈进的何彬，最终成为并非那么“扁平”的艺术形象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他不仅拥有相对复杂的心理世界，性格还随着情节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因此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循此思路进一步探究下去，我们不难发现，有着与何彬相同处境的人，其实不一定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或者采取相同的行动，出现类似的转变）。换言之，他们的生活不一定非得与何彬一模一样，他们本人的性情与心理如同何彬一般，出现某种大的变化（冷→热）的概率也许并不会太高。于是，大家心里很可能会产生又一个疑问：除了现实社会这个大环境之外，促使现实版“超人”何彬真正发生改变的更加具体、最为重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超人》在人物设置和情节构造方面，虽然谈不上离奇、诡异、复杂，但是堪称巧妙、务实而又有效，因此在相对有限的篇幅里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并不单调、乏味的故事。在此，我们可以采用一个简单的图表，把与何彬、禄儿二人有关的情节线索勾勒出来：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1. 一个看似偶然发生的摔伤事件，将原本不相干的两个人联系了起来；2. 禄儿只是个小小的配角，但他在作品里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超人》开头的部分，对何彬的生活状况、



性格特点等有过简要交代，这个人给我们的印象却显得有些模糊、遥远。不得不说，大家对于何彬的了解，实际是在禄儿因病与他有了更多接触、交往的过程中，才开始一点点地增进的（何彬的形象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清晰和具体）。透过禄儿的双眼，人们逐渐认识到，何彬坚硬的外表下潜藏着一颗柔软的心，其“表”与“里”实际并不一致。

从某种程度上讲，禄儿在《超人》中扮演了推动何彬一步步往前行进，敢于去面对最本然真实的自我，不断向现实生活靠拢的重要角色。或者说，禄儿的存在与出现，对何彬的转变而言甚为关键（据文中的相关描述可知，这个小男孩在夜里所发出的痛苦呻吟，尤其是为了表达谢意而专门给恩人何彬送的花、写的信，对这位外表有些冷漠的成年人造成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具体来说，禄儿不仅令何彬“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更使他“泪痕满面”，带来极大极深的内心触动，由最初认为“爱和怜悯都是恶德”，转而相信“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sup>①</sup> 禄儿可谓对其心灵起到了一种深度“唤醒”的作用。

禄儿于何彬的转变乃至他的人生来说，是否真的可以发挥如此这般的功效和作用？评论界对此历来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看法。肯定者如潘垂统，对《超人》赞赏有加，说它“是一篇成功的著作”<sup>②</sup>，充分肯定禄儿在小说中的作用，认为他是一个促使读者更好地认识何彬的重要角色<sup>③</sup>。剑三（王统照）认为，禄儿夜里的“痛哭声”是促使何彬发生变化的“外缘”（内因则是主人公的“人性”已经“有动于中”），“何彬由失望之途中，悔觉过来”，实际“绝不有待于后来禄儿的花篮的馈赠”。<sup>④</sup> 评论者贺玉波则

① 冰心：《超人》，刘慧英编：《冰心作品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4页。

② 潘垂统：《对于〈超人〉的批评》，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1页。

③ 论者将何彬比喻为热水筒，因为“禄儿把这个热水筒的塞儿去掉，大家才知道这里面原来有这样高的热度！”参见潘垂统：《对于〈超人〉的批评》，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2页。

④ 该论者还说：“禄儿的信，固然有点不甚名副其实——记得某君批评此篇，仿佛有这点意见。——但一篇小说，究竟不能完全完全与真正的事实一毫不爽，除非是完全用科学的写实法，其实这是无关于小说的全体的精神。”参见剑三：《论冰心的〈超人〉与〈痴人笔记〉》，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330页。

说：“……厨子的儿子禄儿所写的信太好”，对“读过几年书的儿童”写出“通达婉转而富有深意的话”表示“难以置信”，<sup>①</sup>对禄儿的评价及态度均很有保留。在持否定意见的论者中，用语直接、态度“纯正”<sup>②</sup>的成仿吾，在对“禄儿的那封信”做了一番看似包容的评说<sup>③</sup>之后，随即话锋一转，“我想可以在这里警告我们的青年作家，不要再想在现在的一般人的言论里面，织入高深的思想。我们暂时不能不丢了这条路；我们以后只能在干燥浅薄的言行的全部之中，取曲径把我们的思想徐徐地暗示。……”。<sup>④</sup>这些话语说得颇为不留情面，如论者自己所言，他们都是负责任地提出意见的，其论析可谓做到了具体对文对事而非单纯针对个人而发。

综观整篇小说，《超人》中禄儿与何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前者颇为特别的道谢），的确是促使后者发生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机缘。一个人思想意识的变化，绝非一朝一夕便能完成。在小说中，禄儿是使改变得以发生的一个触发点，但并非主人公之所以转变的全部理由（毋庸讳言，何彬自身的思想意识的变化，实为内在且更为重要的因素）。在很多年里，人们都习惯将《超人》视作冰心宣扬其“爱的哲学”的重要作品<sup>⑤</sup>，深入到它的字里行间也确实会发现，在主人公由冷变热的过程中，“爱”起到的作用实际是最为重要也最不容忽视的。为更好地理解《超人》及其中的“超人”之

① 贺玉波：《歌颂母爱的冰心女士》，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159—160页。

② 他在《评冰心女士的〈超人〉》一文中，较早就提醒自己，作此文的目的“是在这里想把冰心女士的《超人》评论一下——像其余的批评家一样，把话说谦恭一点，那么，我是想在这里把我一个人关于《超人》的意见说说”，但在“说”的具体过程中还是不免露出锋芒来。在肯定了冰心的创作天分与才能之后，成先生紧接着这样说道：“但《超人》这篇小说我却不敢说是成功的作品，我现在取纯正的态度，把我的态度写出来，供大家的参考。”参见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54—55页。

③ “禄儿的那封信，有人说是太不近现实，本来我们现在的社会程度太低，他们表现自己的能力太薄弱，原不仅一个无知识的禄儿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现在的上流阶级以及知识阶级，我们都不能在他们的言论中，表现我们所要表现的思想与情绪。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却不仅不说作者不好，因为时常感觉同样的苦处，我反不禁要表示同情于作者。”参见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59页。

④ 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59页。

⑤ “《超人》、《烦闷》是集中反映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时代苦闷的作品。前者被视为当时冰心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她宣传‘爱的哲学’的力作。”参见范伯群、曾华鹏：《论冰心的创作》，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271页。

变，我们需要对如下问题作出思考、回答：包括《超人》在内的多部冰心作品中的“爱”的内涵是什么？又该如何评价广为人知的所谓“爱的哲学”？

时隔数年后（即1920年代中后期）将走上革命之路的成仿吾认为，母爱为《超人》中“爱”的核心内容，是禄儿的呻吟令何彬想起许多往事和自己的母亲，改变了“一个没有爱的人”。他还说：“如果作者的意思真的是这般的，那就未免更琐碎了。”<sup>①</sup>简而言之，他对这种以母爱为中心的“爱”是心存疑虑，觉得难以认同的。左翼人士贺玉波对冰心批评道：“不明了社会的组织和历史，而且不曾经过现社会的痛苦，所以主张用由母爱而发展的博爱来解除社会上的罪恶，来拯救苦难的众生，在她的作品里只充满了耶稣式的博爱和空虚的同情”<sup>②</sup>，并对此表示忧虑和不满<sup>③</sup>。茅盾运用左翼批评标准对冰心的创作进行分析之后，指出她“处处以‘自我’为起点去解释社会人生，她从自己小我生活的美满，推想到人生之所以有丑恶全是为的不知道互相爱；她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能够互相爱”，其“爱的哲学”虽是“美”的，“然而用以解释社会人生却是一无是处！”<sup>④</sup>与他们不同，身为自由派作家的沈从文对冰心笔下的这种“爱”则持肯定的意见，认为冰心“用着母性一般的温暖的爱”来进行创作，“所得的赞美，可以说是空前的”，她“所写的爱，乃离去情欲的爱，一种母性的怜悯，一种儿童的纯洁，在作者作品中，是一个道德的基本，一个和平的欲求”。<sup>⑤</sup>属于民主派的潘垂统提出，在众多青年因“热烈的希望”得不到实现而深感烦闷苦恼（甚至不乏自杀之人）的情况下，冰心创

① 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63页。

② 贺玉波：《歌颂母爱的冰心女士》，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154页。

③ “作者未免对现社会的组织太盲目了！请问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在剥削被剥削的矛盾社会里面，你能高举着爱的旗帜吗，你能怎样去爱你的被压迫的父母妻子儿女呢？算了吧！空虚的博爱有什么益处？请你研究研究现社会的组织吧。”参见贺玉波：《歌颂母爱的冰心女士》，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167—168页。

④ 茅盾：《冰心论》，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48页。

⑤ 沈从文：《论冰心的创作》，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105—106页。

作《超人》的苦心用意，“全在援救一般颓丧的青年”。<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后，“爱的哲学”曾经长期遭到否定和批判，被认定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和时代的要求是”。<sup>②</sup>有人视之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冰心作品中的具体化，是在革命斗争尖锐化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的集中表现”，提出“它只是一种宗教，一种鸦片式的自我麻醉剂”，“为当时分化中的动摇的青年开启了‘一扇逃避之门’，走上放弃斗争的道路。”<sup>③</sup>进入新时期，研究界“以蹒跚的步履开始在政治上给‘爱的哲学’平反”，肯定了它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流“是一致的”，但由于被认为并非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而所获得的评价不是很高。直到80年代中后期，冰心及其“爱的哲学”才得到“应有的肯定”。<sup>④</sup>不少研究者认为，冰心“爱的哲学”以母爱为基石，<sup>⑤</sup>具有一种天然的宗教气息，它不仅为作家某一阶段的人生信仰在艺术创作中的具体体现，<sup>⑥</sup>更是她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时人谓之“病源”）而开出的

① 论者为此非常感动，以致不禁要向被救者大声疾呼：“青年们啊！你听到‘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我们永远是牵连着啊！’的呼声么？《超人》是救我们青年的上帝啊！”参见潘垂统：《对于〈超人〉的批评》，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3页。

② 中山大学中文系56级现代文学研究小组：《冰心早期作品初探》，《中山大学学报》1960年第3期。

③ 范伯群、曾华鹏：《论冰心的创作》，《文学评论》1964年第1期。

④ 李玲《评新时期的冰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4期。

⑤ 学者方锡德是当代深入探讨泰戈尔与冰心之关系的代表，1980年代之初就撰文指出，“在这个体系中，母爱是一切爱力的原点和发动机。自然爱和童年爱在本质上不过是母爱的生发。它们从母家出发，又以母爱为归宿。这就是冰心爱的哲学体系的内部构造。”参见方锡德：《冰心与泰戈尔》，《文艺论丛》18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有论者说：“冰心‘爱的哲学’之重心是‘母爱’，这是冰心自身生命的最深切体验，也是其创作的主色调，‘母爱’几乎贯穿了她早期所有的作品。”参见顾琪：《冰心“爱的哲学”与基督教关系的比较解读》，乐黛云、（加）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27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15页。

⑥ “冰心对母爱宣教似的竭力张扬，意在建立一个有牢固理论基础的人生观，以求完美地解说社会和有效地解救众生。……冰心在《超人》里设置一个冷漠的心，再设置一个母亲的爱，禄儿的呻吟是两者之间的一座桥梁，最后完成了一个寓言：冷漠的心如何被母亲的爱感化，从而表现出主题：‘世界上母亲和母亲都是她朋友，世界上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参见王学富《冰心与基督教——析冰心“爱的哲学”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3期。

一道颇为有名的“药方”<sup>①</sup>（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却也不乏特殊的意义与价值<sup>②</sup>）。今天，这类观点可以说已成为大家广泛认可和接受的主导性意见。

近年来，不止一位学者继续对冰心及其“爱的哲学”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意见和观点，比如：1. “爱的哲学”是冰心出于“救国救民的热诚之心”，借助基督教、泛神论思想，并结合生命体验建立起来的“一个爱的信仰”，是现实目的明确的“宗教性的哲学把握”；<sup>③</sup> 2. 作为“爱的哲学”具体内涵的“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均有感性与哲理两个层面的意味”，冰心通过歌唱它们“来抵御现实的虚无”；<sup>④</sup> 3. 对“爱的哲学”的宣扬部分完成了“唤醒民众”并给他们“力量”的时代要求

① “五四”时期，冰心“把所受到的基督教‘爱’的教育与她的改良社会的爱国理想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爱的哲学’，想为青年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参见王学富《冰心与基督教——析冰心“爱的哲学”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3期。

② 论者徐瑞岳等人评论道：“应该承认，《超人》是冰心抱着积极为人生态度下的产物，因其与时代脉搏合拍为青年写真而深得共鸣，标志着冰心‘爱的哲学’初步形成，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参见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2页。学者陈漱渝先生则在指出“冰心以爱教国的思想显得有些空乏无力”的同时，肯定了其爱的哲学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进而主张在全球范围构建和谐世界的现实作用。参见王炳根主编：《冰心论集·四（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9页。

③ “在冰心的思想中有两个层次，一是现实的社会关注，一是宗教性的哲学把握。冰心相信，‘社会的一切现象，原是只可远观的’，在‘远观’中对宇宙人生进行整体的体悟，以求形成哲学的，宗教的圆满解释，其目的最终还是为解决时代的，社会的问题”，“冰心借助基督教中的上帝观念，人的观念，大同世界的景观，天使形象等等，以及从泰戈尔、歌德那里接受的泛神思想影响，在自己生命体验的基础上，结合宗教感悟和审美感觉，进行了一系列哲学性的调和，在强烈的入世救人精神的激励下，建立起来一个爱的信仰。‘爱的哲学’并不一定有完全可靠的根基，有某些勉为其难的成份，冰心对此取‘宁可信其真’的态度，对这信仰反复‘印证’，调整万象，引导人生，这实在出自冰心救国救民的热诚之心，……”参见王学富《冰心与基督教——析冰心“爱的哲学”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3期。

④ “‘母爱’首先是一种世俗的人间亲情”，她进而把它“升华到哲学层面，认为它构成世界和谐、友爱的本质，用它来对抗令人失望的现实”；“儿童之爱”在“感性层面上从儿童的天真、儿童间的亲情中体会人性的美”，“哲理层面的意味”则是指“用儿童无知无识的真纯状态与有知识即有挥之不去的烦闷的成人世界相对”；“人一方面既膜拜大自然的神秘美，另一方面又与自然和谐、感应，共同构成宇宙的大调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在自然怀抱中获得的安宁感间接地与人在现实中的失望构成对比，给人以慰藉与安抚。”参见李玲《评新时期的冰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4期。

和历史责任；<sup>①</sup> 4. “爱”是冰心的“纯粹信仰”，“不是哲学”，是有意义的“一种面对苦难的方式”；<sup>②</sup> 5. “爱的哲学”是冰心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人生信念”，“通过逻辑驳论上升为关于人类宇宙的普遍信念”的结果，是“艺术的宗教”；<sup>③</sup> 6. 冰心“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而“潜隐地形成”的“爱的哲学”，为其小说叙事的“拯救模式”奠定了基础；<sup>④</sup> 7. 冰心“爱”

① “五四”退潮后，面对“青年的危机”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作家们凭借自己的教育背景与社会经验企图进行解答之时普遍感到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于是，“爱的哲学”成为一大批男、女作家的共同选择。他们中的不少人由于投入现实斗争而“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哲学”，“冰心则由于缺乏这一客观条件，因而变化缓慢得多罢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决定了在尚未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社会对这一观念的暂时接受，这一点从《超人》发表后强烈的反响就可以看出。所以，就当时‘唤醒民众’并给他们‘力量’的时代要求来说，冰心至少是部分完成了这一历史责任的。正因为如此，这类小说有别于好的社会问题小说的‘悲观’，极力想做出一种‘乐观’来。在当时的主流艺术观——即社会功利性的艺术观的影响下，她的‘视艺术是慰藉人们’的手段、工具便是‘爱’和‘希望’。”参见稂诗戈：《再论冰心与“问题小说”》，《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② “爱，作为纯粹信仰，可遇不可求，是在苦难的孤苦无告中与爱的相遇”，“这不是哲学，是信仰！所谓‘不科学’、‘玄学’、‘神秘主义’等评价语，是不能加在信仰的头上的”，“冰心所宣扬的‘爱’，作为一种面对苦难的方式，是鉴于苦难虽然是人间的客观事实，但人既然无法忍受它的存在，则最终只能以积极的态度在更高的价值基座上超越它，即以‘爱’的价值真实克服苦难的事实真实”，与“逃避”、“混世与反抗”、“麻木”等几种对待苦难的态度相比，它具有逻辑上的“彻底性”。汪卫东、张鑫：《重读冰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③ 对冰心来说，爱不是“靠理智靠逻辑推理而形成的概念范畴”，“而是同她的血肉之躯联结在一起的生命体验和人生信念。……冰心是为了对自己这份生命体验和人生信念的挚爱，才进而去寻找哲学寻找逻辑。……始终固守自己这份鲜活的体验，通过逻辑驳论上升为关于人类宇宙的普遍信念，从而在普遍的哲学意义上维护了爱的价值。在这一逻辑论证中，爱并不是通过论证才得出的结论，而是她立论的基础和前提。这一基础和前提，在逻辑驳论过程中成为连接生与死、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个体与群体的哲学智慧，成为泰戈尔所说的‘艺术的宗教’。”参见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④ “从基督教文化受到了‘爱’的影响，潜隐地形成了她的‘爱的哲学’”，“以众生的痛苦为痛苦、努力拯救痛苦的人们，成为冰心小说叙事的基本内涵。在冰心的小说中，构成了一种救赎模式”，……“冰心执意写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导致的绝望心态，写出他们走投无路处于绝境的状况，却以各种偶然的契机让他们获得拯救，使他们从绝望中摆脱出来，尤其获得心灵的拯救。从看破红尘厌倦人世回到摆脱痛苦热爱人生的境界，形成了冰心小说的一种拯救模式，也构成了冰心小说的博爱世界。”参见杨剑龙：《论基督教文化与冰心、许地山小说的叙事模式》，《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3期。

的歌唱于中国现代文化构建具有重要意义。<sup>①</sup> 相对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侧重从社会—政治角度看问题而得出的意见（具体指常将“爱的哲学”视为不切实际的超阶级的爱，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闺秀派”作家勉为其难地思考现实问题的产物），今天的人们已经普遍能够以更为相宜的视角、态度和心境，对“爱的哲学”（《超人》及“超人”问题乃至冰心先生本人等）作出愈加合理的分析、理解和评价，并由此取得了可想而知的更好的结果与效果。不得不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而可喜的进步。

### 三、如何看待“超人”之变？

在这篇名叫《超人》的小说中，冰心先生运用自己擅长的清新雅致的文笔，将主人公身上发生的改变及整个过程，描述得比较生动细致，使不少走近和阅读它的人常常为之动心动情。我们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在作品最初发表之时，会出现“《超人》出来，已经赚得青年人的许多眼泪了！”<sup>②</sup> 之类的现象。今人阅读《超人》，很可能已经不会再掉眼泪，但有心的读者或许会进一步思考：何彬的此种变化还给人们带来了哪些更加复杂的感受乃至影响？这么多年以来，人们究竟是怎样看待“超人”的改变的？可以说直至今日，“超人”之变，除了引起读者的普遍关注、感动和共鸣之外，还是一个人们有兴趣作出探讨与言说的具体问题。

我们知道，何彬在短短十余天之内所发生的转变不可谓不大。这个变化除了可使广大读者流下感动的泪水以外，还会让大家想到更多的东西——首先，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改变，绝不是作品中可有可无的内容，也并非随意进行艺术构思或创造的结果，而应与作者有意作出的安排和处理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其次，需承认，此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在足以令当时及日后的许多人感到意外（乃至惊喜）的同时，又难以消除他们可以觉察

<sup>①</sup> “‘爱的哲学’，作为五四时代文化的主流精神之一，把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与对他人生命的关怀结合在一起，把个性解放与人道情怀结合在一起，温暖了青年的心，也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关爱生命、尊重生命这个基本精神中的一块重要基石。在‘五四’那样一个青春飞扬与青春低回的时代里，冰心凭借着自己对读者的广泛影响，从正面歌唱‘爱’这个角度肩负起了现代文化建构的庄严使命。”参见李玲：《冰心与中国现代文化》，吴义勤主编：《名家讲女性文学》，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页。

<sup>②</sup> 佩蘅：《评冰心女士底三篇小说》，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4页。

到的一种突兀之感。何彬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激起或引发的感受和思索，可能远比作者在《超人》里所作的文字描述还要丰富、复杂得多（它已不止于一个具体关涉某个人的“变与不变”的简单问题，而与作者的创作观念、艺术风格，读者的期待视野、接受心境等等，存在一种深层次的关联）。对此，现当代的许多评论家已经做过一些富有意义的解读与论析（虽然他们的意见不见得那么统一）。

在探讨《超人》的创作宗旨时，成仿吾说：“有人说作者的意思，是想表达由否定（Verneinung）达到肯定（Bejahung）的一种经过，就是：否定→肯定。”又说：“这种经过，本可以由种种的路途达到，《超人》指示我们可以达到的方法却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爱的实现，那么这种经过是：否定→爱的实现→肯定。”他还指出，“假使我们把《超人》依这种形式分解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各部分的表现功夫还没有做到，作者的观察不仅没有深入，反有被客观的现象蒙蔽了的样子。”<sup>①</sup>成先生在这里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1. 何彬的转变服务于小说的主题表现；2. “爱的实现”促使何彬发生了改变；3. 关于转变过程的艺术表现还欠深入。他还表示，《超人》之所以会有“描写止于是一些客观的可见的现象”的缺陷，主要是因为：一、作者对“近代人的精神上的痛苦”未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二、作者将“由极端的否定转入肯定”的过程看得太过简单。成先生以自己力倡的“冷静严肃的态度”在文中表达出了这样一种看法：何彬的变化是冰心用以表现“否定→肯定”主题的重要情节，由于相应的观察和理解存在问题，使此种转变显现出“不仅理论上说不过来，还使结构上生了一层缺陷”<sup>②</sup>的遗憾，令作品的艺术效果受到一定影响。他总体上并未否定“‘超人’之变”这一关键情节，同时不忘指出，主人公的变化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与处理方面显得不够成熟，容易给人以一种生硬之感。有人也提出过类似意见，认为“何彬听了三夜的禄儿病腿的呻吟，便改变了他的思想”

<sup>①</sup> 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55—56页。

<sup>②</sup> 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57页。



可以说“描写得很不自然”。<sup>①</sup>

成仿吾还具体谈到了“爱的实现”问题。他认为，运用“一场梦境”、禄儿的一封信，以及何彬自己的“一封感伤（Sentimental）的信，与满面的泪痕”，来表现并完成主人公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虽然并无不可，却未免带些勉强的痕迹。同时，提出《超人》里的“爱”因未与功利、实用全然无关，“爱的实现”真正能够起到的作用难免让人生疑。他对何彬的人生作了另一番解析，将其概括为：“没有爱的生活→过去的追忆→爱的实现”，只是“作者似乎没有把爱的真谛看出来。真的纯洁的爱，在授而不在受，在与（to give）而不在取（to take）。爱好比黄昏时分的飞鸟，是要寻出可以栖息的一枝的，不得其所，是不能安息的，然而何彬是何等的无气力，何等的冰冷！”<sup>②</sup> 这些具体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无道理甚至启发性的，值得人们认真地加以对待。

与成仿吾同时代的贺玉波，也曾撰文对何彬的转变明确表达过疑义。他提出，冰心是“主张绝对的自由挥写，不为主义派别所限制”的作家，这使她的作品“总找不出有系统的思想和固定的作风”。<sup>③</sup> 这位已对当时“社会的组织”及“人生的真谛”作过一定分析和研究的左翼批评家，在将冰心多种体裁的创作匆匆论说一遍之后，心有不甘地向冰心高声发出呼吁：“作者啊，请你不要专门以锦绣似的文字，织那些已逝的美梦！现社会已经不是你儿童时代那般地美满，所以你再也不必呻吟，挥写那些已往的儿女常情了。请把你的眼光和心血集中在现社会，……”<sup>④</sup>。在贺先生的评论文章里面，人们既可感觉到他因爱惜冰心的才华并为其创作未能更进一步而生出一种遗憾与惋叹，又实在难以对该论者居于特定立场对冰心之创作及理念的隔膜和误解完全视而不见。

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评论界的“左倾”倾向非常明显，从一般论者

① 贺玉波：《歌颂母爱的冰心女士》，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 1932 年版，第 160—161 页。

② 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 1932 年版，第 60—63 页。

③ 贺玉波：《歌颂母爱的冰心女士》，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 1932 年版，第 169 页。

④ 贺玉波：《歌颂母爱的冰心女士》，李希同编：《冰心论》，北新书局 1932 年版，第 172—173 页。

到文化名人、研究专家对于冰心及其创作的分析、评价，可以说都存在不少问题、缺憾、弊端，曾经给冰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致使她对《超人》中主人公何彬“经一个儿童的启导和一番自我心灵交锋之后”出现的转变，专门作出过某种自我检讨与批判，表示这其实是“夸大母爱”功效的一种“自欺自慰”。<sup>①</sup>近年来有人提出，冰心的问题小说因“以论证问题为目的”而“导致小说结构上以议论为中心的趋向”。《超人》中的何彬“先抱着‘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的错误观念，接着母亲形象出现、禄儿信中的话初步反驳了这个观念，最后何彬自己的信则彻底地否定了这种虚无的人生观，而走向完全相反的人与人都是‘互相牵挂’的正面结论”，因此而使小说“趋向于议论文”，导致了“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失衡”。随后又说：“当社会责任和艺术追求同时摆在面前时，她从自己的文学观念出发，没有偏重自己所擅长的艺术，甚至也没有努力去协调两者的关系，使二者统一起来，而是毫不犹豫地首先挑起社会责任，把艺术追求放在从属位置”，这“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重质轻文’、‘文以载道’的观念有一脉相承的关系”。<sup>②</sup>在这位论者看来，关于何彬的变化一事，冰心在艺术处理方面存在不小的问题而又情有可原。换句话讲，“超人”之变其实不无遗憾甚至可疑之处，但这并不代表冰心处理不了此类问题，只是因为她把更多心思放在别处罢了。

这位评论者还说道，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冰心及其成就，“或许能从一角窥到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文学观念的某些特点，或许有益于将来的小说创作”。<sup>③</sup>撇开主要源于对冰心先生的敬仰和喜爱，有意为《超人》等作品艺术上的瑕疵寻找合适理由的心理、做法不谈，该论者试图通过相对深入的体悟与解析去真正走近、理解冰心及其艺术世界，进而探寻和叩问百年中国文学之发展踪迹乃至内在规律的意图与目的，实际上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认同的，可谓道出了多年来从事相关研究的诸多学者共同的愿望和心声。我们都知道，开展批评性的研究工作，就是居于一定立场运用一定理论，

① 范伯群、曾华鹏：《论冰心的创作》，《文学评论》1964年第1期。

② 李玲《冰心小说探索》，《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③ 李玲《冰心小说探索》，《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对一定的活动、现象和问题作出分析、评价和判断，不是有意（甚至刻意）去赞美、维护或者彰显、夸耀什么，也不是主观（乃至任性、偏执）地批判、诋毁或者遮蔽、掩盖什么，而是通过实实在在又尽心尽力的探讨和解读，深入理解文本乃至作者，最终企图达成关于人、艺术以及世界之间紧密相连的一种发自内心的认知、同情与关怀。

“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sup>①</sup>这是茅盾1934年在《冰心论》一文里说过的话。学者夏志清1960年代初期提出，“冰心代表的是中国文学里的感伤传统”，她的优点“在于她对狭小范围内的情感有具体的认识”，其最好的小说都有一份“纯真的感性”，认为“冰心的作品不多，但她是值得在第一期的作家中占一席重要地位的。”<sup>②</sup>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问题小说作家，在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方面，冰心不见得会有某种特别的优势，但她对“爱”的吟唱与赞颂确是非常真挚和自然的，颇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与美好。她这样做的目的，虽然并非与为现实服务的某种功利性全然无关，却可谓真正出于为整个时代、社会及广大民众忧虑和担心的一颗本心，几乎毫无什么利己的成份或色彩可言。

作为冰心先生重要代表作的《超人》，堪称“五四”时期的一部典范之作，虽然它不是作者本人最为得意的作品，亦非现代文学中最优秀的问题小说创作。自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问世以来，它便一直存在持续不断的争议，从不缺乏进行言说和探讨的理由、空间与余地，叫人决不那么容易忽视和淡忘。审视近百年的相关阅读史和研究历程，对众多评论者围绕与“超人”有关的若干问题提出的褒贬不一的看法，作出回顾、重温后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在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和探讨。他们通过批评开展的相关研究以及得出的论析结果，虽然不免带有特定年代的痕迹与烙印，但是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各自的价值和意义，至今仍不无某种启发性与借鉴作用，有助于今天的人进一步深入理解冰心及其作品。

① 茅盾：《冰心论》，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页。

②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6页。

客观地讲，冰心确实不是因为一般而论的深刻的思想性、鲜明的倾向性，以及新奇、特异的艺术感觉与创作技巧而著称于世的艺术家人物，而是一个不无自己的创作观念与艺术个性，擅长并重视个人的悉心观察、真实体验和内在感悟，与时代虽非毫无间隙或者距离，又不无跟上其发展的节奏与步伐的能力，可以与之合拍共舞、踏歌同行的人。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有人说冰心是一位“没有为自己树立权威，但也并不消失在大众之中”<sup>①</sup>的作家。身为通过创作来发声的人，冰心始终坚信“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一直不改从事文学创作的初衷，总能做到云淡风轻地面对质疑、嘲讽、误解乃至批判，哪怕特定年代曾有过一段颇不愉快的经历，却尽心竭力地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多与民族和国家有关的事情。从“五四”时期到现在，冰心其人其作一直广受读者爱戴和欢迎，对几代人的成长均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体现出了某种毋庸置疑、不可否认的普世的文字力量。有人说，冰心像朵玫瑰花，心里装的都是爱。其实，冰心又何尝不是一朵莲花或者兰花呢，风姿绰约、素净淡雅而又自成一格。

（洪丽霖 云南楚雄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

<sup>①</sup> 李勇：《论冰心早期问题小说的公共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1期。

## 冰心和后冰心

### ——冰心文脉的当代传承与新变

盛 英

近百年以来，冰心文脉的传承时起时伏。

颇具意味的是，“五四”时期对冰心创作的呼应者以男性、男作家为多。1919年9月开始的问题小说如《斯人尽憔悴》《去国》等，因其鲜明的醒世性而为忧国忧民的青年们所看重；1921年“五四”落潮时，反映青年幻灭感、空虚感、厌世感并初步形成了爱的哲学的小说《超人》反响更大，沈雁冰（茅盾）化名冬芬在该小说《附注》中说道：“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至于小诗，响应者有之：1922年4月，尚在德国读书的宗白华读繁星诗后，“拨动了久已沉默的心弦，成小诗数首，聊以共鸣”，这就是他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小诗名篇《流云》；贬低者有之：梁实秋认为，诗人过于“冰冷”，诗篇过于“概念”，繁星春水诗不宜“登大雅之堂”。当然，小诗运动以冰心为首已成定论，并未被人质疑。散文的呼应者当以钟敬文最为典型。1924年钟敬文开始散文创作，深受周作人闲话体影响，但20世纪20年代末后，却由闲话语体转为抒情语体，从而，郁达夫赞其“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作为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开山鼻祖钟敬文，对冰心的敬崇持续了一辈子，1999年他专门撰文悼念她，2000年《永远的爱心——冰心诞辰百年纪念展》上，他竟以98岁高龄前往参加；冰心

飘逸典雅的文风到底影响过他，冰心的为人为文到底深获他的敬仰。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冰心文脉的传承果然鲜明而生动地反映在女作家群里，但“五四”式的启蒙思想，对新时期初始创作的影响却是难分男女的。影片《太阳与人》（即白桦、彭宁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主人公——艺术家凌晨光，在被文革摧残得非人化时，他作如此“天问”：“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如此质问，同《去国》里的英士，留美八年回国后却报国无门、壮志雄心消磨殆尽，只得愤然再赴美利坚时所说的话：“祖国呵！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何等地相似乃尔！无疑，《去国》正是《苦恋》的历史潜文本。启蒙主义思想的根本在于“立人”，今天的中国似乎依然需要启蒙！前些年，读刘心武新著《人生有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版），得悉他与冰心自1978至1991年末的文字缘，十分感动。原来冰心喜欢并看重这个比他小42岁的年轻人，老人家不仅读遍他的小说散文，篇篇有回应，还为他散文集《垂柳集》写过序；老人家不仅乐于收到他的贺卡或书信，更乐于接受他的造访，一老一小交换人生的体验。当刘心武谈及自己在工作和政治上受挫受困时，冰心鼓励他“一定要挺起身来，谁都不能压倒你！你像关汉卿那样做一颗响当当的铁豆！”（见1991年4月6日信）。冰心不为强权所折服的悯世情怀和博大胸襟，给了刘心武以极大勇气和力量；冰心对民主气候的渴求、对人的尊严的体惜，无不体现了启蒙思想的威力。两代以问题小说起家的作家在启蒙主义光环下相互映照，令人感叹不已。

冰心同女性作家的联系就更其广泛与紧密了。除同20世纪40年代就相识的赵清阁等保持着经常而热线的联络外，冰心同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女作家如茹志鹃、葛翠琳、柯岩、宗璞、文洁若等的联系同样令人关注，她或为茹志鹃《静静的产院》写读后感，赞扬茹志鹃“以时代的眼光，来寻找前进中的妇女形象”；或给《葛翠琳幼儿文学选》作序，热情支持葛翠琳所执着的儿童文学事业；或感动于柯岩的政治抒情诗《周总理，您在哪里？》，还夸奖她的儿童诗写得“活泼、带劲”；或表扬宗璞的散文犹如水仙般地清香；或对老友萧乾直接夸奖他的妻子文洁若：“我觉得洁若比萧乾要写得好”。冰心对改革开放后崛起的女作家们的关爱与影响，就更值得作番

研究了，因为其直接呈现了冰心文脉在当代的传承与新变。1987年冰心抒写了有关女作家的文章《人世才人粲若花》，列举了从五四至今的女作家50名，新时期女作家从张洁、舒婷、王安忆到张抗抗、叶文玲、陈祖芬、铁凝等，共计16名，占1/3之多；假如再加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同她老人家通过信、造访过她的霍达、陈庆愉、李小雨、陈慧英、陆星儿等的话，那将是代表一代才人的数字。当然，传承与新变她文脉的当代女作家，不一定非要同她老人家有直接的联系；精神的联系与传承、文脉的延续与延伸，决非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方式。文脉传承的关键在于文脉内核的发扬光大。冰心文脉的内核在哪里呢？我以为，可以从启蒙、爱、神性和诗性等方面进行考量；是否可以由这四个维度来加以探究呢？

## 二

作为由“五四”运动震上文坛的冰心，她的启蒙思想既来自近代启蒙思想家，又同她信奉的自由主义神学难以分开。不是吗，冰心家中悬挂的龚自珍诗句“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对联，正是冰心在1923年出国前，自己收集了定庵（龚自珍的号定庵）句后托人索书，结果由梁启超书写而成的；由此可以得悉冰心所处时代及其社会思潮的情状。龚自珍（1792~1841）是林则徐的同时代人，他不仅深刻揭露批判腐朽黑暗现实政治和社会，还以剑气与箫心寄托救国拯民的思想志向；他强调人的作用，否定圣人或天理对世界的主宰，从而特别地崇尚人的“自我创造”。梁启超（1873~1929）虽属龚自珍后辈，但他由衷地推崇龚自珍，声称在晚清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自珍确与有功”；而他自己则为近代启蒙大家，既奉行变法维新，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又大力宣传民权、自由、进化之论；还亲自发动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革命，期待新文学能成为促进现代政治革命的新式工具。冰心祖父谢銮恩同晚清的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是知交，严复不仅为系统地将进化论、自由主义西学“真经”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完成编译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等），他先前还是中国海军建设的元老之一（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务长）；冰心父亲谢葆璋（1865~1940）就是在谢家书馆里被严复所看中、被招到水师学堂就学，走

上海军之路的。亲历过甲午海战及其失败的谢葆璋，不仅坚守国家尊严、向往民主共和，还从小培育女儿大胆而独立的个性；家庭环境的熏染，当然地催促着冰心对近代启蒙思想的接受和领悟。

冰心自少年时代开始还同自由主义神学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从贝满女斋到协和女子大学再合并到燕京大学，冰心虽受洗并不及时，但新教的自由主义神学对她的影响却是相当深刻的。自由主义神学一、推崇基督舍己牺牲以显示上帝圣爱的精神，在为真理的前提下将牺牲、奋斗、创造和爱融为一体，具人本主义倾向；二、在强调人的价值实现的同时，提倡社会改革，以求在地上实现天国景象，具鲜明的入世性；三、个人可凭“圣经”直接领悟上帝启示和真理，人的个体意志自由、理性和道德责任并存，兼具个人主义与尽职主义的统一。当然，冰心启蒙思想的产生，更是“五四”运动本身高举科学民主旗帜反帝反封建的目标，以及外来的自由平等博爱乃至个人主义普世价值观，直接地渗入于她心灵世界并同其融为一体的结果。冰心不仅直接参与“五四”文化运动，以大量作品宣扬理性、平等、个性解放等启蒙思想，还成为了爱和美的启蒙大师；冰心不仅直接活跃于“五四”爱国运动的行列，还总是将启蒙和救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27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她既为纪念“三·一八”惨案撰文《哀词》，又为熊佛西反帝剧本《一片爱国心》充当导演（之一），结果，差点被军阀张作霖派来的士兵给逮捕（后因燕京大学是美国人所办学校，不准他们入校，冰心和熊佛西才免遭一劫）<sup>①</sup>，冰心无愧为英勇的爱国斗士。应该讲，冰心启蒙与救国相统一的理念贯穿于她一生。尽管在较长时间里，冰心启蒙思想曾因“革命”意识形态的阻遏而被压抑，但，时隔三十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到底使她很快地重新焕发了思想青春：197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写下《回忆“五四”》和《从“五四”到“四五”》文章，由衷地表达了要为举起“科学与民主”两盏明灯，尽上自己“最大的力量”的心愿。就在以后日子里，冰心果然以耄耋之年，写就了许多为知识分子请命（从《无土则如何》到《读〈国殇〉》等）和呼吁“教育为立国之本”（从《我请求》到《读〈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后》等）的醒世文章，受到广

<sup>①</sup> 卓如《冰心全传》（上），第283—286页，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大读者称赞，人们誉她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冰心很清楚，只有推崇和发扬启蒙思想，才可能真正地结束盘踞于中国太久太久的蒙昧主义，迎来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

春江水暖她先知。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当启蒙主义刚刚得以复苏之际，后冰心们果然率先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或控诉“文革”对人性的摧残与异化，或伸张人的尊严和权利，或热烈追逐真善美的理想；因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焦虑以及对光明前程的期待，女作家们决然地展开了新启蒙主题，像张抗抗的早期作品：从《爱的权利》到《淡淡的晨雾》，从《北极光》到《隐形伴侣》，不都是最典型的例证吗？20世纪90年代，有人认为新启蒙已分裂为各种主义（如文化保守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但女作家们却坚守新启蒙立场，依然执着地将社会启蒙和人性启蒙结合一体，尤其着重于对个体生命、个体的人的独立、尊严、自由等，作出了颇为深刻的揭示和表达，其启蒙力度与犀利度果然超过了80年代的戴厚英、舒婷与王小妮；筱敏的散文集《成人礼》就是一例。《成人礼》以人类视角、中国眼光穿越历史时空，从法国大革命谈到俄国知识分子精神，从德国法西斯谈到中国“文革”，从爱默生、惠特曼谈到萨特、海德格尔等，她以自己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与感怀，智慧地描绘和论述了：“革命”是如何引来专制的；以国家、民族为名义的“集体主义”，又是如何无视、践踏个人尊严和自由的；同时，筱敏还以高傲、桀骜不驯的姿态为个人主义辩护。在筱敏看来，每个个体的人都具本体意义、本体价值，个人存在不应被轻视、被鄙视，而个人尊严是不可让渡的；个人主义价值体系应以人为中心，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最高价值，人对人的信仰，理应胜于对神的信仰。个人主义反对的是权威主义、极权主义对个人的压迫、奴役和支配，因而它总能真正崇尚个人的独立、权利、意志、自由乃至私生活；个人主义当然也懂得对他人的尊重。1924年，冰心在《介绍一本书——〈北京的尘沙〉》中，自称是个人主义和尽职主义的“崇信者”，认为“只要安分守己，竭力的尽了自己的任职，你便已救国了”。显然，筱敏比冰心更其反传统，她在继承冰心崇信的个人主义同时，更倾心于自我，认为“做自己的良知所认定的事情”就行。筱敏的个人主义更趋于自由化，同传统的训诫无疑是抵触的。也许，这正是她对冰心启蒙思想的新变。这种新变，

在 1996 年张抗抗的《情爱画廊》里也有所呈现。该小说女主人公秦水虹，既搞婚外恋、又同女儿一起爱上同一个男人，对于曾经传统过的秦水虹来讲，当前的她已不再那么高尚了，既不遵守妇道，又不尽母职；但，作家的同情到底倾斜于她，作家理解秦水虹性爱觉醒的根源和过程，不仅让她享受性爱的自我开放和冲浪的美妙境界，还让她从此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学术事业和新生活。后冰心们的反传统让每个人的个体自我得以伸展，似乎正攀向着人类性自我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个人主义已从受控的集体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世纪之交，张抗抗在长篇《作女》中再度塑造了一个更加自我、更具挑战性的后现代形象——卓尔，卓尔做人、干事的原则是“我是我自己”，崇尚的个性更加时尚化和个体性。记得该作出版不久时，我曾为它写过评论<sup>①</sup>，表达了我对卓尔们反传统、生命活力以及追求自由和个性的尊重。当时，是卓尔让我注意到西方妇运理论从要求男女平等、到探究性别差异、再到追求个人解放、提升的几个阶段，并再次触摸到新时期女性文学由人到女人再到个人的路径，真的，我特别感激张抗抗对卓尔这个艺术形象的发现与塑造，她把脉把得好准！有人认为到了 21 世纪，新启蒙正在被某种国家主义或古典主义解构；但我想，随着人们对极左革命的认识与反思的深入，启蒙主义是难以被解构掉的。王安忆《启蒙时代》通过“文革”中所谓对革命的启蒙，讽刺了革命究竟产生着怎样的思想，什么样的精神生活，乃至造就了何种人格；当革命被启蒙的时候，南昌、陈卓然们的生活只会变得空洞化和教条主义起来。尽管王安忆写的是大历史中的个人史，但作品到底让我们醒悟到，中国人集体性的自我认定，存在着许多因“革命”而造成的问题。该作让人们思考革命与启蒙的真实关系，从反面理解启蒙的意义。当前，我们必须警惕因所谓的革命而让启蒙被解构的危险。冰心“五四”式启蒙思想的长期被阻，不正是由“革命”意识形态所致？王安忆揭开了这层面纱，意义非凡。

### 三

关于冰心“爱的哲学”，20 世纪 30 年代初黄英（阿英）已给它归纳为

<sup>①</sup> 盛英《以女人的名义看“作女”》，《中国妇女报》2002 年 8 月 6 日。

母爱、童真和自然之爱，并提出：“一切的爱都植立基础于‘母性的爱’与‘宇宙的爱’的上面”<sup>①</sup>；“母性的爱”与“宇宙的爱”为其基础、出发点，有了它，“爱的哲学”才得以完整呈现。从血缘意义上说，“爱的哲学”是生命纽带的“亲情之爱”，尤其母爱兼具着自我牺牲和自我完成的生命意味，果然是整个爱的哲学最鲜亮的标示；从道德意义上说，“爱的哲学”是理性的、人道主义的“仁义之爱”，洋溢着对人际、对世界万物的仁德、善良与温暖；从神学意义上说，它则是“上帝即爱”、“真理就是一个字‘爱’”的“神圣之爱”，在神爱光芒照耀下，人与人彼此相拥，人与自然彼此相抱，整个世界走向真理和光明。世俗之爱、宇宙之爱、万全之爱、神爱在冰心“爱的哲学”里总能交融为一体，从而，它或成为宇宙运行的推动力，或成为促进人格完善和社会和谐的催化剂。爱，对于冰心而言，是信仰、是宗教，是她为这个世界所立的“极”和“心”。如此有关爱的思想，在整个人类爱的文化史上应占有重要位置。此外，冰心还将爱看做是真善美的结合点，尤其与美的同构，使爱的世界呈现一派温馨、温柔与温暖的色泽，可谓美轮美奂、魅力无比。

假如说泰戈尔“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说法是爱的真谛的话，那么，冰心所抒写的母爱则是它最圆满的阐释。冰心笔下的母爱似春风般温暖地吹拂，似浪涛般汹涌地翻滚，而在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铭心之作《南归》里，冰心则更将母爱同生命相连，她对丈夫吴文藻说：“我对于生命的前途，并没有一点别的愿望，只愿我能在一切的爱中陶醉、沉默。”冰心是最懂得爱同生命的关联的，她正是从自己母亲和天下母亲那里认知和体味了那“无我的”“无条件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了孩子、为了所爱的人可以“牺牲了一切”“摩顶放踵”的母爱的风貌与品性（见《关于女人》后记）<sup>②</sup>；并将其同神爱——“完全的爱”“完全的牺牲”交融起来，于是冰心终于将爱认作是女性“自我牺牲与自我完成”的一种生命仪式，即由忘我的母性之爱去完成自我的生命、自我的人生和自我的前程。如此之爱，不正是“充实了的生命”吗？

① 黄英（阿英）《谢冰心》，《冰心论集》（上），第8—25页，2000年，海峡文艺出版社。

② 冰心《关于女人·后记》，《冰心论创作》，第41—44页，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冰心对母爱的赞颂以及将母爱同生命关联的思索，对后冰心们的影响是深远的。后冰心们不仅直接领略着冰心对他（她）们最贴心的爱，还努力增添人间母爱的新内涵。刘心武母亲于1988年冬、张洁母亲于1991年秋故去，冰心都写信安慰他们，对张洁甚至还这么说道：“别忘了你还有个‘娘’”，署名时果然加上了个“娘”字。张洁同冰心一样是个孝女，她那记录母亲生命最后八十多个日夜心路历程的长篇自述《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正是《南归》的张洁版：两者同样是对母爱铭心而深长的颂歌，同样讲述着关于生命、爱和灵魂的故事，甚至同样地期待着自己在母爱笼罩下能得以新生，活出个新的自我来。两篇丧母之作所投入的感情深沉而浓郁、文字凄婉而清雅，致使都成了怀念母亲的经典散文。客观地看，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世纪之交的女性文学文坛上，由于西方输入的解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解构母亲神话的作品多了起来，所塑造的恶母与异化了的母亲形象也跟着多了起来，后张爱玲现象显得活力四射，由此后张爱玲们似乎要比后冰心们更加活跃。不过，后冰心们毕竟是热爱冰心的，尽管她们也常常兼爱着张爱玲，犹如迟子建一般。迟子建在散文《光明在低头的一瞬》荣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期间说过，她更偏爱些张爱玲、萧红、甚至丁玲，但她到底被冰心那“婉约中的俏皮，沧桑中的温暖”的文字风格所吸引，更敬仰冰心先生那大海般胸襟、恬淡安详神情的大家风范<sup>①</sup>。许多女作家果真步尘冰心，在后现代解构母亲神话的氛围中，依然真诚地抒写母爱，抒发对母爱的礼赞：无论是斯好、黄蓓佳、王英琦，还是池莉、赵玫等，她们母爱题材的散文，或记录自己怀孕与育儿的体验，或抒写对生命创造的感怀以及对儿女成长的期盼，或袒露熔铸母性自我魂魄时的震撼与动情，篇篇真实而生动，令人感叹。斯好在《生命·神启·爱》里谈及在做自己和在做母亲时的不同感觉时，给人以多少联想啊。她写道：在作为自己存在的时候，常常会“陷入对生命的怀疑，有时甚至渴望结束”，而在当母亲时，她却觉得要一辈子当好“孩子的导师、朋友、保姆”，并愿活到99，以让孩子人生处于“最黯淡的晚年时，我还能够

<sup>①</sup> 迟子建《闹市中的大海》，《我对黑暗的柔情》，第191—192页，2010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陪伴他”。对母子之间如此的生命连接和灵魂对应，你会作何等感想呢？毕淑敏的母爱篇章，受到社会更其广泛的关注，给人以更多沉思。首先，毕淑敏膜拜母亲的自我牺牲精神，揭示出了母爱的本质特征。小说《生生不已》所塑造的现代女娲——乔先竹形象，给人以极为悲壮的感动；一个病弱之躯投入新生命创造工程时的镇定、坚韧、无畏，使母性光焰灼灼逼人，不能不让人感叹母性的自足性、绝对性和超验性。其次，毕淑敏对母爱的见解相当独特，认为母爱是母性结构中“自我完成”方面的绝佳文化资源。散文《母爱的级别》《成长密码》《孝心无价》《当我们想家的时候》《做最好的母亲》《孩子，我为什么打你》等，无不在告诉你如何抵达母爱的高地：一、爱不是先天的，是后天艰苦琢磨的成长之丹；爱需要学习与钻研，是需用一切手段打磨和精耕细作的艺术。二、母爱是分等级的，初级阶段的母爱，是物质的、照料性质的，属糟粕与精华并存的原始状态，有时会因尚未认识到孩子是另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而对他（她）不予尊重。高级阶段的母爱，母亲则能高屋建瓴地完成同孩子的分离，既尊重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尊严与个性，又能智慧地帮助他（她）的生命走向灿烂和辉煌。高级阶段的母爱是从血缘分离、扩展到超越一己的广博之爱。三、母爱并非母亲专利，而是人类最美好、最无私、最博大的爱的总命名；无论男女老少都曾欣欣地接受过母爱，他（她）们也都可以成为辐射母爱的源泉。毕淑敏本人既是孝女又是位好母亲，当母亲身患肝癌期间，她带着母亲“快乐出门”，甚至为母亲先行服药以求其保险系数；她花费了半生积蓄，带着儿子卢森航海环游 20 多个国家港口，共同完成《毕淑敏母子航海环球旅行记》，成为母爱高地的典范。无论是作品还是自身实践，毕淑敏都为女性如何以爱抵达“自我牺牲和自我完成”生命境界作出了不凡贡献，可谓是对冰心母爱世界最漂亮的新变之一。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的千古绝唱，呈现了冰心爱的哲学最内在的道德向往；爱和同情的并行正是她对仁爱的呼唤和歌唱。冰心自幼就知道对任何生命的怜惜和爱护：为折足的蟋蟀流泪，为受伤的黄雀鸣咽，探望小鸟的巢穴，浇灌美丽的花朵，小冰心已懂得这些动物植物的母亲也在牵挂它们，从而她“未曾做过不仁爱的事情”（《寄小读者·通讯二》）。青少年时代的冰心已被“宇宙的爱”以及大调和思想所吸引，

坚信宇宙间的爱力、人世间的同情与互助，一定会让这个载着众生万物的大地前行，一定会让人类欣欣地生活着。冰心的仁爱，是通过同情心把自己扩大到爱他人的。仁爱作为道德理想，则是对天下所有人的慈爱，是不计较贫富智愚之别的，如《最后的安息》中惠姑对童养媳翠儿的友善关爱多么让人动容；仁爱作为人性善的提升，是对他人精神世界的深度关怀，尤其是对他人尊严的仁义相待，如《三年》里的槃，不因在情场上的得胜而沾沾自喜，相反，他真诚地体谅“坦白的情敌”霖的自尊心，不愿使其受到伤害，如此的同情和体谅，让人领略着仁爱的温度。中老年的冰心更加懂得对生活的感恩，但却遭遇到战争和“文革”的恶与苦；成熟了的生命使她厚德载物的器量与品性变得更其鲜明了。先看中年冰心。1936年6月，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60大庆，冰心为感谢他对燕大的恩泽，畅谈他对学生“爱和同情”的事迹，使这位被中国历史争议的老洋人，复原为温和恳挚的慈爱形象<sup>①</sup>。抗战期间，冰心《再寄小读者》，尽管只坚持了三则，但所开启的“同情的柴扉”与所构造的“爱的茅庐”，仍然让人们享受着冰心式母爱、仁爱的安抚。抗日结束时，冰心到日本呼吁中日两国女性要将“同情和爱的情感”，像海风那样和熙交流起来，“用我们女性的手来彻底制止战争”（《给日本的女性》《对日本妇女的期待》）<sup>②</sup>。“文革”时的冰心已进入老年，她几乎停笔，在极少的几篇公开文字里也再难见到“爱和同情”字眼，但从她给家人的信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她在干校时对人间仍抱希望，因为那里毕竟还存有互助和友爱。新时期的来临，冰心文字进入甜酸苦辣的“辣”的阶段，而人们却不会忘记她对妇女、儿童、教育事业、受灾百姓所作出的善举。生命路上爱和同情的平行，正是爱与善的同行：是爱引领了善，是善储蓄着爱。这时，愿永远给这个世界奉献爱心的冰心，果然将“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旗帜举得更高了。

新时期抒写仁爱的女作家当然不少，且不说写了慈善系列的航鹰与写了大爱系列的竹林，就是近些年来相当活跃的葛水平、乔叶，她们同样地

<sup>①</sup> 冰心《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我自己走过的路》，第39—41页，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sup>②</sup> 冰心《对日本妇女的期待》，《我自己走过的路》，第95—97页，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或把“良善”看作是“人活下去的根基”（葛水平语），或称“温柔之心就是仁慈之心”（乔叶语），进行着她们仁义和温情的叙事。纵观仁义和温情叙事，却当以铁凝和迟子建最具代表性了。以真善美为创作底色的铁凝，无论抒写仁义还是塑造仁爱形象，笔下特别来得，或给人们带来乡村少女的原始美德，而使之沉浸于干净、纯粹的精神领域中（如《哦，香雪》）；或让人们沉浸于农人们仁义的心灵大气象间，而增添精神生长的力量（如《笨花》）；但是，像《永远有多远》中对仁义者白大省这个形象的塑造，却又给人以别样的思索，呈现了铁凝对仁爱抒写的另一番功力。铁凝对白大省的善良及其可悲遭遇的叙述，确实相当特别，不仅让这位得不到回报的仁爱形象出现变形，更让人们看到了在当代语境下“善”所处的脆弱困境。仁爱并非单向的，当施爱者没有了爱的回报、没有了对对方的希望时，善就变得脆弱了。正因为仁爱的非单向性，它需要有个外部善的环境与对象，否则太容易像白大省那样，被他人所利用乃至剥削了。利用过、抛弃过白大省的那个郭宏，就是在他离了婚又得自己照管孩子的情况下，转回身来，下跪在白大省面前求饶求婚，致使让白大省再次受骗的。白大省开始要求自己别再上当，但当她见到孩子拉下的那块散发着奶馊味的肮脏手绢时，同情心却再次让她可怜起郭宏来，接着就同他结了婚。白大省的自我牺牲，完成的则是失却了光度的、又涩又苦的自我。铁凝对白大省这个艺术形象的善、仁爱的审视太奥妙了，一方面呈现出人性内在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铺排了善的尴尬和脆弱。对善、对仁爱的多维度探测，不可不谓既深又新；这样的新变值得深入地探究。

迟子建的温情叙事有口皆碑，她既能在黑暗里透出柔情，又能让风雨与灿烂相遇；她既能由凛冽中涌出温暖，又能从脆弱里萌发从容。她的作品为何总能给人以善、美和大爱的感觉呢？又为何总能让人在感受伤怀之美的同时、心底升起那柔和的感觉呢？迟子建自己再三说过：是“因为有了寒冷”，才“有了对寒冷尽头的温暖的永恒的渴望”。迟子建果然感受着世间的苦难与丑恶，乃至人性的卑劣与残缺；但她毕竟由亲人们那里、从乡亲们那里、从市井平民那里体悟到小人物的善良、隐忍、宽厚与爱意，她说：“我从他们身上，领略最多的就是那种随遇而安的平和与超然，这几乎决定了我成年以后的人生观。”正是这种对普通人、平民百姓的平视或仰

视，让她不敢轻言“同情”两字，她以为“同情”有点居高临下的意味。迟子建坚信个个普通人的生命及其所闪烁的生命光亮，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体，对于他们只有敬畏和感恩。前年，迟子建在接受《文艺报》采访，谈及小说集《黄鸡白酒》时说道：“我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总带着感恩的心去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哪怕别人吹给我的是寒风，哪怕世界给予我的是漫天霜雪。想想吧，所有人都会化为尘埃，没有什么不可宽恕的。我们不过是宇宙的一粒尘埃，大自然才是万古长青的。所以我也钟情于描写大自然。读者能够从我的小说中感受到暖，我还是很欣慰的。”（《文艺报》2013年3月25日）这些话真回答了她温情叙事的缘由：一，她因对生活的热爱而具美好的个人情怀与强大心理力量，从而既不怕寒风与霜雪，更能将温暖和爱注入包容、宽容之间，并将其洒遍人世间；二，她因总能领略大自然天籁之美和领受大自然对人类的赐予，致使她对现实世界的表达，无不染上温馨的浪漫气息和强劲想象力；仁爱情怀始终统领着她那极美的形象世界。尽管迟子建不言“同情”两字，但她的仁爱之心，她的爱同善、同美的熔融，到底同冰心爱的哲学交相辉映了。

#### 四

神爱，为冰心文脉的神性之核，将神爱作为冰心“神性研究”的首要议题，可谓实至名归。其实，正是神爱将冰心爱的哲学——母爱、儿童爱、自然爱交融在一起。青年时代的冰心，当她膜拜上帝、耶稣，由衷地吟诵“这神圣无边的爱”的时候，她一则崇仰基督教为爱的宗教，再则却自然地自己的生命体验浸染于信仰之间，宗教之爱和生命之爱难分难解。那么，神爱又是怎样地同母爱、儿童爱、自然爱交融一体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以为王学富的阐述尤为到位。王学富《冰心与基督教——析冰心“爱的哲学”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丛》1994年第3期）一文认为，一、冰心的母爱包含着她所赞赏的耶稣“完全的爱，完全的牺牲”的自我牺牲精神，母爱和上帝爱，两者同样地“长阔高深”；由此，冰心果然把观念的上帝之爱转化为现实中母亲之爱，就如同《超人》通过对母亲的赞美转化为对上帝的赞美那样。二、冰心对儿童爱着力描绘的是，由天堂翩翩飞来的天使如何转化为儿童的过程，用天使形象描绘儿童的纯真，借



“儿童之爱”代表“人类之爱”的理想，从而造就了一个充满光和爱的、“和爱神妙的世界”，就像散文名篇《笑》、小说《最后的安息》等所烘染的那般。三、冰心对自然美的赞叹，一边赞叹造物主的万能和慧力，一边崇拜造物主的化育和爱育。造物主不仅创造了自然，自然还以爱联络了整个宇宙，万全的“宇宙的爱”图画就此而形成。你看，冰心“爱的哲学”不是已抵达“圆满之境”了吗？在冰心文学世界里，冰心通过母爱、童真爱、自然爱投身于上帝怀抱、领略着上帝的存在。其实，神爱是这样将三者熔融于一体的：造物主赐予每个人以母亲，又为人类创造了自然；母亲以爱联络了整个社会，自然以爱联络了整个宇宙；人类是母亲的孩子，又是大自然的婴儿，人类在大自然的微笑里，融化着人类的怨嗔，最终抵达“人类之爱”的境界。这里，“神爱”的真实内核——创造宇宙，调整万象，终于被迂回而生动地呈现出来了。原来，这也正是冰心熔融基督教爱的宗教和印度泰戈尔“梵我同一”哲学后，对宇宙同一论和人类生存本体论问题的思考与体验；这样的神爱，其神性入世的特点是相当鲜明的。

然而，冰心的神爱，绝不包含肉体的性爱，这当然又同她所信奉的基督教教义相关。基督教尽管是爱的宗教，但它却用罪的理念遮蔽乃至贬斥性爱。基督教神爱是圣爱，是一种精神之爱、灵魂之爱；它有它自己的性道德论：一、强调一夫一妻制的神圣性。二、一切性行为，只能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生产；则只允许为生孩子而发生性关系。三、一切为寻求肉体快感的性行为，都是犯罪和堕落的诱因<sup>①</sup>。如此教义，当然不同于密教：既将性交引入宗教仪式之中，又把男女性交所产生的力量当作创造宇宙的无限力量。有人以为冰心文脉中乏于性爱，其实这正是由基督教神爱教义所致，不宜勉为其难。

对于冰心而言，神性正是她对信奉之神——上帝、基督的信仰；信仰使冰心文脉的神性灼灼发光。尽管冰心对其他宗教（如佛教、印度教奥义书的“梵”等）持开放乃至部分接纳的态度，但对上帝、基督的赞颂、膜拜、祈祷却格外地真实、虔诚和亲切；尤其在早期作品里，如此神性的呈现显得尤为丰满而清晰。其一，冰心诗文直接取材于《圣经》，或称颂上帝

<sup>①</sup> 见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下卷，第582—583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

的神圣、庄严、光明和奥妙，创世、智慧、慈爱和全能；或铺叙基督的降生、受难、复活和救赎，“完全的爱、完全的牺牲”；或低吟使者保罗在传教过程中的执着和坚韧、义人约伯在经受上帝考验时的沉寂和忍耐；等等。如《圣诗》这组诗篇，虽都直接指明出自《圣经》的某个章节，但它们绝非是教义的演绎。冰心在寻觅神的精神存在轨迹的同时，着重呈现的却是自己对神的心灵的感应；可以说，《圣诗》等极富宗教情怀的诗章，搭起的是神启和自我的桥梁，它们既是神灵的栖身之所，更是自我内心世界神迹的显现；其间的祈祷形式同时表现出了冰心对神的坚定信仰和虔诚。其二，冰心诗文还出现了许多宗教意象，无论是代表基督徒信仰的“十字架”意象，还是作为上帝使者的“天使”（安琪儿）意象；无论是象征基督和迷失者关系的“牧人一羊群”意象，还是人的灵魂所属的“天国”意象；它们所显示的神性凄美而温柔、辉煌而沉着。这里同样采借与应用了《圣经》用语，尽管不像《圣诗》那样注明出处，但冰心对神的领悟和感知却更加令人感动。如《笑》里安琪儿与众生交织在一起的笑容，怎能不让人对调和了的、爱的世界赋予期待和神往呢？《往事（二）》里小冰心向父亲表示愿当一名海上“灯塔守”的情景，怎能不让人对这位宣誓成为“光明的使者”的少女感佩不已呢；这样的志向和牺牲精神，是冰心自我神性的典型呈现。在现实生活里，冰心确实是个神性的勇敢实践者。其三，冰心诗文尤其是小说，则经常运用基督教“救赎”原则，敷衍不幸一苦难一救赎，堕落—自省—救赎等叙事模式，以呈现上帝用神爱调整万象、拯救世人的神性。“原罪与救赎”是基督教的两大核心原则，冰心依据自己将道德和信仰定义为一体的看法（这点同于康德所创建的道德神学），尤其看重上帝对人类在道德上、人性上的拯救。因而，她小说中凡属“救赎”主题的，一方面像《最后的安息》那样，进行上帝对人间不幸和苦难以拯救的叙事；另一方面就更多地关注于神对堕落、羸弱人性、灵魂的救赎叙事了；像《超人》那样用上帝之爱和母亲之爱的交融，来救赎何彬这样疲惫灵魂的小说，不仅数量多，影响也颇大。冰心总是将上帝、基督视为自己心中绝对的道德律令，从而也坚信上帝、基督能让人类获得智慧上、道德上、灵魂上的拯救。她或正面叙述神给人以希望和拯救的过程，如《最后的使命》那般，神给诗人送来了“希望的使者”，致使他勇敢地欢乐前行；她还通过

人内心的冥思靠近于神，从而获得灵魂的升腾，如《悟》里的星云，正是在对爱的冥思中，顿悟了万全的“宇宙的爱”的图画；原来，人只有在潜入内心时，才能接近于神并得到神的牵引。冰心更乐于借用实践神性的优秀人才，宣扬“完全的爱、完全的牺牲”的基督精神，最具典型意义的，当然是在《关于女人，我的学生》中的那位“S”女士了。救赎所体现的神性，根本在于一个“爱”字，而这果然是冰心所最钟情的。

神，并非只限定在基督教神学语境里，各种宗教语境里的“神”同样应得以尊位；同理，神性，也可谓是对一切神圣精神存在的统称。神性既是对神启、神灵、神迹、神祇等的发现和寻找，一种返向原宗教的精神；也可以是对绝对价值与永恒、终极关怀与信仰的期盼和追溯，一种泛化的宗教情怀。新时期作家们自新世纪以来，对神性的追逐，可谓日趋高涨。20世纪80、90年代，海子、史铁生、北村乃至张承志等的神性作品，刘小枫相关神学的著作，虽为众多读者所关注，但神性视角却并未得到张扬；近些年来，莫言作品中基督教救赎意识（如《丰乳肥臀》）、忏悔意识（如《蛙》）却在发酵和增值；贾平凹倾于道教，甚至去终南山取经，拜访高人，致使笔下许多女性形象颇具月亮般神性；阎连科力作《炸裂志》原熔融了寓言性和现实性，写出了中国村庄的畸形进化史，但他却非要称其为“神现实主义”（又“神识主义”），让“实”和“识”都不脱离一个“神”字；至于张炜，高度信奉“大自然母亲”，视宇宙性为神性，公开提出“没有神性的写作，不会抵达真正的深邃和高度”口号，并予以广泛宣传。理论家刘再复、林岗在专著《罪与文学》中说道，神性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维度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缺乏与‘神’对话的维度”<sup>①</sup>。当今，果然已有愈来愈多作家着力于神性对文学的注入或进入，这确实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啊。

女作家文脉中神性的渗透同样令人瞩目。迟子建怀着忧伤和激情写完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同冰心一样，她写神性首先写神爱；在对萨满教盛行的鄂温克部落悲壮命运的铺陈中，她凸显的是通灵的萨满的大爱精神和高贵气象，感人至深。女萨满妮浩每跳一次神、救一个人，她自己的孩子就会死去一个；尔后，她又将孩子装入白布口袋扔到向阳的山坡上，并

<sup>①</sup> 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第244页，2011年，中信出版社。

为他歌唱神歌，让他升到天上那有光明和银河的地方，去饲养神鹿。迟子建在一次演讲（见《心在千山外——在渤海大学的讲演》）中说过，这个女萨满是具有原型的，她呈现的是一种“大爱”，是“人类渴望达到的圣景”；“她一生的经历就是一部杰作”，为之，在小说里，迟子建“把这个萨满的命运作为了一条主线。”一直具泛神论、泛灵论观念的迟子建，除由神爱完美地呈现神性外，她对神意和神境的追逐，可谓目标清晰、思路开阔、形式优雅。那些抒写故乡、大自然和亲人的作品，无不起伏在感伤的情感波澜中，或展开着如梦如幻的艺术想象，有时还增添了瑰丽的神话和传说，从而使神意和神境都洋溢着爱 and 美的光泽。迟子建所写到的宗教，除萨满教外，还涉及佛教、犹太教等，同冰心一样，她偏胜利于渲染宗教情怀，以致神性显得尤为人性化和普世化。然而，迟子建对性自由的颂扬，或者说她那些关于女性性权利的张扬之歌，如《逆行精灵》、《微风入林》等，则并不回避性爱抒写，直接将性爱场景置于神圣境界予以敷衍，这无疑已构成对冰心神爱表述的一种突围。

为人们所熟悉的徐小斌，她对东方神秘主义、西方灵学的迷恋，致使她的文学王国想象瑰丽、神意盎然；她自身又具某些神秘的生命体验，致使她的文学王国兼具贴近现实和超拔现实的、令人震撼的超验力量，灵气十足。近年，长篇《炼狱之花》喜获国际“大雅风”文学奖，她已于2014年5月去加拿大领了奖。该作正是将现实装进魔幻筐里的一个作品，将人性与神性打通、并揭开其双面性的一个作品，一部犹如神助的作品。我以为这一切都挺符合阎连科提出的神现实主义。有意味的是，几乎同时，阎连科也得到他喜获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的消息，2014年的秋日，他终于抵达捷克领奖并发表了极其精彩的演讲。阎连科认为，神现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并非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地仰仗于人的灵魂和精神；它是作家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见阎连科《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徐小斌《炼狱之花》对当代时弊的讽喻，是“直面现实”的，只是置其于魔幻情景之间；小说所塑造的主人公——海百合，又投射了作家自身对真善美的追求与期待，呈现出作家站立在精神制高点上，对社会、人生、人性所作的种种思考。徐小斌的作品几乎都是一种现代寓言，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主题，尽管它们时而以梦幻、时而以虚幻、时而

以魔幻模样出场，但其神实主义的“臆思”却是意味深长的。1922年冰心小说《疯人笔记》一直被视为作家的“特异”作品。它的特异在于它的“变体”与“高深神秘”。剑三（王统照）认为，该作是冰心借疯人之口，索解着“生与死，爱与憎”六个字，是这样吗？似乎至今尚未有个清晰的说法。我以为，神实主义其实正是由此呈露端倪。《疯人笔记》借“我”，一个补鞋老人，对几十万年的宇宙史发出质疑：为什么人类总是被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而难以自由地释放？为什么母亲和上帝犹如团团乱丝，他们的爱总被乌鸦、聪明人所吞噬？而同乱丝关系密切的“白的他”（印度王子），他的慈祥 and 温柔反而遭遇灾难而被驱赶到了北冰洋？难道人们心头的冰块永远不会被消融？难道世界永远不会发生真正的转移？这所有质疑，多神、又多实啊！今天，阎连科和徐小斌的神实主义显然已得到重大发展，冰心的神性追求、神识表达确实已被发扬光大了。继《炼狱之花》（2010年）后，徐小斌又推出专写爱情神性的《天鹅》（2013年），莫言赞道：“徐小斌：从《羽蛇》到《天鹅》，飞翔的姿态越来越优雅”；在难以寻找到纯粹爱情的今日，《天鹅》对爱情的呼唤并沉浸于其间的情态，果然让人尤为感慨和感动；《天鹅》的爱情谱写又同音乐的陪伴相交融相激荡，乃至使飞翔之美让人怦然心动。作曲家古薇与边防军人夏宁远的爱情传奇，虽然凄美，却道出了两个孤独灵魂相互取暖的真谛——爱情需要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小说最后，小夏不幸身亡；而古薇在排练完成歌剧《天鹅》后，走向两人相识的赛里木湖畔，面对那只孤独的天鹅，终于纵身潜入湖内，实现了西域巫师所喻示的“大欢喜”。两个灵魂都视对方为自己心中的神，两个灵魂也都在神启下唤醒音乐灵感，而两个灵魂又都在彼此的抚爱中抵达美妙的神境，难怪徐小斌在《天鹅》扉页上只写了一句话：“爱情是人类一息尚存的神性”。徐小斌写的爱情是神爱，其特色和风味无疑是个出色的“新变”。

新世纪以来，女作家们对神性、神爱的抒写决非个别现象。享誉海内外的严歌苓，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充满传奇色彩，让人惊叹；而其间像扶桑（《扶桑》）、王葡萄（《第九个寡妇》）等，以地母般神性拯救他人的神性光泽，更令人感叹不已。正是这些炫目的女性形象的神色、神采、神气和神魄，造就了严歌苓神奇的艺术天地，甚至被誉为“中国当代女作家

第一人”（陈晓明语）。提出“中国文学缺少幻想传统”的残雪，更主张作家须具有神性，要像“先知”一般；尽管人们视残雪为文坛异数，但她那充满灵感的作品（尤其理论作品），不能不让人感佩她的智慧、智能和神明的理性。近些年来，人们注意到诗坛崛起的女诗人沙光。沙光自从1992年受洗入基督教以来，自觉地与耶稣立约，表示一生要做祂意愿的事；尔后，在主的召唤下，她果然从事起神本主义（以神为生命之本）诗歌创作，并获取重大成果，2011年出版了五卷本的《沙光诗文集》（《生命的雅歌》、《信心的操练》、《大地上的异乡人》、《镜像》、《小巨人大亮光》），真正地将诗学和神学融为一体，呈现出诗歌向神和向善、向美的统一，从而得到了前辈诗人牛汉、屠岸等，当代诗评家谢冕、杨匡汉、吴思敬、唐晓渡等的广泛肯定和高度评价。沙光诗篇的题材同圣经的《圣诗》一样，是一种委身与基督的写作；她的诗篇，则全方位地诠释着善和美的本源在于神的理念；这种理念同冰心早期创作的理念并无二致，只是沙光似乎更遍及到她全部的身心。

## 五

尽管冰心曾经提及自己的笔力宜散文而不宜于诗，五四新诗草创时期，她的小诗也遭到过梁实秋、废名的非议；但她的繁星诗、春水诗，到底还是成了人们对新诗的审美期待，成了诗歌与哲理交融的滥觞，也成了新诗语体的重要标示；她既成功地引领小诗运动，又将自己的诗情、诗性注入散文、小说领域，从而成为颇具诗性的作家。

诗性，我以为可理解为是诗的本质特性：它所蕴涵的诗思是生命感悟的提升，它所蕴涵的诗情是丰富情感和想象的飞扬，诗思和诗情则通过意象（意境、象征、隐喻、暗示）途经，交融、统一在它们的存在之家——语言之中，由此形成情和美的崇高价值，抵达诗性境界。完成于1921年秋的繁星诗，它的发表其实晚于写在同年春天的《圣诗》，然而，它们同发表在1922年的春水诗一起，突出地呈露了冰心文学诗性的几大特征。其一，冰心基于对神、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生命深处神秘和血脉的探求，致使她对充实的生命呈现——爱，尤其是母爱，特别地动情和热衷；对孩子的童真及其梦想，特别地青睐与倾心，在繁星春水诗里果然建筑起了爱和孩

童的天国。其二，冰心对大自然的迷恋，使其灵魂浸濡其间，当她听从自然召唤时，大自然的春光与风雨化作了她胸中的海岳，从而融化着人类的怨嗔并温柔了世界，甚至还创造出极富尊严的伟大人格。繁星春水诗兼具清纯崇高的情感和瑰丽超拔的想象，成就着冰心作为爱的使者形象，和作为“人化自然”伟大歌者的形象。其三，自幼读古书、背古诗的冰心，面对母爱和大自然，词章之美油然而生；而繁星春水诗的诗思、诗情无不点染着色彩美和音韵美。同期小说《遗书》（1922年）一边提出新诗须“有含蓄不尽的意思，声调再婉些”的要求，一边还提出“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的文体主张；在繁星春水诗里众多意象的营造，之所以能情景交融、亦诗亦画，抵达出神入化境地，正是她实践自身理念的结果；而冰心语体的创造，则更使中国新诗大放异彩。

隔年（1923年）初，冰心在《中国新诗的将来》中又提出对新诗的“五有”期待：“诗不止有意境，还有艺术，要有图画般逼真的描写，音乐般和谐的声调的，叙事之中，仍不失其最深的感情。”诚然，繁星春水诗正是往这个方向努力地予以实践；而有意境、有艺术、有描写、有声调、有深情的“五有”，也成了冰心散文抒写的追求。应该讲，冰心自觉地将诗情、诗意以及她推崇的理性主义注入她叙事性文学之间，而诗性在她的散文里则发挥到了最高点。不是吗，你能忘记《寄小读者》里所描绘的沙穰疗养院里花的生活，鸟的生活，水的生活，云的生活吗？那里不仅比喻迭出，骈律和叠句让生活竟然如此地艺术化。不是吗，你能忘记《山中杂记》里对山与海的比较，冰心宁愿投海不愿坠崖的誓言般心愿吗？那里运用了许多古诗词表达她对海的特殊感受和感情；其间所涌动的语汇、意象和象征，托出的正是诗性和神性。不是吗，你能忘记《往事》里那页页生命历史的篇章所承载的生命分量吗？那里，父亲的身影母亲的爱也好，海的女神诗的女神也罢；愿当光明的使者也好，愿推开生命宫门的英勇也罢，几乎都是小诗那些主要意象群（如父亲、母亲、弟弟、大海、星空、春光、晚霞、花草、飞鸟、梦乡等）的再现；我以为，称《往事》是繁星春水诗的散文版，可一点也不过分。冰心散文创作对抒情性、哲理性和意象美的追求贯穿始终：她从早期感伤型（“满含着温柔，微带着忧愁”）风格，到中期清朗秀逸风貌，甚至到晚年凝重老辣气象，要为这个世界增添些“美”

的心愿，则是始终没有改变的，由此到底成了一代散文大师；正如卓如所言“冰心是现代美文的开拓者和奠基人”<sup>①</sup>。冰心美文的诗性、诗质的形成，一方面在于她天赋的才情，一方面却在于她巨大的语言魅力。冰心兼容中西、古今的语体（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虽不能说它“绝后”，但其“空前”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她诗文中所熔融的古诗词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从元曲到龚自珍、纳兰性德的清代诗词；所熔融的西方浪漫主义，从歌德到拜伦、雪莱，从华兹华斯到柯勒律治；这种“熔融”所产生的语言魔力，又有谁能比得上呢？

冰心的小说，无论问题小说（如从《秋风秋雨秋煞人》到《超人》），还是心理小说（如从《遗书》到《西风》），均具鲜明诗性，因而它们或像散文诗章，或被笼罩在优美的意象之间。冰心问题小说大多作为她启蒙思想的载体；当时她正认真探索着爱的哲学，因而，自《超人》后，冰心总是将爱的内结构，置于现实问题的真实世界之中，致使它们彼此相遇和照应；冰心着意于“爱”对人的心理及其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并将“爱”当做完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这样，“问题”常常被置于微妙的、压缩性的“爱”结构中，并得到了诗性的阐述。沈雁冰为《超人》而哭，正是爱的自结构的诗性起到了诱发情感作用之故。《秋风秋雨秋煞人》里英云的婚姻故事，因英云自由的被扼杀而呈现一片萧瑟秋气；小说用了由古诗词所写的秋风、秋雨、秋音、秋调、冷月、破云、眼泪、心囚，建构起秋的意象群，由此敷衍英云心路的黯淡和凄惨景象，于是完成了小说内质与诗性的交融。冰心善于运用传统的艺术意境，或使其成为小说主导性的结构要素，或使其成为小说局部细节的元素，诗化特征是显见的。冰心心理小说大多运用独白、日记、书信等样式谱写人的心路历程，它们总是抒情重于叙事，对精神生活、心理活动的勾勒细致入微，而对故事情节的结构却似乎被严重地削弱。像《遗书》里宛因生前给冰心写的16封信，透露的是宛因对人生、生命、自然乃至文学的见解和感叹，生活片段的层层叙述中透出的却是阵阵诗波。心理小说的抒情性在《遗书》中就发挥得相当充分。《西风》抒写一位因执着于事业而放弃爱情的女教授秋心的故事，全文写的

<sup>①</sup> 卓如《冰心的散文》，《冰心论集》四（上），第269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



是秋心对青年时代恋人——远的思念、邂逅、分别的心境，全部通过写心理，铺叙了一个相当动人、浪漫的故事。其间则又是通过如火车、轮渡、西风、月光、海风、双手的紧握和松开，泪珠的“欲滴”和“流回眼眶”等意象群，将秋心最隐秘、最微妙的心理活动渐次展示出来的。有情有景的意象创造，是诗性的重要原动力，冰心文学佐证了这一点。

当我注意到新时期著名诗人海南的时候，立马被她的诗性所征服。她的诗性不仅洋溢于诗篇，同样散发在她小说和散文中，她是位同冰心一样的多面手；而她那诗歌的巫性以及丰富的意象，却令人陶醉，让人悟出了什么叫神秘，什么叫灿烂，此时的诗人果然给人以“诗仙”之感。海南近年的获奖诗集《忧伤的黑麋鹿》，摆脱了早期诗作的恐惧和迷茫，在澜沧江深水的潜流中，腾跃起她那心灵的火焰，犹如澜沧江峡谷中既黑暗又充满阳光的两种火焰。这两种火焰在不同豁口的相遇，不仅演绎了黑麋鹿在黑暗和白昼中，蜕变为一种植物、一块岩石、一朵浪花的故事和传说；这两种火焰还通过诗歌的漫游，道出了诗人身体的历险和心灵的种种神秘体验；其间众多意象的巫性和神秘性，可谓是对冰心诗性是一种突围。


从舒婷到翟永明，都承继着冰心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激情的诗性，然而，她俩却都切入女性视角，以致突围了冰心的童心视野。尤其翟永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大型组诗《女人》及其序言《黑夜的意识》以来，傲然地让女性作为主体存在凸显出来，不仅引领了女性诗歌潮流，继之，还以性别写作和超性别写作的并行，或者在性别视野下的超性别写作，致使女性诗歌乃至女性艺术女性文化，都获取了正确健康的发展方向，以及理性智慧的谋略。翟永明的黑夜意识，意欲摆脱太阳窥探的眼睛，以寻求一个自主的黑夜世界：“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免于难”（《世界》）；其间，尽管呈现出某种混乱的激情和狂野的表达，但它关于性别歧视对女性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对女性竭力渴求回归自我的旨意，到底犹如惊雷般震动了诗坛。由于翟永明的性别意识、性别视野具无与伦比的精神空间和文化天地，以致女性诗歌乃至女性文学，果然也由翟永明开始插上了飞翔的翅膀。翟永明还同冰心一样敬崇宋代词人李清照。冰心在美国留学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撰写的硕士论文是《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见《冰心全集》第2卷，海峡文艺出版社），她欣赏李清照性格的高贵、情操

的高雅和思想的深度；她也注意到李清照的艺术形式和色彩，乃至声感敏锐和富有诗意。翟永明则说道，李清照是她心目中的大诗人；因为她有三大“超越”：“她能够超越她那个时代对她的局限和对她的束缚，她也能超越性别和偏见对她的压制，她甚至能够超越一个辉煌的男性诗歌时代，从中脱颖而出”（见翟永明诗文录《最委婉的词》第204页）。翟永明对李清照三大“超越”的膜拜，正好完整地反映了她自身的创作实践：她虽身处消费主义和娱乐化时代，却依然坚持着精神自由、思维独立的气概；她虽坚持凸显女性自我、女性经验的性别写作，却又不断地探索超性别写作，以求“新的完成”和“新的变化”；她虽身处诗界，却对建筑、装置艺术、电影等进行着持续地探究。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翟永明在继续表达女性经验的同时，果然用女性特殊视角去观照历史问题和人性中的普遍问题，写成名篇《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时间美人之歌》等。新世纪以来，她更以不尽的哲思和丰润的诗意，写出一批散文随笔集，其间如《天赋如此——女性艺术与我们》、《女儿墙——翟永明散文》等，竭力地追溯女性生命主体和文化主体，以拯救女性过往这双重的缺失；其间如《纸上建筑》等则又直接呈现了她对艺术和建筑的青睐之情和高超造诣。她还同著名电影导演贾樟柯合作《二十四城记》剧本。翟永明不仅是文学家、艺术家，还是个社会活动家，她组织过多届国际诗人节和艺术展，还是成都“白夜酒吧”兼文化沙龙的老板……翟永明作为非体制内的诗人，到底以自己温和的女性主义和出类拔萃的诗艺（尤其追求新的语感、新的结构和主题，以突进更深的审美境界），以自己美丽的外貌和善解人意的待人之道，成了无数诗人所簇拥的诗神。翟永明始终认为对创造性的热爱是最重要的，而精神自由则是她选择写诗的前提。是啊，对创造性的热爱，对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才是诗性的根本之所在。冰心这样告诉我们，翟永明更是如此地告诉我们。

（盛英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作协理事、评论家）

第六辑

社会学研究





## 内生的活力与共生的秩序

——燕京社会学派视角下的边疆土司、  
民族区域自治与一带一路外部效应

张海洋

先师吴文藻早年执教燕京大学（1929~1938），带出社会学“开门四弟子”：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黄迪，前三人都曾到云南大学任教。先师辞世前三年（1982~1985）也在中央民族学院带出民族学“关门四弟子”，除笔者之外，另三位分别：一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龙平平，原学历史现做邓小平研究；二是在美国办翻译公司的关学君，原学考古现做文化交流；三是复旦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原学英语现做符号象征认知人类学研究。

1985年夏天，我们四人硕士论文答辩，先师因病缺席，但请林耀华教授带来写给每个人的褒奖评语。当年入秋，先师辞世，三位同学升学就业各有前程。笔者则留校教书蹉跎岁月至今。2015年秋天，蒙王馆长慨然寄赠巨著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读后才痛感辜负先师太深。该合传再现了师母和先师的生活经历和他们在教育、文学、社会政治和中外民族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付出的心血代价，留给国家民族及我辈的期盼和研究命题。这是笔者读到的最丰满鲜活活动人心弦的吴先生传记。去年寒假，冰心文学馆约笔者去福州长乐拜读吴先生晚年部分日记，又承蒙王馆长拨冗接见并尖锐耳提面命，指出我辈对先师留在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的边疆边政民族研究思想遗产和学术成果发掘继承弘扬不力，我辈于此难辞其咎，亟应追踵先贤幡然振作。笔者聆教汗颜心生忏悔，立意用余生继承先师志业，现就汇报跟随先师学民族学做边疆边政文化生态研究的一些心得体会。

中国民族文化自成体系内涵丰富但结构复杂不易把握。最简单分类是个“双核双螺旋”的太极图结构格局：东亚农耕与内亚畜牧两个生态生计

板块又分别带有华南东南亚、满洲东北亚次重心。这是古今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应对内部治理和对外交流的文化生态基础。

秦汉以来，中国的边疆民族关系和相关事务治理呈现出南北差异：北方民族往往能跟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甚至登堂入室取而代之，到清朝就演成了长城长征连线以外由平行于内部六部的理藩院治主持的“和亲会盟政教互惠”体制。南方民族地区除了南诏大理，通常不再能跟中原抗礼，但能基于文化生态、依托山川地势，形成地方割据实力继续互动博弈，到元朝就演成了类似封建藩属间接治理的土司制度。当今中国南岭两侧湖广闽黔滇的大武夷、大武陵、大凉山乌蒙山，横断山脉藏羌彝走廊甘青川藏滇边区，都是典型的内地边疆土司密集区。

清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绥服准噶尔，边疆民族均成清廷藩属但仍有南北差别：北方的满族亲贵联合蒙古王公藏族僧侣依托理藩院及承德盟会，仍然像联邦盟友；南方土司时而也有皇室眷顾，但总体隶属朝廷礼部，因而更像地方领主。各地流官总能在土司与朝之间策动“改土归流”误国扰民邀功固宠。北方王公受流官摆布较少，却多受移民农商利益诱惑损失领地。辛亥革命后，北方民族直接进入“五族共和”框架。南方民族还要努力争取，最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同享平等权益共同并引领世界后现代转型潮流。

历程显示古今中国的土司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是边疆民族文化生态本土自性跟世界潮流国家治理需求连环博弈而产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支撑这个格局的就是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长时段大范围视角下的文化生态学千年结构。这样的特色治理体系久经考验发育成熟颠扑不破且不难认知。但人的理性终究有限：历代王朝实力强大承平日久，统治者的思想观念总开关就会生出“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毛病，就会对“上层建筑压垮经济基础”的后果意识不到或无所畏惧，因而就要围绕边疆民族治理体系来回折腾“恢复”与“革除”自毁根基。试想清朝早年的南方土司“改土归流”如果不那么成功，则太平天国酝酿期间整出偌大动静就会有人举报干预，不致酿成地动山摇的滔天大祸；如果藏羌彝走廊横断山区改土归流也像华南那样成功，1863年翼王石达开在安顺场的处境结局就会跟1935年的长征红军依稀相似。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基本都

在少数民族地区且多在“改土归流”弄得凋零残破的土司区内。红四方面军两次“南下西进”试图越界，结局都很悲摧。长征落脚的陕甘宁边区少有土司却多有回族蒙古族。共产党研究这两个民族因而最早最深刻。

当今中国学界时而争论土司的民族身份。其实按结构功能论原理推断，土司无分民族只要想坐稳，其身份认同就必须八面来风，好比英国的米字旗中位。学界有时争论土司制度在中国何时革除绝迹。笔者基于同理，也敢说真正革除绝迹只能在各地民主改革确立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1956年前后。当年中国内地边疆“中间圈”的土司制度跟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因而具有结构合理性。后者且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做出的最佳制度成果：把北方满、蒙、维、回、藏跟南方民族都安排成民族自治地方，体现出边疆民族事务治理空前深化的千年变局。港澳台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也是基于对外部效应的深思熟虑而跟当年北方民族相似。中国学界面对边疆民族主客观内外部两种格局，总须以学术创新成果引领国人正心诚意自觉致力于诚信互信制度建设，防止有权任性粗心大意犯下“根本重大颠覆性错误”，把国家民族变成2015年初夏历史三峡东口的“东方之星”。

这就是吴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倡导社会学中国化推动乡村研究，后来在大学研究边疆民族边政治理推动西南抗战大后方建设，晚年做中国和世界民族研究的思想动力。其学问始终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而围绕政治改良制度建设，因而总能领先于时代有所超越。刚毅木讷远见卓识有的放矢言信行果是先师学术成功的根基；而面对现实择善固执志在超越也是先师社会理想政治抱负多半落空的学人志趣使然。

但天道酬勤功不唐捐。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制度建设难题仍不出先师预见范围：中国的善政善治关键仍在基层社区民主自治、民族区域自治、陆港澳台一国两制这三项相互锁定的自治制度建设。当今中国所受挟持也仍来自先师当年面对的南京南库民族主义经济民生决定论。破解困局的关键也仍是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完善的障碍也仍跟当年“宪政”转轨相似：不在客观条件而在主观选择。试想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执政仅用28年，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执政条件下确立70年而不能推出自治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条例》。关键部件缺位导致体制不能发挥正常效能。结果就是边疆民族领域治理成本提升而困惑加深。乌坎村民自治和港澳台一国两制也随之受困。

主流媒体总把难处归因于外部敌对势力。其实“三项自治制度”恰恰是中国特色制度体系里最符合全球人权和文化生态保护方向，因而是最有得道多助资质的设置。助力多寡也是得道与否的检验指标。试想当年南京民国失败，甚至苏联解体都不在民族自决自治或抗战艰难经济困顿之时，而在抗战胜利忘乎所以，对内拒绝政治改革制度建设，对外信手亮剑耗尽民心国力之际。当今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因而还是本乎初心回归党义信念，继续推动中国乡村、边疆民族、港澳台三个领域的三项自治制度建设；最根本的理论方法还是借鉴先进理念，基于中国文化生态，重振先师在燕京大学发展的知识社会学范式。

先师最早供职、结婚、成名的燕京大学（1929~1949）也是中国教育典范传奇。美国人司徒雷登仅用10年就能打造出世界一流大学，足令当今国人见贤思齐。当年燕京大学的人才化育、学术成果和社会政治影响更使国人受用不尽。燕大最后的学生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仍在力推《民法》出台。当年接受过燕大器官捐献的几所大学，都据此发展出国内一流学科：其中就有中央民族学院（现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学。具体到边疆边政民族研究领域，燕京一校也涌现出影响深远至今的两个著名学派：史地学派的带头人是顾颉刚、谭其骧；社会学派带头人就是先师吴文藻和他的学生费孝通。

先师当年学界研究边疆边政民族宗教包括土司制度的初心本意，也是提升国家在相关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配合抗战“大后方建设”。1951年中国院系调整撤销社会学，主流学者受形格势禁更多转进史地和民族研究领域，形成了当前土司制度研究文史主导的范式及相应缺陷：一是多以经验事实为终极成果，不能联系边疆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现实需求，不肯把古今关联道理说透而满足于给主流社会和决策者开列悟性考题；二是学科建设主张仍以史地为主，不能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的知识原创性中受益。其实无论当年还是眼下，先师吴文藻引领的燕京大学社会学边疆边政民族研究成果都堪与史地学派媲美，而且更有思想性、更有现实制度建设创新潜力。笔者仅就个人所知，列举燕京三代学人的几项成果作为学习研究动态参考：

一是先师林耀华和陈永龄先生所在的成都燕大社会学系（1942~1945）



研究彝区、藏区、羌区，无不涉及当地土司并揭示出“家屋社会”现象，还有余贻泽先生早年写成的《中国土司制度》；

二是李安宅、于式玉教授夫妇和先师林耀华携学生宋蜀华先生 1951 年作为学术工作队随十八军进藏兼作实地调查的成果；

三是成都燕京学生李绍明教授晚年策划指导的藏羌彝民族走廊研究，还有燕京社会人类学传承人王铭铭教授提出边疆“中间圈”概念并指导北京大学郑少雄、曾穷石、王娟等多名研究生近年的系列成果。

笔者总结燕京社会学派成果相比于史地学派而提供的创新视角：

一是史地学派认为土司是边远民族地方的原始落后遗存，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的权宜之计，即改土归流教化流程的中间站。燕京社会学派则基于文化生态学视角指出，土司本身也有主体能动性，也能节制中央王朝集权决策的弊端，降低治理成本和人文代价，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多样性传承，总之能发挥地方民族参与发展和治理的积极性；

二是史地学派认为土司制度阻碍社会进步。但燕京社会学派年轻学者采用后现代视角研究藏羌彝走廊的成果表明：土司制度作为边疆民族地区作为“中间圈”治理机制不仅是文化生态保护区和社会灾难防火墙，而且是内外贸易桥梁中介和文化交流纽带，不仅符合中国文史大传统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理念，还曾维系前现代中外一带一路运作。

三是史地学派认为集权的秦政秦制比封建的周政周制优越。但燕京社会学派能参照西欧英伦、东亚日韩泰等国经验证明封建制转向现代宪政反比集权制容易。世界史表明：法俄等国激进、德日等国保守都有不良后果，长效都不如英美等国的稳健博弈中庸之道。事实证明：中国土司区的现代化转型和当下民族关系通常也更为和谐平稳。

在燕京大学社会学派视角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古今中国边疆民族事务治理的需求，有助于国家民族应对现代化到后现代的三级两跳创新转型中的发展与治理挑战：发展就要保持多样主体的内生活力，包括生态平衡和人口再生产和文化价值公平传承；治理就要维护家国天下多样主体诚信互信共生秩序，落实一带一路构想并参与全球治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张海洋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教授）

## “后魁阁”范式：中国乡村研究的当代取向

谷家荣

**摘要：**“魁阁”，原本只是云南昆明呈贡县古城村民表达信仰的地方，却因抗战时期费孝通等人的到来而逐渐享有国内外普遍知识和高度认可的乡村研究学术代名。魁阁社会学实地研究是坚信基于微型村庄类型比较可以认识整体中国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实践总结出来的科学范式。它饱满拥有多重象征。其“实地调查”、“自由讨论”、“再回实地”的方法，成就了大批在国内外都具有非常影响力的优秀成果，开创了社会学中国乡村研究的魁阁范式。惠于先辈专家学者们的智引，经青年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中国已基本形成一个极具魁阁范式意义的学术共同体。置于当代社会意境，中国乡村在转型发展中出现许多更为复杂的新文化结构，总结和承继魁阁研究范式，凝练新乡土中国的时代命题，聚合在乡村问题上有共同旨趣的学人，创新开展中国乡村研究，已成为不可推脱的时代责任。

**关键词：**魁阁；学术共同体；乡村研究；范式继承

研究范式是学者们基于客观社会实际所调查抽象出来的一种学术研究意义上的价值逻辑。一种成熟完善的研究范式，由于对其处社会能够进行比较理想的表述，因而容易在学术界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在这个取向上，经费孝通等老一辈专家学者实践探索出来的社会学实地研究魁阁范式，不仅充分释放出基于微型村庄来认识整体中国的特殊魅力，而且在范式意义

上为青年学者遗存了一笔富足的学理财富。在中国乃至相当范围的异国空间里，正是魁阁范式被学人们有效继承，学者们才得以在“行行重行行”的乡村调查和自由论辩中写就出优秀的学术篇章和学术著作。时空穿行，乡村遭遇异文化，中国乡村研究在“出了问题”的范式转型中左右徘徊，认识整体中国社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寻找科学研究范式便自觉为学人们共同的追求。出于此关怀，本文试图通过魁阁研究范式的回顾和总结，和时下具有共同乡村情结的学人，一起探讨适合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学术研究范式。

### 一、“魁阁”隐喻：中国乡村研究的文化代名

魁星阁是云南昆明市呈贡区古城村南面一个当地人供奉神灵和表达信仰的地方，抗战时期，由于费孝通等心怀认识和改造中国理想的学人到来以及随后组织成立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而逐渐被学界所认识。“魁阁”，这个原本朴素的地理区场，现早已成为中西方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三大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较为敬仰和崇拜的文化空间。关于魁阁，费孝通曾回忆说：“返国时抗战已进入第二年，所以我只能从安南入云南，住下了得到中英庚子款的资助，在云南开始实地研究工作，写出了一本《禄村农田》。后来得到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和燕京大学合作机关。我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们一起下乡调查，而且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二十九年冬迁到呈贡，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了‘魁阁’这个绰号。”<sup>①</sup> 尽管“魁阁”工作站没有存在太长时间，实际参与的成员也不多，但人们却写出极具国际同行高度认可的经典作品。正是因为“魁阁”这种深层次文化隐喻的存在，似乎“中国社会学实地调查研究中心在云南，云南实地调查研究中心在魁阁”的见解，才潜在地成为人们基本共识的定论。当下的呈贡“魁阁”，尽管其作为曾经专门供当地人烧香祭拜、以求魁星点状元的文化功能已经彻底消失（魁星阁主楼被作为文物重新整修改造保存，东侧新建楼房用作社区管委会的办公场所），但它并没有因为空间布局形式和其曾经的功

<sup>①</sup>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1。

能的改变而降低学术名位。魁阁所富含的特殊象征意义，使这里成了国内外民族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最乐于步走的文化“圣地”。“到云南魁阁”成为大多数热心于乡村问题研究者的理想追求。

魁阁隐喻成就中国乡村研究学术共同体。魁阁社会学工作站开启了中国乡村研究实地调查的良好风气。山西省作家协会《黄河》杂志编辑部主任谢泳认为，“魁阁当时的工作风格和学风，大体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sup>①</sup> 惠于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哲引，“从微型村庄来认识整体中国”也逐渐成为青年学者的集体意识和实践行动，那些心志于社会学、人类学及民族学研究的年轻学者都早已习惯把“单位村庄”调查作为寻找和检验真理的学术研究取向。青年才俊们的调查研究丰富和再度实践了费孝通等先辈开创的魁阁研究学术范式。经过学者们 80 多年的不断探索和经验积累，充分具有魁阁学术研究意义取向的中国乡村研究学术共同体基本形成。时下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大学科里，举凡带有一定研究性质的学术成果，基于实地调查资料来开展学术研究已成为人们评判学术成果优劣的一条重要标准。尽管有学者认为，现代背景下的村庄调查资料存在“真实”与“非真实”难以有效明辨的困境，村庄调查资料传递的小村故事是否真实更是存在质疑，甚至连调查者进行的所谓的村庄调查的这个过程行为也不一定可信。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微型单位村庄研究始终是最为重要和根本不可放弃的研究理路。这种经由费孝通等人发起而不断成熟完善的学术研究范式，在宏观意义上整体规范了人们的研究行为，人们基于“单位村庄”实地调查研究经验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在概括描述整体中国社会的过程中逐渐成就出一个极具中国本土性质的乡村社会研究魁阁学派。

## 二、“魁阁”精神：中国乡村研究的伟大创举

所谓“魁阁精神”，其实指意的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在云南昆明呈贡魁星阁小楼里实践探索出来的认识和改造中国的一种学术品格。它是一种拥有自我范式边界的学术研究伦理，其方法论的核心

<sup>①</sup> 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J]，北京大学学报，1998（1）。

要义是鼓励人们依循乡村历变发展的社会面相，深入实地进行充分实证调查，去再创造归属并真实表述对象中的“他者”的研究学理。“费孝通探求中国富民的道路，将根扎在中国的农村。”<sup>①</sup> 魁阁社会学实地研究工作站的生命周期尽管只是1940~1945年的短暂五年时间，但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抗战爆发，费孝通从遥远的大西洋彼岸轮渡回国，经越南上岸到昆明，顾不上旅途疲劳，到昆明两个星期后，他就开始到云南禄村调查。时逢战乱，组织人员开展学术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初到昆明的费孝通并没有知情和怀揣共同理想的深交旧友，能帮得上忙或者说有共同心志的，更多也只是从北京转移到云南大后方的老师。费孝通选择到禄村做调查，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其实也是出于有燕京大学师友的照应才确定的。费孝通说：“这个时候几个大学都到昆明了，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组成了西南联大。同时我们清华算学系的老教师熊庆来，他是一个数学家，当了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把吴文藻请去了。不久我也到了云南，同吴文藻接上了头。”<sup>②</sup> 这样，从村庄选点的角度来讲，云南禄村和江苏江村都是费孝通学术研究生命历程中两个事先没有任何设想“无心插柳而柳成荫”的考察点。1940年，当昆明遭遇日本飞机轰炸而缺乏安全保护的情况下，费孝通便组织带领学术知交来到远离昆明市中心的呈贡县古城村魁星阁小楼里，按照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的模式继续开展社会学实地调查研究。魁阁工作站的研究条件十分艰苦。田汝康曾在多种场合回忆说：“魁星阁很陈旧，风一吹，松动的木板就会晃动碰击，晚上睡觉常常被这种碰击声所惊醒。楼面不大，研究人员挤在一起，另有三个书架，有的书和资料装在箱子里。晚上点的油灯，自己用棉线作灯芯。”那个时候，费孝通已是一个做父亲的人，但战争年代，大学教授也同样面临家计问题，能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坚守“基于微型村庄来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这块学术阵地，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学术精神。费孝通是个学术“快手”，女儿费宗惠营养不良，他便卖文养家，靠写作和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所得稿费来维持家庭生活。

① 吴铎. 志在富民与农村研究 [J]. 上海大学学报, 2006 (5).

② 费孝通. 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7 (1).

魁阁精神是西方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中国本土化实践。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中国社会学也是从西方传进来的。但遗憾的是,“西学本土化的融通和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西方社会学概念与中国现实社会及其解释上的契合,中国社会学在追随西方社会学的发展进程中,型构出来的仍旧是一种移植型的品格,这种品格明显体现在源于本土的理论极为匮乏。”<sup>①</sup>为能真正本土化中国社会学,费孝通主动承担起责任,并将研究起点定位在单位村庄。“费孝通最大的贡献,就是吸收了西方文化和人文科学的最新成果,引入了实地调查、实证性实验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全面改造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和治学方法。在本土化过程中,在各个学科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坚持在结合国情、扎根本土这个基础上探讨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使我国的学术界得以走向世界。”<sup>②</sup>学术界公认的真正把民族志研究推到一种学者们都认可并充分实践的人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科学的民族志必须做到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这两者在发生学上的分离或者分工,经过许多人多年的努力,终于由马林诺夫斯基在自己身上第一个完美地达到合一。”<sup>③</sup>1914~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新几内亚岛东南部的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调查,1922公开出版世人认可并开结构功能主义风气的经典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告别战争,马氏走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台。经历了长期落后部落民族社会生活经历,他更加充分地认识到深描地域社会的重要性,于是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开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推行“调查加自由讨论”的“席明纳”(Seminar)式的教学方法。也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费孝通来到这个以讨论为主要范式的班集体,赶上结构功能主义学术思潮的“早春”。其实,留英之前,费孝通跟随吴文藻、史禄国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学习,关于“调查加自由讨论”的研究范式还没有成为中国大学教授们的方法,中国社会学又是一门非常年轻的“洋学

① 赵旭东. 超越社会学既有传统: 对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思考的再思考 [J].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6).

② 马戎. 社区调查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纪念费孝通教授逝世7周年 [J]. 青海民族研究, 2012 (3).

③ 高丙中. 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6 (3).

科”，人们并不完全知识这门学科的核心要义，费孝通对该学科所要求的实地研究根本就没有多少知识积累。1932年，吴文藻为让中国社会学尽快发展起来，邀请了帕克到中国讲学。事出中国学者意外的是，帕克教授在北大讲学的过程中教学中没有始终停留讲台，而是把学生带动北京市区立交桥下观察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大家才逐渐明白社会学实地调查研究的真谛。这个认识对费孝通本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1935年，费孝通先后到广西大瑶山、江苏开弦弓村调查。这两次调查使费孝通明白并坚信实地研究这条认识整体中国的学术道路。巧合的是，这个时候的费孝通，尽管没有遭遇制造大规模灾难的惨烈战争，但也经历了广西大瑶山调查痛失妻子的悲痛，所承受的身心煎熬并不亚于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小岛上的日日夜夜。此外，当时坐进教室里参与讨论的费孝通已经完成王同惠调查遗稿《花篮瑶社会组织》校对，家乡江苏吴江市开弦弓村的前期调查，已经拥有基于微型村庄来看文化要素整体搭配的田野经验。对于他来讲，这个时候参与这种自由讨论具有非常的积极性和充分的谈资。在两年多的自由讨论学习氛围中，费孝通从文化要素整体搭配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文稿交到导师手上，马林诺夫斯基发现学生费孝通的研究与自己有非常相似之处。更为超越的是，费孝通以一个文化主体者身份看待自身文化的方式调查研究文明社会。也正是这一点，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才信心十足地给予费孝通博士论文“开创里程碑”的高度评价。从最初完全封闭在人类学实验室里的体质测量，到后续北京立交桥下观察弱势群体，大瑶山瑶族及开弦弓汉族调查，直至最后写出并赢得当时西方社会人类学界最具名望的马林诺夫斯基的高度认可，费孝通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也是当时西方最为时兴的社会学微型村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因此，1938年，从英国回到中国昆明的费孝通就不会轻易把这种学术研究方法丢弃，积极实践“席明纳”研究方法来认识整体中国社会成为他当时最想实践的学术行动。这种想法不仅使刚一回到昆明的费孝通就开始进入禄村调查。尽管后来受到西洋同门师兄弟“微型村庄不能概括整体中国”的讨论性批判，但如此多的机缘巧合注定会使胸怀“富民”大志的费孝通坚定把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深度描写微型村庄的民族志范式带到中国。得益费孝通的积极推进，魁阁社会学实地研究工作站被组建起来，

并在艰苦的抗战年岁开启了中国式的“席明纳”范式研究。

魁阁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和改造中国的自主行为实践。费孝通说：“中国社会如此之大，又有悠久的历史，一个人的一生想要穷尽对她的认识显然做不到。可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首先就是认识中国社会，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是脚踏实地做研究，一辈子不停顿，世世代代不间断，积有限认识为无限认识。这就要求我们首先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探讨客观规律。科学之道在于实事求是，科学结论不能靠主观臆想。”<sup>①</sup> 抗战时期的艰苦环境下，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矛盾的。尽管报国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理想，但经历国民党消极抗日和人为制造李公朴、闻一多以及西南联大“一二一”惨案后，大家都纠缠在“何以行为”才算真正报国的思绪中。费孝通亲历了过很多事情，在西南联大学生爱国运动中也欺负着重要角色，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的一点是：深入开展农村实地调查研究。在他的影响下，那些在艰苦条件下依然能坚持齐聚昆明呈贡魁星阁讨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其动力已经不是完全单纯意义上的学术追求，支撑他们那种为调查研究“不要命”的动力，根本上升到了为国为民的热血心志。“费孝通毕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其实并不是学术的成就，而是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sup>②</sup> “为研究而研究，有损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对社会毫无补益。”<sup>③</sup> 心怀报国意志的学者们认为，如此泱泱大国为何遭遇一个地理空间上十分渺小的邻国蹂躏而不能自我拯救，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不发展，国民没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而要通过改造进而让国家强大和国民高度认同国家，最基本的前提必须充分认识整体社会。这是当时聚居在魁星阁小楼以费孝通为带队人的知识分子们的一个基本共识。因此，当埃德蒙·利奇质疑费孝通“村庄研究何以能够概括整体中国社会”的时候，费孝通并没有抽象地与他强词夺理，而是告别中国沿海地区的开弦弓村来到中国内地的云南禄村，寻找另一种类型的西部村庄，试图通过“单位村庄”调查，总结研究中国类型村庄，借以回应西方

① 费孝通. 社会调查自白 [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5: 4.

② 杨圣敏. 费孝通: 民族学发展的指路人 [J]. 西北民族研究, 2007 (1).

③ 费孝通. 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总序 [M]. 社会, 2005 (1).



学者。这当时魁阁工作站里的学术同仁普遍怀有的学术心态。

### 三、“魁阁”遗产：中国乡村研究的范式继承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村庄实地研究范式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民族识别及国家各项民族政策的制定实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国家先后从中央和有关省自治区抽调大批专家学者进行民族识别调查。这项大规模民族研究工作历时30多个年头，其中，虽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停顿过10多年，但从其成果来说，应当说是我国民族研究的空前创举。<sup>①</sup>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编写出版的五部大型民族丛书，为国家科学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时事变迁，70多年前费孝通等老一辈民族学专家学者开创的科学研究范式对当代村庄问题研究依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完成之后，一定程度上说，基于微型村庄来认识整体中国社会的学术路径已经得到广泛实践，在总结前期调查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注意到跟踪调查著名田野点的学术价值，回访先辈学者曾经调查的村庄逐渐成为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学者志向。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农村村庄，人口流动已成为普遍现象。赵旭东认为，跨越村落边界，把理想型的乡土社会与现实的游民社会联系在一起考察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表达努力变得极为迫切。因此他主张采用在这两者之间构建起关联的跨越乡土社会的田野民族志方法论来调查研究现代村庄。<sup>②</sup>总体上讲，基于魁阁社会学实地研究基础上延伸出来的著名田野点追踪调查，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指导完成的“云南三村”回访比较有代表性。回访者不仅反思性评论了先辈学者们的某些学术观点，而且还根据村庄变迁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思想。

云南在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占有重要位置。抗战时期组建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为学者们提供了继续从事科研教学的空间场所。在社会学领域，通过微型村庄调查来认识整体中国的社会学理路，最初在云南得以深入实

<sup>①</sup> 费孝通.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验与思考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0 (1).

<sup>②</sup> 赵旭东. 远去与归来：一种跨越乡土的田野民族志方法论 [J]. 西北民族研究, 2009 (1).

践。2000年,为能认识半个多世纪以来云南农村变迁发展的整体情况,云南大学担当“先头兵”,组织开展了人口5000人以上的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调查。2003年,云南大学在总结云南民族调查经验的基础上又组织开展了全国55个少数民族村寨调查。这次调查已经涉及整体中国,研究成果立足于村庄又超越村庄,在全国范围内截面式地“扫描”同一时空下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文化现状。自云南大学开先例之后,国内的许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也陆续开始行动起来。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开展“中国综合社会情况调查”,借鉴日本、韩国及西方国家的问卷模式,制定10年中长期计划,对全国31个省/区的农村和城市社区进行调查。这类调查完全按照问卷形式进行,时间短,所获取的多是数据资料,定性研究并不深入。2006年,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启动“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典型百村调查”课题,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广西五个自治区和云南、吉林、黑龙江三省,调查走访了100个边疆基层村落,全面展现边疆民族村寨变迁发展状况。2008年,针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流失的困境,云南省民委启动“云南少数民族村落语言使用情况调查”项目,调查走访了云南22个民族、79个村落,研究成果提供给相关政府部门决策参考。2009年,云南大学组织开展民族学人类学暑期调查实践,向全国招收学员培训后,安排到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研。近年,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也先后组织过类似的调查。尤其是2012年清华大学组织开展的暑期实践活动,共走访205个村,6000多户村民,规模大,对象分布广。但是,这类调查的时间短,并不能全面深入地占有原始资料。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针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情况,组织开展“中国民族经济村庄调查”。截至2013年4月,已调查87个村庄,出版著作44本。2013年,为能给国家调整和制定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实证素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组织开展了“21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目前,各项内容正顺利推进。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组织开展的村庄调查研究,基本上按照社会发展变迁这条主线,全景式呈现基层村庄各方面的内容,停留在基于单位村庄变化发展情况进行描述性的记录式研究,很少从相对

深层次的学理层面分析研究区域社会的文化结构体系，并没有从单位村寨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变迁现状调查基层上，从更加核心的层面来深入研究文化变迁发展的根骨逻辑及其潜存的科学机理。

#### 四、“后魁阁”关怀：中国乡村研究的重要题域

当下，人口流动成为乡村普遍现象，种地这种“守住农门不放手”的生活已被乡民看作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看到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壮年进入城市，老人和小孩留守在贫困的乡村里，人们开始发问乡土社会是否还能表述中国。关于该论题，赵旭东认为，“对于乡村，这些人带着预先的偏见，以为乡村正在变得失序，未来乡村可能会面临崩溃。他们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乡村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形态的自身转化能力。”<sup>①</sup>费孝通在其晚年也多次谈论到面对日新月异的乡村社会变迁“乡土中国”概念的适用性问题。赵旭东教授认为，从一种最初提出此概念的理想型意义看，这个概念的适用性的涵盖性是可以超越于一定时代限制的。乡土社会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社会类型，这种社会类型密切地跟以土地为生的农村社会紧密联系。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尚没有发明出来一种生存的方式，可以使人的生活的最终环节不依赖于土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社会都可能属于“乡土社会”这一类型，只是不同的社会对土地的直接依赖性强度存在高低差别。赵旭东坚信，费孝通曾经着力去描述过的乡土中国在今天的巨变，绝不意味着乡土社会的消失和瓦解，只要人类还必须从土壤的种植之中获得食物，乡土社会的消失就只能是一种现代人编造的神话。<sup>②</sup>如果承认乡土社会依然能够恒久存在，但我们不能否认异变中的乡土社会释放着多重象征意义，聚焦重要题域，创新研究成为学者们的当代使命。

首先，外部性发展的乡土社会是否尊重文化主体。如果人们肯定乡土社会长久存在，那么放眼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历程，这种恒久存在的乡土社

<sup>①</sup> 赵旭东. 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 (3).

<sup>②</sup> 赵旭东. 费孝通的“乡土社会”何去何从 [J]. 社会观察. 2010 (11).

会，其自我发展演进中的文化搭配产生了新的逻辑规则，即外部性成为乡土社会发展演变的一个最为主要的推动力。传统的乡土社会，其作为一个“无讼”和亲属关系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内生性是其最为主要的发展动力源。传统乡土社会，人们依附土地生存，“求田问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父母在、不远游”，人口流动几乎处于静止状态。区域性的村落空间里，人们彼此关怀，生产互助，用心沟通，懂得世故的老人享有较高的生活权威。由于人们很少离乡走动，“乡里”和“乡外”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区隔，本乡人不关心也不了解异乡人的生活，人们不对照，更不愿意在对比中寻求外部援助，“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是一个文化搭配极为合理的熟悉共同体。这样的时岁，人们即便偶遇都市人觉得非常实惠的外部援助（如新修公路），乡民也会因担心其固定的社会文化结构遭到破坏（如心惧村庄土特产品或年轻姑娘被外面人带走）而拒之门外。与传统乡土社会完全不同的是，新乡土社会主要遵从外部性发展逻辑，乡村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始终复合多重外部文化要素。其实，只要人口流动出现在乡土社会，那就意味着人们传统乡土社会的生活格局被打破。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明显，西部落后地区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会被这种差距“拉出”乡村。这部分“跳农门”的青年群体，当经历都市生活体验和先进文化改造再回到自己乡村时，就会不同程度地矛盾在文化调适的困苦当中。如果这种阵痛不能根本消除，他们便主动扮演起改造村落生活群体的角色。时久，乡村经由他们而异生出许多新文化，年轻人开始跨越传统，寻求理想生活。这样，外部性力量就逐渐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寻求政府和各种外来帮扶成为大家共同的祈望。由于不甘心长期遭遇贫困责难，这个时候的乡民，哪怕是世代祖宗占有的资源，也愿意和盼望有人来发掘，将其转化为致富乡邻的财富。然遗憾的是，这根基于乡土社会内部内生性萌生出来的富民“草根”，并没有在新乡土社会获得茁壮成长的环境。乡土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社会交往模式以及社会心态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很多地方，乡民寄希望外部力量开发利用乡村资源以富民的群体诉求，被有势的干部和有经验的老板共同组合起来的外部力量或者说既得利益群体利用，开挖了乡村，乡民却没有在兴乡富民中摆脱贫困。

其次，新文化模式是否真实归属乡村社群。全球化背景下的乡土社会

经历各种镇痛，从传统社会跨越到现代社会，尽管浓郁地方文化传统的老年群体始终惦念甚至以实际行动维护传统习俗，但依然难以抵挡全球化的“文化侵蚀”浪潮，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告别文野之别，跑步进入乡里乡外“一片天”的时岁。在这样的文化空间里，人们的乡土意识淡薄，曾经的情感交往逻辑渐而被工具逻辑取代，礼尚往来中的“物”成为人们社会交往中普遍认同的中介，礼物崇拜不同程度地冲淡乡民们的共同体意识，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乡民村落社区高低贵贱的重要身份指标，作为一个“原子化”的家庭个体，为能让家人在乡里乡外都有一个“体面”的形象，哪怕是始终以“多子绕行膝下、父母在不远游”为至上生活理想的老年人，也愿割舍本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保留孤独，让子女们离开自己，远行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从事副业，增补家庭财富，以实现“活出脸面”的理想。对于青年人来讲，都市的吸引，即便得不到父母的宽容和允诺，走出乡村仍然是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受过良好教育的乡村知识精英，愿意选择留在环境好、经济收入高的大都市；没有得到过多少教育但有一技之长的年轻人也希望到都市成就自己的事业；没有明确目标和文化知识积累的青年人，也会怀着到城里闯荡一番的想法而离开家乡。全球化背景下转型发展的乡土社会有着多重意义。从单位家庭讲，乡村人口外流，给老人留住了孤独，给未成年的孩子留下了想念。但从更加宽泛的区域社会讲，乡村人口流动则会给乡土社会制造严重的人文资源失衡问题。乡村本是生活主体相互关爱、人情味较浓的社会。年轻人告别乡村，维护乡土文化的责任便彻底转移甚至抛给那些高龄年岁的老年人。由于缺少更多的参与人群，老年人在维护乡土人文的过程中便容易陷入“孤岛式”的文化继续漩涡，当他们谢幕人世，那些经由他们还可以勉强传承的传统文化便注定会走到断裂边沿。离乡的年轻人当家乡亲人离世或是随从进入城市后，更没回家的心绪。这样，由于缺少文化传承人，乡土文化非常容易在人们集体无意识中遗失。对于那些当初离开乡野的青年人来讲，经历了都市忙碌或冰冷的资本积累生活而重返乡村试图寻找乡村温暖的时候，乡音已尽失，作为文化的陌生人，早已不可能再拥有和饱享曾经那种充分尊重人本的乡土人情。

## 五、“后魁阁”旨趣：中国乡村研究的主要视点

自然文化村作为单位微型村庄选点。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开展乡村社会调查，传统的魁阁范式需要继承，但更需要结合村庄真实，创新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实现“认识整体社会”的目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村庄，自从人口流动成为村庄重要内容之后，传统文化格局受到冲击，在外来文化全方面影响和改造下，很难坚守传统村落意义上的文化格局。其实，当村落构成主体中的青年人开始流动时，单位村庄就不可能再继续恒久维护村落文化边界，文化异变必定会成为村寨事实。村庄在变迁发展中逐渐沉淀出新文化类型。文化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环境中积累总结出来的经验。任何文化都会受地缘关系影响。这就意味着，村庄在变迁发展中创造新文化时，不可能摆脱地理空间的限制，尽管人口流动使村庄交织进许多异文化，但参与到村落空间的文化要素都会不同程度地适应村庄环境。否则，外来文化要素就不可能在村庄恒久停留，更不可能在村落社区获得发展繁荣的机会。这样，“流动”的村庄，其自我建构的文化模式往往就是一个充分基于自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自然文化村。自然文化村很大程度地模糊了单位村落的地理空间边界，区隔自然文化村的核心边界转移到文化这个核心元素，文化成为划分村庄类型的基础准则。因此，现代村庄调查，虽然不能放弃费孝通等人开创的微型自然村庄范式，但在村庄选点的问题上，则需要上升到自然文化村的高度，才能真正基于微型村庄调查实现认识复合整体社会的目的。原则上，遵照自然文化村逻辑进行村寨选点，每一个自然文化村应该以六个村庄为基层文化单位最为合适。因为，六个自然村组建起来的一个自然文化村，其文化构成已经可以从一个较为系统的整体结构上来加以研究。这种意义上的村落共同体范围内，是一个文化相对完整的区域共同体，其文化要素的搭配可以从一个相对完整的结构功能上得到阐释。基于这样的区域共同体的描述，是可以实现认识整体中国社会的。若以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为例，坚持自然文化村原则，就可以按照“三级文化圈”方式进行村寨选点。第一级次的自然文化圈，主要针对云南世居且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25个世居少数民族，每个民族可以选择2~3个支系作为对象，总体规模控制在75个自然文化村以内。第二级次的

自然文化圈，主要针对人口在 5000 以下有固定聚居村落的非云南世居少数民族，总体规模控制在 20 个自然文化村以内。第三级次的自然文化圈层，主要针对人口比较少并且没有固定村庄聚居点的民族，以据具体情况，可以选择 5 个左右的民族村寨进行调查。基于这样的原则进行村庄选点，充分兼顾文化代表性，因此可以基于自然文化村来认识当代背景下的云南整体民族文化特征。

人文资源作为乡村研究重要选项。“所谓的人文资源就是人工的制品，包括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它和自然资源一样，只是自然资源是天然的，而人文资源却是人工制造的，是人类从最早期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文化、人类的历史、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一样，有很多是属于不可再生的，一旦被破坏掉，就永远无可挽回。”<sup>①</sup> 全球化背景下的村庄，最为明显也是最为重要的表征是传统意义上的村庄人文资源遗失。村寨人文资源是乡民在历久的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财富，它源于乡民生产生活实践，又反作用于乡民社区生活。缺失人文资源的乡土社会，是不能有永久存在根基的。作为一种文化财富，人文资源根本就是支撑一个社群恒久存在的关键要素，如果一个民族缺失人文资源，那么其文化共同体就将被解散，这是一个基本的基础逻辑。现代化背景下的很多村庄，这个逻辑底线正在被打破，而作为人文资源主体却处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现代意境下的中国乡村，很多离开家乡的青年人“一切向钱看”，早已不关心传统文化，主动丢弃传统文化成为普遍性行动，保护人文资源的责任转移给老年人，代际传递的断裂，人们终将受到人文资源彻底遗失的报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年轻文化主体缺少传统文化资源的关怀，即便遭遇这种报复，依然“不疼不痒”，甚至根本不知觉。面对这种情况，1997 年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文化自觉”的观点，呼吁人们用实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悠久历史的文化。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

<sup>①</sup> 费孝通. 人文资源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和意义 [J]. 文艺研究, 2001 (2).

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sup>①</sup> 针对这种文化困境，国家也采取过许多办法来扶持文化传承人，试图通过“安排培养”传承人的方式来传承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传承的方式理论上是理想的，但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政府主导型的文化传承方式难以能调动文化持有者主动传承文化。文化是文化主体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并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技艺，当这种技艺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文化主体便会主动抛弃，进而重新选择或是创造新的文化技艺。文化是根本需要基缘于文化持有群体的内在情感和实际生活需求才能得到有效传承的，政府主导型的方式很难获得理想结果。其二，政府主导型的文化传承方式容易引发各种利益纠葛，很难选择出真正的文化精英。政府动员培养的文化精英，实质上是一种利益推动行为。按照政府设计推行的行动模式，凡被推选培养的文化精英，可以定期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由于这个物质利益的存在，很多人便开始动用关系，试图成为被选择的对象。这样一来，不仅不能保证文化传承人的整体素质，而且还会在文化精英群体中产生新矛盾，那些真正懂得文化的人不但没有再度延续和传承文化的动力，而且还会不同程度地干预“传承人”的行为。“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要有历史文化和艺术方面的基础。”在“传承人”为了有所表现，又会毫无文化根基地举行多种展演性的文化活动，慢慢丧失文化基业。

乡民心态作为乡村研究主体内容。心态是文化持有者实践行动的根本促动力，文化持有者保留和丢弃文化的行动，本身是其心态的一种外在表现。如果说人文资源关注的是文化持有者的外在文化要素，那么心态关注的则是文化持有者成就各种外文化的内在基础。从这个层面上看，乡民文化心态研究的重要性不逊于乡村人文资源的研究。乡民心态直接决定人文资源的存在形式。全球化背景下，突破地理空间边界组织起来的自然文化村，是人们基于共同心理认同基础上构造出来的区域共同体。如果单位主体的文化“不认同”上升为文化群体的共同认同心理，那么传统人文资源

---

<sup>①</sup>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C]，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478。



将会遭遇被遗弃的命运。当然，一些时候，共同的文化“不认同”，会使文化群体构造出超越单位地理意义上的文化村庄，自然文化村也不排除是文化主体共同的文化遗弃心理再建构起来的新型文化村。不排除的另一种文化视像是，或许超越单位地理村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文化村丰富保有多样传统文化要素。但不管是文化主体内在心理铸就，还是政府主导型保护的结果，只要这种类型的自然文化村存在，那都是人们共识心理的结果。综上两点缘由，乡民心态就应当是当下乡村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承续魁阁范式也是一个艺术过程，既需要学者们换位“体感”前辈学者们所处动荡年岁时的心态，也需要知识当代社会背景下的真实乡村及真实的乡民心态，依循随时势历变发展的乡土真实，再造归属于乡村文化持有者的科学研究范式。

（谷家荣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教授）

## 综述（代跋）

### 冰心研究的新收获

#### ——冰心文学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东方 鲁普文

冰心文学第五届国际研讨会 2016 年 11 月 7 日在昆明举行。本届研讨会由福建省文联、云南大学、福建省作家协会、冰心研究会联合主办，冰心文学馆和云南大学文学院承办，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福建省文学艺术对外交流中心协办。来自中国、美国、日本、泰国等国的 80 多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会议收到 51 篇论文，五十多位学者作了主题发言。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 一、冰心创作与翻译研究

冰心创作与翻译研究成果突出。小说方面，有降红燕《中途点的迷思——〈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叙事与性别》、舒凌鸿《幽咽泉流冰下难——冰心小说中的个人型叙述声音》、刘岸挺《第一声诘问：谁之罪》、刘传霞和丁雪艳的《论冰心作品中的外国女性形象》、王兴霞《寻找“理想的父亲”：冰心创作中的另一面》等；诗歌方面，有伍明春《早期新诗话语场域中的“小诗”——以冰心为考察中心》、万莲姣《冰心诗歌的社会文明价值观之今探》、萧成《泰华“小诗磨坊”对冰心〈繁星〉与〈春水〉诗艺之借鉴》等；散文方面有张叹凤《论冰心文学书写中的西南地理文化呈现》、石华鹏《试论冰心乡情散文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孙桂荣《“传统”性别话语如何对当发言？——从冰心〈关于女人〉谈起》、祝敏青《〈默庐试笔〉中的“冰心体”叙写》、吕若涵《冰心的西南：伤悼忆往、“庐”之言志与风景描写》、林佩璇《从〈默庐试笔〉文本分析看冰心的抗战情怀》、郑斯扬

《空间反思中的冰心：〈默庐试笔〉的意义指向》；张翼对冰心散文诗语言艺术进行了研究。以往冰心较少受到关注的作品，这次也有人关注。如乔世华《比较冰心与巴金的挽郭文》、江震龙、迟伟红《冰心1940年代创作谈研究》等。翻译方面有陈恕《冰心翻译的世纪回眸——译著的人文关怀及其他》、李海英《冰心“奇迹”：一个女性作家的成功与难题》、李娟《冰心与〈吉檀迦利〉中译本——兼论〈吉檀迦利〉孟、英、中版本的文化关联及意义》等。学者们或对冰心创作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或从她的单个文体切入，或对其文本进行细致的解读，研究视角、理论与批评方法多样。从研究视角来看，有冰心在海内外影响、传播研究，周师师《宿命或影响：论冰心与福建女作家》的论文谈到冰心对当代福建女作家的影响。萧成论述了泰华“小诗磨坊”作品对冰心的《繁星》《春水》的艺术借鉴。陈婷婷《冰心文学作品在泰国的传播》对冰心文学作品在泰国的翻译、传播做了介绍。有比较研究，乔世华分析、比较了冰心与巴金的挽悼郭沫若的文章之异同。有人物形象研究，刘传霞、丁雪艳论文和王兴霞的论文，分别对冰心作品塑造的外国女性形象和父亲形象进行探析。还有宗教思想研究、创作与翻译互动研究等。从研究理论方法来看，降红燕采用女性主义叙事学方法解读《我们太太的客厅》，认为它是冰心最富于审美魅力的小说之一，体现出冰心对叙事艺术的掌控技巧和女性性别的思考深度。郑斯扬用空间叙事学理论，对《默庐试笔》中的“默庐—北平”进行空间政治性解读。舒凌鸿对冰心个人型叙述声音的小说进行叙事研究。林佩璇在广义修辞学理论理论框架下，从话语不同层面解读《默庐试笔》的文本修辞特色。祝敏青以《寄小读者》为参照，考察《默庐试笔》中多种修辞手法的表达。张叹凤从地理人文学的视角，对冰心于抗战期间居处西南地区的文学创作，召开论述。学者们还就冰心话语当下价值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孙桂荣指出，冰心看似“传统”的女性话语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与现代女性自立自强精神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性别话语日渐多元、各类消费主义思想甚嚣其上、女性主义越来越激进的现时代的今天，有重新提倡的必要。万莲姣认为冰心诗歌所折射的社会文明价值观，有益于现实或未来中国的社会文明建设。毕新伟强调，冰心的女性德性观是一种现代型的女性德性观，它中正平和、继往开来。重读冰心，对于当下社会的家庭建设有所裨益。

## 二、冰心非文本研究

冰心非文本研究在日记、书信、档案等各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周立民《金坚玉洁的友情——冰心与巴金往来书信读札》，解读冰心、巴金间的通信。他认为这些信件刻画了两位文学大师不同的性格和气质、之间真挚的友情和忧国忧民的胸怀。刘嵘《冰心日记中的时代生活——解读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冰心日记》，以冰心本时期的日记为研究对象，从出访生活的实录、时代场面的描绘、文学趣味的表达、真实心灵的律动和亲情关怀的呈现五个方面，解读时代大背景下冰心日记中所呈现的时代生活。凌孟华《名人日记与冰心行实论纲——从冰心在昆明的门牌号说起》通过勾勒了吴宓、罗常培、顾颉刚、陈克文、朱自清、叶圣陶等名人日记记录下的“冰心行实的几个方面与若干细节，试图揭示‘名人日记与冰心行实’话题的重要性与丰富性，凸显其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步起跃教授《冰心和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成绩之研究》，调阅了冰心、宋美龄的在威尔斯理学院的档案，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尤其是她们的学习情况。牧野格子《关于包贵思——以与冰心、杨刚的交流为中心》围绕包贵思的文章和她写给威尔斯利校友会的信，梳理了二人的交往与相互评价。施晓宇《冰心故乡考》搜集族谱，方志等史料，和田野考察相结合，补充了冰心父系、母系方面的一些家族史料。陈卫《感谢病与别离——冰心在云南呈贡的抗战生活》围绕冰心写的信、条幅、校歌、宝塔诗等，还原了冰心呈贡心境和生活。这些成果是对冰心生平经历和交往、家世渊源的研究的推进。

## 三、冰心研究之研究

冰心研究之研究是对冰心研究的再考量、再批评，是对冰心研究成果的重新审视，对推进冰心研究继续发展有着特别意义。本届研讨会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1）对冰心研究的整体考察和建议。冰心研究会会长王炳根先生在他对冰心研究的整体把握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认为，冰心研究方面尚存几个领域有待深入：“冰心体”的语言问题研究、接受美学的研究、文本尤其是冰心与基督教的关系及她为此创作的作品研究、日记与书信研究。（2）对冰心研究者成果的研究。《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

文藻》是王炳根先生的“冰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代表着冰心传记写作、生平研究的新进展与新收获。”李玲《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与精神风骨——评〈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与吴文藻〉》，强调了王炳根冰心研究的创新性、吴文藻研究的拓荒价值。她概括了这本专著的四个特点：提供了丰富扎实的历史资料、贡献了前沿性的学术见解、理性审察与激情写作的融合、学术评述与艺术想象的统一。熊飞宇的专著《重庆时期冰心的创作与活动研究》是对冰心的一个断代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次熊老师也提交了解读它的文章。文献是研究的基础，熊老师的成果无疑也是重要的。(3) 文学史视野下的冰心研究和冰心研究综述。温奉桥、李萌羽《论冰心文学史形象的建构和嬗变》选取新中国成立后具代表性的中外六部文学史著作，从文学史体例到叙述语调，考察冰心文学史形象的建构和流变，进而阐释冰心文学史形象建构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深层原因。洪丽霁《当“超人”成为问题——冰心〈超人〉的百年研究历程回顾》，回顾与审视近百年的《超人》相关阅读史和研究历程，认为这些研究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各自的价值和意义，至今仍不无某种启发性与借鉴作用。出于“分析冰心研究现状，确认成绩，指出偏颇，追索原因”，“把冰心研究引向深入”之目的，冰心研究之研究是富有意义和价值的。

#### 四、其他研究成果

本届研讨会还有其他一些收获：(1) 吴文藻研究。吴文藻是著名学者，是中国社会学燕京学派的创始人，在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很大。同时吴文藻培养了诸如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黄迪、李安宅、李有义、陈永龄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但他更多是作为冰心丈夫进入读者的视野中。鉴于吴文藻和冰心的关系，他也是我们在研究冰心时无法绕开的一个人物。本届研讨会，这方面的成果有张海洋《内生的活力与共生的秩序：燕京学派与共产党殊途同归》、谷家荣《“后魁阁”范式：中国乡村研究的当代取向》、娄贵品《吴文藻与顾颉刚关系考述》等。(2) 名人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吴富贵论文《冰心与云南：文学名人与文化名城》，以呈贡默庐冰心故居名人文化特色资源为例，分析了地方特色文化开发方面的优势，尤其是文化名人冰心译介纪伯伦文学作品对接中黎文化旅游项目综合利用开



发前景及其在名人文化建设和文化强省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和发展愿景。

本届研讨会，与会学者展开充分热烈的讨论，各种观点碰撞、交融，贡献了许多宝贵意见。当然会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这为新的学术生长点留下了空间。希望本届研讨会能够启迪我们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新的研究方向，推动冰心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

（刘东方 冰心文学馆馆长；鲁普文 冰心文学馆学术研究部馆员）



福建省图书馆

FUJIAN PROVINCIAL LIB

20

I206.7  
583  
2016:2  
2017  
福建省图书馆



冰心论集 2016

ISBN 978-7-5550-1266-5



9 787555 012665 >

定价：150.00元  
(上、下册)